

中國經濟
論文集

中國經濟叢報社編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第三集

中國經濟論文集

第三集

中國經濟情報社編

(Institute of Chinese Economic Information)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

55071
4543

23

目次

總論

1. 目前研究中國經濟的目標..... 1
2. 中國國民經濟的總動員..... 11
3. 國民經濟建設的先決條件..... 18
4. 工業日本與農業中國..... 25
5. 華北經濟的殖民地化..... 34

貿易

1. 論貿易出超..... 45
2. 談談德僞商務協定..... 54
3. 蘆鹽輸日的意義..... 62
4. 驚動全球的華北走私問題..... 70
5. 過去抵貨運動給與敵人的打擊..... 80

工業

1. 中國煤礦業和煤業會議..... 87

2. 中國鋼鐵資源與鋼鐵工業	95
3. 中國棉紡織業的新趨勢	103
4. 中國的絲繭業	112
5. 中國的糖業問題與國糖產銷協定	120

農 業

1. 談中日棉業合作	131
2. 私有？村有？國有？	138
3. 土地村公有方案的實際意義	153
4. 農本局的性質和前途	169
5. 中國當前的災荒問題	180
6. 本年内幾種農民糾紛的研究	190

金 融

1. 幣制改革以後	201
2. 中國跌進英鎊集團以後	210
3. 中美白銀協定的透視	220
4. 中美會談與新幣制的前途	229
5. 評“對於增加籌碼問題意見書”	238
6. 從“物產證券”談到一般的貨幣理論	247

財 政

1. 由平時財政說到戰時財政	265
----------------------	-----

2. 非常時財政問題的再檢討 ····· 276
3. 中國的新公債案與財政 ····· 287
4. 所得稅的開徵及其前途 ····· 295

交 通

1. 論鐵路建設與鞏固國防 ····· 305
2. 論滄石路的建築 ····· 312

東 北

1. 東北勞動大眾的亡國奴生活 ····· 317
2. 東北農民的生活和奮鬥 ····· 331

總 論

1. 目前研究中國經濟的目標
2. 中國國民經濟的總動員
3. 國民經濟建設的先決條件
4. 工業日本與農業中國
5. 華北經濟的殖民地化

目前研究中國經濟的目標

錢 俊 瑞

在今天中國正由一個半殖民地急速地變為完全的殖民地，同時全國規模的對敵人的武裝搏鬥快要爆發起來的時候，我們來研究中國經濟到底應當而且必須研究些什麼呢？一句話說完：我們要研究全民族對敵抗戰的物質（或稱物資）與社會的基礎。詳細點說，我們第一要研究：在某帝國主義對華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侵略之下，中國的各個民族和各種社會成份，那些一定會參加抗敵救亡的陣線，那些可能參加這條陣線，而那些定然會參加敵人和漢奸的陣線；第二我們要研究中國現有的資源和生產裝置應當怎樣配合着全民族的抗敵戰爭，進行必要開發和動員，來保證抗戰的勝利。

有一些中國的“正統派”經濟學者到今天還在那裏背誦亞丹斯密列克爾的原理，捧着馬爾薩斯人口論的講義，跑上講台，我們不是有意地在替我們民族的敵人作理論，也作成了民族敵人的俘虜。這種現象當



然是可恥而又可悲的：然而這種可恥和可悲的現象却有它一定的社會根源，那些“金裝”了的經濟學者到今天還沒有觸到某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大眾瘋狂的掠奪，到今天還沒有聽到和見到中國大眾救亡的呼聲和行列（更不要說他們會參加了），他們的利益依然安安穩穩安放在銀行和最高學府裏面。他們今天所要求的只是如何在“滔天皇恩”之下，讓他們的金屋殿堂繼續存在，因此他們願意捧着那些經濟學上的陳言爛說，來討好敵人，包庇自己。他們用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來證明敵人的侵佔我領土，虐殺我人民之為合理；用自由貿易來解釋敵人侵奪我市場，甚至用走私來踐踏我市場，是一種“科學的行為”。他們否認貨幣權爭奪的理論，來掩護敵人和其它帝國主義對於中國財政金融的進攻；他們又用經濟發展程度決定民族興亡的機械理論，來證明敵人滅亡中國是“天演公理”，而中國民族的淪亡也是必然的歸宿。我們知道那些稍有“良心”的學者可以不看到東北四省的淪陷，可以不看到華北內蒙的被敵人武裝佔領，可以不看到幾千萬同胞的被人奴役和屠殺，然而他們不能不看到平津學校的被人勒令遷移，華北各校校長和教授的被人驅逐；因此他們也就“不禁有動於中”，背棄他們一向保持的謬說，同情於救亡的正確理論和行動。然而另外竟有些恬不知恥的名流學者，在此情況之下，竟還能運用其腐朽的經濟理論來奉迎敵人的意志。李權時博士的中日經濟提攜

論，便是著名的例子。

另外有一部份經濟學者，他們往往滿足於背誦新政治經濟學的法則，他們只想努力研究商品價值，資本的構成，生產的過程乃至地租理論。等到他們一接觸到現實問題，不是感到頭痛，便是覺得生疏，他們不會而且往往不願參加實踐的過程，增進和糾正他們現實的認識，結果他們所習知的理論，就變成死板的教條，而無補於問題的解決和現實的改造。

此外，國內還有一部份經濟學者，他們站在科學的經濟學的立場，在發掘中國社會機構的內層，確定中國社會的性質，由此而說明中國社會改造的方向、任務、和動力。這種可敬的工作對於中國求取解放的大眾的確已經有了不可抹殺的貢獻；同時在中國學術界上也已經樹立起輝煌的界碑，然而在今天，當我們的民族敵人正在張牙舞爪，滿想一口氣把中國吞滅，中華民族已經站在不求生存便是立即死亡的最後關頭的時候，這些學者在研究領域中的努力是不是已經算足夠了呢？

我們說，還沒有，而且差得還遠。第一，他們還沒有把國內社會改造和民族解放的任務正確地統一起來，尤其是還沒有把民族解放的任務提到澈底解決中國問題的第一位。我們知道，這不僅是個疏漏，而且是個很大的錯誤，我們試問：在目前中國正從一個半殖民地變成完全的殖民地時候，還有什麼會比爭取民族的獨立和解放，更加神聖，更有決定的重要性呢？

我們能夠設想在最大的民族敵人沒有給我們擊潰以前，我們能夠求得全般的社會解放嗎？我們知道，這是決不可能的。恰巧相反，我們主要的民族敵人一天沒有消滅，他們對於我們的生存權利便一天剝奪一天，他們對於我們要求解放鬥爭的壓迫，便一天兇過一天，因此我們就沒有理由來放過我們民族最大的敵人，關起門來大談其在裏面改造的工作。當然我們在這裏又決不能機械地把民族解放的任務高高掉在半空跟社會改造的內容隔離起來。我們應當了解民族革命和社會改造兩者之間，有其有機的不可分的聯繫。從上面所說，我們知道，社會改造一定要跟着民族革命前進；現在我們要說，民族革命一定要社會的改造來充實牠的內容，保障牠的勝利，因為脫離社會改造的民族革命只是殖民地一部份有良心的統治階層的幻想；牠是得不到大眾的參加和擁護的，因此也就是沒有動力的死東西。

我們不能否認，過去一部份經濟學者的所以不談民族解放的確是因為他們在有意無意地之間，已經受了關於民族問題的偏見的影響。他們怕談民族獨立與自主的問題，為的是他們怕被人家‘貶’做民族主義者。他們怕說民族革命，為的是他們怕人家罵做抹殺社會革命的混蛋。他們甚至不敢設想中國是一個國家，是一個民族，他們‘科學的頭腦’命令他們只能設想中國只是一個‘社會’，一個由幾個階級和階層組成的社會。

實際上這種了解可以說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中國是這麼一個社會，這是不錯的；然而中國却同時又是一個民族，又是一個具備着各種必要條件的國家。如果有人只認識到民族是個整個，只知道誇揚自己民族的優點，竭力要造成本民族對於別個民族的壓迫，那末他們只是侵略的民族主義者，他們跟求取民族的獨立和自主是無與的。同時如果有人只能抽象地了解到國家是超乎一切的權力，竭力想法擴充本國的領土，發揚本國的風光，那末他們只是偏狹的愛國主義者，他們跟維持國家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也是毫不相干的。當然，無論侵略的民族主義者也好，偏狹的愛國主義者也好，他們都是。認侵略是合理的行爲，因此他們生長在帝國主義國家，便是徹頭徹尾的侵略主義者；而一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却又往往搖身一變，成爲投降主義者的尾巴。

我們當然願意那些偏狹的民族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能夠爲我們民族的獨立和祖國的解放而努力，而奮鬥，然而我們更希望他們能夠擺脫那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觀點。站到正確的把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造的任務看做密切不可分離的觀點方面來。我們不怕承認中國是一個民族，恰恰相反，我們還誇耀我們這個古民族的光榮和優越，我們還熱愛我們的祖國；我們要憑着這種誇耀和熱愛，來摧毀我們民族的內外敵人。我們認爲，我們光榮的民族，我們偉大的祖國，在這一世

紀來已經受盡帝國主義者獸性的踐踏和國內奸細們無恥的污辱。我們固然看到，假若一個民族正在壓迫別個民族，那末這個民族本身一定不會是自由的民族；同時我們更能看到，一個被壓迫的民族，那就更談不到自由，反之，牠是受到內外敵人的雙重壓迫，因此被壓迫民族的大衆首先就應當團集整個民族的力量，打擊內外的敵人，以求自身的獨立與解放。

沒有全般地充分地把民族解放的任務擺到第一位，同時沒有把這任務和社會改造的任務有機地聯繫起來，這是目前一部份進步的經濟學者所犯的第一個毛病。

第二，那些經濟學者在中國社會經濟的性質的研究上確用過很大的功夫，特別從兩次熱烈的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和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以來，一般研究中國經濟的朋友們對於中國經濟的結構，確乎已經具備了相當的認識。這種研究的成果一面是最近十年來社會實踐的結果；同時又使這種實踐推進了一步。

然而不幸很很，我們研究中國經濟的朋友們因為研究材料的缺乏，特別是因為自身實踐的不夠，對於最近期內——或是說，或一九三一年以來社會經濟的變化，並沒有給以正確的評價。在這時期，中國正從一個半殖民地變成完全的殖民地，這種情勢的急轉直下已經使得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起了很大的分化，各個階層之間的對比也有很大的變化；這種分化和變

化對於反帝國主義統治的民族陣線的建立，可以說是非常有利的。

首先我們要說民族資本的陣營裏面所起的變化。過去我們認定：外國資本強烈的壓迫使得我們的民族資本，失去獨立發展的可能；同時國內革命勢力的發展，又剝奪了民族資本反抗外國資本和削弱封建勢力的最後勇氣；結果我們的民族資本爲要維持其豐厚的利潤起見，爲保證牠自身的存在不受致命的打擊起見，就很自然地向外國資本投降，向封建主義妥協了。

這一種對於中國民族資本的估量到現在是不是還算正確呢？是的，這種估量在基本上還是正確的，然而估量得並不夠，特別在政治的意義上是不夠的。我們知道從一九三一年以來，中國所受某帝國主義在軍事上，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進攻，已經使得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存碰到了最後的危機，這其間大部份民族資本家也早已感到致命的威脅。不消說得，日本的資本靠了牠雄厚的軍事政治力量，向中國國民經濟進攻，結果民族資本的陣營，在他們沒有重新英勇地參加廣大的反×民族陣線之前，只有被打得七零八落，毫無存在的餘地。在另一方面，民族資本買辦化的必要雖然增加了，可是，買辦化的可能却在一天天減少，因爲第一，某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統治一天天趨於獨佔，其他帝國主義已經遭到最後的排擠；第二，某帝國主義

對中國的統治一天天在採取直接統治的方式，買辦資本的功能已經在一天天縮小。這樣中國民族資本在牠主觀上已經碰到一條死路。

在這種情勢之下，中國民族資本，甚至於一小部份的買辦資本（特別是那些給某帝國主義以外的帝國主義謀利的買辦資本），對於某帝國主義的進攻，可能不立即投降，而且有參加整個民族反×陣線的可能。日本在華的猖狂走私，迫得全中國的民族資本家不得不起來作最後的吶喊，這不是明顯的例子嗎？

其次，我們要說到農村中間的地主和富農。不錯，中國的地主和富農到如今還是用着半封建的剝削方式（富農是有一部份是用資本制的）收奪下層農民的血汗，特別是土地，他們還是國內封建勢力的主人翁。然而我們單是這樣估量是不是夠了呢？不，還是不夠的。在某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掠奪正在猖狂進行的時候，中國的地主，特別是富農，是可能起着某種程度的反抗作用的。對日本的軍閥和資本家搶到了我們的東北四省以後，一面實行大規模的武裝移民，一面便隨意沒收當地人民所有的土地。東北的地主和富農在這裏所受到的損失和威脅，使他們部份地可能同情甚至參加當地大眾對某帝國主義的抵抗。在關內的富農，他們的經濟狀況一天天在惡劣了，同時他們以小資產者的資格可能蘊藏着一種熱烈的愛國

情緒，而參加反抗國外民族敵人的民族陣線。

所有這些，我們前此都沒有周詳地估計到，而這種新的估量，對於目前正在進行着的決定民族存亡的決戰，却有非常大的意義。因此我說，我們的經濟學者對於最近期內中國社會成份的比重及其地位的變化並沒有去充分的估計，確是個很大的缺點。

第三，我們研究中國經濟的夥伴們在過去曾經集中他們的力量在中國社會經濟關係的分析上面，這本來並沒有錯。然而我們在目前却要提出我們新的任務，我們必須用更多的注意來研究中國資源的分配，生產以及金融交通運輸的技術機構，為的是要完成我們經濟上的總動員，保證我們對敵人抗戰的勝利。這個新的任務在我們目前的研究工作裏面，不僅應當佔到一角地位，而且應當佔到主要的地位。我們為要完成這個任務，我們一定要糾正過去把技術的範疇和社會的範疇機械地對立起來的錯誤，我們一定要從民族總動員的觀點，分析社會和技術的構成，而把社會關係和技術關係正確地聯繫起來。

末了，我們得重新申述，空前的民族危機和中國大眾爭取解放的鬪爭已經將一種最重要的任務交給我全國人民：我們應當怎樣勝利地開展我們的民族解放戰爭？一切研究中國經濟的夥伴們，應當在這個總的任務之下，規定他們自身應做的和必須做的工作。這個工作就是研究中華民族對敵抗戰的物

資和社會的基礎。

我們就在這樣嘗試着。

(附註)本文是著者新著‘國防經濟論’的緒論，全書在編述中，最近可出版。

中國國民經濟的總動員

錢 俊 瑞

我們在‘永生’第二期說過，假使我們的確能夠向我們頂主要的敵人抗戰，那末最後勝利的把握一定是在我們手裏。我們在那裏曾經指出某帝國主義在技術經濟上的缺陷，特別是社會內部的缺陷，會最後粉碎他們一口氣吞滅中國的野心。

但是我們絕對不是樂觀的定命論者，我們決不會抄襲那些“中國民族無論如何不會滅亡”的呆子理論，來安慰自己，來欺騙別人。某帝國主義決計不是元代的蒙古遊牧民族，牠也決計不是十足封建的滿洲民族，牠之侵略中國在意義上跟蒙人滿人“入主中原”根本不同。某帝國主義雖然跟我們“同文同種”，“誼同袍澤”，然而爲要滿足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慾望，爲要延續和擴大他們軍閥資本家的統治起見，他們是會“大義滅親”的。所以，儘管中國具備戰時的各種有利條件，然而倘若我們富裕的資源儘是躺着不動，或是被人家“鯨吞蠶食”，我們廣大的人力，儘是聽便人家用毒物斲喪，用槍炮來轟炸；我們比

某帝國主義好過百倍的社會基礎，只是長此自己戕害下去，那末中國終有滅亡的一天。

要求我們的生路，而且要使我們中華民族“永生”下去。我們從此刻起，便要在各方面動員起來，對我們的主敵作殊死的抗戰。我們立刻要動員全中國的物力、人力、財力、在一個集中的目標之下，有計劃地有組織地進行決定我們命運的工作。

全部國力的動員應當包括陸海空軍的軍事動員，全國文武機關人員的動員，整個國民經濟的動員等等。在這樣一篇短文章裏，我們當然不能說到全部國力動員的計劃，這裏我們所要說的，只是國民經濟動員的計劃，而且只想在原則上指出幾點比較重要的地方吧了。

誰都知道，一個現代的戰爭，決不是單單前線士兵的戰爭，而是整個前方和後方的“拚命”。戰爭的技術愈是『新法』，戰爭的規模愈是廣大，戰爭的時期愈是長久，那末決定戰爭勝敗的重心，越是從前方移到後方，越是從前線士兵的廝殺移到整個國民經濟的“交鋒”。我們從“一二八”的經驗來看，從阿比西尼亞的長期抵抗來看，我們一定能夠推想到，倘若全國上下決心抗戰，那末未來的戰爭，一定是大規模的長時期的戰爭。因此，全國人力和各部門經濟的健全的動員，在未來的戰爭中間，的確是有決定的重要性的。

講到全國經濟動員的計劃，我們要提出一個最高的原則，

那就是說，一切人力、物力、財力的動員，應當以保證全國人民踴躍地有效地從事抗戰保證抗戰在戰略上最高的優越性，為其唯一的任務。下面我們略說各經濟部門——工業、農業、金融、交通、運輸、貿易、勞動力等——的動員，指出幾個原則。

在前線應用的東西，大概可以分做下列三類：第一類當然是各種戰鬥用具、如軍器、彈藥以及一切作戰用具。第二類是輕工業的產品和農產品，包括人和牲畜的生活用品和糧食等等。第三類是補助的物品，如各項輜重，衛生用具，燃料，機械油類，交通通信材料等等。

整個工業部門在作戰的時候，應當按照戰爭的需要全部改造過。中國現有的工業，在供給上述第一類用具上，將表顯出最大的弱點，因為中國軍需工業可以說還沒有存在。關於這一點，我們除掉動員全部現存兵工廠，製造軍火以外，我們特別要維持並建立較好的外交關係，使得國外軍火的供給，有確切的保障。

中國的工業在作戰期內所能供給的物資，以輕工業的產品居多；至於各項最重要的補助用具，如燃料（煤、煤油等）和各項戰略金屬（如錫、鎢、等）的生產，正要用最大的力量來發展。這裏我們一定要確定一個原則，那就是說，因為我們主要的敵人在中國工業部門所佔的力量實在太大了，所以當戰爭開始，我們就得把敵人的企業無條件地收歸自己國營。比方棉

紡織廠在戰時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可是中國的紡織業却受日本資本的壓迫，日本在華的紗廠把中國自己的工廠壓得透不過氣來。這裏，倘若一旦戰事爆發，我們爲要鞏固我們的經濟陣線，同時爲要削弱敵人的供應能力，我們能不把敵人的企業收歸自辦嗎？在那時候，一切關於經濟的不平等條約和協定，當然要全部撕毀的。比方，日本因爲自己鐵礦不夠，在一九一三年跟漢冶萍公司訂結協定，規定該公司必須供給日本鐵砂三千五百萬噸。那樣的協定，只有願做亡國奴的人們才願意負擔遵守的義務呢！

其次，重工業方面應當集中於跟軍事直接有關係的各項生產，我們要用最大的力量開發我們豐富的煤礦、鐵礦、油礦和錒、鎢礦等。在輕工業方面，要盡量改變裝置，適合於戰時日用品的製造。

現在來講農業。農業生產在戰時前方和後方都非常重要。首先，我們應當趕快提高糧食的產量，我們應當設法在最短期內，彌補我國百分之五的糧食不足量。這裏我們自然不是說農民拚命增加生產，給地主多收點租籽；我們應當規定，在作戰期內，全國農民所生產的糧食，除開留下一部份，供給農民自身之外，應當由各地方設置戰時糧食委員會，集中儲藏，輸送到前方去，一部份運到城市裏，供給備戰的和工作的大衆消費。

除開糧食以外，我們要增加棉花和桐油等等的生產。這一着，可和目前日本替我們來“提攜”，勸誘華北民衆增植棉花，絲毫沒有相同之點。恰恰相反，我們主張，中國棉花應當絕對要由中國人用，中國桐油絕對要由中國人用。這一點，我們不是要向各國的自足自給政策（Autarchy）學樣，我們爲的是要保證戰略物資不被人家——尤其是主要敵人奪去，也就是要保證我們勝利的前途。

第三，講到金融。這一點我在‘永生’二期已經指出，中國全國十八萬萬盎斯的存銀，在抗戰的前提之下，是有全部集中起來的必要；而且也只有在那樣的前提之下，才有集中的可能。白銀和黃金的國有，應當是戰時經濟政策的中心任務，到那時我們一面要用現金現銀，買進外匯，作爲穩定幣價之用，同時可以向外國購辦大批軍火，從事抗戰。那時候的財政一定發生膨脹的現象，然而事情毫不可怕，到那時候，我們爲要維持市面的平穩，可以發行大宗紙幣來救急的。

此外在財政方面，我們當然不能忽視各種健全的來源。我們一定要沒收敵人和漢奸的資產，徵收所得稅和遺產稅，以及徵收從軍代金（不參加作戰便要出一定量的錢，充作戰費）等等，增加當時的收入。

第四，軍用交通的開拓，在戰時是非常重要的。戰爭勝利有一個最重要的條件，就是軍隊能很快的動員和集中，這樣才

能進行迅速的襲擊，取得最初的勝利；或是作出人意的反攻，以轉敗為勝。這些都必須有便捷的軍用交通。中國近年來鐵道的建設大有進展，南京鐵道部以及各省政府各商辦鐵路公司共定有建築二千五百公里新鐵路的計劃，一九三五年已完成分之三。全國公路建設更加可觀，到一九三五年十月末，全國經濟委員會所協築的公路已在兩萬公里以上，已敷路面可通汽車的，約居半數。在這裏我們應當提出兩個原則，來統制全中國的軍事運輸。

(一)中國各項交通運輸工具無論鐵道、內河及沿海航行，乃至航空路線，都受列強的控制和掣肘，在這一方面，我們在發動抗戰之初，就應當將敵人對我们的控制，全部解除；對各中立國的控制，應當成立友好協定，這樣才可以保證我們自主的軍用運輸。

(二)今後一切軍用交通運輸的建設，應當集中在對敵作戰的戰略地帶，如華北，鄰近華北以及沿海各省。目前一切不必要的建築應當全部停止，將經費人力集中到抗戰必要的建築上去。

第五，現在要講貿易。這裏我們特別重視對外貿易，一旦戰爭發動，對外進口出口貿易，如果毫無統制，結果一定“一場糊塗”。為什麼呢？比方，我們剛才說過，我們戰時對於糧食和棉花是非常需要的，然而像目前蘇北山東和河北等省的糧食，

正由大批浪人收買到日本去，而我們中國老百姓反沒有糧食吃，一定再要用高價向國外採辦。中國的棉花許多都給日本用去了，中國自己的紗廠却因原料缺乏而關門停工。這樣情況倘使繼續下去，我們能夠保證抗戰時期不發生糧食和日用品的不缺乏嗎？所以第一我們必須禁止或限制必要品的輸出。

其次，我們在戰前和戰時，需要大批的軍用品和一切技術用品，這些我們在抗敵的條件之下，必須規定免稅或減低稅率辦法，與各中立友邦訂結協定，獎勵牠們的進口。

最後，我們要說到勞動力的動員。這裏我們一面要設法將全國的勞動力完全改編，使得一部份的勞動大眾能夠直接參加前方的抗戰，而另一部份就得留在後方，一面受軍事訓練，一面積極從事上述各項生產和別種工作。

上面我們對於整個國民經濟的戰時動員計劃，已經說了一個大概，詳細的規劃還得要靠大家的實踐來完成。在本文的末了，我們還要重申過去的說話，我們在作經濟、政治和軍事方面動員的時候，雖然有種種困難，可是最後的勝利還是操在我們手裏。中國的民衆和軍隊在抗戰進行的時候，一定能夠像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民衆一樣，不但表現出偉大的潛伏的力量，而且會完成偉大的創造，訂正舊的戰術，編制新式的抗戰軍隊。這種優點是帝國主義的侵略者所夢想不到的，然而這却是決定我們抗戰勝利最主要的條件。

國民經濟建設的先決條件

章 乃 器

國民經濟是什麼？這在半殖民地的中國，應該是特殊的針對着帝國主義經濟，買辦經濟和封建經濟而言。

帝國主義經濟是指一切含有侵略意味的外人在華經濟活動，尤其是外人在華的產業——牠不單是剝削中國的勞苦大眾，而且也摧毀中國的民族資本。且看，華商紗廠不是已經幾乎被外商紗廠打倒了嗎？

買辦經濟是指一部分——也許是大部分——中國資本家的經濟活動。他們或者是本意上就在幫助外人在華經濟活動，或者是在不知不覺中幫助外商資本打倒民族資本。

封建經濟是指運用特權或者特殊勢力——不是資本勢力——向人民進行超經濟的剝削的經濟活動。如地主、高利貸資本主，鹽商，牙仲，開設官銀號發行不兌紙幣的軍閥官僚，以及借統制經濟名目實行私人壟斷工商業的新軍閥新官僚，他們的經濟活動都是封建經濟。他們不但是剝削勞苦大眾，而且要

阻礙民族資本的發展和國家的統一。他們不但要剝削勞苦大眾的經濟利益，而且要剝削勞苦大眾的身體自由；甚至要使勞苦大眾賣妻鬻子，以供給他們的剝削。所以說：他們的剝削是超經濟的。

這三種經濟雖然寄生在中國領土之中，然而危害中國民族的。這三種經濟一日存在，中國國民經濟便一日不能發展。他們不但阻止了中國國民經濟往社會主義開展的路，而且也阻止中國國民經濟往資本主義開展的路。中國假如照目下的方向走向工業化，那就逃不出是畸形的殖民地的工業化。換一句話說，就是上述三種經濟進一步的發展，和國民經濟的根本消滅。

所以，在中國而言國民經濟，主要的任務，就在消滅寄生的帝國主義經濟，買辦經濟和封建經濟。倘使我們只是從教科書當中了解國民經濟的意義，就把牠抬出來大吹大擂，而忘記了半殖民地經濟的特殊性，那就是替帝國主義做“虎伥”，而變成一個買辦經濟學者。

思想較高的青年們，也許要覺得：假如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是向着資本主義發展，那末，勞苦大眾所得着的，依然只是痛苦和貧困。

自然，假如中國可能有一個國民經濟的建設，我們決不會

希望牠的資本主義發展，時代和環境也決不會容許牠們向資本主義發展。不過，在理論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和國民經濟下的資本主義，實質是不同的。

第一，在殖民地的資本主義之下，經濟上畸形的發展，要格外嚴重。比方，都市的畸形發展和農村的特殊衰落，固然是資本主義各國共同的現象；然而，在帝國主義勢力特殊的掩護之下，中國少數都市畸形的發展，要超過一般經濟因素所能造成的限度。而在封建勢力特殊的——超經濟的——剝削之下，中國農民所受的痛苦，也遠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之上。

第二，對於產業工人的剝削，在殖民地裏也是格外的嚴重。帝國主義在國內，還要相當的保持紳士的面目，而且還要儘可能的保持民主主義的面具；對於工人，還要相當的採取改良主義者的懷柔政策。甚至到了不得已而施行法西斯化的恐怖的時候，依然不能不拈出“保護勞工”的騙人口號。可是，對於殖民地工人，他們的豺狗面目就要毫不客氣的擺出來了。比方，對於工人的鞭撻，凌辱，甚至屠殺，是只有在殖民地才變成爲“司空見慣”的。因此，帝國主義國內的工人，可能變成“貴族工人”；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剝削得來的利潤，可以分給他們極小的一部分，使他們能爲帝國效勞，以維持帝國治權于不墜。

第三，在文化方面，帝國主義在國內還要儘可能的保持“思想自由”的口號——自然，到最後的法西斯階段，是連這個

口號都取消了。而國家呢，也還不能不以財政收入的相當成分，作為教育和文化的用度。而在殖民地，帝國主義却要毫不客氣的施行愚民政策。殖民地人民的技術教育，必然是工具主義；而殖民地人民的政治教育，必然是奴才主義。

所以，我們應該明白：一個國家如果是在國民經濟的發展之下資本主義化，牠在資本主義長成的過程中，社會上必然有很大的進步；而在殖民地的狀態之下資本主義化，一開始就使社會進化受着妨礙。勞苦大眾雖然是一樣的受剝削，然而程度是顯有高低的。我們指出這一點，並不是說中國應該爭取國民經濟發展下的資本主義化，而是說中國勞苦大眾的要求解放，應該是格外的迫切。

* * * * *

中國怎樣才能建設國民經濟呢？我們應該是由國民經濟建設中間爭取民族的解放呢，還是在爭取民族解放之後才能談得到國民經濟建設？

在這裏，迷醉在教科書裏面的流俗經濟學家，見解便和我們不同。他們過去是高談建設和國力的補充，而目下是高談幣制救國。過去沙土上的建設計劃，所得到的結果是“民窮財盡”，顯然是碰壁了。沒有國防的國力補充，所得到的結果，也不過是招致敵人進一步的破壞，顯然又是碰壁了。由第一道防線大吹大擂的建設，退到第二道防線很可憐的只敢說補充，再

退到第三道防線就只敢抬出一小部門的幣制。以後將怎樣退呢？他們是要退到中國的“堪察加”去了！這樣的國民經濟建設，究竟還是解放民族，還是使民族在國民經濟建設當中一步一步的滅亡？

一個國權不完整的半殖民地國家，而要高談國民經濟建設，本來是太不量力。爲了幣制改革以後發生出來的問題依然很多，甚至牽動到更大的平衡國際收支問題，平衡預算問題，以至外交問題，許多幻想般的計劃又出來了。什麼管理匯兌以減少入超哩，採行遺產稅和所得稅以增加財政收入哩……說了一大套。可是，外交如何應付呢？就沒有人談到了。

是的，管理匯兌和採行遺產稅及所得稅，都是現代國家應該做的事；但是沒有具備現代國家條件的半殖民地，却不配談這些。我們一提出管理匯兌，採行遺產稅和所得稅等問題，立刻就牽動了更基本的外人在華治外法權問題和租界問題——總而言之，是不平等條約問題，是帝國主義勢力問題。這更基本的帝國主義勢力問題一天不解決，租界裏面的洋商，便可以提出他們的領事治外法權，以對抗我們一切管理匯兌和推行新稅制的法令，有財產的中國人——這中間包含着買辦經濟和封建經濟的勢力，是照例的用“掛洋旗”的方法，以逃避國稅的徵收。這裏，我們還得注意到：如果管理匯兌只及于華商銀行，遺產稅放棄了財產的大本營上海，而只向內地的中小都市

和農村裏去徵收，所得稅放棄了主要來源產業利潤，而只向薪金階級榨取，那不單是不公平，沒出息，而且是病民的。

然而，這都是以後的問題了；在目前，即使國際收支依然不平衡，財政依然入不敷出，匯價還可以維持。目前的重大問題，到是因為幣制改革而引起的外交問題——日本帝國主義干涉我們的幣制改革。且看，連一個幣制改革都受別人的干涉，怎樣談國民經濟的建設呢？

我曾經說過：管理貨幣是超過了半殖民地國權的一件事；半殖民地國家如果要管理貨幣，牠或者只可以進一步的投降帝國主義，借牠們的力量來完成這種管理，或者，只可以用民族革命的力量來完成這種管理。現在談到更大的問題國民經濟建設，我也是作此感想。假如我們想在保持現狀之下進行國民經濟建設，那所得的結果，恐怕只是帝國主義經濟，買辦經濟和封建經濟的外面，戴了國民經濟的招牌。

然而，有人認為我們可以很爽快的放棄了港口，到我們的“堪察加”去建設國民經濟。

如果我們真是和敵人作一個你死我活的革命戰爭，我們自然應該準備最後退到我們的“堪察加”去；但是，假如是很懦怯的不戰而退，拿出蘇俄歷史上“退到堪察加去”一句表示奮鬥到底的激勵話做掩飾，那是中國人民所不能同意的。退到

‘堪察加’去再預備打出來，那只有革命戰士能夠做，而決不是主張望風退却，志喪氣奪的失敗主義者所能效顰。失敗主義者所能做的，依然逃不出過去中國軍閥官僚有退無進的把戲；而且，退到“堪察加”去，還得有強有力的革命羣衆做中心，然後退了之後能進。倘使一個有保守領土，保護人民的職責的政府，爲了少數人的苟安，很輕易的放棄了十分之八的領土和人民讓敵人去蹂躪，而退到‘堪察加’去組織一個小朝廷，我相信民衆是不會擁護牠的，而且要痛恨牠的。那樣，牠憑什麼力量打出來，甚至憑什麼力量自存呢？此外，假如退到“堪察加”之後，依然不過是由甲帝國主義的懷裏出來跑到乙帝國主義的懷裏去，那又更不必談了。

所以，就是退到“堪察加”去建設國民經濟，那先決條件，也依然是一個民族革命。放棄了民族革命便談不到退到“堪察加”去，更談不到國民經濟建設。

因此，我們不能不有一個結論；中國國民經濟建設的先決條件，是民族解放運動——民族革命；中國只能經過民族解放運動取得國民經濟建設，而決不能經過國民經濟建設取得民族解放。

工業日本與農業中國

駱耕漢

一 “友邦”寄給我們的賀年片

“友邦”很講“禮義”，在去年年底，她就關照她所御用的電通社發一個賀年片給我們。在那張賀年片上，她曾告訴我們一個可喜的消息，就是日本外務省已經決定把對華的文化事業費，由每年六百萬圓增為七百萬圓，藉以更積極地來促進華北農村的“更生”：第一，她要在華北設立農事試驗場，指導“更生”的具體計劃；第二，爲了使生產出來的農產品能有確實銷路，“更生”的對象暫以日本所需要的棉花和羊毛爲主……總括說一句，就是用日本先進的技術來幫助開發落後的華北農村，造成“工業日本與農業中國”的親善集團！

但是載着這樣“親善”的消息的賀年片，對於我們已經不能算是很新的刺激了。因爲就在去年，我們也曾收到同樣的禮物，不過是在已經下令廢除了的舊歷年初。當時（一九三五年

二月十三日)日本外務省聽了剛由上海歸國的橫竹商務參贊的報告以後,就決定提出“中日經濟提攜”方案;這方案的主要內容也是“對中國之農業方面,與以技術的援助,獎勵中國棉花之大量生產,由日本大量購買之”。而且就從那時起,直到現在止,國內中外各報,還不斷地批露日本軍部和外務省的迭派經濟調查團到山西到綏遠,以及“興中公司”“中日貿易協會”怎樣成立起來等等情報。試問:我們的“友邦”這樣多情多義,念念不忘,到底是爲了什麼?是不是別有用心呢?

當去年舊歷年初,日本外務省將那第一張賀年片寄給我們的時候,國內曾有少數權重位高的偉人,以爲這是不會來討回禮的;因爲,據他們說,“中日經濟提攜”是完全“互惠”的方案,中國並不需要損失什麼。去年七月間,前行政院長汪精衛氏接見日本記者的時候,就公然承認這種說法。他說:“中日兩國不僅在地理上人種上有其密切的關係,就是在經濟上也有合作的必要;因爲用日本的技術來開發中國的富源,是與中日兩國都有利益的工作”。有的甚至提出比這還要樂觀的解釋,以爲這是日本帝國“悔過自新”的表示。他們說:日本自以武力霸佔東北以後,不論在國際關係上,國內財政上或是對東北本身的統治上,都感到不合算和威脅,因此他不得不改弦易轍,提出“中日經濟提攜”的“親善”政策來。‘敵乎?友乎?’的作者徐道鄰先生,就是在事前指出這點,“警告”日本快點伸出友愛

之手來的“預言家”！然而這種說法除掉表示自己害着嚴重的喪心病狂症，或是代表某一階層有意欺騙大眾以外，是不會再有更多一點的意義！

固然，日本自以武力霸佔東北以後，確是感到不合算和威脅。列強（尤其是美國）因為她在東北的獨占行爲而更加對她仇視；社會主義的蘇聯，對她也積極防範起來；這些是她原來預見得到的。還有它國內的經濟恐慌和財政危機，原想在霸佔東北以後可以得到解決的，但其結果反是病上加病，更形嚴重。歷年在義勇軍遊擊之下的東北，對她既不是很好的市場，同時也不是很好的原料供給地。國內經濟依然陷在特種蕭條的泥濘之中，財政赤字也因東北的軍務費和開拓費而節節增高了，這是她所意料不到的。但是它爲了排除這許多窒礙，再也不會像無恥漢奸那樣，動不動就“悔過自新”；而是更進一步地來加強她的軍國主義政策，換句話說，就是兼併整個華北乃至整個中國。當她開始向這第二步邁進的時候，所以同時提出“中日經濟提攜”的“親善口號”來，一方面是要利用當時“徐道鄰式”的中國外交路線，和在這種路線之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人的口舌，來替她宣傳“友邦”之愛，麻醉一般大眾的抗日意識；另一方面，同時也是更主要的一面，是在促使東北方面所發生的各種窒礙，能夠更有效地更迅速地克服過來。

總括一句，日本提出“工業日本與農業中國”這個口號，在

現階段的意義，是以比較“九一八”時代稍有不同的手段，將整個華北變為她的殖民地，一方可以補償國內金融資本家的“夙願”，使國內經濟恐慌和緩下來；同時使她對英美列強以及社會主義蘇聯更有戰鬥的力量，藉以完成東亞霸王的雄心！

二 日本的大砲和華北的富源

我們這樣論斷，絕對不是像認敵作友的作者那樣胡說霸道，而是有現實的根據的。這可分成兩部份來說：第一，華北在其地理的經濟的條件上，恰巧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渴望的殖民地；第二，她又是用那不折不扣的殖民地化的手段來開發我們的華北。現在我們且先看第一點。

日本在太平洋上最大的敵人，除掉美國以外，還有一個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但是要想打擊這位新興的最大的敵人，僅僅霸佔了東北還是不夠的。她必需奪取察綏寧夏乃至整個的華北，才能相當威脅外蒙和截斷西伯利亞鐵路的中部。另一方面，當太平洋大戰爆發起來的時候，她也必需攫得整個的華北，才有比較完善的陸上根據。這是從地理形勢上所下的觀察。至於從經濟來看，華北也是日本帝國主義目下所必爭的肥肉：

第一，華北有廣大的棉田（主要在冀魯兩省），其產量佔全國百分之六十以上，這是東北所不能夠大量生產的；

第二，華北有優秀的畜牧區域(主要在晉察綏三省)；全年所產羊毛佔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這幾乎是東北所沒有的；

第三，華北還有佔全國總產量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小麥，和佔全國總儲量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煤礦，這是東北所有，但是感到異常不夠的。

至於華北這些產物，就日本本國而言，都是無法生產或是不能大量生產的必需原料。固然，日本是世上最大棉紡織業國家之一，在過去兩年間，她的棉紡織品已在南洋，印度，非洲乃至整個世界市場上和英國的曼却斯脫正面衝突起來，但是她爲了棉紡織業的原料——棉花，她却不得不向英屬印度和金元王國叩頭。爲了羊毛，也不得不同英國去爭奪澳洲的富源。至於她想在食糧方面或是重工業方面有所活動，也是處處要受英美的控制。尤其當這大戰的前夜，列強備戰空前猛烈的時候，各個經濟部門這樣不能自給自足，使日本帝國主義所感到的不安自然更加厲害。過去她是想靠着東北來解決這些問題，但是四年來的東北不僅沒有滿足她的這些要求，甚至還更刺激着她的這些要求。因此華北的棉花和羊毛等等，就深深地刻進她的眼簾中間去了！

那末日本帝國主義用怎樣的方法來攫取這塊肥肉呢？那就是前面所說的不折不扣的使華北殖民地化。我們曉得日本的軍國主義是建築在不曾完全成熟的金融資本之上的；她主

要還是靠那過份的野蠻行爲來生長的。而在現階段(即大戰前夜的階段)是以戰爭準備戰爭爲其特徵；這在這次華北經濟的開發中也充分表現出來，我們不妨把牠分作三個段落來回顧一下：

第一，在去年上半年，所謂“中日經濟提攜”主要還是作爲一般的方案，在中日朝野之間發生蒙蔽人民的麻醉作用。同時，土肥原將軍也還不過用那貪婪無厭的鼻子嗅遍了華北華南和華中。可是到了第二個段落，即到了五六月間，河北事件和察哈爾事件被土肥原將軍無端煽起；廿九軍撤退河北，華北戰區從冀東伸至察東以後，情勢也就一變，即一般的“中日經濟提攜”，推演爲更具體的“開發華北經濟”。爲了這，他們曾迭派專員調查晉綏的礦藏和羊毛，並在閻錫山和傅作義的協助之下，成立了經常的調查機關。同時在另一方面，“東亞經濟協會”，“東亞惠通貿易公司”“河北經濟協會”等等組織，又以買辦或經紀人的姿態紛紛成立起來，“引導”日本軍閥財閥來開發華北；因此華北經濟的殖民地化，就急速地具體化起來。

但是我們曉得，“華北獨立國”假使不能在實際上建立起來，財政赤字與日俱增的日本帝國主義是無法來“開發”華北的棉田和礦山的。所以土肥原將軍更積極起來導演華北自治的怪劇。到了去年十一月底，這幕怪劇已經相當完成以後，華北經濟的開發也就隨着進到第三個段落。醞釀已久的“興中公

司”——滿鐵會社開發華北的前鋒，遂於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在大連開成立大會；同月“滿蒙毛織會社”決定在天津張北等地設立分廠支社，滿鐵又在天津設立主辦華北水利鐵道的“福昌公司”本月十日天津來電，又說山西“大同礦業公司”和“西北實業公司”的經理，已被滿鐵邀來天津，商談該省礦藏的開發。日本在華紡織業領袖津辰一郎，也由東京返華，準備在津青濟三地作大量投資。總之，日本軍閥財閥對於華北經濟的開發，已經隨着他們在華北的軍事勝利而節節前進了！

這樣看來，日本在這時提出“工業日本與農業中國”的意義，無非要將華北首先變為他的原料供給地和她國內過剩商品的獨占市場，使她能與英美爭霸，這完全是以日本為本位的殖民地政策呀！

三 互惠呢？還是侵略？

然而國內竟還有許多無恥學者，硬要把敵人說成朋友，把侵略說成互惠，以掩飾他們自己的罪惡！有些人現在還這樣辯解：“日本派員研究並指導華北農民種植棉花，同時他又擔當收買的責任，在經濟上總有真正互惠合作的意義的”。然而我們應當仔細提防“擔當收買”這四個字所發生的實際作用。上海英美煙草公司對於山東安徽的農民所生產出來的菸葉，很多年前就負起“包買”的責任。它起初用資本的力量將其他收

買菸葉的商人打倒，或吸收了來做牠自己的幫客；然後就用一致的低價強迫農民出賣。農民第一因為窮，第二因為烟葉市場已被“大英公司”壟斷，就把烟葉挑回不賣，也不能夠把它燒來當飯吃。於是，種菸農民就被這個“包買”剝削得只剩一身的皮骨了。

日本商人早在去年以前，對山東河北等地的棉農玩過這套把戲。在這裏，我們不應忘記從事“復興”農村工作，辦理合作社的人們，在客觀上都是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來用“統制”的市價“包買”棉花。上海各大銀行領導下的河北棉業改進會，實施河北棉花五年計劃，自然也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歡迎的“農業中國”工作。

在土肥原將軍的華北五省“自治”計劃相當完成以後，日本的財閥更可不必要借助經濟力量，而直接利用政治力量來完成“擔當收買”的工作。東北的偽國成立以後，日本資本控制下的“滿洲棉花公司”就用“統制貿易”這種口號，強制地壟斷着東北的棉花市場。現在東北的各種農產，無論原料或是糧食，都已經在“統制貿易”政策之下全部去受着日本財閥的支配。他們非但替日本工業保證廉價的原料，還要利用這種壟斷地位來實施更殘酷的剝削。在糧食收穫的時候，他們就用最低廉的價格來收買糧食；到了青黃不接的時候，又用高價來把貯存着的糧食賣給東北農民；這樣釀成了去年極嚴重的“春荒”。這

就是‘農業中國’的最好的榜樣！

“農業中國”的內容還不僅止此！日本帝國主義運用經濟政治的力量，將棉花“包買”到自己手中以後，到了必要的時候，就可將棉花市價任意提高，使中國脆弱的民族資本紗廠買不到便宜的原料，不能夠同日廠競爭。譬如去年，上海三十一家華商紗廠有六家倒閉，武進和無錫各三家，青島蕪湖各一家；而在華日廠却能日夜工作。將來華北棉花既然根本是由日人“指導”開發，那末民族紗業也就只有完全毀滅的希望了！

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一貫的政策，是要使整個中國變成一個專替日本工業生產廉價原料的農場；由於這種廉價原料，再加上日本國內乃至中國的廉價勞動力，使他們的紡織工業可以去同英國爭奪南洋羣島，澳洲，以至印度和非洲的市場。另一方面，他們又要壟斷中國的煤鐵生產；並摧毀中國的各種民族工業，來使整個中國變成傾銷日本過剩工業品的廣大市場。所謂“工業日本和農業中國”，它的全部意義就是這樣！

一九三六，一，十八。

華北經濟的殖民地化

孫 遜

日本帝國主義“開發華北經濟”的原則，一方面是適應牠備戰的需要，因此牠的“開發”計劃中的主要部分（如礦產及交通）不能不含有重大的軍事意味，而華北駐屯軍和軍部支配下的滿鐵，是站在“開發”工作的最前線。另一方面，在“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口號之下，進行殖民地化華北經濟，併吞中國的民族工業，把華北變為日本資本主義的投資地，銷貨場，賤價原料和賤價勞働的供給地。總結起來，便是使華北（首先是華北，其次即是全中國）加入日“滿”經濟集團。這個計劃，從冀察政委會依日方之意旨而設立後，便大踏步邁進的實行了。

對於“開發”華北，日本帝國主義作了很長期的充分準備工作，滿鐵的調查工作從前年便已開始，至今尙未完全終了。牠設立了興中公司，作為主持對中國（目前首要的是對華北）經濟侵略專門機關。日本外務省把今年對華文化事業費增至七百萬元，在天津青島設立自然科學研究院，在冀察各地設立

農產畜牧試驗場，擔任改良農業畜牧業的技術指導。

在重工業方面，本來日本在華北煤礦中便有相當的勢力，如山東的魯大煤礦等，去年泰記公司日人又強佔了河北的柳江煤礦。最近由於山西軍閥的勾引，興中公司及滿鐵會社已經在計劃着開採晉綏兩省的煤產。山西的煤礦是華北的最大富源，據估計埋藏量約佔全國的二分之一。察哈爾的龍烟鐵礦也準備開採，將在北平近郊湯山設煉鐵廠。日本的滿洲工廠在天津設立事務所，據說要壟斷華北的鋼鐵製造等事業。冀東的金礦，日本資本家也在積極的籌備開採。

輕工業，首先是紡織工業，是日本財閥向華北發展的主要部門。在天津和青島，或者是創設新廠（如東洋紡機會社在津籌設十五萬紗錠的大紗廠，已經開始建築，金藤紡織會社及大日本紡織會社亦已決定在津設廠），或者是增設分廠（如上海裕豐紗廠決定在津設分廠）擴充機器（如上海紗廠的青島工場）。破產停業的華商紗廠，其中天津最大的裕元被鐘紡社收買了去，北洋由上海日商裕豐紗廠收買，寶成由日商大福公司收買，也都商妥。在這種大刀闊斧的侵略之下，不但華北各省華商經營的紡織，毛絨，棉布各業不久將同歸於盡，而且全國各地的華商紗廠，也都將不能立足。

據日本紗業資本家的代言人說：日本紡織業認為在華北投資，有莫大之便利，第一、容易獲得生棉，冀魯兩省棉田不久

將來定可增加，假如日本紡織業指導中國農民從事改良棉產，則中國棉花將更適於紡織。第二、已有廣大市場，華北五省有一萬萬人口，華北情況改善以後，人民之購買力將有極大之增加。第三、煤之供給甚豐富，取用亦便。第四、失業華人甚多，容易雇得工人。第五、有華北駐屯軍之充分保護”。這最後一點，對我們認識日本軍事侵略的相互關聯上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東亞烟草公司也決定在天津設廠，圖霸華北的捲煙市場。同時在化學工業方面，將在天津唐山設廠製造“鹽素酸加里”。在市政工業方面，滿鐵正進行向各地投資，舉辦電氣及自來水事業。

至於農業，日本的主要目標是發展植棉，因為棉花是紡織工業的原料，同時又是製造火藥不可缺少的東西。他一方面利用現有的河北棉業改進會等組織作代理人，同時要設立“山東棉花改良協會”，及由天津日駐軍與冀察政委會合辦“農村合作社”，借給農民種籽及款項，大規模擴充棉田面積（這將造成華北食糧生產不足的恐慌），而這些農民便將受到日本資本的直接支配和榨取。在通縣，因為農民“多持反對態度”，殷逆汝耕竟派遣軍隊下鄉，強迫農民種棉。

在畜牧業方面，牠主要是獎勵飼養綿羊，以便從華北得到大批賤價的羊毛，供給牠的毛織工業。

日本資本案對於長蘆鹽產的收買，是最近華北經濟上很

重要的一件事。鹽，是化學工業（軍事上不可缺的）的原料。長蘆是華北乃至全國的一個重要鹽區。最近日本三菱等財閥已經成立聯合組織，直接向鹽戶賤價的大批購買，運往日本，並且免繳出口關稅。將來日本財閥很可以運用牠的大量資本，壟斷長蘆的銷路和價格，而嚴重危害到華北的民食。這裏，天津大公報的社評所謂：“苟政府信用昭著，自行將灘戶存鹽，定價收買，然後賣之日人，則事權統一，灘戶可沾公平之利益”。其實也不過是中國政府和官吏從日本財閥那裏稍沾餘潤罷了。灘戶是決不會沾到什麼“公平之利益”的，日本財閥也決不會給鹽戶們“利益”的。

日本帝國主義正在奪取中國海關的管理權，以便按照自己的利益修改出入口稅率，使日貨順利的獨佔中國市場，和由中國獲得賤價原料。有田的對華外交新骨幹，特別着重經濟關係，第一步要求中國政府減輕關稅稅率，第二步就要促成中日“滿”關稅同盟及經濟集團。實現這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組織華北及其他各地的私運，以破壞現行的海關行政和關稅率。私運，在今日早已不是少數浪人們偷偷摸摸的事業，牠現在是他們政府的預定計劃和政策，牠是在大規模的非常公開的進行着。對於北甯路和海關實行的緝私辦法，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公然提出抗議，日本憲兵直接保護和索還私貨。最近實行了“緝私辦法”，私貨反倒更暢行無阻的侵入，每次“浪人一槍

在握，怒目橫眉，直衝查驗所而過”（申報），在不斷的遇到武裝浪人行兇以後，海關員對於無稅單的私貨也不敢不替牠裝運。私貨不僅完全攪亂了華北市場，而且打擊了上海和各地的商業，例如上海全市華商糖行六十家，因私糖傾銷損失已達千萬元，這樣繼續下去，勢非停業不可。

據密勒氏評論報主筆鮑惠爾的估計，華北私貨的進口數額，已經超過海關納稅進口的貨物。另外，據四月十九日大美晚報載：自去年起，華北私貨入口總價值，已達三萬萬元以上，約佔入口貨總額百分之三十強，其中單只今年一、二、三、三個月私貨入口就在一萬萬元左右。這是多麼令人觸目驚心的數字！

關於財政，冀察政委會已經實際取得獨立。據中外各報的消息宋哲元與南京方面會商的結果，決定：

冀察關稅每年收入四千二百萬中，除外債擔保金三千萬外，一千二百萬歸冀察政委會。

冀察鹽稅每年收入二千二百萬中，除外債擔保金四百萬外，一千八百萬元歸冀察政委會。

以上共計三千萬元，由冀察政委會自由使用，自二月一日起實行。

此外，冀察晉綏四省統稅收入，每月約七十萬元，除了山西省以外，也全部解交冀察政委會。

傀儡的牽線人更精明些和強硬些，天津日軍參謀石井中佐在接見外報記者時，不慌不忙的掏出懷中記事小冊，說河北一省的總收入，每年共計一萬四千八百萬，向例河北當局是將其中一萬零二百萬匯往南京的，以後這一萬零三百萬的巨款將要扣留，用在河北各種事業上。

“統一發行，集中準備”的“幣制改革”，在冀察已定為例外。平津的存銀不肯南運，河北省銀行還在增發鈔票。天津的外商銀行運銀南下掉換法幣，也遭到天津市政府和海關方面的扣留，而因為“華北情勢頗歡迎日系銀行之發展”，上海正金、台灣、三菱、朝鮮、三井、住友六日商銀行，却準備將牠們始終不肯交出的在滬存銀一千萬元，運往華北。另外，關東軍有更鉅大的計劃：“以天津為中心，成立華北五省之金融中樞機關——華北公庫，集中華北各省現銀，發行紙幣。公庫主腦須以負有衆望之親日派充任，顧問及科長以上之重要人員均須聘用日人”。（大美晚報）這些都是控制全華北金融，使華北貨幣與日圓發生聯繫的重要步驟。

至於殷逆汝耕的冀東偽政權，自從得到華北當局按月接濟鹽稅收入二十五萬元，北寧路收入十萬元，本來已經不愁作賣國生意沒本錢，可是日偽並不滿足，牠們還設立“冀東銀行”發行紙幣，在冀東各地設稅卡，徵關稅，發新引，收鹽稅，強徵統稅，發行新印花，……至於省縣各稅的截留，更是不成問

題。

其次要說到充滿火藥氣味的交通運輸事業的“統制”和“建設”。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宋哲元自行委派陳覺生為北寧路局長；武裝接收路局。陳覺生原籍雖是廣東，但生在日本，據說已入日籍，他的被任為局長，完全是土肥原推薦的，南京方面結果也加以默認。宋哲元又委派親信張維藩為平綏路局長，從此華北兩條最有戰略意義的鐵路，都在冀察政委會直接管理之下。最近還要設立“交通委員會”，主席內定陳覺生，設立的目的是要取得河北省境內平漢津浦兩鐵路的管理權。

現在北寧路每次例車都有日本憲兵隨車監視，平綏路張家口車站的售票處不收中國鈔票。津浦路天津總站自從去年冬日本憲兵強駐車站監視行車，直到現在幾個月不撤退。對於每次貨車到站，都要檢查車數號數，對南下車尤其不肯輕易放行，要查點車數與北上車相符，而且每次不開出十五節以上，方才放過，同時在天津總站每天必須放有貨車三十節左右。這樣便直接控制了華北和長江下游之間的貨運。五月一日起，北寧路與南滿路及偽滿二十餘條鐵路實行貨物聯運，更便利於日貨傾銷華北。華北與“滿洲國”通長途電話的結果，是“關內通話者多屬日人，實際等於日偽專用線”。（申報）而現在平津又與偽滿通陸線電報了。

華北與偽滿通車後，“北寧路實際上已完全由日本的南滿

路管理着”(密勒氏評論報)，日本帝國主義現在要把北寧路直接歸併入南滿路。另外關於發展華北鐵道的計劃，首先要完成的是滄(縣)石(家莊)線，彰(德)濟(南)線，這兩條聯絡平漢津浦膠濟正太的橫斷鐵路，如果成功，牠就可以完全控制了平漢津浦兩大縱貫鐵路的軍事價值，西進時非常迅捷便利，並且可以更便利的開採和運輸華北各省的煤鐵礦，和使日貨深入內地。對於已成鐵路方面，特別是平綏路和膠濟路，決定擴充“既得權”，就是增加投資，用“中日合辦”名義取得完全的支配權。牠計劃把平綏路由包頭再延長到蘭州或西寧（現在已經勘察包頭五原一段），這可以說完全是爲了進攻蘇聯的軍事目的。

政府當局發鉅額鐵路公債，其中包括延長平綏路，向西展築隴海路，山西當局正積極完成同蒲鐵路，但是這些結果都無異給敵人的侵略西北和華中開闢了長驅直入的捷徑。至於冀察政委會實行兵工築路，殷逆汝耕也積極修築公路，他們在替誰服務，更不必說了。

對於長途汽車事業，滿鐵已決定實行統制，設立華北汽車運輸公司，包辦戰區與長城各口及平津間九條汽車路線，並與熱河境內各鐵路聯絡。在航業方面，天津日商七家會社組織“太平洋同盟”，作壟斷華北航業的準備。孫中山先生建國方略中計劃建築的“北方大港”（大凌河口，在樂亭縣境）現在將由冀東偽政府闢爲商港。關於關內外航空聯運，中日雙方屢次交

涉未得結果，現在日方自己直接幹起來了，牠在天津設航空支部，一月以來，每天有二三架日本軍用機自關外飛來天津，載送郵件或旅客，有時則供日軍官搭乘，飛往各地視察。往來均強行佔用中國航空公司機場，實際上等於自行開闢一條航空線，而作定期航郵。

在日本帝國主義經濟的和各方面的侵略之下，華北的工農商民的生活上有些什麼實際影響呢？

去年日僞從天津招募許多工人到多倫一帶築路，去的時候是花言巧語，工資若干，而結果是鞭撻虐待，一文不發，這並不是罕見的事，例如在“冀東”，日韓人販私貨，由當地中國的大車苦力裝運，起初是按日發錢，過了十幾天就不發了，日韓人說是到月底一總算賬，事實上過了一個多月也還沒有發，這顯然是有計劃的騙局，準備在貨物卸完後，一走了事。

因為僞國限制華人出關等原因，影響到北寧路的營業，陳覺生便藉此大舉裁員——預計將有五百人被驅到失業的境地。而日本在華北的設廠和傾銷日貨，將摧毀華北現有的民族工業，更不知要有多少萬的工人淪落街頭。

對於商業，一方面有日僞組織的公司壟斷和競爭，例如津平間及灤東各華商長途汽車行，就都因此而無生意可作。另一方面是徵收更苛重的捐稅，例如“冀東”徵捲烟稅，稅率較前加倍。僞滿在馬蘭谷卡徵收土貨稅極重，以致遵化興隆一帶商店

作坊紛紛倒閉。

在冀東重新登記田契，增加田畝捐，附稅超過正稅四五倍，河北省政府以前減輕的幾十種苛捐雜稅，完全恢復，並且由太上顧問巧立名目，徵收什麼防共費，防空捐等等。偽防共自治軍也今天徵挖壕費，明天要馬乾捐，急如星火，違抗者殺，農民只有罄其所有，甚至要賣兒鬻女來完納。

宋哲元雖然也唱出“廢除苛捐雜稅，解除民衆痛苦”的高調，而其實除了表面上把幾種收入細微無關緊要的捐稅取消了以外，據天津大公報的各地通訊，最近河北省政府正向各縣嚴催預徵民國二十六年的上忙錢糧。

平津的米麥和許多種物價都日漸被日人操縱，時常有計劃的擾亂或抬高，使民食受到危害而從中取利。

我們從活生生的事實得到的結論是：在日益加强的日本帝國主義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支配和侵略之下，尤其是在最殘酷的超經濟的榨取之下，華北的工農商業不但不會復興，華北民衆的購買力不但不會提高，而且連消極的保持現狀也是不可能的。展開在我們的眼前的，將是一幅破產、毀滅、和牛馬生活的悲慘圖畫。同胞們！請看今日之華北，竟是誰家之天下？

貿易

1. 論貿易出超
2. 談談德僞商務協定
3. 蘆鹽輸日的意義
4. 驚動全球的華北走私問題
5. 過去抵貨運動給與敵人的打擊

論 貿 易 出 超

石 西 民

一 大家關心的出超問題

根據海關發表的我國對外貿易進出口數字，去年十二月份出超五、三五—、四二七元，今年一月份出超更增至九、七一八、九六二元。我國開關以來，除了一八七六年（清光緒二年）全國對外貿易（包括一向有大量出超的東北各港口在內）曾經有過一千七百萬元的出超以外，以後足足有五十九年的攸長歲月，每年入超的數目成了日增月漲的形勢；所以一般憂國志士，乃至名流學者，一朝發現這數十年來僅見的出超數字，那裏有不歡欣鼓舞的道理呢？

死抱着海關貿易冊不放的人們，他們簡單素樸的腦子裏，反映着虛無飄渺的海市蜃樓。於是他們說：“中國是出超了！洋貨漸漸被我們的‘國貨’所排擠了！以後利權不僅是不會外溢，相反的，我們還可以向海外賺鉅款，來發展自己的工商業了！”

總而言之，在他們的心目中，有了出超，中國的國民經濟固然是可以逐漸繁榮發達！並且有了出超，好像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他們熱情而帶着稚氣的腦子裏，看不清中國民族的現狀，和半殖民地的經濟特徵。

有些帶着一副狡滑奸詐的假面具學者博士們，他們的論調却與那些稚氣的樂觀論者不同！當然的，他們也同樣贊美出超，不過他們贊美出超，同時更要謳歌當局者的豐功偉業！

國際貿易局告訴我們：“一九三五年的中國對外貿易，在總額上看雖然還呈萎縮之象，但就進出口貨物看來，那末出口貿易因為受銀價低落的刺激，比較上年增加百分之七；進口貨物，因為關金價格提高，竟較上年減少百分之十”。因此，結論自然要認為這現象是中國對外貿易好轉的徵兆。這就是明白表示當局的白銀徵稅乃至幣制改革，是使中國貿易好轉的唯一原因。

跟着就有許許多多的博士學者異口同聲地說：“中國貿易出超是由於新幣制實施的結果”！但是，客觀的事實真如上面兩種說素相符合嗎？

不，不，一千個不是！我們現在要從兩方面來說明不是的理由。第一方面，我們根本不承認中國貿易有所謂出超。其次，再就他們用以製造歪曲論調的海關貿易冊所載的統計數字，來觀察一下出超的意義在什麼地方。

二 貿易沒有出超

大家一定曉得，近年來中國沿海及長城一帶走私的風氣，一天一天的厲害！帝國主義者的浪人勾結中國的封建遺孽，組織運私機關的陰謀層出不窮，自去年以來，走私的範圍更加擴大，走私貨物的價值也更增多！這種漏稅貨物的大量運入中國，在海關貿易冊上是半個影子都沒有的！

今年三月十三日的上海日文日日新聞有一段很詳盡的關於私運的記載。據該報所載，去年祕密輸入中國的貨物價值經某海關從業員專門的推算，等於去年正式輸入總額的三成五，我們照這一估計推算，去年海關輸入總額為九億二千餘萬元，那末密輸起碼要在三億一千萬元左右；假若把這一個大數目加上去的話，“好轉”的情形就顯然兩樣了！

怎樣兩樣呢？我們就拿去年同前年的入超額來比較一下，就可明白。我們曉得去年的入超額，因為比前年衰減一億四千三百萬餘元，所以結果是三億四千三百餘萬元；但是我們若將上面那個密輸數字加上去，就變成六億五千三百萬餘元了！前年度的入超額，却只有五億元！貿易好轉在什麼地方？

固然，前年度也有私運的，但是進口無論如何不能與去年等量齊觀。我們根據日日新聞同日刊載的推斷，前年的密輸額，相當於全部輸入的一成五，即一億五千餘萬元。那末從哪

裏去證明貿易的好轉呢？今年三個月又快過去了，漢奸浪人狼狽爲奸的私運，愈加無法無天了！在這樣一種嚴而且顯然的事實的面前，只要不是近視和專以謳歌“聖朝盛代”爲業的學者博士，誰也不能肯定中國真有所謂出超吧！

三 海關貿易冊上的出超

爲了更深一層去擊破樂觀論者的根據，我們抱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決心。在上面已經說過，樂觀論調是以海關貿易冊的統計數字做根據的。現在我們就看看貿易冊上面的出超，到底表示着什麼意義。

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一月這兩月來的出超，顯示着中國經濟更進一步的殖民地化；換句話說，就是更進一步依附於帝國主義。我們從進出口雙方加以解釋。

從進口方面說，在出超期間，減少最多的是糧食，例如去年一月份入口洋米值九百餘萬元，而今年一月份則減至九十七萬餘元；去年一月份小麥入口幾達五百萬元，而本年一月份則減至五十一萬元。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今年一月份九百七十餘萬元的出超，糧食輸入衰減是一大原因。不過，我們要明白，這種糧食輸入一時短少的現象，完全是暫時的，在目前狀況底下，中國糧食自給絕對談不上，大宗糧食輸入絕對不會長期停止，所以毫無可以樂觀的地方。

此外，從出口方面說，十二月份出口貨物以棉花桐油佔最主要，一月份出口以桐油爲第一位，芝麻等次之，這種造成出超的出口增加，表示兩種意義：一種是特殊原因的結果。去年十二月份棉花出口總計九百餘萬元，這大宗棉花的輸出，是因爲日本商人因紗價大漲，中國存棉不豐，故大批躉購，準備在青黃不接時，以高價轉售於華商。這種投機的輸出，能夠長久保持嗎？並且這種投機壟斷的行爲，對中國民族工業的打擊又是多麼深刻！

一月份輸出以桐油爲最大宗，桐油的輸出，在近三年來是造成無日不增的趨勢。但是我們曉得，這種桐油輸出增加，完全由於帝國主義者的加緊備戰。我們且不要說帝國主義者瘋狂備戰，是以我們中國作它們的屠場的，只要我們看看美國等積極提倡植桐的情形看來，桐油的命運，結果一定是絲茶之續！誰能擔保以後能繼續大量輸出呢？

從這兩個出超月份的進出口數字看來，我們可以得出這兩個月來的出超有下列三個特性，即暫時性、特殊性以及備戰性。所以在這樣一種不固的基礎上的出超，不過是曇花一現！絕對不能繼續的！二月份江海關發表的上海對外貿易，入超就有一千六百餘萬，這又可以證明我們的推論了。

同時在這裏更可以曉得以幣制改革和外匯跌落來說明貿易好轉是如何的荒謬了！因爲有許多博士們硬以外貨輸入的

減少，歸功於中國幣制改革以後幣值貶低以至洋貨貨價增高的結果。假若這種理論可以成立的話，那末，美國白銀派的提高白銀價格增加用銀國的購買力的理論也不會擱淺了！一九三四年是銀價最高的時期，照上面所說的道理，洋貨輸入中國應該大增特增，但是事實如何呢？一九三四年洋貨輸入還是減退！歷年進口貿易的減低，的確不是因為幣值的變動，而是由於大眾的窮困啊！

四 對李權時博士批評之批評

三月九日申報經濟專刊一六六期，莫湮先生提出貿易出超對國民經濟將發生三種影響：第一種是因為貿易出超，影響關稅收入，而關稅是內外債的担保，一旦減收，結果一定造成債信動搖，整個金融信用受其影響。所以他說：“出超非但談不到振興實業之可能，而財政成了問題了！”第二種是出超對中國民族工業反而是一種威脅，因為我國輸出都是廉價的原料，同時輸入的都是高貴的製成品，所以一轉手間損失的還是中國。第三種是輸出品以農產品為大宗，但是中國出口貿易品是經過輸出商及買辦之手而輸往海外，所以得到利益的全是中間商人。其次，因為原料廉價出賣，而輸入工業品則價格抬高，這不等價交換，更促進農村破產。莫湮先生所提出這三點影響，在我們看來，可以說是正確而扼要的。然而李權時博士在

第二十卷第十期的銀行週報上却認為莫湮先生的理論是杞人憂天，是似是而非的。他說：

“不佞以為莫湮君貿易出超有害於中國全國經濟三說，雖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究屬太形悲觀。過去中央財政，幾大半建築在關稅收入之上，此本為過渡時代的畸形發展狀態；最近關稅收入短絀，適足以促財政當局的改絃易轍，從速採行較為公道之直接課稅如所得稅遺產稅之類，以資維持政府機構及內外債信用於不墮。至其它二害，亦係相對的而非絕對的說法；當中國尚未工業化之時，其出超之構成物品，自必為農產品原料品無疑；設不此之圖，則必無出超之可能。至農村經濟未必能受出超利益，此則未免有所曲解，蓋農產原料品果能源源輸出，則農村經濟自必直接的及間接的受其良好影響也。”

這段是李博士先生的批評，我們認為極大部分是不正確的。因為：

第一、對關稅減收影響財政危機，決不能像李博士那般認為毫無問題。去年全國關稅收入為三億一千五百餘萬元，但是償付內外債本息却需三億餘元，關稅收入僅夠支付償債本息了，這對政府財政上的打擊是如何嚴重！固然、照理說，由於財政危機的嚴重，反而能促使當局去創辦比較合理的稅收如所得稅遺產稅等等。但是我們若認清目下客觀的形勢，那就會知道事實不然了！因為中國的稅制一向有富人不出稅的現象，中

央關，鹽，統三大稅收，都是貧民負擔的間接稅。所得稅和遺產稅都是一種向有錢的人多徵稅的直接稅，在這時候，能不能夠順利施行，大有商量餘地！遺產稅所得稅宣傳不止一年了，成績在那裏？所以以後政府解救它的財政危機，不是向外秘密借款（內債當然也採用，但是很困難了），便得靠多發法幣了！那末，由於財政危機而對外借款或濫發紙幣的時候，對整個民族乃至國民經濟將發生如何嚴重的結果！我們可以把這一問題忽視過去嗎？

第二、李博士以爲中國未工業化時，出超構成品必爲農產品原料品，這話粗看也是很對的。不過我們要注意中國工業化什麼時候能夠完成呢！同時我們更要注意，中國已不是一個完整的壁壘。照目前的事實看起來，例如中國民族工業巨擘紗業，一天天衰落，甚至大部份紗廠不能開工；然而日本在華的紗廠怎樣呢？上海日本幾家大紗廠如大康，裕豐，上海紡織會社等，都在大大擴充改良，將舊的織機紗錠全部換上最新式的織機，並且在上海計劃專織棉布，換下來的舊機器運到青島天津去設廠紡紗。總之，在民族紡織業式微的今日而日本工廠却萬分的活躍。

這活躍不僅打倒了中國紗廠的營業，並且奪去了日本本國紗廠在華的銷路；而且還更進一步要大量輸出南洋，與日本本國紗廠在南洋一帶爭奪市場了！在半殖民的中國只看見帝

國主義者在華的工業化，那裏看得見半殖民地民族的工業化呢？

我們記得：李博士曾著文主張中日應該經濟提攜的，所以日本在華工業的發展，在他看來也許就是中國的工業化了！將來日本在華工廠更發達，到了它不僅獨占了中國整個的國內市場，並且有更大數量的工業品輸出外國的時候，李博士或者還要馨香祈禱呢？

第三、農產輸出我們認為農民是相當得到一些利益的，不過得到利益的只有少數地主和富農，他們可以將產物留着等待高價，至於大多數貧農，他們的農產品，不待收割就早已廉價賣去了！同時，農產價格提高，中間商人佔利最多，在原則上是絲毫沒有衝突的。此外，農民對於不等價交換受到損失而促進農村沒落，也是很普遍的事實。李博士要是高興走進農村去看看，看看那些愚昧的農民受着中間商人和其它階層欺騙剝削的情形，或許也會覺得自己所說的話有些粉飾太平吧！

談談德僞商務協定

姜 解 生

關於德國與僞滿於四月三十日在東京簽訂商務協定的事情，我國外交當局曾表示過“對此事極端重視”的態度，德國半官式政治外交通訊報也曾認為“本協定關係極為重大。”雖然我國外部直到現在還未見有“作適當處置”的“決定”；儘管德國當局已經發表文告，聲明此協定“完全是技術性質並無政治意味及背景”，但我們覺得這協定的嚴重性是依然存在，我們覺得祇要站在中國人民大眾的立場，是誰都應該起來極端加以重視的。

我國輿論界對於這協定的注意，我們覺得還嫌不夠。雖然有的已經表示過嚴正的意見，可是有的竟會認為“此次協定”祇是“小問題也”而已。這種老是“以大事化為小事，以小事化為無事”的態度，我們覺得它在客觀上所能起的作用祇有兩種：不是幫助侵略者以遏止被侵略者的“不平之鳴”，就是替被侵略者求得苟安之道，而向侵略者表示服從的方法。因此，假

如把這種態度運用到德偽協定這種事情上來，那是要不得的。

大家知道，德日兩國是全世界侵略陣營中站在一條戰綫上的東西兩大先鋒。德日同盟業已成立之說既經傳遍了世界，德日同盟之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更可見得它對於世界和平前途的威脅，不消說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了。這次德偽協定的締結，假如我們認為日本是一個主動者，假如有人認為這種協定實質的意義本來就是“日德的經濟協定，”那末我們可以斷定，這種商務協定的簽訂，決不是普通的商務協定所可比擬，它在德日關係上所佔地位的重要，它對於世界和平影響的巨大，是顯而易見的。所以我們認為，如就目前整個的國際形勢來看德偽商務協定的訂結決計不是“小問題也”的事情。

不錯，所謂偽滿也者，不過是日本帝國主義一手所造成的傀儡。偽滿實際政權早就握在日人手裏。最近日人充當偽滿重要行政人員的增加，簡直連這傀儡的假面具兒，也將沒有保留的餘地了。然而，假如因為德偽協定實質的意義是日德間的經濟協定，就認為根本“無所謂德偽間的協定”，同時，假如又認為凡關於偽滿的事情都屬於“中日國交上的問題，而不是中國與其它各國間的問題”。那末，從這樣的邏輯所能得到的結論無非是：德偽這次商務協定的簽訂，好像不過是德日關係的問題，並不是中日或中德關係的問題。這就是所謂：中國人論國際問題所應該要的“各清各帳”的原則。你看，這是多麼巧妙的

詭辯呀！其實，所謂“各清各帳”的原則我們固然不必要在這裏加以檢討。我們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不得不鄭重指出誰對於這次德僞簽訂的協定，忽略了它跟中國的重大關係，甚至認為它祇是德日間的問題，誰就等於承認了僞國，放棄了中國對於東北領土主權的保留。所以，我們要堅持保留收復失地的決心，我們對於德僞協定的認識，就非作為有關中國主權的重大問題來考慮不可。

在這二次大戰的前夜，國際間祕密的外交活動，固然不算什麼希奇。但是我們可以說：某種外交活動愈是祕密，某種協定成立前後的經過愈是神祕，它的作用就愈是重要，它的意義就愈是複雜而廣泛。假如這次德僞簽訂的商務協定，果真祇是限於技術普通商業性質的話，那末德國遠東經濟考察團團長克樸博士的行蹤又何必祕密到這樣的程度。他在四月初就祕密離滬赴日，事後在五月初又祕密來滬；當時遇見了遍訪多時後的新聞記者，他對於所謂“德僞商務協定”竟又予以否認。假如真正像他所說的祇是非正式的商業合同，那末此種合同的簽訂又何必在東京舉行那樣“鄭重其事”的外交方式呢？所以，德僞商務協定的簽訂，即使我們單就它表面上簽訂的經過來說，我們也無從找出它祇是“小問題也”的理由來。

現在我們就把德僞協定的主要意義來解釋一下：

根據外電所傳，德僞商務協定的內容很簡單，中間規定兩

點：第一，這協定自本年四月三十日簽訂成立之後，當於六月一日起發生效力，以一年為有效期間。如須繼續有效，當於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以前開始談判。第二，偽滿在這時期裏邊，可以價值日金一億元的貨物（例如大豆羊毛等），輸往德國。德國以外幣付這貨價四分之三，其餘四分之一則以馬克償付。偽滿允以此項馬克償付德國運入的貨價。假如德國匯兌地位不能使外匯處籌得外幣日金七千五百萬元，則偽滿輸德貨品可以減少，但以六千五百萬元為限，不得再少。

假如祇從德偽協定這樣表面上的內容來說，我們自然只能指出它比較次要的經濟上的意義來。比方：從此我們更加可以證明，德國的經濟危機是仍然沒有減輕，特別是關於原料和外國貨幣的問題，表現得更為嚴重。根據德國當局的報告，因為去年出口貿易總額的低落，因而影響到它所購外幣數額的太少，所以它所必要的原料，也竟為了維持貿易平衡的關係，受到相當大的限制。最近偽滿大豆輸入數額的減少，已使德國牛油和奶油製造業等受到不少影響，甚至使一部分人的生活也感到恐慌，就是為了這個緣故。因此，德國協定成立之後，德國需要偽滿提供的大豆，就可以得到相當定額的保障。不但如此，德國還可以藉此把一定數額的全製品輸往偽滿，這對於它的貿易平衡和外幣問題，自然也不無小補。另一方面，我們知道大豆是東北的特產，是東北經濟原有的命脈。九一八事變以

後，日本既控制了東北整個經濟，大豆之完全操縱在日商手掌之中，當然不消說得。但是日本所需要的大豆不多，以後對德輸出數量既有相當的規定，而又可以換得克虜伯廠的飛機大炮，這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正在瘋狂地擴張軍備而還嫌不夠的時候，不能不說是一得而兩便的事情了。

然而德偽協定更重要的意義，却是它的政治作用。這裏我們可以分成四點來說：

第一，它可以造成德國正式承認偽滿的局面。當然協定簽訂的消息一發表，東京的日日新聞，就指此項協定為德偽間商務正式關係的起點。大家知道，九一八事變以來，德偽間的商務關係，特別是德國所需要的大豆，當然早已恢復了事變前的原狀。可是，日本報章竟然偏偏認為，這是德偽間正式商務關係的開始。試問德偽關係假如並不因此協定而有巨大的變化，換句話說，假如並不因此協定而作為德國正式承認偽滿的表示，那末日日新聞的所謂“正式關係”又何從說起呢？所以，我們覺得這一點政治上的意義，也許是克樸博士到上海時行蹤異常祕密的最重要理由吧。因為，這聰明的博士，對於中國人民大眾的心理，一定是早就很有研究的了。

第二，假如我們認為第一點是無可辯護的事實，那末我們就可以說，這次德偽協定的締結，顯然就侵害了中國主權的完整。有人以為偽滿與外國訂立協定這已經是第二次了，它跟第

一次蘇僞間的中東路買賣協定並不相同。不錯，德僞協定與蘇僞東路協定的性質確實是不同的。因為中東路是中國和蘇聯共有的產權，蘇聯既然對東路有部分的權利，則它在不得已的環境下被迫而出賣東路，乃是它收回部分權利的唯一辦法。我們要不讓蘇聯出賣中東路，我們就應當首先收復我們的失地，然後再向真正收買中東路者收回我們的權利。我們自己的權利沒有能力把它收回，倒要不許人家收回原有的權利，本來是講不過去的事情。可是德僞協定呢，情形的確當真不同了。東北對外締結任何協定的主權，自然決沒有中國和德國共同享有的道理。德國在東北既無原有的權利可以收回，因此它跟僞滿訂約的地位，根本就與蘇聯出賣東路所處的地位完全不同。人家收回自己的權利，我們固然毫無理由加以阻止。可是，人家如果不跟中國簽訂協定而跟中國所未予承認的僞滿簽訂協定，那末，這還不是侵害了中國的主權是什麼？

第三，德僞協定的締結，無疑地將使德日間的關係愈益密接起來。它們對於共同反蘇聯的工作，自然也可以得到更大的展開，德國的所以甘冒這樣的大不韙而實際上做出了承認僞滿的行動，原因就是由於德國在西歐反蘇聯的工作上，的確已感到相當大的困難。它爲了澈底地達到它反蘇聯的目的，便不得不要求這所謂“東亞霸主”的幫忙了。至於日本的所以樂於接受德國這樣的要求，同時也有非請德國幫忙不可的地方，自

然也有它的得意之處和它的苦衷在裏邊。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日本看得非常清楚，假如它要大舉進攻蘇聯，而它祇是單獨地在發動，那末無論如何還嫌不夠的。所以，它對於德國的積極拉攏，本來是必然的趨勢，而這次德偽協定的成立，那真是它的得意之作了。

最後，德偽協定最重要的一個意義，確還是在於日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略，從此將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因為，日德同盟的利益具體化，東亞和西歐反蘇聯空氣的愈趨緊張，其它帝國主義列強是多多少少會予以同情的。這樣一來，列強對於日本獨佔中國的猜忌，至少可以放鬆一着。同時，德偽協定的成立，日本就此可以作為其它帝國主義承認偽滿的一個先例。這種先例，不但可以藉此引誘其它列強也與偽滿發生正式的關係，並且也可以對中國政府給予更大的威脅。因此種種，結果祇有一個，即日本對於中國的侵略形勢將乘此機會格外大踏步地前進了。最近華北日軍的迅速增加，乃至華南華北走私問題的一天嚴重一天，華中華南自治運動或浪人騷擾的此起彼仆，都是最顯著的實例。

總而言之，我們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以我們所處被侵略者的地位，對於世界任何侵略者勢力的膨脹，我們應當積極設法予以制止。我們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安全和解放，為要澈底保持和爭取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對於敵人的着着進攻，我

們固然應當積極起來防止，而對於侵略者所放的煙幕彈，我們更加應當一致起來揭穿它的真相，喚起廣大民衆對於它的注意。因此，全國民衆應當起來要求當局對於德偽商務協定這件重大事情，趕快由“極端重視”比較消極的態度，馬上進入和實行“採取適當處置”辦法的階段。

蘆鹽輸日的意義

朱 楚 辛

任何人都知道，目前中日關係還未轉好。然而，我們最近又聽到“蘆鹽輸日”成爲事實的消息了。這從整個國民經濟的觀點以及一般大衆最切迫的生活問題說來，將這個問題加以一番分析，實在是並不多餘的。

現在，我們依下列的步驟來進行這個解剖工作：首先我們要問日本爲什麼需要蘆鹽？其次它是用怎樣的手段來進行這個獲取的過程，最後它是在怎麼樣的條件之下達到這個目的！並且附帶說明這時我們中國將發生怎樣的影響？

日本爲什麼需要蘆鹽？無疑的，因爲世界經濟恐慌的絲毫不見“好轉”，因爲帝國主義之間的經濟戰爭迅速轉變爲武裝廝殺，它們無時無刻不在準備防禦別人攻擊，也無時無刻不在準備侵略殖民地。在西方，意大利早已經用砲火向阿比西尼亞宣揚文明，希脫拉也已在萊茵河沿岸揭起戰爭的火蓋。在東方，日本更以瘋狂無比的手段激起九一八以後一連串事變。在

這當兒，軍事工業的需要特別發展也就作為帝國主義者的最迫切的課題了！鹽（工業用鹽）我們知道是蘇打工業的原料，而蘇打又是軍事化學工業最最基本的原料！然而日本在世界上雖然是好戰的國家，可是他的先天（地理條件與資本主義發展的落後）却又缺乏這種原料。據調查，日本在最近幾年來鹽的消費是大大增加了，一九三三年的總消費量為一百四十一萬一千公噸。較之一九二六年度已增加百分之廿六，較之一九三二年度也增加百分之二十，而這些增加，又完全為工業用鹽需要激增的結果。因為鹽消費總量中，食用鹽的消費，一九三三年是七十六萬一千五百八十一公噸，較之一九二六年度僅增百分之二·五，較之一九三二年且有減少的傾向，但是相反面，工業用鹽却不然，一九三三年的消費量為十四萬九千五百零一公噸，較之一九二六年增加至五倍之多！較之一九三二年，也增加百分之六十有奇；而且，工業用鹽對食用鹽的比例，在一九二六年占百分之一二·一六；至一九三三則躍進為百分之四六·一；一九三四年，據一般人推測，則又增至百分之六一·二七。

這一種傾向，因為日本國內鹽生產的停滯而更為加烈。據說日本在過去三十年當中，每年鹽的生產量都只五六十萬公噸左右。這就迫得日本非從國外運進大批鹽斤不可！此項運進的鹽斤，一九三四年是一百二十二萬九千三百六十公噸，較之一九二六年增加至四倍之多！較之一九三三年也增百分之三

十二有奇！

在過去，東非洲的意屬索馬利蘭，厄里特利亞，以及埃及三個地方，供給這個輸入鹽斤幾至百分之五十二，此外則從南滿租借地，以及中國的青島也佔百分之三十二·五；然而自從西方侵略者意大利在東非掀起戰爭以後，這種鹽斤的輸入也就大受影響了。這就是日本爲什麼需要開闢新的鹽源，以及爲什麼剛巧在這個時候向中國需要買購蘆鹽的最基本的原因。

日本既然需要蘆鹽，自然它要千方百計取得這個蘆鹽。而其採取的手段，也正如它在中國所用其他手段一樣，它是用威脅，嚇詐，欺騙，以及一切誘取的手段的！歷史是最值得我們尊敬的教師，假使我們要明瞭目前日本用怎樣的手段來獲取這個蘆鹽，最好我們回顧一下中國青鹽輸日的歷史。

青島，本來是我們中國的領土，因爲清末被德國侵佔，所以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青島就作爲日本戰勝德國的戰利品而移渡到日本的手裏去了。因爲日本鹽生產的缺乏，青島就成爲它的取鹽要地。日本在數年之內把青島的鹽田擴充到十倍以上。可是從華盛頓會議以後，青島歸還中國，日本從中國取得三百萬元鹽業建設的代價，並且要中國供給它每年定額的鹽斤。這從有無相通的原則之下，原無何種利弊之可言。然而，它一方面答應每年向中國購買一百萬擔至三百五十萬擔的鹽，但另一方面却又聲明，當它有難以接受這許多鹽斤的時

候，它却無遵守這個協定的義務。這樣，一方面它有隨時獲得足額鹽斤的便利，而我們中國，却有隨時堆積過剩鹽斤虧累鹽本的弊害。那時候，日方代理購鹽的是三井三菱，中國方面是永裕公司。因為日方不遵守協定，它每年實購鹽斤恆在訂購數量以下，以至永裕公司賠累甚鉅。并且對於鹽的價格上也大肆操縱之技。例如鹽價原言照金州（在南滿）鹽價前三年的平均比例減低百分之七。然而事實上却把鹽價壓低至百分之二十以上。這對於辦理輸出鹽斤的永裕公司自然要大受損失了。現在引列一表以明其詳細（單位日元）：

年 別	實銷量	平均差價	短收鹽價額
一九二六	747,021.49	0.200	149,404.30
一九二七	801,138.90	0.220	176,250.56
一九二八	735,328.67	0.220	161,772.31
一九二九	783,134.08	0.230	180,120.84
一九三〇	876,916.70	0.230	201,990.84
一九三一	473,926.02	0.201	95,259.13
一九三二	929,915.77	0.201	186,913.07
平 均	763,911.66	0.210	160,421.45

日本爲什麼要少購鹽斤，是不是因爲它國內已有足額的鹽生產呢？一點也不是！它主要的目的是在少給鹽價，多佔便宜。這從它一方面少購鹽斤，而另方面向中國的散商鹽戶購買工業用鹽，和把朝鮮鹽輸日可以看出。因爲那時永裕公司的專辦輸出鹽價是有相當統制性的，而散商鹽戶的鹽價則較永裕

公司爲低。據說那時候，日本由青島輸入工業用鹽和輸入朝鮮鹽的歷年指數增加如下：

1926	100
1927	222
1928	259
1929	320
1930	180
1931	181
1932	305

現在，日本因爲華北局勢的進展，它不但想把從前慣用的手段移演於蘆鹽上面，而且更加用一些強蠻行爲來促其從速實現，而其手段之巧妙離奇，假使我們不深加注意，簡直會使人恍惚迷離！一方面，日本爲要使人感覺到在華北確有食鹽過剩狀況，它拚命把大連的劣質鹽斤運銷華北，據上海大公報五月十六日記載有如下一則消息：

“長蘆鹽使署前產銷課長鹿廷九，與日人在大連合組大隆公司，批購大連紅鹽二百萬石，準備傾銷華北各地。經鹽務署按每石四元折價收買，已有百五十萬石先後運抵昌黎留守營，餘將陸續運到，官方令摻入蘆鹽中推銷，致蘆鹽滯銷。”

四月二十四日天津大公報也有同樣的消息：

“……詎近頃有人，不時由遼甯省撫寧等處，以海船運輸大批私鹽，經洋河口運至冀東各縣銷售，致官鹽滯銷，鹽稅損失甚鉅……”

可是另一方面，日本也拚命利用漢奸鹽梟，把食鹽私運出口，據上海大公報四月一日消息，其情形如下：

“最近私鹽出口之事，時有所聞，半月以來，運出已達一萬二千二百擔，係由冀東保安隊保護之下，就地購辦運往大阪，并未繳納任何稅賦，此間官方對此，亦無可如何。”

運出口的私鹽，不僅專為日本國內之用，同時它也想把偷稅鹽斤仍舊在中國沿海一帶（如膠東等處）銷售，以與官鹽競爭。這樣，它不但可以得到免稅使用蘆鹽的便宜，同時也可得到眼前販運之利。

這一種把滿鹽運到冀東，把蘆鹽偷運出口或在膠東等處私售的行爲，自然也有破壞鹽務，威脅政府財政的作用。這種破壞鹽務的舉動，其目的也無非要達到，在日本有利的條件之下，使蘆鹽順順利利的輸出。

我國政府方面對於這種威脅引誘所造成的結果，自然感到十分切膚之痛！因為國內廣大民衆的日趨貧窮，大多數却在淡食和刮食硝鹽的條件之下，蘆鹽的相對過剩也是事實！爲要保鹽稅收入於舊水準而不墜，“蘆鹽輸日”也就被中日雙方共認爲可能實行的前提了！

從這個前提出發，中國方面的要求是，但願能使現有狀態不再繼續，對於慘痛的青鹽輸日歷史自然無暇去回顧。當四月底和五月初，中國方面原擬仿照前例再來一個專辦公司（五月

一日原擬成立裕民公司)，一切依照青鹽輸日的舊法來解決問題。然而從日本方面得到的回覆是，現在已不是十年前的東亞局勢，中國也已不如十年前的中國了！天津日副領永井對這個擬議公然抗議說：“蘆鹽專賣要設裕民公司，這是與前談特許出口事不符！”（五月四日申報）

裕民公司擱淺以後，中國方面退一步的提出，由“包商承辦”。爲欲在出口鹽上面稍微抽一點鹽稅，不願白白無稅送人，所以當五月中旬時“官鹽商辦”的原則也還能保守！然而從日本方面得到的第二個回答却說：“不能，萬萬不能！我們要直接向灶戶購運！”

現在，經過幾度的進逼和退讓，正式協定雖未宣佈！半正式的蘆鹽輸日契約據說已經成功了！五月二十七日申報天津專電：‘蘆鹽輸日契約，已由長蘆運使戈定遠天津日領岸偉一兩個人簽字。契約的內容是爲：准三菱岩井兩公司購買，年限三十三萬噸，輸出稅每噸一元，脚力一元五角，并由長蘆鹽灘請日本顧問指導製晒化學用鹽。’

從這個契約上我們可以明白的看出，第一，日方代理購鹽的還是三菱，然而中國的裕民公司已經沒有了。青鹽有永裕公司專賣，目前蘆鹽却歸三菱等直接購買，這樣，鹽民灶戶也將更直接被日本方面緊緊抓住！此後鹽民在操縱鹽價的抑壓之下，鹽民的生計將不堪設想。

第二，蘆鹽出口稅每噸抽一元，實際上據說合每擔只抽六分，較之青鹽輸日由永裕專辦時抽稅一角二分還要減低一半，（前永裕公司輸出鹽表面上每擔僅收三分，而實際則政府收回青島鹽業之代價三百萬元，須在永裕鹽價上負擔，故每噸除五角零四釐正稅外，尚須負擔一元四角之產價，計每担共納費一角二分，——上海大公報四月十六日），至於蘆鹽出口稅較之內地稅更輕得多多！

第三，這個契約中規定說年限三十三萬噸，但另據中央社六月一日專電，却說“特派員河西日內返國覆命，首批蘆鹽四十萬噸，將於本月內輸出。”那末，三十三萬噸云云，也不過為字面上之規定，而且在日顧問的指導之下，此後化學用鹽將大量產出，因而在首批四十萬噸之後，第二第三……批必然繼續輸出，華北食鹽市場必然大形空虛。於是華北大眾的淡食命運也將更形穩固，或者劣質的大連紅鹽也會繼續作為華北大眾的替代品了。

驚動全球的華北走私問題

駱 耕 漠

字林西報特約記者五月二日天津通訊：記者曾與新自北戴河返津之某商人談及私運事，據云：“余並未見私運情事，所見者只有各式船隻三十八艘，停泊於北戴河海灣，用舢板多隻，卸運貨物至海濱起岸，其忙碌情狀正不減於貨運繁多時之天津外灘各碼頭。君不能再稱此為私運，因其實為自由貿易矣。就目下之情形而觀，不僅北戴河為自由貿易之口岸，甚至其沿海一帶，亦均自由放也。”

到現在為止，關心華北走私問題的已經不僅僅是直接負責應付的政府當局，親自受着私貨壓迫的民族資本家，以及各個階層裏面熱心救亡運動的愛國同胞，而且已經驚動了世界列強的執政者，尤其是大不列顛的朝野。華北走私問題所以會發展成為這樣一個國際性的、對內又是全民性的問題，決不是由於少數人或一部份人主觀上的誇大，而是因為它在客觀上確實包含着許多可怕的因素，而且一天危迫一天，使我們不得不加以全面的注意。現在為了挽救整個民族的危機，我們對這個問題需要加以充分的和積極的探討。

首先，我們想對華北走私作一個史的觀察，指明它的嚴重程度，以及它的影響，然後再來討論對付的方案。關於這一部份，有一點是我們最不應忽視的，那就是華北走私的開始和發展，是跟近年國難的加深以及外交上的種種失策節節相應的。譬如在四年以前，因為東北淪亡在敵人之手，而當局又不起來武裝收回，人造絲和毛織物這類奢侈品的偷運便接着在華北登台了，不過當時還不敢橫行無忌。到了一九三三年五月塘沽協定簽訂以後，走私因有冀東戰區為其大本營，來勢更猛烈起來，對於緝私關員竟敢加以公然的抗拒和毆辱。不過華北走私竟然引起全國乃至全世界的人們注意，那還在去年八月以後，因為當時於原有的塘沽協定以外，又補訂了何梅協定，使華北戰區範圍格外擴大，同時也就是使私運格外自由和廣泛。等到冀東偽組織與冀察政委會這兩個傀儡政權相繼出現以後，就連走私這兩個字本身也很難適用於華北了，因為從大連營口來的私貨可以公然在北戴河秦皇島起岸，並可自由運抵天津，這樣就難怪從北戴河回到天津的一位商人要告訴字林西報的記者說：“余並未見私運事情，因其實為自由貿易矣！”

現在我們來看看華北走私的驚人的具體數字吧。據海關所發表的報告，自去年八月一日至本年四月廿五日，由冀東戰區輸入天津的私貨如下(單位包)：

	人造絲	捲烟	疋頭	白糖	其他
八月	3,052	226	—	—	—
九月	4,020	510	680	—	—
十月	3,978	842	2,609	4,410	329
十一月	11,063	1,041	2,265	1,859	993
十二月	14,674	424	1,055	71,529	416
一月	5,082	252	944	65,143	185
二月	1,262	561	1,151	40	428
三月	63,039	1,812	4,796	10,975	1,193
四月	23,447	507	7,631	208,601	7,503
合計	89,617	6,171	21,131	479,296	11,052

從這表我們可以明白看出，華北的私貨正和天津的日貨一樣，正在那兒不斷地增加，而且愈來愈多。同時我們還得深深注意：這滾滾而來的私貨幾乎已經暢達地由天津而遍及全國了！西北因為無法緝私，人造絲白糖這類私貨得以蔓延，是用不着再說了；現在就是直通國都的京滬線上也充滿了私貨。據十九日南京專電所傳，其被緝獲的就有數十起之多。此外比較小的縣份，也有私貨出現，例如江蘇北角的沛縣，素稱交通梗塞之區，然據本月十二日該縣通訊，近來却有許多遠道小販，肩負着人造絲織品兜銷，每匹十元，比市價便宜一半。從這裏我們又可看到私貨的無孔不入。這樣，就難怪華北走私要成為舉世矚目的非常問題了！

現在我們要進一步地來檢查一下：這日益猖獗的走私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大家曉得：我們的“友邦”這樣熱心偷運私

貨，並運用各種方法把私貨傾銷到內地去（這裏我們要同時注意“友邦”在華南方面的走私活動），是抱有很大的野心的。它不僅僅是爲了關稅上的一點點便宜，而是想根本推翻華北的海關權，使華北經濟更露骨地殖民地化。換言之，它要借走私漏稅來動搖中國政府的財政基礎，借私貨傾銷來摧毀整個中國國民經濟，以期壓迫中國政府屈服，來接受中日“滿”經濟同盟的全部計劃。這些陰謀（東京的御用報紙幾乎是公開宣傳的）便是廣田三原則的侵略精神，現在幸賴“友邦”駐華軍人數月來的努力，已經很有成就了。第一，據海關當局統計，自去年八月至本年四月，因受華北走私影響，中國海關稅收已減少二千五百五十六萬元（統稅因華廠出品被私貨壓倒，亦顯著減少）。使南京當局和英美列強都感到很大的威脅，因爲中央稅收百分之四十，和償付外債本息基金百分之九十皆有賴於關稅收入。英國駐華專使羅斯爵士因不勝其威脅，且於四月底兼程北上，和華北日當局磋商妥協辦法，並提出減低中國關稅的具體條件。第二，一般工商業者因經受不起私貨破格傾銷的壓迫，也悲慘地從國內市場上相繼敗退下來。關於這點，我們願意多舉一些實例，使一般工商業者對於當前的國難，能夠有一個普遍的切身的認識：

第一，糖業方面：據上海該業同人說，華中和華北所銷用的糖，有洋糖和粵糖兩種，全由上海進口，一般市價（連關稅在

內) 爲白糖每担廿二元, 紅糖每担十八元, 然而私貨却只要十二元和十元左右; 因此津浦隴海兩路全爲私糖所霸佔, 京滬一帶亦大受影響, 上海六十餘家糖行都有停業之虞。據前月十八日時事新報所載, “金利源碼頭, 公和祥碼頭等處堆棧之華糖, 均無法出清”。

第二、人造絲業: 據上海該業同業公會報告, 上海人造絲疋頭廠家, 在去年有興昌, 鼎源等二十一家, 絲織機數計達二萬部, 現僅留六七家, 機數三四千部, 這主要也由於私貨傾銷。譬如從天津運來的緋葛綾, 每疋(計十八碼) 祇售三元至四元, 而本埠廠家所出的, 其最低成本就要合到六元, 這樣就難怪後者只好關門大吉了。

第三、海味業: 據上海海味業同業公會主席葛維菴氏談, 華北一帶的海味銷路, 遠在“九一八”之後即爲某國進貨所獨佔, 現在走私擴大, 上海海味在徐州以北的銷路已告絕跡, 長江一帶的市場到下半年海味旺月以後, 亦必爲私貨所侵奪。上海的海味業, 目下亦已受到陸續運來的私貨的打擊。

此外如紡織業, 麵粉業, 捲烟業, 火柴業等, 則早已受到私貨的迫害, 這在天津方面尤其表現得明顯。至於內地的手工業者以及一般商家(假使不甘當漢奸, 販私貨) 所受私貨傾銷的摧殘, 自然比城市裏的大企業更難承當。從這些具體的事實教訓之中, 全國民衆尤其是一般工商家, 實應澈底醒悟: 走私是

摧毀我們整個國民經濟的最毒辣的手段，主持走私的是我們應該一致反對的敵人。



那末我們該怎樣來進行我們的反攻呢？敵人的陰謀計劃是快要全部實現了，我們還能再遲疑片刻嗎？

然而事實上，政府當局對於這日益嚴重的走私問題，和過去對於其他各種中日外交問題一樣，自始即未採取堅決應付的辦法，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失策。譬如三月十八日，津海關與北寧路局在財鈔兩部的策劃之下，公佈了北寧路在天津東總兩站協助海關查緝起運洋貨暫行辦法，共計六條，其主要內容是：凡是沒有報過關的洋貨（即私貨），路局得請其補報，否則拒運。一望而知，這辦法已是大大的讓步，因為它已承認秦皇島乃至天津是日人的自由港，在那裏我們不能徵收應徵的關稅；同時這辦法又是非常不切實際的，因為財鈔兩部明明知道北寧路早已隨着冀東偽組織和冀察政委會的成立，而落在敵人控制之下了，那裏還敢執行上面的命令呢？再如四月二十七日，政府當局又開始實施另外一種“有效辦法”，即於津浦線的滄縣，平漢線的長辛店，增設新稅卡，同時又於津郊南北運河和子牙河匯合處添設檢查所，以期從水陸雙方來堵止私貨。但是打開地圖一看，這裏所謂“有效”只是對走私作更有效的讓步，因為這個辦法主要是由傀儡政權冀察政委會發動而經中

央同意的，它使私貨公然活動的範圍更從冀東伸展到津浦和平漢線上來。同時堵止私貨南下，還是不能有效。最近中政會又通過了懲治偷漏關稅暫行條例，財政部又接着公佈了稽查進貨章程，條文不可謂不嚴厲和不周密；但是誰都知道：中國海關的緝私制度，靠了英人的策劃，其嚴密已堪與世界列強媲美，而華北走私目下還所以那樣猖獗者，是因為我們的“友邦”竟運用更強的武力來策動走私，並驅使冀東和冀察兩個傀儡政權來替它助長走私。所以這次的條例和章程，無疑地將和過去兩次的對策一樣無效。固然，我們並不否認以往和現在政府當局所苦苦計劃出來的緝私防私等辦法，是可能發生一點作用的，同時也是應該提出的。但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對於敵人前前後後的各個方面的侵略行爲，我們要澈底地給以正面的反攻，這樣，前面那些輔助的緝私防私等辦法才能發揮它們可能的輔助力量，否則，就是空話。這是負責當局應該深深反省的！

說到這裏，我們務須談一談減低關稅的主張。因為日本軍部這次主使華北走私的藉口是我國關稅稅率太高，英國方面爲了想對日妥協以保全自己的種種利益，就派遣其駐華專使羅斯北上對日提出減低關稅的意見。但是我們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這是應該加以斷然的反對的，因為以較高的關稅率來保護民族工商業的發展，是我們應有的權利和自由，何況我

們的關稅稅率因過去種種束縛，還比世界各國的低得許多。所以我們有權要求當局徹底拒絕這種減低稅率的自殺辦法！要曉得走私是敵人無恥而殘酷地侵略中國的一種方式，“中國關稅過高”不過是他們的一種藉口吧了，即使稅率一度減低以後，“友邦”還是要祕密輸入的，它非使華北經濟完全殖民地化，使中國完全接受中日“滿”經濟同盟的方案不可；所以同意減低稅率便無異自殺！一九三四年七月新稅則頒佈以後，對日貨稅率本來就已經大大地減低了，然而其結果仍是今日如潮如湧的走私，這是我們應該學習的教訓！

現在全國民衆都在沸騰、怒號之中，大家都期待武裝抗敵！這是必需的，因為這是中華民族唯一的出路！譬如拿眼前的走私問題說吧：華北走私所以會一天猖獗一天，完全是因為我國喪失了失地和簽訂了塘沽協定，目下政府所提出的各種緝私法令先後皆歸於無效，也是因為不能建立起徹底的抗敵外交，這些在前面都用事實來說明了。所以真正有效的緝私方法和真正有效的救國對策一樣，只有以暴力制服暴力。

目下上海一般工商業者，因為如前所述，親身受着私貨的打擊，也痛感到國難的嚴重了，並起而共謀救亡之道了。連日來要求嚴厲緝私的有下列幾個團體。

1. 華商紗廠聯合會於五月七日電請中央嚴厲緝私。
2. 中華工業總聯會於五月八日開會，電請中央嚴厲取締。

走私並維持原定稅率。該會錢承緒先生並提出聯業統制，各業統制地方統制等具體辦法。

3. 中華國貨維持會於五月十二日舉行第一次執監聯席會，即電請中央嚴厲緝私。

4. 電機絲織廠業同業公會亦於同日召集會議，電請中央採有效辦法緝私並維持原定稅率。

此外總工會和糖業海味業等亦有同樣的要求。市商會更於十六日分函全市各業公會，徵求具體的緝私杜私方法，棉布業公會且即於二十日函答唯一有效的杜私方法，在“團結商民拒購私貨。”

這些表示固然是很可喜的現象，然而可惜的，他們對敵人的走私仍沒有徹底的認識，僅只要求用頭痛醫頭的方法，空口喊叫“嚴厲緝私”，而沒有堅決的行動。

從上述那些事實之中，我們可以看出上海一般工商業者還依然沒有奮起拒購敵貨，維護民族工業的決心。



最後，我們還要擊破一種有害於救亡運動的幻想。自從華北走私於四月間特別猖獗以來，英美列強也被驚動了：英美駐日大使都正提出抗議或詰問，比德荷法等國亦非常焦急，因而國內就有一部人幻想英美列強會和日本衝突起來，於是一方養成機會主義的等待心理，同時就減弱自發的抗敵精神，這是

應該加以嚴厲的批判的！在這裏，我們姑且不論英美列強這次反對華北走私，是爲了保全他們自己的利益，即保全英國在海關行政上的統制權，英美在華北的煤油市場，還有最最重要的即保全原有的關稅收入以償付外債本息，而非爲我國存亡打算；我們但問它們之間的矛盾是否可以給我們利用。固然，自華北走私特別猖獗以來，英美日（尤其是英日）之間的衝突確是比較顯著起來，但是我們不要忘掉太平洋上列強對立的基本形勢，即第一，美國因路途遙遠，在軍事上還很難駕御日本；第二，英國因苦於歐陸問題和地中海問題的應付，在遠東只有和日本攀老同盟的力量；第三，英美是世界性的敵人，聯合制日又較少可能。因此，英美列強怎樣積極起來干涉“友邦”走私，是很少現實性的。譬如上月底羅斯爵士兼程北上，只是向駐津日總領川越氏提出減低中國關稅的折衝辦法，即損害中國以利日本並保全自己，這是英國對於華北走私問題的基本態度。克萊武之對日詰難，乃至目下羅斯之鼓勵南京當局進行緝私準備，主要都只是虛張聲氣，使前面的妥協方案容易得到日本軍部的垂許而已！所以我們要徹底解決走私問題，不能幻想英日的衝突，只有依靠自己真正抗敵自救呵。 1936, 5, 24。

過去抵貨運動給與敵人的打擊

朱 則 民

敵人現在正從各方面向中國大舉進攻，在軍事方面，不斷地大批增加在華駐兵，並積極佈置，準備進一步地實現其吞併全中國的政策；在政治方面先威脅中國當局接受廣田三原則，繼而又和中國漢奸政權訂立使中國人民自相殘殺，使日本好藉口在中國增兵的“防共協定；”而在經濟方面，現在正大批地向中國輸入私貨。這種經濟方面的進攻，——走私，其嚴重性決不下於軍事或是政治方面的進攻，因為直到現在，走私已不只是爲要脫免關稅，而是敵人有計劃的要澈底破壞中國民族工業，要使全中國人民經濟生活依靠於日本的商品，即是說，要中國完全變成聽憑日本宰割的殖民地。

但是，敵人的進攻從各方面襲來，我們也只有從各方面反抗：我們只有以武裝反抗來回答武裝佔領；只有以抵制仇貨來回答敵人有計劃的無恥極頂的“走私”。

經濟侵略是毒辣的，然而經濟抵制也是厲害的。國聯對意

的實施制裁，不是引起意大利極度不安嗎？當然我們不能拿半殖民地的中國和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但是，如果我們一切受害的中國民衆，不管是工人，農民以至民族資本家，只要團結起來，武裝起來實行嚴厲的經濟抵制，也同樣地可以制敵於死命。

這決不是過甚其言，我們只要回憶一下中國歷次抵貨運動所給×帝國主義的打擊，便可知道經濟抵制的確是中國反抗敵人一種有力的武器。美國沃查德(D. J. Orchard)曾著文說：“中國用抵貨作政治武器”(China's Use of the Boycotts as Political weapon)(註一)，從這句話，我們也可以看出外人對於我國抵貨運動的力量的認識了。沃氏在說這句話的時候，還在中國抵貨運動並沒有巨大效果的一九三〇年。我們知道，直到一九三〇年為止，中國抵貨運動不過只有八次，而這八次的效果若和一九三〇年以後相比，不知要差得幾多。現在我們且將這八次抵貨運動的效果列表如下：

歷次抵貨年的進口日貨值與前後二年的平均值相較之增減百分率(註二)

	年 份	事 由	增減百分率
第二次	一九〇八	二辰丸事件	— 16.2%
	一九〇九	安奉線建築問題	
第三次	一九一五	廿一條事件	— 16.3%

第四次	一九一九	收回青島事件	+	5.5%
第五次	一九二三	收回大連事件	-	9.5%
第六次	一九二五	五卅慘案	+	4.9%
第七次	一九二七	山東出兵問題	-	7.1%
第八次	一九二八	濟南慘案	-	

上述八次抵貨運動，雖然沒有像“九一八”事件後抵貨運動對於日貨輸入打擊的那樣厲害，可是我們知道，如果沒有這幾次抵貨運動，則日貨輸入，必然年增一年，決不會老是住在那個水平上，這只要看當時日本對別國輸出之增加程度，就可得而知了。至於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抵貨運動對日貨輸入的打擊，按照上表來說，似乎並不厲害，但是我們就當時情形看來，就可以知道是相當嚴重的；當時不單是日本，即連英國也大受損失。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六個月中英國棉貨輸入中國為五百九十萬鎊，至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即五卅事件後）竟減至二百五十萬鎊，計減至百分之四十。日貨輸入的減少更加厲害。（註三）因為上表數字是前後兩年的比較，而五卅慘案前後兩年都是抵貨年頭，同時從一九二六年九月起，民衆抵貨已集中抵制英貨，所以比較起來，日貨還是略有增加。

這八次抵貨運動，雖然有很大成績，但是，我們認為在每次運動中還有許多的缺點，因此不能完成更大的任務。例如：每次抵貨運動都是為學生界知識份子所主持，不能把廣汎的

抵貨陣線組織起來；沒有深入到中國民衆各階層，特別是沒有得到商界民族資本家積極的贊助和支持，因此，使每次運動往往因奸商的破壞而不能持續下去。

“九一八”事件後的抵貨運動，來勢兇猛的多了。這運動一開始就得到全國的響應，全國民衆檢查的檢查，宣傳的宣傳，在洶湧澎湃的呼聲中，在人山人海的環視下，一堆的仇貨燒了，又一堆的仇貨燬了，這種運動不得不使日本資本家發起抖來。“鎮壓抵制日貨運動”這是當時日本當局對中國政府屢次迫切的抗議和要求，可見這一運動的嚴重性了。那末，“九一八”事件後抵貨運動究竟給日本怎樣的打擊呢。

一九三〇年“九一八”事件尚未發生的時候，華北華中華南三區，輸入主要日貨的總值是一五二、六〇六、〇一二關金，到了一九三二年（即“九一八”事件後一年）減至五一、五九〇、二五九關金，這即是說比一九三〇年減少百分之六六·二，實值在一萬萬關金之上。到了一九三三年減縮的更厲害了。一九三三年首三季進口日貨總值較之一九三二年同時期又減少百分之三〇·四，實值是一千二百餘萬關金。大坂和日本別的地方的紡織廠都紛紛關閉。

怎麼見得，這是抵貨的效果呢？我們可從中國對各國貿易的比率來看，一九三〇年全國日貨進口總值佔對外貿易進口總值是百分之一三；而一九三二年全年不過合百分之一四；一

九三三年首三季僅合百分之九。

也許有人會懷疑，這許是中國民衆購買力降低的緣故吧。我們說，日貨輸入固然會因中國人民購買力薄弱而減少，但決不會因此減到這樣多，這樣快。一九三二年中國對外貿易總值較之一九三〇年確是減了百分之二四·九，但是這和同時期日貨低落數字——百分之六六·二相比，不是還差得許多，這樣看來，誰也不能否認抵貨運動的力量了。

這一次抵貨運動較之前八次要兇猛劇烈多了，因此它的效果也大得多了；但是它給我們的教訓更是嚴重深刻；第一、在運動剛開始擴大和深入的時候，漢奸和奸商參雜進來搗起亂來，這時使我們整個運動無從整頓發展，後來出現了組織並不健全的“血魂鋤奸團”，倒給奸細們相當的打擊，這告訴說：在抵貨運動中，一定要有强有力的領導，和監督機關，由羣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進行抵貨運動。第二、這期間抵貨運動有一個很大缺點；就是在上海抗戰時，華北日貨輸入增加；在榆關長城戰爭時，華中日貨輸入增加（數字恕不舉了），這充分表現中國人抵貨運動未能一致，這缺點在今後抵貨運動中必須以最大力量克服過來。

“九一八”後經過一度劇烈的抵貨運動，到現在因為政府要“睦鄰”，抵貨運動也就在“睦鄰”政策下被鎮壓下去了。但是××帝國主義已從各方面向中國做總的進攻，“睦鄰”政策已

爲日本侵略史實證明是軟弱無能失着的政策，這時我們爲挽救我中國工商業，爲了民族的獨立和生存，能放棄我們過去所運用打擊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嗎？

我們要起來擴大抵制仇貨運動，但是我們認爲：第一、抵制日貨運動不能沒有武裝保護和支持，因爲在華北漢奸政權和日本帝國主義直接統治之下，沒有武裝保護一定要遭日帝國主義和漢奸的摧毀；即在華中華南也要防止漢奸的破壞和陰謀，所以抵制仇貨運動不能不馬上動員組織和武裝全國人民大衆。第二、我們認爲抵制日貨運動不得不擴大爲武裝抗×戰爭，因爲在日本帝國主義是不會容忍這一打擊，而在我國爲澈底實行嚴厲的抵貨運動，一定要趕出包庇走私的帝國主義兵力。第三、我們認爲：抵貨運動本身就是爲着進一步實行抗×戰爭，也只有這樣抵貨運動才表現出它的偉大力量。所以一切沒收的日貨充作抗×軍隊的用品及一切救國之用，或充救濟受難同胞之用。日本帝國主義在大量走私之後，隨之而來一個大批增兵，讓中國抵貨運動之後，也來一個武裝抵抗吧。

(註一)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of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ume 152 Nov 1930。

(註二)鄭友揆著：‘九一八後兩年我國日貨進口分析’。

(註三)文化界救國會出版：‘今年的五月’。

工業

1. 中國煤礦業和煤業會議
2. 中國鋼鐵資源與鋼鐵工業
3. 中國棉紡織業的新趨勢
4. 中國的絲繭業
5. 中國的糖業問題與國糖產銷協會

中國煤礦業和煤業會議

朱 楚 辛

煤，按它的效能來講，可以說是一切工業向前發展的動力和前提。假使一個國家要振興工業，對於煤礦就得加以注意和開發。中國就煤儲藏量來說，可以說是在世界上藏煤最豐富的諸國家中，佔到一個地位的。然而從它的生產量上看，却還大大地落後。據 W. Belden-M. Salter 的估計，中國地下煤藏有二四八、二八七百萬公噸，可是每年生產量只有二七、二四四、六七三公噸，簡直只佔儲藏量的萬分之一多一點。煤礦工人（新舊礦都計算在內）也只有二十萬左右，假使從他們的生產量來說，每人每年平均不過一百二十六噸。比起歐美諸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來（比利時二百噸，英國二二五噸，美國六八八噸）中國煤生產的落後是一目瞭然的了。

再從煤的消費方面來看，中國煤大部份是供家庭燒用的需要（佔百分之四三·三，其中內地佔百分之三三·三，城市佔百分之十）；而工廠不過佔百分之三二·六；交通事業佔百

分之八·四；煤礦自用佔百分之八，其餘供其他各業所消費。在這裏，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中國一般工業用煤的鮮少，對於煤業的前途具有極大的關係。因此，由於中國經濟一般的落後，中國煤業也就蒙着一層黯淡的命運。

假使再一看投在中國煤礦業中的資本，我們知道中國煤業還具有很濃厚的殖民地性。下表是很明顯的指示着這點：

（見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日日新聞’，包括東北四省）

國籍屬	資本額(元)	百分比
純華商	108,087,144	48.22
中日合辦	29,988,693	13.38
中英合辦	31,363,158	13.99
中德合辦	4,500,000	2.00
中俄合辦	24,000,000	10.67
純日商	26,213,620	11.69
總額	224,152,015	100.00

上表所列純粹華資不過佔百分之四十八，這顯示着中國工業的半殖民地性。並且因為華資各礦遠較外資生產技術為落後，所以在煤生產總量中，華資所佔的比例更為低下。據第四次中國礦業記要所載，民國十九年中國境內所有外資各大煤礦之產額，為一四、七一七、七四四噸；佔全國產額的百分之五六·七六。而華資各大煤礦的產額只有四、七五三、三四七噸；僅佔百分之一八·〇二，即連各小煤礦的產額都計算在內，亦祇為百分之四三·二四。喧賓奪主的形勢又是多麼的

可驚！

外資在華的煤礦業上既有如此雄厚的勢力，所以今日中國重要各埠，如上海天津青島廣州等地的煤銷市場，除開外洋輸入的外煤不計以外，一大半的銷數是被幾家外人經營的大煤礦公司所霸佔着的。上海天津幾乎成爲英商開灤獨佔的狀態，濟南青島則全操在日資魯大等的手裏，所以從煤銷市場看起來，國煤的命運是很可悲觀的了。

到目前，因爲世界經濟恐慌的深刻，使中國的煤礦業無論華資外資都一律受到深刻的打擊。根據礦業聯合會去年十二月編的廿三年度國內礦業概況一覽表所載，開灤產額雖有五百萬噸，而販賣額不過四百萬噸；此外產額與販賣額之差，中福公司有十七萬噸，中興有十萬噸，晉北礦務局有十萬噸，井陘礦務局有十二萬噸。總計全國各礦，幾有二百萬噸左右找尋不到顧主。這對於幼稚的中國煤業，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致命傷！

煤業另外一種致命的打擊是“省自爲政”的情形的存在，致使他們受着很大稅捐的負荷，間接直接助長了外煤氣燄的作用。例如中法越南商約對於越煤的特稅率（由關金二元九角減爲關金九角），國煤在華南的銷路已大受排擠。而今年一月二十七日，廣東對省外煤輸入無論國煤外煤一律每噸征稅五角，更使國煤不能在廣東立足。財部在表面上按照礦業法征

稅百分之五，然實際情形截然不同，譬如湖北富華煤礦稅捐就有煤產稅，財委會捐，工會捐，公安捐，一區捐，二區捐，公益捐及其他雜捐等九種以上之多（申報五月十一日）河北各煤礦商也在呼號稅捐的繁重，據說除礦區稅，礦產稅，營業稅等正稅外，也有地方公益捐，教育捐，警務捐以及印花稅等等名目。此外在強求統一的原則之下，河北等區的煤礦稅率也已逐年增高。民國三年原定千分之一五，後改為百分之二，民國二十一年又修訂為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最近則確定為一律百分之五。這對於原來比較可受輕稅的煤礦是大大增加了負擔。例如井陘年產百萬噸左右，從前僅繳礦產稅二萬四千元，現在照百分之五計算，據說已加一倍有餘；河北一般用土法開採的礦業，從前每噸不過抽稅三四分，現在則須繳付與年產達五百萬噸的開灤煤礦相同的稅率（百分之五），這簡直是為外資煤礦開闢新市場的清道夫！現在，華北各煤礦，因為“冀東偽自治區”的強征統稅，而冀察晉綏四省統稅局又仍舊照常徵稅，所以礦商苦痛更加深刻，就連資力雄厚的英商開灤也已感覺到重稅難以負荷，不能跟外煤在中國市場上競爭了，至於國煤的焦頭爛額更無須贅述。

此外，運費高昂也是中國煤業不能發展的一個原因。歷年交通事業的開發，主要除為軍事上的便利之外，簡直很少能給煤業運輸上以低費運輸的便利。無論是河南的焦作煤，山西的

大同煤，陽泉煤，以及陝西的韓城同官白水煤，或者廣西的遷江煤，都因運費高昂而不能與外煤在市場上相角逐，或因無福享受近代的交通運輸工具以至積滯不銷。例如大同煤以唐山煤為競爭對象，然而前者因平綏路運費過高，致使煤價無法低廉，而後者又可受“無論到達遠近各大站每年只繳五百萬元運費”的特惠。陽泉煤以安南煤為對象，然國內運費最高的正太路却為它必經之途（每噸每公里二分五厘，現改二分，但因取消回扣，仍與二分五厘不相上下）。井陘煤礦自築運煤鐵路的運費還要高過正太路一倍，而平漢路運價又較北甯津浦為高。因此井陘煤礦也就喘息在高度運費之下，不能與外煤在市場上作一較量！

國煤在上述諸不利條件之下，自然難與外煤相競爭，何況日煤又以排山倒海之勢向中國市場進行匯兌傾銷，這簡直可以致國煤的死命而有餘。據本月五日中華日報所載，最近日煤以成本之下的販賣價格在中國銷售，不僅比華煤價格低廉，且比其在瀋陽大連及日本國內的販賣價格亦形低降。撫順煤的成本（包括運費關稅）每噸計一〇・六五日元，而販賣價格則僅為九・七五日元，日煤成本，每噸八・八五日元，販賣價格只須八日元。它們在中國市場上與國煤價格差額比較如下：

（單位噸）

販賣地	上海	青島	漢口	天津
販賣價格	國煤 (中興煤) 十五元	青島煤 (博山煤) 十二元	漢口煤 (濟漢公司) 十三元	十二元七角
	日煤 九元八角	七元八角	十元	十元

當前的中國煤業不僅受苛重捐稅與高度運費的摧殘，以及外煤傾銷等等不利而日趨沒落，同時也正與國土被佔以及一般紗廠業被日資收買同其命運，有許多煤礦公司又漸漸地要被日資所征服，所吞噬了。最近柳江煤礦在強奪之後，終於以六十六萬元的價格讓渡給日資泰記公司了，長城煤礦和寶興煤礦也在敵人的淫威之下收歇停閉。北平門頭溝天佑煤礦因為欠中日實業公司債款無法清償而由日人接辦，去年甚至開灤都有被日本收買的傳說。這許多，象徵着今日整個華北的命運，也指示着中國煤業一般的前途。

* * * *

正當這內憂外侮交攻的時機，六月一日全國煤業會議的召集，不能不說是一個適應時機的偉大舉措。然而我們一回憶過去實業部當局對於煤業救濟的歷史，却又不能不使我們抱着極大的惆悵，去年以來，關於一千萬煤業公債的發行，真是“過盡千帆皆不是”，醞釀了多久仍是沒有實現；煤業借款去年八九月間雖曾轟動一時，可是現在也無聲無息；礦業金融調劑委員會奉命撤了，現在代替的成績就是這個煤業會議。煤業會議究竟能予中國煤業以多少光明的前途呢？我們可以先看

一下參加這個會議的是什麼份子！

參加這個會議的範圍有十省一市，代表有三十一家煤業公司和二個礦業聯合會。他們所代表的佔全國各省全數煤礦產額的三分之二，其餘三分之一的小礦業者却都在被邀請之外。這對於中國整個煤業說，自然不能不視為遺憾。因為此次實業部當局對於中外資本是一視同仁的，在這三分之二的成份中，自然外資如開灤中福以及魯大等要佔很大的勢力；而其餘三分之一的小礦業者，完全為華資，却未得參加這會議的機會！

其次，據實業部當局的宣示，會議目的不在如何減低運費和稅捐，而在如何劃分售區以消除過去的銷售傾軋。可是我們知道中國煤業的資本，大部分是在外資的掌握之中，如果不給國煤以相當的特惠，在現狀之下，僅以一視同仁的統制辦法來破除“無望”的競爭（假定它可能的話），這不能不說是限制華資的發展。例如今年一月井陘與開灤曾經訂立聯合推銷合同，規定開灤銷數佔百分之七十八，而非陘佔百分之二十四。假使煤業會議的分配銷量也從此種原則出發，那末，簡直要把華資煤業圈在狹少的圈子內而永不得發展了。何況，其餘三分之一純華資煤業者又都在被拚棄之列呢！

總之，中國煤業的不振，正如一般工業一樣，主要的病症是在帝國主義勢力的壓迫，和含有封建性的苛稅的摧殘。若要

使其能夠振作，自然應該廢除繁重的苛稅，減低煤斤的運價，並且對外煤施行高度的關稅，對外資和華資煤礦的措施也應輕重有別，然後國煤才有光明的前途。因此，我們不能不希望實業部當局對於華資與外資經營的煤業放棄其“一視同仁”的態度，對於中國工業不振的主要病症，也設法把牠一一拔除，使中國的民族資本有逐漸欣欣向榮的可能。

中國鋼鐵資源與鋼鐵工業

陳 文

一國國民經濟的生產，可分為兩大部門：一是生產手段的生產，另一是消費資料的生產，兩者形成不可分的辯證的合一。但是，生產手段的生產，却占有主導的決定的地位，原因是它能決定整個生產部門發展的性質和程度，特別是生產手段部門資本的蓄積，乃是整個生產部門的資本擴大的前提。無疑的，鋼鐵工業是生產手段生產中最最基本的工業之一，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都傾全力以發展鋼鐵工業和壟斷鋼鐵工業，這是歷史的事實。

其次，近代戰爭（無論是侵略的或是防衛的）的勝負，愈加依賴於一國生產手段的生產部門之發展程度，而尤以鋼鐵工業為最有直接的決定關係，假使大家還能記起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如何不惜犧牲保障布留安盆地的鋼鐵工業，以及戰後德國如何處心積慮的要佔領沙爾流域和法國要收回亞爾薩洛林，那末大家總該特別重視鋼鐵業對於民族生命的關係罷。

在這樣兩個認識之下，我們來討論中國鋼鐵資源和鋼鐵工業，是有特殊意義的。現在，隣邦在提倡‘農業中國’，政府主張‘經濟提攜’，隣邦從統制東北產業進至華北資源開發，而政府也從心理建設的新生活運動，進展到物質建設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了。作為國民經濟發展之基礎的，作為抗敵自衛之資的鋼鐵工業，究竟怎樣了呢？這是值得我們深自反省，值得我們為國防經濟而奮鬥的。



首先我們要說到中國鋼鐵工業的自然資料——鐵礦的自然豐度和分佈情形。

假使說中國的煤藏量佔到世界的第三位，那末，鐵藏量是真夠不幸的了，——中國是個鐵藏貧弱的國家。世界藏鐵225,689兆噸(百萬為兆)，中國連東北在內，一共祇有1,200兆噸，僅佔世界的百分之0.54。這種自然富源的貧瘠，應該是能特別提醒一個民族的注意，它要為保持民族經濟和自衛的生命線——鋼鐵資源而奮鬥。

然而到現在是痛定思痛，我們如何來補償五年前不抵抗所給予鋼鐵工業的致命打擊呀！我們鐵藏量既已微弱到僅佔世界的0.54%，而在這極端微少的數字中，還有百分之七三以上早已拱手奉送了。讓我們沉痛的引用一張統計表在下面：

(1) 全國鐵藏總量	1,206,437.570噸	100%
------------	----------------	------

(2)遼寧熱河	883,521,570噸	73%
(3)中國本部	322,916,000噸	27%
(A)察冀魯綏	174,601,000噸	
察·宣化龍關	91,645,000噸	
河北·傑縣	32,424,000噸	
山東·金嶺鎮	13,700,000噸	
綏遠·白雲鄉	21,000,000噸	
(B)長江流域	111,800,000噸	
(C)閩粵	36,512,000噸	

在極度貧乏的鐵藏量中有百分之七三以上在五年前跟着東北的土地，一起拱手奉送了，我們知道這是對於隣邦的戰爭準備，是獲得了如何巨大的幫助，而對於我國鋼鐵工業的發展，又如何殘酷的打擊！日本每年產鋼三百萬噸，本國所生產的鐵砂僅有二十萬噸，它需要向中國朝鮮巧取豪奪，還得每年大批的向馬來南洋羣島一帶購買鐵砂。九萬萬噸鐵藏量的獲得，保證了隣邦鋼鐵工業戰時的原料供給吧！

我們還餘下大約百分之二七的鐵藏量，共計322,916,000噸。我們要長期抵抗，要物質建設，那末應該如何用決死的精神來保持這劫後餘業呢！假使再把這些奉送，我們真要把中國歷史倒退二千年，學習那種‘揭竿’起義精神，來收復失地了！但事實之不幸，使我們真得啼笑皆非。餘下來存留在中國本部的鐵藏量，有百分之五四以上，是集中在察冀魯綏四省的。這殘餘中的百分之五四的鐵藏量又怎樣了呢？華北四省的鐵藏

量174,604,000噸中，佔首位的是察哈爾的宣化和龍關，察東從去年起，也已經是偽軍和日軍的天下了，隣邦的技師，殖民地探險家，財閥，都已在計劃着開發宣化和龍關的鐵了。其次是河北的灤縣，共計32,424,000噸。灤縣在從前是非戰區域，中國只有半個主權，現在是殷逆汝耕的轄地，這一筆天富也只好勾銷了。再次是綏遠，計20,000,000噸。綏東六縣，業已淪亡；現在正是敵騎環攻，進窺全省的當兒，礦藏是否能隨領土得以保存，還要看我們政府能否領導地方抗爭。此外是山東金嶺鎮，恰恰位在膠濟路張店附近。日方在膠東半島的勢力，在威嚇利誘的要把山東招到冀察政權去，這是衆目昭彰的事。所以，我們儘可不問冀察政權是一個傀儡政權的變形，隣邦在軍事上已經控制華北，已經在華北進行資源開發；退一步說，華北諸大鐵藏地，也已多半名實都給日本拿過去了。這是準備抗戰的準備成績呀！

華北的鐵藏是用這樣形式繼續奉送隣邦的，而長江流域和閩粵的一點兒殘餘，却在用公然盜賣的形式，由地方政府源源輸送給隣邦。長江流域的鐵礦，集中在湖北和安徽兩省。湖北有漢冶萍公司，五十年前，清朝官吏張之洞在富國強兵之下，所建立起來的。那時就已經侵入了日本資本，到了民國二年，當時貪官污吏的軍閥政府，爲了借用日資，和日本改訂新合同，漢冶萍須供給日本鐵砂三千五百萬噸，但是整個礦還不

夠三千萬噸。這種喪權辱國的契約，就將中國本部唯一大鋼鐵工業的漢冶萍公司犧牲了。它實際上祇成了隣邦鋼鐵工業的原料生產者，中國天然富源的盜賣者。歐戰以後因為長江流域亂事時作，所以這個契約倒未見忠實履行，尤其是九一八以後。好幾年不曾運礦砂赴日。但是到了去年，我們的湖北省政府建設廳，就一口氣對日出輸象鼻山十五萬噸鐵鑛砂，每噸僅值四元，這種喪盡廉恥的行爲，當時實業部曾用有關國防及國家利益的理由，來制止它，可是因為最高軍事當局業已允許，也奈何它不得。原來漢冶萍公司所屬的大冶廠每年產鐵砂礦約38萬噸左右，象鼻山所產約7萬噸。最近這種盜賣國富的現象，更是變本加厲。據本年七月七日第389期礦業週報登載着六月廿八日中央通訊稿說：“湖北建設廳去歲探出象鼻山鐵砂三十萬噸，全數售予日本，行將運畢；尚有七十萬，正與日商磋商售運合同；並計劃開採尖山鐵鑛，聞可得鐵二百萬噸。”礦業週報的編者，一方面聽了本年三月間行政院翁祕書長的演講辭裏說：“本來中國對於棉鐵政策是很重視的，我們現在第一要自己提倡鍊鋼鐵，第二鐵砂出口應由政府管理，無論何人以鐵砂售於外人，時間不能過長，分量要有斟酌，俾得供給自己的化鍊”（中國地下的富源與國家的力量）。可是事實是怎樣？說是說，做是做，難怪礦業週報的編者說：“回憶翁文灝祕書長之演講，不覺痛心！”

除出湖北而外，有大量鐵砂生產的是安徽的桃冲和當塗；每年生產的有40萬噸左右（1933年3萬噸，1934年4萬噸），因為都跟隣邦訂有長期售砂合同，每年還是把鐵砂強制售賣給隣邦。所以，長江流域每年80萬噸到90萬噸的鐵砂，都是隣邦鋼鐵工業的寶貴資源。自然，除鄂皖兩省之外，長江流域其他各省也多有鐵礦，但大都藏量不富，大多是小規模生產的。所以，中國本部所留下來的鐵藏量中，長江流域所佔的百分之三四左右，雖然名義還是我國所有，實際已經等於隣邦的了。

大家還可以放心，閩粵還留下36,512,000噸的鐵藏量。不過為難的倒是天下烏鴉一般黑，鄂皖可以出售國富給隣邦發財，難道閩粵就不會做？

翁文灝先生說：“中國所產十萬萬噸鐵砂，有七萬五千噸在遼甯境內，剩餘之二萬五千萬噸又去了二千萬噸，更覺可怕，所餘二萬三千萬噸，我們如何的利用，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翁先生是把華北藏量都算在“所餘”的份兒裏的，而現在情勢迥異，鐵礦資源斷絕的危機，比翁先生所估計的不知又增大幾多倍，所以我們更得重視，地下富源與國家力量的關係了。

然而產鐵工業的全部滅亡，對於國家力量所感受到的切膚之痛，較鐵藏資源的喪失，更要現實得多了。中國連東北在內，一共有九家新式設備的鍊鐵廠。這九家的鍊鐵廠，就是代

表中國的鋼鐵工業的。就生產能力的裝置而言，每日能產鐵，81萬噸，然其中在東北的日資鐵廠的產量，佔到1,820噸，約達百分之四八。這種情形已經有太阿倒置之嫌，可是實際情形，還更加不如，近七八年來，龍煙公司（河北石景山），漢冶萍漢陽廠，大冶廠，新鄉宏豫公司，上海和興鋼鐵廠，都先後停爐，完全沒有生鐵生產，祇有六河溝公司所附設的揚子鐵廠和保晉公司經營的陽泉鐵廠，時作時輟，每年還有一點生鐵出產，然而不過2—3萬噸。所有機械生產的生鐵，可以說全是由日資的本溪湖鐵廠和鞍山鐵廠所獨佔，以東北失陷的一年計算，兩廠產量占機械生鐵產量的百分之九七以上。東北失陷以來，鄰邦的金融資本立刻和關東軍的武裝勢力融和在一起，投資一萬萬圓，收買鞍山弓長嶺諸鐵廠，成立昭和製鋼所，儘量開採得天獨厚的地下鐵藏，把東北的鋼鐵工業推到侵略戰爭的第一線上。反觀剩在關內的諸鐵廠，每年雖能生產72萬噸，可是依舊關門大吉，仰賴外國每年五十萬噸左右的生鐵的輸入。

目下中國每年尚產生鐵17—8萬噸，都是土法開採的，這種土產生鐵，還要輸到外國去。聽說政府要在安徽馬鞍山江邊築一日產毛鐵350噸的鐵廠，廣東也想在廣州附近築一日產毛鐵275噸的鐵廠，山西也要在太原附近築一日產毛鐵160噸的鐵廠，但計劃多年，還是紙上具文。已有的棄之如敝履，不值一

願，新的却是實現無期。這樣，就把中國鐵工業犧牲了。

至於說到鍊鋼，那是更痛心的了。日本在歐戰之前，產鋼不過三十萬噸，中國產鋼也有十五噸，到現在日本每年產鋼三百餘萬噸，中國弄到一千噸還不到。舊有鍊鋼設備最完備的漢冶萍漢陽廠，上海和興廠，早已完全停工。和日本在東北銳意經營昭和製鋼所，每年產鋼四十萬噸比較起來，才會明瞭我們五年來還是在努力經濟建設，還是在力求“農業中國”的命運的到來？

我們瞭解了鋼鐵資源和鋼鐵工業的現狀之後，會知道第一：非收復業已喪失的鋼鐵資源，非嚴密保護現存的微量鐵礦，就不足以求民族生產力之發展，更證明沒有充分的鋼鐵生產，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是完全騙人的謊話。第二，假使不求鋼鐵生產量某程度之自給，以增長我們禦侮自衛的力量，只知造公路便敵人，那末，所謂準備便要落於不着邊際！

中國棉紡織業的新趨勢

羅 瓊

一 中日提攜聲中的原棉發展

日本年來提出“農業中國，工業日本”的復興中國農村的新計劃，以完成“中日經濟提攜”的任務。這種“復興計劃”主要的內容是：第一，在華北設立農事試驗場，指導復興農村的具體計劃；第二，爲了保證農產品確實有銷路起見，改良和培植的農產品，暫以棉花爲主；第三，在一九三六年內，華北各省的棉田，至少須增加二百萬英畝以上，而棉種則必須用美棉栽植，照這樣看來，那麼所謂“農業中國”的意義，在現階段大部份就等於“棉業中國”了。

不過疑問就此發生，爲什麼這種“復興計劃”的內容，單只注意到農業中的棉花呢？原來這“復興計劃”是根據着“工業日本”的一個原則而決定下來的。而在日本的工業中最重要的部份就是紡織業，在過去幾年中，牠的棉紡織品已在南洋印度非

洲乃至整個世界市場上，和英國的棉紡織品互相角逐，所以在目前爲着擴展牠的棉紡織業，壓倒英國蘭開夏的棉業起見，牠需要大量的棉花，但是這是日本窘處，它所需要的棉花，大部份都靠着美國和英屬印度輸入，華棉輸入實在有限得很，例如在一九三四年日本棉花總輸入額約有十八億磅，而華棉僅佔20.4%。照這樣看來，倘使英美一旦拒絕供給棉花的話，那日本的紡織業除了束手待斃以外，簡直是一籌莫展的。因此日本爲了減除自身對英美的依賴起見，就不得不向華棉發展了。

那麼華棉有沒有發展的可能呢？這倒不用擔憂，中國有着兩大產棉區域（長江流域，黃河流域），都有豐富的棉產。特別是河北山東山西三省。棉田的面積佔全國棉田總面積的33%，而產額佔全國的42%。量的方面已經如此重要，在質的方面，這三省的棉花，又佔全國之首。特別是山東，美棉種植，已佔棉田面積的60%，河北省也佔30%。並且就是上述的質量，還遠沒有達到三省所能容納的極限；在一九三二年三省植棉面積，僅佔全部耕地的4.56%，而山西還只佔1.97%，所以三省的棉花，實在是前途無量呢！

日本有鑒於此，當然抓住了不肯放手，在東北，牠們老早已經決定十五年計劃極積擴充棉產，據說棉田面積1934年已經比1933年增加10%。到計劃完成，產額可以增加40萬包。在山東方面，遠在1933年就成立山東棉花改良會，改進中國棉

花，最近日本外務省，更派駐濟總領事西田，切實負責改進山東棉花，並向魯韓交涉在膠東租地，募集農民，貸放種子款項，栽種棉花。到去年華北事變以後，天津日本駐屯軍和日本外務省雙管齊下，前者規定投資二千萬元，派遣日籍的指導員，協助農民種植棉花；後者更決定把華北文化費，增加到七百萬元，在各地設立自然科學研究所，指導栽種棉花。並在大日本紡織會社，金滕紡織會社和東洋紡織會社的要求下，由駐華文化部，聘請滿鐵技師改進棉種，借朝鮮總督府棉籽十萬斤，在冀魯晉三省試種，並規定每省貸給農戶費用三萬元；另一方面，晉省復在日本的要挾之下，“自今年起，全省強迫種棉，不種即問罪，如有損失，政府賠償，推行人員敷衍者以遺誤罪論”。

日本這樣雷厲風行地把農業中國的計劃，實行起來。它的精神固然可以欽佩，但它的用意實在有些可怕，原來所謂“農業中國”也者，按照上述的分析，不過是利用它在華的政治經濟的特殊勢力，強迫中國農民生產它所需要的原料，幫助日本發展它本國的棉紡織業而已。

二 一落千丈的中國棉紡織業

日本不單要拿中國的棉花，完全放在它支配之下，並且還要壓倒中國僅有的民族工業——棉紡織業。最近幾年中國民

族紡織業一落千丈；而在華日廠。却仍突飛猛進，看了下表數字，就可一目瞭然了：

兩年來中日英紡織廠對比之變動

年份	中國資本			
	廠數	紗錠佔全國%	線錠佔全國%	布機佔全國%
1934	92	57.97	32.47	48.85
1935	96	55.68	32.53	46.86
年份	日本資本			
	廠數	紗錠佔全國%	線錠佔全國%	布機佔全國%
1934	41	38.12	66.91	41.40
1935	44	39.29	66.86	44.86
年份	英國資本			
	廠數	紗錠佔全國%	線錠佔全國%	布機佔全國%
1934	3	3.91	0.62	6.75
1935	4	4.03	0.61	8.28

看了上表，華商的廠數和線錠，看來好像稍稍增加，但是這不能做樂觀論者的藉口，一方面因為一九三五年到現在，日英廠家都從紡紗傾向織布方面去，而中國廠家只能拾取日英廠商的殘餘了。

另一方面即使線錠數稍稍增加，還不過是紙面上的現象，一年來停工減工的增加，真是造成了空前的紀錄。

兩年來全國紗廠棉業狀況(華商紗廠)

	1934年上半年	下半年	1935上半年	下半年
開工錠數	4,678,272	4,777,092	4,809,559	4,952,826
停工錠數	1,224,267	933,683	1,344,986	1,360,273

平均停工鐘點	1,583	1,598	1,757	2,443
半年間總錠數停工週數	3.98	2.44	3.72	5.08

並且這種現象，更帶着全國普遍的形態出現：

一九三五年全國各地廠商停減工數

地 別	減工廠數	停工廠數	停工紗錠數
上海市	9	8	365,214
江蘇省	3	6	152,833
湖北省	—	2	180,832
河北省	—	3	122,035
其 他	2	5	180,820
共 計	14	24	1,001,645

上年來停工減工的情形已經如此厲害，但是到了1936年紗市仍未好轉，華商紗廠存貨比去年年底激增一萬另二百八十八包，所以各廠還是一再縮短工作時間。

不單這樣，許多廠家，都已停到無可再停，減到無可再減的地步，於是不得已而倒閉者，真不知多少。

1935年倒閉的紗廠數

廠 名	資本(萬元)	紗錠(枚)	清理日期
天津裕元	560	71,360	1月11日
上海民生	70	9,000	5月
漢口第一	600	88,000	7月
蕪湖裕申	100	18,400	7月14日
漢口民生興記	28	53,312	7月28日
啓東大生第二	150(萬兩)	30,800	11月 1日

除此以外，其他沒有調查清楚資本數量的華商紗廠倒閉

的在上海還有五家，武進和無錫各三家，青島蕪湖各一家，到今年一月一日，甯波和豐紗廠，就宣告停工，真是替1936年中國紡織業放了一聲不吉利的開門炮！而大生第二紗廠，又以二百萬元的最低價格，登報招標，在本年三月九日開標，竟沒有一人問津，現在又減價到一百六十萬元，再行招標，預料仍舊沒有人承買。華商紡織業至此真已山窮水盡了。

華商紗廠所以如此衰落，除掉人民購買力減縮的一般原因以外，最大原因就是日商的操縱，由於上節的分析，大部份紡紗原料——棉花，既已操縱在日商手中，這樣它非但可以任意提高市價，並且還可以隨意輸出。像去年華商紗廠苦於缺乏棉花時候，但是原棉輸出竟達21,732,316元之鉅，比一九三四年增加6,531,437元。你想一方面棉花歉收，一方面還要用自己的棉花去發展別人家的紡織業，那棉花缺少，也是當然的了。第二，日紗加緊競爭，無論華商紗廠如何苦於紗賤，但是上海日紗，從去年八月一日起，更加入上海紗布交易所和華紗公開競爭。在華北又瘋狂發展紡織工業，紗錠布機的增加，真是空前迅速（詳情容於下節敘述）。第三，大好的華北市場，在日本勢力操縱之下，華廠產品，當然難於插足。如此三面夾攻，華商紗廠當然像秋風落葉那樣只見凋零了。

三 突飛猛進的日商棉紡織業

相反的，日商在華的發展，却在那裏突飛猛進，尤其從華北事變以後，在其特殊勢力掩護之下，華北日廠發展的速度，根據在華日人紡織同業會製1935年日商紡織業各項統計，可知一二。

	1935年	比1934年 同期增加	上海比去年 同期(增減)	青島比去年 同期(增減)
紗錠	182(萬錠)	+ 7(萬錠)	- 2(萬錠)	+ 8.8(萬錠)
總錠	32 萬錠)	+2.8(萬錠)	+2.3(萬錠)	+ 0.5(萬錠)
布機	226(千架)	+ 4(千架)	+1.5(千架)	+2.18(千架)
原棉	340 萬担)	+ 2(萬担)	- 12(萬担)	+15.8(萬担)

上表表示，第一，日商紡織業的發展，其重心已由上海而移向華北；這種趨勢到了今年更加顯著，它不單就原有廠家加以擴大，另一方面更大批的收買華商紡織廠，如北洋六紗廠中裕大固已早落日人之手，去年裕元紗廠，也因負債五百餘萬元，無法償還，于是被日方收買；其他更有寶成華新兩紗廠，都因負債累累，先後被日方收買，所以華北的華商紗廠，大部份已落入日人之手。非但這樣，大阪東洋紡織會社，又委托裕大紗廠在天津購地八百畝建築大規模的紗廠，第一期擬裝布機千架，紗錠五萬。第二期機錠各增加一倍，已決于四月十五日興工建築，年底完成。大阪金藤紡織會社，也擬出資三千萬元，在津建築紗廠，大阪大日本紡織會社，也正在進行調查，將設一大紡織廠在天津；其他如上海裕豐紗廠大公紗廠，都要向天津分設分廠。一般實業家看到這樣的情形，都不勝其悲哀的

說：“日三大紗廠建築成功，除冀省紡紗廠受其壓迫，勢須停工以外，其餘在晉魯之紡織工業，亦必受其侵銷影響，難望與其久持爭衡；即毛織業棉布業亦恐無存在之力”（上海大美晚報三月二十四日）。

第二，一九三五年以來，日商布機棉布一般的增加這完全因為在購買力如此衰退的情勢之下，紗業的發展已經到了極限，只有向棉布方面發展，還能奪取土布市場，所以日廠都改弦易轍，增加布機，利用賤價的勞動力和原料，生產劣質的棉布，以適應中國大眾貧乏的購買力。上表布機棉布一般的增加，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到今年二三月間，布機數目更在那裏急激增加起來，例如浦東日華紡織工場的布機，最近就已增加一倍，從七百三十六架增至一千四百三十六架。自然，日商布機的增加，相反的，正是說明了華商布廠的着着減少，尤其是土布生產的被迫得失了它們最後的地盤。

日商紡織業家，除掉拚命的增加和擴充日商紡織廠，並收買華商紡織廠之外，更把幾家名義上還屬於華商的紗廠布廠，想法統制。中國紗廠機器陳舊，最舊式的機器竟要二個工人管一台，但是日廠中最新式機器，一個熟練工人可管三十四台。因此中國紗廠為着苟延殘喘，就不得不向日本資本屈膝。今年二月二十二日上海每日新聞登載，資本二百五十萬元的無錫慶豐紗廠，和資本二百五十萬元的青島華新紗廠，都由豐田自

動機械會社來改換新機。

綜上所述，自從“農業中國，工業日本”的具體計劃積極推進以後，中國的改良棉花，大部分輸送到日本，中國惟一的民族工業，也紛紛落入日商的手掌之中，產業前途的危機，真不堪設想！

1936, 5, 5。

中國的絲繭業

朱 楚 辛

說起中國的絲業來，很多人都知道絲和茶是近百年來出口貿易的大宗。中國有好幾省的農民，他們都以養蠶為唯一副業，譬如號稱中國“天堂”的江浙兩省，有一半以上縣份的農民是從事養蠶的（江蘇六十一縣中有四十四縣）。江浙主要的城市像上海、無錫、杭州、吳興都是全國著名的絲業重鎮。廣東有二百萬以上的人口靠蠶絲業為生，粵絲輸出，經常總佔該省對外輸出總值百分之六十以上，跟每年鉅額的華僑匯款，成為平衡廣東對外收支的兩根台柱。此外，四川和山東絲業在整個經濟部門中，也佔不可忽視的地位。絲業的重要，於此可見。但是對整個國民經濟有這樣重要地位的絲業，現在是正在一天天崩析衰頹！我們對這一現象是應該如何的加以注視和關切！

要說明中國絲業衰落的原因和狀況，我們不妨先從生絲的國際市場看起。目下世界上有兩個最大的生絲市場——一個是美國的紐約；另一個是日本的橫濱。因為美國是世界上生

絲銷量最大的國家，而日本確是世界上生絲供給量最富的國土。它們都各佔全世界上生絲供求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到九十以下。所以紐約與橫濱的生絲市價，也就是世界生絲的決定的市價。現在，中國已經是“世界的中國”了，中國生絲的命運，已經操在遠離蠶農萬里以外的紐約與橫濱。

一九三一年以來，世界經濟恐慌的襲擊，使得美國絲銷量一年縮減一年，下列數字恰恰指示出這種趨勢：

美國絲銷量(單位担)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594,839	553,818	469,427	461,706	497,143

事情很奇怪，美國絲銷量縮減的結果，受到打擊的並不是佔全世界生絲供給量百分之八九十左右的日本，却是我們這個老大的中國。下表便是一個對照：

歷年生絲輸出統計(担)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日本	553,600	540,820	479,125	502,225	530,060
中國	136,186	78,219	77,103	54,544	76,322

上表指示出日本在一九三三年的生絲輸出，雖然也減少了許多，但至一九三四年就已回復向上的道途。可是，我們中國却一直往下降落，只有去年略見一些回復，而這種回復的原因，却是由於日本去年偶然災荒所造成的歉收，以及美國歷年恐慌的結果所引起的存底缺乏。顯然的，只要日本災荒一過

去，美國存底也就會補滿，中國的絲銷也就會仍舊往下激退。這事實，並不是我們妄加推斷，只要看今年開春以後全國經濟委員會蠶絲改良委員會的報告“上海出口生絲已逐月向下降低”，就可給以充分證明的。

很明顯的，中國的生絲出口已經觸了世界經濟恐慌的霉頭，並且主要的受到了日本生絲強烈的排擠。

一個技術落後的半殖民地國家，與一個技術比較進步的資本主義國家，原無所謂競爭。例如說，一九三四年日本每担絲的成本是四百十一元，而中國就須四百七十五元，兩者相差百分之十三，生絲質地的優劣不必說，誰願意來買這一種貴貨？更因一九三四年，日本抑低匯率，日美匯率平均為三十，而中美匯率却為三五，在同一美國市價之下，日圓和華幣，相差竟至百分之十四。誰又願意來攬售中國的生絲？

當然，中國生絲所以有如此悲慘的命運，作祟的還有人造絲。因為經濟恐慌所造成的一般購買力的普遍的減退，人們對於生絲織物已經無力去購求。而成本比較低廉的人造絲，恰巧填補了這一個恐慌時代的空缺。歷史上，馬鈴薯和棉花代替了麵粉和羊毛的事實是時代的要求；現在人造絲取天然絲的地位而代之，也決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向來在世界上人造絲產量最多的是意大利，其次要算是日本。它們不單在世界市場上排擠了生絲的地盤，而且在中國

國內也已深深的插入。近年來，人造絲在輸入中國的比例上，向佔首位的意大利，已由日本所取代了。當一九三三年時，輸入中國的人造絲，意大利是一，七五二公噸，日本僅有二五二公噸，但至一九三四年，意大利激減為七六四公噸，日本却猛進為一，二七二公噸，去年意阿戰爭爆發以後，意大利忙於東非軍事，日本人造絲便更進一步，大規模地壓倒意絲，獨占了整個中國市場。現在，中國生絲被人造絲排擠的問題，和華絲被日絲排擠的問題，二者已經深深地結合而集中在一點了。

中國的絲業是趨於沒落了，所以關於絲業，現在映入我們眼簾的，只是一幅淒慘的圖畫。勉強掙扎着的開工絲廠是更減少了。當一九三〇年時，上海、無錫、蘇州、鎮江等四處絲廠有一百六十一家，至一九三一年減為一百五十九家，一九三二年更激減為八十九家，一九三三年僅留二十三家。這是指經常開工者而言，至於因季節關係，在每年七八月間，有時也可以看見大批絲廠臨時開工的現象，例如一九三四年八月，江浙兩省總計有七十二廠，一九三五年春季也有同樣的開工廠家。但經常開工究屬寥寥，只要季節一過，廠家也就不得不停工。此種情形，在去年的上海可以作為典型的例子。當去年夏間，上海開工絲廠達四十三家。至十二月中則僅為十五家，到陰歷年底，更減為九家。不數日僅存三家。去年是一般人稱譽為中國生絲出口好轉的年頭，而情形尚且如此，其他時期怎樣，更不

難想像了。

絲廠大批關閉的結果，自然成批工友被排擠出廠門！他們，不但在關廠時要受苦，就是在有時偶然好轉的時機，物質生活上也並無多大進步。此外，廣大的蠶農可以說是絲業衰落的最後犧牲者。他們沒有遠矚絲市前程的眼光，當然更沒有屯繭以待善估的經濟能力。蠶兒一上簇，他們就須記掛如何出賣的心事。饑餓的肚子逼迫着，他們把繭子急急出售，而這却造成收繭商人殺價獲利的機會。我們不記得去年是一般人所謂好轉的年頭嗎？當十一月時，上海與無錫的乾繭市價漲至一百八十三元有零，但在蠶農出賣繭子的五月，市價却只八十七元七角五分。這是說，蠶農的命運，無論是“好轉”或“不景氣”他們却總是受苦。

因為絲繭不值錢，所以蠶農也就視養蠶為畏途。據估計，近年來江浙的桑園已減去三分之一左右。在出絲最富的無錫，桑田改為稻田的數目，竟達十分之六、七以上。真是說：“昔年黃金樹，今日灶下薪”，蠶農的長嘯短嘆，恐怕是誰也應該同情的。

年來政府當局對於蠶絲救濟似很努力。全國經濟委員會下設有蠶絲改良委員會，江浙也各設改進會統制委員會等等機關。今年，據說除江浙魯川諸省外，還要在廣東設立指導所。廣東省當局自己也已擬定了改進絲業的三年計劃。從這許

多機關與計劃的規模看來，中國蠶絲業的“復興”希望，似乎不致十分渺茫。但據過去數年的設施經驗告訴我們，前途又似乎黯淡！因為浙江統制收繭的結果，徒然使上海的絲廠沒有原料的來源，而蠶農又必須在規定的低價之下出賣蠶繭。下面這段話，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鮮繭價格的估定，是以某一種縲折的市價為標準來折算的，因為統制會為使繭本不致過高起見，所以作為折算標準的市價，往往是最底的一個。譬如春期絲價，縲折在四百五十斤者為四百元，除開支縲費一百元，則每担乾繭為六十六元零，如再減去每担乾繭之烘費及開支十三元，所餘以三除（約鮮繭三担烘乾繭一担），則每担鮮繭僅得售價十七元八角八分強。像這樣先以最低的絲市價，取去各階段可能的獲得，而使最初生產階段的農民去承受一切慘跌的風險”（‘東南日報’三五，八，三〇）。

蠶種統制也是政府當局救濟目標之一，而其統制效果也是一樣。因為統制辦法是以政府信用向製種家收買蠶種，再以此推銷給農民，想藉此使農民由土種改養改良種。可是我們知道，土種是農民自己製的，不必出錢買，改良種却須化錢購買，在農民經濟狀況十分惡劣的今日，強迫他們出錢自然感覺到非常為難。所以政府為了適應農民的低度購買力，只得把種價減低，但另一方面製種商不願在成本以下出賣蠶種，所以又必

須籌款津貼。結果呢，羊毛出在羊身上，津貼費還是從每担繭子上抽改良費來彌補。這樣，在蠶農是得不償失，在製種家却有政府代他們負推銷之勞了。

蠶種統制另一個不良結果是：因為製種場不能私自銷種，而政府銷種又是“公事公辦”，以致一面發生蠶農缺種的恐慌，一面政府要焚燒過期未銷的蠶種。再因省庫和國庫空虛，有時改良費雖在繼續嚴征，但蠶種津貼費每不能如數撥付。因此一般中小製種家未免叫苦，而使缺種恐慌更形嚴重，結果只得向東鄰去運進一批、二批，三批……三萬、五萬、十萬張以上蠶種來作救兵，以維護統制政策。

近來由於城市地產業的不振，和公債標金投機的受到限制，銀行資本已在強烈地要求“資金轉向”。上月上海二十家銀行組織江浙春期放款銀團，舉行三千萬元鉅額的放款，正是這種“轉向”的具體表現，他們有可靠的三成墊頭，豐富的八厘半月息，銀行家自然心滿意足。然而能否救濟得了蠶農的沒落，我們根據上面的分析看來，却還不敢過份樂觀。

但是，正在這絲業不振的當兒，絲業界的兼併現象却在猛烈進行。無錫絲商薛壽萱在去年廢歷年底竟以一千萬元以上的資本租賃了四十餘家絲廠，同時江蘇各縣的繭行也被其一手包攬。當世界絲市一天天衰頹的今日，竟有如此富於冒險精神的企業家出現，自然值得我們贊賞與驚喜，我們並且希望他

成功，能夠挽救一些絲繭業的頹廢現象。不過我們却回憶起兩件舊事來：第一，去年美國經濟考察團來華的時節，曾有一度中美合設大規模人造絲廠之風傳。第二，今年三月間美國生絲大王乾利氏來華，曾特別到無錫去考察過薛氏創辦的六個工廠。并且據說“垂詢甚詳”云云。從這二點看來，薛氏此番收買四十餘廠，究竟是否與這兩件事實有些關係，到是我們談到了絲業前途而聯想起來的一個問題。

中國的糖業問題與國糖產銷協會

朱 楚 辛

一 一個對比

“在最近召集的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席上，食品工業人民委員米高養對於蘇聯食品工業做了一個很詳細的報告，其中有一節關於製糖工業說明如下：

‘在這幾年間，蘇聯食品工業中建立了許多新的部門；有若干部門的生產，在世界上已列在最前的地位，例如製糖工業在1936, 1, 14止的這一年度中，已出產了一萬萬三千萬普特，到本年季節終了時，預計可以出產一萬萬四千二百萬普特，佔世界糖產的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產糖為美國，去年共產七千八百萬普特（折合白糖計）。到明年度，蘇聯糖產將增加到二萬萬二千萬普特，約超過美國產糖額兩倍’。——中國農村二卷三期

這是佔全地球六分之一面積的社會主義蘇聯的情

况，現在回顧一下我們中國是怎樣？

“據目下的情形而言，上海六十二家糖行，已完全入於停頓狀態；銷路毫無，營業清淡，無不在水深火熱之中；岌岌可危，三月份及二月份之糖業，全市僅達萬餘包，僅二十萬元左右；我們如依一年營業達一萬萬元之比例言，則此數月雖為淡月，然其營業之不景氣，亦可想見矣，目下在金利源碼頭，公和祥碼頭等處堆積之華糖，均無法出清，良以營業極少，存貨依舊堆存如山也”——中華日報4, 18。因為糖業市場的衰落，所以糖業原料的栽培也發現兩種顯明的趨勢，一是蔗園大批改成農田(稻田)，一是蔗禾逐漸衰萎殘弱。因而其必然的結果，一方面，中國大眾終年陷在沒有糖食福運的狀況中(據外國專家估計每一美國人，每年食糖數量為九十磅；英國人每年七十磅；日本人每年四十磅；中國人每年約二磅，還是平均數)。另一方面，中國的蔗農永久在顛沛流離，完全赤貧的狀態。

兩個世界的對比，就是在整個經濟的一角——糖業中也表現得何等明顯呵！

二 一般癥結

首先，糖業的衰落，正如其他一般工業衰落的原因一樣，封建殘餘的桎梏，正是壓死中國糖業的主謀犯之一。因為糖業本身對於原料具有豐富的不可分性，牠一面是工業，同時又

與農業(種蔗事業)結有不可解的聯系,所以封建桎梏所予的妨礙更爲巨大。榨蔗事業技術的落後,還逗留在人工與牛力的階段;交通事業的畸形發展,有些區域根本尚沒有近代的交通工具可利用,或有交通工具因運費高昂而無福利用;所以人力挑送還是最主要的運輸方法。因而在糖成本中,運費佔着不可輕侮的地位。據一般估計,每名人工挑運百斤,走十里路,約需工錢二角,走百里路程,便要工資二元。假定自出產地輸送至有船舶往來的地方爲一百里路,百斤便要運費二元,每斤運費兩分。但是爪哇運到中國的洋糖,據說每磅運費不要百分之一分,這是表明封建桎梏在壓死中國糖業過程中扮演着何等重要的幫兇地位!

然而問題似乎還不止此,苛捐雜稅的繁重,更是一條絞殺糖業的致命鐵鏈。生產時有稅捐,運輸時有各種名目的科課,發賣時還有許多需索。因爲封建地域的關係,各省有各省不同的花樣,現在我們舉一個四川內江縣的例子以資實證:

桔糖由內江運往沙市之一切運費雜費及捐稅

內江至瀘州各稅	每萬斤	70.00元
瀘州各稅	每萬斤	38.00元
渝堆地	每萬斤	53.20元
營業稅	每萬斤	17.45元
公店費	每萬斤	1.05元

照費	每萬斤	.85元
手續費	每萬斤	5.00元
堆租	每萬斤	.48元
外交	每萬斤	.50元
堆工秤錢	每萬斤	.09元
渝出口稅	每萬斤	44.46元
渝關稅	每萬斤	27.74元
萬縣各稅	每萬斤	24.44元
渝至宜輪費	每萬斤	100.00元
黃沙溪進口稅	每萬斤	29.60元
宜昌進口報費	每萬斤	5.32元
宜駁力	每萬斤	3.00元
宜開桶費	每萬斤	55.00元
宜運沙水力	每萬斤	6.66元
總計	每萬斤	494.24元
平均	每百斤	4.94元

(‘中行月刊’十一卷一期)

在這樣花樣翻新名目繁多的苛雜之下，國糖自然不勝其負荷。假使沒有外糖的競爭，那末牠的終極限制定會碰到人民大眾低度購買力的釘子。然而現在，中國經濟已經牽入世界經濟的漩渦，國糖已不能獨霸國內的市場。當牠在市場上出現

時，牠已經必須與外糖作一個較量。自然呵，在作這種較量的時候，國糖顯然現出劣敗的情勢了。下面是中國糖與爪哇糖的成本比較：（單位每擔）

	中國	爪哇
甘蔗原料價	11.40 (每擔廣東糖須甘蔗十二擔)	3.40 (爪哇糖須甘蔗七擔)
甘蔗運廠費	1.20	.60
轉口費	.50	—
至上海運費	.50	.50
製造費	3.00	.90
機器折舊費	1.00	—
資本利息	1.00	—
棧租火險	.40	.40
代售商酬佣費	.60	.50
合計	19.60	6.30

（上海‘大公報’5, 12）

在這裏，甘蔗原料價相差幾至 9 元 6 角之多，這主要是因爲改良種與土種的關係。但其歸結原因，自然是由於中國蔗農之赤貧，因而無法採用改良種，這簡直與中國蠶農所有的煩惱如出一轍。此外利息負擔與折舊費，因爲爪哇糖廠在歐戰時得

每擔六十元的高價之利，所以不另計算。這在中國糖廠年年虧本的情形之下又是值得何等羨慕呵！

封建桎梏同時也表現在蔗農對於糖房的隸屬關係上。因為蔗農的赤貧化，每無資本以經營蔗田，他們每先向糖房借款，而以甘蔗青苗作抵押。這種情形在四川，大約每萬斤甘蔗可抵貸二三百元，將來以蔗償還，月利都在二分五厘至五分之間。因為糖房資本大多向漏房（煉糖廠，糖房為粗糖廠）或其他金融機關轉借而來，所以這一條鐵鏈又表現着重重剝削的關係，而與蔗農直接發生關係的糖房，不過只盡一種中介人的任務。因此，那一種青苗放款也就包含種種高利貸的典型剝削因素，蔗農也自然只有呻吟喘息在重壓之下而不得甦醒了。

其次，中國糖業的盛衰史也與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結着不可分解的聯系。當英帝國主義第一次打開中國的藩籬以後，香港就成為英帝國主義設立糖廠（太古，怡和）向中國傾銷的大本營。甲午戰役，日本更把中國的最大產糖地（台灣）佔為己有。因而，向來為國糖獨佔市場的本國領土就成為帝國主義糖業的角逐之場。關於這一些，我們翻閱一下海關貿易冊，就可得到事實的證明：洋糖輸入在1895年以前每年為數不過百餘萬兩，但在1895年，一躍即成七百三十餘萬兩，1905年更作第二步的躍進，輸入幾達二千二百餘萬兩。在大戰時期，帝國主義為忙於廝殺，無暇向中國兼顧，於是糖業也隨一般產業的發

展而略有向上，但至大戰砲聲一過，洋糖即如洪水一般奔騰澎湃而來。1920年為三千九百餘萬兩。1921年為七千餘萬兩，至1929年更達九千九百七十六萬兩，這樣，中國市場上充滿洋糖，中國大眾吃食的也盡是洋糖，國糖的地位，不過只表示“聊盡人事”的姿態而已。

帝國主義之所以能在殖民地的中國大量傾銷，一方面固然由於他們高度技術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他們的在國內市場上的獨佔價格以向海外傾銷。例如澳州的糖價，在1931年時，國內價格為每噸26.19先令，而其輸出價格則只需9先令，這一種差額當然是取償於牠本國的國民大眾身上。而其主要的手段，自然需要有一個高度的關稅壁壘，例如澳洲對外糖輸入完全禁止，美國對外糖輸入稅則逐年提高（1921前每磅1.0048分；1921後每磅1.6分；1922每磅1.7648分；1930後2.00分）。而且帝國主義諸國家對於糖業補助金，也曾化了很大的巨額，當1901至1902年時，據說此項補助金德國為40.7百萬馬克；奧國為15.3百萬馬克，法國為88.2百萬馬克；荷蘭4.1百萬馬克；比利時4.9百萬馬克，至於英國從1924至1931年止支出補助金共有三千萬鎊之多。這在負荷重重的中國糖業者看來，自然不但是要垂涎欲滴，而且非倒在馬下不可了，下述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1930年若廣東四川，廣西福建江西之糖業，因爪哇糖競

爭及進口原因，幾完全破產，所有土糖廠均被迫停閉，昔日之土糖產區若汕頭及珠江口三角洲一帶，從前平均不隔一哩即可見一土糖廠，但及1930年，則行數小時亦難見一廠……”。

三 一道摧命符

在內外交攻的雙重壓榨之下，中國產業註定着必然沒落的命運，然而有許多人們却想在空中建造“國民經濟”的樓閣。“振興糖業”就是列為“五大基本工業”的樓閣之一，看呵！

浙江全區合作糖廠建立了，現在又擬在溫州新設製糖廠，江西大規模的建設計劃中就有製糖事業為其主要項目之一，預定支出資金100萬元。四川更擬籌備大規模糖廠，資本且定二千萬元。福建亦預備在龍溪設立糖廠，資本亦需三百萬元。計畫中的最大者當首推廣東。廣東不但對糖業實施統制，且把諸大糖廠收歸省營，自從民廿三年冬以後，新造市頭二廠即行成立，廿四年十二月順德揚陽二廠又相繼舉辦，這四大省營糖廠，據說至本年四月底止已盈餘三百萬元。同時軍墾糖廠也有二所（一所為懷陽平潭，民廿三年冬成立；一所為東莞糖廠，廿四年十二月成立^註）。在這次西南事變發動以前，廣東當局依照牠的三年糖業計劃，本擬於本年年內在潮梅區再設辦一廠，同時在中山潭州設立墾糖廠一所。現在，計劃已隨政治變易而擱置，然而牠的建設計劃在空幻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史上實

在佔着很重要的一頁。

空幻計劃的第一個目的是想從此能‘自足自給’，所以一方面我們看到各省的努力建設計劃，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粵糖的努力向華中華北銷售，然而顯然的，日糖走私的浪潮已經把種種計劃打得粉碎了。

這種打擊有如何重大意義，我們在篇首敘述上海六十二家糖商陷於停頓狀態可以推測而知。至於此種私貨，據海關報告，從去年八月起至本年五月止，數量有 838,928包，價值有 4,152,694.60金單位，稅收損失達 7,248,337.92金單位，以高度技術製成的白糖，毫不負擔各地的損失，來與國糖競爭，國糖之受打擊可知。假使我們從稅捐市價觀察，那末當更為瞭然。據說私糖在福建漳屬每百斤售十八元餘，在泉屬僅售十七元餘，在廈門也只售二十元零二角。假如正式納稅進口，每百公斤至少須售二十三元。在天津國產之潮白，據說現市價目每百斤要二十五元。而走私洋白糖則不過十二元。因此以上海為集散地的國糖，原來北可至山東的荻水，西至西安，長江流域如四川萬縣，沿海如溫州台州海門等縣。但自二月至現在據說銷路簡直已完全絕跡，而且有侵奪上海市場的趨勢。并且就是英商太古怡和在天津糖行也已受到極大的壓迫。有停止六個月糖業經營的消息。我們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者想“自給自足”，現在事實已經證明我們的“友邦”是在怎樣阻礙他們的

心願了。

四 國糖產銷協會應該怎樣挽救糖業的危機

因為走私危及自身的安全，糖業界的廠商們需要團結來自救了。國糖產銷協會的成立就是在這種需要之下發生的。現在據說“表示願意加入者已有千餘個單位，粵桂糖業也已有電前來表示合作”，該會已經在“自身團結”和“當局領導”之下正式成立，他們的主要工作預定有九大項目，而其最中心的目標則為“謀國糖生產的發展，增加推銷力量”，在這預定工作裏面，除要做許多技術上的必要工作以外（如調查世界各國食糖生產數量及銷路暨其種植與製造方法，編製產銷統計），同時也述及糖業與農業貸款與救濟方法。真正能夠觸及問題核心的可以說僅有二項，那就是：

（1）第四條，對於正當國糖之運輸負責調查，并出具證明書及切結以利其運銷之便捷。

（2）第八條，受政府之委託，協助稽查進出口食糖事項。

在這種首先顯然的，該會對於如何廢除苛捐雜稅一項放在他們的“主要工作”之外去了，然而此項工作之重要實不亞於其餘許多工作的“主要”。這原因，大概是因為該會一切工作都在政府領導之下進行，所以有不便提出的地方。

其次，對於目前緝私工作也沒有正面提出解決的手段，他們只能對於正當國糖出具證明書和切結，對於私貨的檢查也只是受政府之委託而已。這正如目前一般民族資產階級對於整個走私事件，只能作“檢私”和“拒私”的工作，連“緝私”的名目都不敢提出一樣。他們是何等沒有膽量與勇氣。

假使該會的工作只局限於這一步，假使該會除“主要”工作之外而不旁及其他副要的（其實也是應該作為第一義的）反封建的工作，那末我們可以斷定，國糖的前途是非常有限的。同時，假使不把私糖的猖獗之勢殺下去，並且不能正面的提出，仍是畏畏縮縮的進行，那末，國糖協會一切都將成為空話。

現在，整個民衆救亡運動已風起雲湧，緝私工作也已正式進行，國糖業者的唯一出路應該把“緝私第一”的觀念放在心頭，配合着廣大的緝私運動的步調，放棄“依賴”“委託”的觀念，達到“不運私糖”，“不販私糖”，“不買私糖”的目的，這才是國糖的真正前途。也是國糖協會真正應該努力的任務。

1936, 8, 6。

農 業

1. 談中日棉業合作
2. 私有村有國有
3. 土地村公有的實際意義
4. 農本局的性質和前途
5. 中國當前的災荒問題
6. 本年內的幾種農民糾紛的研究

談中日棉業合作

錢 俊 瑞

中國棉紗業大王榮宗敬氏曾在去年三月十四日發表下面一段談話：

“救濟紗布業之根本辦法，須增加棉產，並注意培植，使產品優良。……二十三年度全國棉產最豐富者為河北省，且質地亦甚優良，我紗布業甚為歡迎，謂為全國第一。現在希望貴報代為轉告河北同胞，去年河北棉產既有相當成績，今年更須加倍努力於生產數量，並改良其質地，繼續向前邁進，務使河北棉產年年可佔第一位，此種榮譽，慎勿為別省奪去，則十年而後，不但我紗布業可以日趨發達，即河北省之農村經濟亦決不若現時之恐慌”云。
(天津‘大公報’3, 17, 35.)

光陰易逝，轉瞬間一年又過了；我們現在來提起這位“民族工業的長老”的談話，真是“不勝感慨係之”的！不錯，河北棉花產量最豐，質地又好，而且“此種榮譽”恐怕到現在是更不容

易“爲別省奪去的”了。而“十年而後”！我們所能看到的，恐怕不是我中國紗布業的日趨發達，而是日本紗布業和火藥業的飛黃騰達（假使日本資本主義本身不鬧什麼亂子的話），和中國民族紗布業的完全絕滅吧。同時，在“十年而後”，我們所看到的，恐怕也不是“河北農村經濟決不若現時之恐慌”，而是河北（華北甚至整個中國，假使中國民衆不發動抗戰的話）農民陷於“水深火熱”，個個變成日本軍閥資本家的奴隸吧。

因此，我們在痛惜榮老先生的“苦口婆心”之餘，還得把榮先生的談話修正一下。事實已經明明白白告訴我們，民族資本的代表榮老先生，救濟紗布業的根本辦法，第一步決不是增加生產，改良棉質；而是造成日後增加生產，改良質地了的棉花，能夠給我們自己運用，而不爲強暴奪去，作爲他們轉身剝奪我們的工具的先決條件。在現狀不變的情形之下，你儘管增加棉產，改良棉質，中國的銀行家儘管幫忙農民，推廣植棉事業，可是增產改良的結果，却給強敵佔了便宜。那末農村破產果然還得破產下去，民族紗布業的衰落，也還得衰落下去。在一個國破民亡的局面之下，你還想緊緊保住你生產出來的東西嗎？那末，你真在白日做夢了；不，你在客觀上面直是“助紂爲虐”幫助敵人督促中國民衆去替強敵服役了。

這些，我們可以用日本提倡中日棉業合作來說明。日帝國主義用“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口號，要在經濟上把中國淪爲

牠不折不扣的殖民地，這已經是明明白白的事情了。中日棉業合作就是實現這個口號的第一步，同時這第一個步驟恰巧要在榮宗敬寄以厚望的河北和華北各省首先完成起來。

中國出產棉花的地方大致可以分做兩個區域：第一是長江流域，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六省；第二是黃河流域，包括河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五省。日本在目前所談的開發華北產業，進行棉業合作的區域，主要是指河北、山東、山西三省而言。這三省的棉田面積，據一九三四年中華棉業統計會的統計，佔全國棉田總面積的三三%，牠們的產額佔全國棉花總產額的四二%。這三省所種的棉花近年來大有增加，在一九三〇年，三省棉田面積只佔全國面積二六%，產額也只佔全國總產額的三四%。中國近年來棉產額的增加，主要還靠冀魯晉三省棉產的增加。這裏我們可以看出，華北植棉事業在數量上佔據怎樣重要的地位。

就質量來說也是一樣。榮宗敬先生說，一九三三年河北所產棉花，質量最好，這是不錯的。實際上山西山東兩省所產棉花，質地也都不差。特別是山東，質地良好的美棉，其種植面積已佔百分之六十，中國棉種只佔百分之四十；在河北省，美棉種植面積還只佔百分之三十。

這三省棉產的發展，前途是非常光明的。因為華北的地質，氣溫和雨量都適於植棉，所以華北每畝棉花所有的產量也

比長江流域爲多；河北、山東、山西三省每畝棉花的收成，跟全國每畝平均產量相比。要多百分之二十以上。倘使再把華畝折合成公畝，那末三省每公畝的收成，在一九三三年達二百二十磅，比美國棉花的產量還要多些呢。三省植棉事業的發展有很大的可能；一九三二年三省已經種植棉花的面積佔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四·五六；尤其是在山西，棉田面積還只佔全部耕地百分之一·九七。

日帝國主義看到這種情形，怎得不垂涎三尺！再加上牠目前一面要擴展牠的棉紡織業，把英國蘭開夏的棉業打個片甲不留；一面又在拚命擴張軍備，中國棉花正可以大做其火藥原料。再有一點，我們必須指出的，日本國內紡織廠目前所用棉花，大部份都靠美國和印度方面輸入，華棉輸入實極有限。比方在一九三四年，日本棉花總輸入額約有十八億磅，而華棉輸入只有四千三百多萬磅，約佔總輸入量百分之二·四。日本爲要滅除牠自己對於英美的依賴起見（這種依賴在未來的戰爭一旦發動之後，英國或美國倘若對日加以經濟制裁或封鎖，那是多麼危險呀！）更不得不在中國加緊增植棉產，並且改良牠們的質地。

原來日帝國主義想在遠東造成一個強有力的棉花集團，已不是從今天開始着手。日本老早有個所謂“十五年計劃”，從一九三一年我東北淪陷以後，日方就按照計劃在滿洲實行，先

後創設“滿洲棉業協會”和“滿洲棉業會社”，積極投資，擴充棉產。一九三四年東北棉田面積就增加到十九萬八千畝，比一九三三年增加十分之四；棉花的產量已經增加到八萬包，可是日本人自信，等到十五年計劃完成，棉產額可以增加到四十萬包呢。

根據日本所謂遠東棉業集團的擴大計劃，她在華北各省（河北、山東、山西、河南北部，甚至江蘇也被包括在內）至一九三六年必須增種棉花二百萬英畝以上。所種棉花規定都用美棉，這樣才可以適合大坂各紡織廠的胃口。上述各省在種植棉花的時候，須請日本專家指導。美棉種子現在經過日本經紀人的手，大批在華北散發。從一九三四年起，津浦、平漢兩路沿線農民所接受的此項棉種，不下五百萬磅。

日帝國主義爲要推進“中日棉業合作”就設立種種機關，負責擴充和監督華北各地農民的栽培棉花。一九三三年日本駐華紡織同業公會，曾組織山東棉花改良會，跟中國當局共同改進山東棉產。從冀東和冀察兩政權成立以後，日方更“因勢利導”，督促華北當局，積極獎勵植棉事業。不消說得，興中公司在推進棉業合作上會盡最大的功能。除此以外，天津日本駐屯軍最近還想特設經濟顧問部，委任參謀部附多人，跟冀察政委會經濟委員會切實合作，對冀察兩省農村，作有力的統制。雙方又規定投資二千萬元，派遣日籍農村指導員，協助農民增

進農產。這樣，華北農村的命脈，實際上就落在日本駐軍手裏。另一方面，日本外務省爲改進華北棉產起見，也派員在河北豐潤等地，設立農事試驗場，跟興中公司共同負責。

最近據可靠消息，日方曾向晉閻提出幾個要求。除同蒲路須趕快展築到大同，以便日軍隨時可以出動，直達山西以外，還迫令全省種植棉花。另一方面，北平晨報二月十三日曾載山西建設廳決定“自今年起，全省強迫種棉，不種即問罪，如有損失，政府保賠。推行人員敷衍者，以遺誤論罪。據責負人談：此次強制人民種棉，目的在增加生產，與國防無關”。山西人民種植棉花跟中國的國防固然無關，只怕它跟日本的國防，倒有關係呢！

此外，日人在山東方面的努力更是可觀。日本統制華北紡織業的有大日本紡織會社，金藤紡織會社和東洋紡織會社。牠們除積極加強對於華商紗廠的統制以外，還在大大擴充牠的自己在華北的紗廠，最近牠們三大紗廠，計劃共同建築能容十五萬紗錠的工廠一所。關於原料方面，由外務省，滿鐵會社共同出資。遣派技師督促華北農村，以事生產。他們已向朝鮮總督府借得種籽十萬斤，先在冀魯晉三省試種，每省規定，貸給農戶費用三萬元。三省裏面，牠們又特別注重魯東。日外務省特令駐濟南總領事西田，就近向魯省當局交涉，在膠東方面租進農田，募集農民佃種，培植改良棉種。日方對於江蘇北部，甚

至其他沿海地方，都在設法增種棉花。有些日本資本家已在江蘇、山東等省沿海地帶，變相收買田畝，勒令農民種植棉花，受日人的監督。據大坂每日新聞記載，這種警察式的監督植棉制度，在江蘇若干地方已從一九三五年起實行，結果到底怎樣，現在還無從知道。

日帝國主義這樣厲行“中日棉業合作”的結果，除掉一部份中日貿易協會的衰衰諸公以外，每個有良心的民族企業家，也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例如華北方面，“依一般實業家觀察，日三大紗廠建築成功。除冀省紡紗廠受其壓迫，勢須停工以外，其餘在晉魯之紡織同業，亦必受其侵銷影響，難望與其久持爭衡；即毛織業，棉布業亦恐無存在之力”。（上海‘大美晚報’三月二十四日）。華北如此，上海的棉紡織業又那裏有倖存之理。那末一年以前榮宗敬先生所期望於河北農民的，即使能夠完全實現，又那裏是中國民族紗布業的福音呢？又那裏是中國農民的福音呢？

私有？村有？國有？

孫 治 方

——“土地村有制”批評底批評——

俄帝亞歷山大二世，在一八六一年解放農奴的時候，曾對地主們說：“與其等到農民們自下而上來推翻農奴制度，倒不如讓我們自上而下來廢除這制度吧”。

現在，太原綏靖主任閻錫山為“防共”起見，也是為避免農民們“自下而上”來解決土地問題起見，提出了“土地村公有”的辦法。他認為“土地問題解決能將共產黨造亂的空隙彌補，將摧毀現社會的爆炸彈消除”。他底這個提案發表以後，引起了社會各方面的注意。國內各地的新聞雜誌，都登載着討論這問題的文字（就作者隨手所搜集到的便有四十四篇），社會學術團體的會議上，把這問題提出來作為研究底對象。不管批評者對於“土地村有制”的態度如何（贊成或反對），不管他們底社會地位如何（黨國要人或學者名流），他們幾乎異口同聲地承認，土地問題是今日“中國社會問題之癥結”。而我們從“舉

國上下”對於這問題之熱烈注意這一點看來，亦足以證明土地問題確是今日中國的重要問題之一。這是我們從此次土地問題討論中所可得到的第一個結論。

因此我們又回想到今年三月間在天津益世報農村週刊上宣稱“土地問題在一九二七年便已過去了”的王宜昌先生未免過於慷慨，竟把這樣一個‘小問題’疏忽了過去。

在上述四十四篇批評文字中，無條件地贊成“土地村公有制”辦法的固然很少，但公然反對土地公有原則的文字也是很少。有許多批評者對於土地公有的原則是贊成的；但認為“土地村公有”辦法是不夠的，認為中國土地問題之解決，應該採取更澈底一些的辦法。這是“土地村公有制”底更進一步的批評。另外有許多批評者，對於“土地村公有制”在原則上不加以評，甚至加以某種限度的贊助（所謂“立意固屬甚善”），但對於原提案的具體辦法加以種種指摘。這種人把土地公有看作是人世間永遠不能實現的一種烏託邦理想，他們的意見便是想在不反對之中否決了土地公有的原則。這事實似乎告訴我們：土地公有的主張在社會上已有相當根基，它不僅已獲得相當羣衆，甚至就是明明反對它的人也覺得從正面來攻擊土地公有主張，已經是不很聰明的辦法。這是我們從此次土地問題討論中所可得到的第二個結論。

從正面來反對土地村有制的少數批評者中間，能夠對於

土地公有的原則，在理論上提出正式理由的，祇有唐啓宇、唐慶增、蕭錚、新橋、袁賢能、夢蕉、陳鴻根等幾位。他們的理由可以歸結為下列數點：

第一，“人類雖為萬物之靈”，然究屬動物之一，動物之自私性，人類迄今未曾消失，所以“私有與佔有為人類之天性”。“保守私產為人類牢不可破之心理”（蕭錚、唐慶增、陳鴻根等）。這理由對不對呢？我們且不說動物倒不曾學着人類一樣，自己吃飽了不算，還要霸佔着生活底來源，不准其它同類來享用；動物亦沒有像人類一樣，剝削同類以供自己享樂（而且生物學者告訴我們，有許多動物是很能組織集體生活共同謀生的）。但即以人類而言，他們底最初的社會形態也不是私有制的，而是公有制的。關於這一點就是蕭錚陳鴻根諸先生亦並不否認。但既然承認了這一點，那麼我們就不能以人類底天性來為私有制辯護。我們不說人類底天性倒也能了，若是要說起這一層來，那麼我們祇有恢復公有制才是道理。祇有在私有制度下佔了便宜的人們，才會把社會發展到某一個階段才發生的私有制度，當做“人生牢不可破的天性”（其實是忘記了人類底本性）。

或者如陳鴻根先生所說，公有制僅是人類在原始時代的現象，但是“由於人類社會演進之結果，已普遍地造成私有現象，這種趨向之造成亦非偶然的，必有其背景之推動”。所以人

類不應該再實行公有制，恢復原始的社會形態。其實陳鴻根先生底理由正是證明了相反的結論。因為陳先生既然承認人類的原始社會中沒有私有制度存在，這制度是後來因某種背景之推動而產生的，那麼他應該承認：私有制度將因另一種背景之推動而趨於消滅。人類社會從公有制而變為私有制固是一大進步，但從私有制進而為更高一級的公有制，又是一大進步。這恰是與“正”“反”“合”的辯證法規律相適應的正常發展。

反對土地公有的第二種意見是說：“土地公有使農民對土地失去愛力”（肅錚，唐啓宇）。其實，這完全是私有制度下所養成的錯誤的成見，而且是極少數人底成見。因為在私有制度之下，大多數人民早就失去了土地和其它一切生產資料（就是組成現社會底財富的主要因素），對於他們私有的觀念倒是最薄弱的。事實告訴我們：在現社會中侵佔或破壞公產（如廟產，族產，森林池沼等）的到不是大多數農民，而是鄉村中的豪紳地棍。同樣拚命榨取土地，破壞土地生產力的事情，也是在私有制之下，才發生的現象。在私有制度下面，農民所耕種的土地，大半不是自有的，而是從地主那裏租來的。租約滿期以後，原來的佃戶是否還能繼續耕種這塊田，是不得而知的。尤其是在沒有固定的租佃契約的地方，地主們任何時期內都有把土地收還的可能。那時候，農民投在土地上的資本，非但沒有辦法可以收還，而且反成了地主們漲租的藉口（因為土地生產力增

加了)。就是以私有制度下面的自耕農來說，他們對於自己的私有權能夠保持到那一天，也是毫無把握的。反之，今日中國農村中的自耕農的田產有一大部份是早已抵押給高利貸者了。所以在私有制度下面，農民們不願在土地上作長期投資，不願多施肥料(除了不可缺少的以外)，他們祇想多多地從土地中榨取農產品，而不願意額外地供給它一些滋養料(同時，我們知道，處在帝國主義者，高利貸者，商人，地主和苛捐雜稅重重剝削下的農民，也沒有餘力可以來培養土地)。於是土地之瘠瘦化便成了今日資本主義各國的普遍現象。所以就在這許多資本主義國度裏，對於森林水利等事業亦不得不違背着私有財產的原則而收歸國營。私有制度養成了人類的自私自利的惡習。這真是否定這制度的很有力的論據了。

關於人民對於土地的“愛力”問題，唐啓宇先生曾發表了一段妙不可言的議論。他說：土地公有之後，“耕者不能自有其田，人與地之關係日趨薄弱，孰為保守鄉里？孰為捍禦外侮，遇有危難，去之若浼，是真國家民族前途之極大危機也”。若是照唐先生底這種說法推測，那麼實行土地公有已經十餘年的蘇聯，早就應該被強鄰所瓜分併吞掉了。但事實上，真真處在這種“國家民族前途之極大危機”中的倒不是蘇聯，而是保持着十二分的土地“愛力”的大中華民族。不知道唐先生對此作何解釋？

反對土地公有的第三種理由是說，土地公有“將塞農民勤勉節儉之心”(新橋等)。地主們總覺得世界上祇有他們才是勤儉人，而那些以地租利息供養他們的農民都是貪吃懶做的寄生蟲。大概在地主底想像中，農民祇有在他們底鞭打下才會勞動，若是沒有了他們，農民們將不能從事耕作了。這真是不攻自破的論據。因為決沒有為地主做工的佃戶，倒肯勤奮地從事耕作，而為自己勞動的農民倒偷懶的。蘇聯的實例，正好證明這種論據之荒謬。在那裏，不僅土地已歸公有，而且連私的經營形式都已經被取消。但蘇聯農業生產之發展，以及農民對於勞動的熱忱，已為全世界所公認了。

反對公有制的第四種理由，是蕭錚先生所提出的土地“經濟性”問題。蕭先生認為土地公有將使土地失去“經濟性”。他在這裏所說的“經濟性”，是指土地價格和土地買賣而言。但這理由亦是很不充分的。因為土地不是勞動生產品；它底本身本來沒價值的。土地的價格僅是資本化的地租（見本刊本期的“小辭典”）而已。土地購買者所付的田價不是土地本身底價格，而是地租的價格。換言之，土地價格和土地買賣的本身，就是土地私有制之下所造成的不合理現象。土地價格和土地買賣從生產的立場上說，非但不是必要的，而且是有害的。因為它徒然分去了很大一部份的資本，使生產方面反而感覺到資本不足的恐慌。同時為地主們造成了壟斷土地以剝削農民的

機會。如果我們可以用土地私有制所造成的這種不合理現象來爲土地私有制辯護，那麼奴隸主也可以用奴隸底“經濟性”來爲奴隸制度辯護了。因爲在奴隸主人看來，奴隸也是商品，也有價格，也是用錢購買來的。同樣妓院中的老鴇也可以說，他養的妓女是用大洋錢買來的，——說得漂亮些，妓女也是有“經濟性”的，——法官不能侵犯他的私有權，甚至給他徒刑的處分。

反對公有制的第五種理由是袁賢能先生所提出的，他說，那些沒有田的農民（佃農和雇農們）“原來就是不能夠生產的人”，政府不應該“剝奪良民（地主，富農）去幫助不良的社會分子”；何況“中國的大地主並沒有多少(?)，拿他們的地產來分贈給無量數的無賴之徒(?)實在是不對的”。我們覺得袁賢能先生底理由真是“賢能”極了！這樣的土地私有制底擁護者真是“最老實”沒有了。我們對於這樣的高論真可以不必再加以任何反駁或解釋！我們祇是有一點不明白的地方要請教袁先生：那些無量數沒有田地的“不良分子”既是“無賴之徒”是“不能生產的人”，那麼那些肥頭胖耳的良民們（地主和富農）底田是誰個幫他耕種的呢？他們收的租是那裏來的呢？

總之，從理論上說，我們不僅找不到半點理由，可以爲土地私有制申辯，而且我們更可以找到許多反對它的理由，土地私有制足以阻礙農業生產之發展，足以因土地購買而消耗去

一筆生產資本，而且足以妨礙自由投資，使工業中的資本得能自由流入農業中間。至於土地私有權之存在，使地主得以利用土地所有權，來剝削農民，以至於造成今日最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一層更不用說了。所以甚至一般較先進的資產階級學者，也都主張土地公有，站在這一點上說，閻錫山底土地公有制提案確是一種進步的主張。但是他底“土地村公有辦法大綱”是很不澈底的，關於這一層許多批評者也早已指出過。

第一，閻錫山的“土地村公有制辦法大綱”第一條說：“由村公所發行無利公債，收買全村土地為村公有”。這就是說，土地村公有制在原則上並沒有否定地主底土地所有權（如祝百英先生所說的，村公有制“在原則上是承認土地私有權的合理”）。在土地村公有制下面，地主底財產並沒有被損害，但祇是從土地的形式變為金錢的形式而已。（雖說是公債，但總要清還的）。

我們知道，高利貸者，商人和地主，本是今日中國農村中的三位一體的統治者，如今土地村公有制祇要求這統治者取消一個地主的名義，而把他的財產統統變成金錢形式；換句話說，就是要求他把自己的財產，統統集中為高利貸商業資本的形式，去繼續剝削農民。

近年來，由於田賦和其它種苛捐雜稅底增加，以及農民底抗租運動之擴大，地主們便是覺得自己的“江山”有些不大太

平。所以唐慶增先生便爲地主們訴苦說：“所謂大地主者，以種種關係，收入未必豐裕，多以擁有土地爲累事。雖則丁文江先生已在安慰這些“可憐的”地主們（和唐先生）說：“這是極少數的例外，而且這種狀況是不能久持的，但如果現在村公有制底實行者能夠爲地主担保，把他們的田產換成一個更安全而便利的形式，那麼地主也很樂意接受這提議的。（在田賦增加和農民抗租的條件下，田產的確沒有現金安全；而且我們可以相信，土地村公有制如果真的實行，那麼地主把持下的村公所，一定能夠担保地主們的公債兌現）。

第二，關於土地村有後的農民負擔問題。在四十四篇批評文字中，除了三四篇對於這問題根本沒有提起以外，其餘的沒有不認爲農民底負擔非但沒有減輕，而且增加了。因爲根據‘土地村公有辦法大綱’底規定，收買土地的公債是以四種稅爲担保的。這四種稅中間，主要的便是農民底勞動所得稅（百分之十），和產權保護稅。此外，根據大綱規定，“在土地村公有制推行之初，耕農對省縣地方負擔仍照舊徵收田賦”。這誠如錢俊瑞先生所說的，土地村公有制實際上不是“公有”，而是“收買”，歸根結蒂“羊毛還是出在羊身上”。農民對於這種土地公有辦法，當然是不會歡迎的。

第三，土地問題之解決，如果多少是有一些實際意義的話，那麼毫無疑義就要侵犯到地主階級底利益。所以如果是要

依靠地主的力量來解決問題，那麼即使是最起碼的改良政策，也沒有實行的可能。地主們既可以把“二五減租”實行成“二五加租”，也未始不可以把‘土地村有’實行成‘土地自有’（地主自有）。

思平先生在第四期‘教育與農村’上發表的‘中國土地問題之史的觀察並論閻百川氏之土地村有方案’一文中，分析了中國歷史上的幾種土地改良政策以後，得到下列結論：

“一切反對地主特權的企圖，都是與封建制度處於對立地位的。王莽雖然起初以帝王的權威強迫實施他的土地公有政策，但他還是利用封建的政治機關去執行。但是整個封建政治機關的力量，都是與地主有不可分離的關係，這就是說土地公有是要地主階級自己來解除自己的武裝。所以王莽之遭受地主強烈的反抗而歸於失敗，與魏孝文帝不侵犯地主的土地而得到成功，這正是十分證明了土地公有與地主階級的利益，是完全勢不兩立的一種鬭爭”。所以，“執行一種新的政策”，而沒有一種新的力量，仍舊假手於舊勢力，是必然失敗的。

在這篇文章開首的時候就說過，綏靖主任閻錫山是為“防共”起見，為避免農民們“自下而上”來解決土地問題起見，才提出了“土地村公有”的提案。所以他底“自上而下”的土地村公有政策，是交給村公所去執行的。但誰也知道，鄉村公所是地主階級底御用機關。所以閻錫山底土地村公有政策，也就

是“利用封建的政治機關”來執行的土地改革政策。它底前途祇有兩個：第一，在出版物和會議上熱鬧宣傳了一番，盡了些廣告作用之後，就煙散雲消地永遠消逝了；第二，這政策如果真的施之實際的時候，（這是很少可能的），那麼這結果便決不是韋乃器先生所說的“豪紳和農民之間，不是東風壓到西風，便是西風壓到東風”的問題，而是毫無疑義地被地主壓倒了農民。一八六一年，俄國的農奴解放便是最好的實例。那時候，俄國底農奴主們爲要避免自下而上的農奴解放起見，曾自上而下地實行了農奴解放。其結果農奴們在表面上是無代價地獲得了法律上的自由權，但實際上他們應以份地收買金的名義，支付很貴的一筆贖身費。於是農民們在“被解放”以後，便從農奴而變成了負債勞役者。而俄國的土地問題，也直到一九一七年才得到了澈底的解決。

第四，是土地問題與整個社會制度的聯繫問題。雖則土地問題是目前中國的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問題。土地問題決不能脫離了其它社會問題而單獨解決的。閻錫山對於改革整個社會制度的意見，除了土地村公有制的提案以外，另有推行“一層物產制之物產證券”的意見。據他底意見，現社會底一切弊端，都是起源於金本位的貨幣制度，所以貨幣制度改革以後，或採取了所謂“一層物產制之物產證券”制以後，社會上一切問題便得解決了。每個稍爲讀過社會思想

發展史的人，都知道這種觀點是許多烏託邦社會主義者所共有的意見。這種意見早被科學的社會主義學說批評得體無完膚了。不料如今居然被一位負有防共之責的綏靖主任，當作活寶貝來欣賞。

在十七世紀十八世紀時代，這種烏託邦的社會主義思想，曾起有不少革命的進步的作用，因為他曾無情地暴露了資本主義社會底一切黑暗。但是如今，被我們的綏靖主任所復活了的烏託邦主義底糟粕，僅是一劑大衆的迷魂湯而已。資本主義制度底不合理已經是大家所熟知的事情，現在的任務，主要的倒不是怎樣了解這黑暗的問題，而是怎樣解除這黑暗的問題。

然則，爲什麼金銀本位的貨幣制度之廢除，不能解決整個社會問題呢？因爲金銀本位的貨幣制度的本身，就是以少數私人佔有生產資料爲基礎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底必然產物。所以如果不剷除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之本身，而想廢除貨幣制度，那就是斬草不除根的，捨本逐末的辦法。但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如果不被剷除，那麼土地村公有制的辦法即使在一時間能夠依照起草者底理想而實現了。但結果仍舊要重演資本主義經濟中大經濟併吞小經濟的慘劇。商品經濟之發展，曾促成了原始共產社會之崩潰，曾衝破了封建自足經濟底堡壘，那麼它一定也會打碎土地村有制之下的份地之劃分，並衝破土地村

有制對於僱傭和租佃之限制。同時，商品經濟如果未被取消，那麼價格的剪刀形問題，市場問題等亦不能得到解決的。

除此以外，民族獨立問題，也是擺在今日中國社會面前的另一個問題。如果不能獲得民族的獨立，沒有完全的關稅自主權，不能完全廢除不平等條約，那麼在各帝國主義國家經濟侵略政策下，中國的土地問題也不能單獨解決的（大公報十月十二日社論也曾說到這一層）。但我們並未聽到土地村公有辦法大綱的起草者在口頭上，或在行動上，對於民族問題之解決有所具體建議。

第五，誠如錢俊瑞先生所說的，“晉閻不主張土地國有，而主張土地村有，是值得我們體味的”。這完全是反映自足經濟時代的封建割據的思想。同時村有制也可以使當地的地主們更容易獲得操縱壟斷的方便。誰也知道，在下級的地方機關中，封建勢力是最為濃厚不過的。此外在實施土地村公有的時候，有許多問題不是村公所範圍以內可以解決的；而在實施土地公有以後，要進一步而組織生產的時候，也不是村公所所能負擔的任務。農民們需要土地，然而也需要農具，肥料和種子等。赤手空拳的貧農們，先有了土地，還是不能耕種的。要徹底解放農民，並改善他們的生活，祇有先提高他們的生產能力。然而要提高農民底生產力，那祇有打破了農民底零細的私人經營底範圍，甚至打破了村底界限而組織大規模的集體生

產。但這工作顯然不是村公所的能力所可解決的。每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沒有國家底積極援助是不會成功的。資產階級國家對於新興的資本主義企業不給以直接援助（如大革命後的法國，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就不會有今日的資本主義社會產生；蘇聯政府如果不以機器和資本幫助農民，蘇聯的集體農場亦不會有今日的驚人的成績。所以如果要實行土地公有，那麼就不應該把土地交給村公所管理，而應該把它交給國家管理。（在批評土地村公有制的文字中，居然還有主張小經營勝過大經營的理論！它的理由，便是說小經營較適宜於集約性的作物。但主張這理論的人，似乎還不知道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度中，如果樹，蔬菜等集約性的作物，也早已採用大規模經營了。稻作是公認的集約性的作物，然而在美國南部早已實行大規模的機器生產，而且最複雜的農業機器——割打雙用機——也已經改進到可以適應於稻作經濟了）。

此外，大多數批評者對於實施土地村公有制的種種技術困難加以指摘（如人口調查，地價估計，清丈田畝，寬鄉狹鄉之調劑，授田還田之規定等）。關於這一層筆者很同意思平先生的意見。他認為這些都是“次要的問題，在主要的條件具備時，是能順次求得解決途徑的”。祇要有真真的農民大眾為後盾，有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存在，那麼就是更澈底的土地綱領，更困難的任務，亦能很順利地完成（蘇聯便是最好的實例）。否

則就是最起碼的改良主義政策，亦沒有辦法可以實行的（二五減租便是實例）。

土地村公有方案的實際意義

葉 民

一 兩種勢力夾攻中的山西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太原綏靖主任閻錫山在綏靖公署和省政府紀念週上報告道：“陝北匪共，甚為猖獗，全陝北二十三縣，幾無一縣不赤化，……現在共黨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擴大區域的威勢……全陝北赤化人民七十餘萬，編為赤衛軍者二十萬，赤軍者二萬……”（大公報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如今整個陝北二十三縣除榆林、米脂兩縣以外，幾乎完全在紅軍勢力之下，並且關中的一部分，隴東的一部分，綏西的一部分也常有紅軍出沒。陝北的赤區中心地帶如延長，延川，清澗，安定，安塞，膚施，保安，靖邊等等縣份同山西中部僅僅一河之隔，在任何時期都有渡河向山西進攻的可能。如今山西各縣共黨莫不等待機會，以圖發動。去年一月二十日“一部紅軍在晉北苛嵐起事，縣政府被毀，縣長郭藍田並承審員於倉卒中逃

避，身被重傷，縣長之姨太太及縣府第一科科長，並住在縣府之北平軍分會查檢校場陳委員，晉綏財政整理處張委員，當時均告失蹤”(一九三五年二月廿三日，香港工商日報)。去年十二月間又在臨晉縣破獲一共黨機關，有八人被捕。晉西各縣顯然已經在赤色勢力的直接威脅之下了。山西雖有七萬五千人的軍隊，但是都過慣了太平日子，戰鬥力並不強，不能做紅軍的敵手。對於這一點晉閻頗有自知之明，所以他在‘土地村公有辦法大綱’的說明中曾說道：“江西之共，竭國家之全力，費時數載，僅僅滅之。西北農村破產，十戶九貧，地廣兵單，封鎖不易，赤禍蔓延，似非此少數兵力所可封鎖”(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社會經濟月報二卷十期專載)。故此山西軍進剿陝北赤軍的消息，雖然已經宣傳很久，但僅在綏德、吳堡、清澗、等沿河地域一二百里地方以內設防，且不敢遠離防區一步。

在另一方面，如今在山西的太原，綏遠的歸綏，和包頭等地，日本軍隊都設立有特務機關，經常有武官駐在，監視着我們的長官們的行動。日人在包頭且建築有無線電台，以便日本軍隊彼此互通消息。綏東的集寧已經在代表日本勢力的滿洲軍隊的掌握中；整個綏東各縣已經間接直接地在日本勢力的支配下。山西全省也早已在日本參謀部的開發計劃中了。

日本軍人對於山西政治的影響如何，我們更可以從下面的事實中看出來：以前日本人的勢力還沒有到察綏，因此同滿

路造到平原以後，他們就不准山西當局再向北建築。現在因為他們的勢力已經深入察綏，因此又迫着山西當局迅速完成平原至大同的鐵道，並且要把同蒲路和正太路迅速改成寬軌。

目下山西就夾在紅軍和日本軍兩種勢力之間。據說，紅軍方面曾向山西當局建議，聯合政府軍隊共同抗日，而日本軍部方面也要求山西當局建立共同防共戰線。山西當局處在此兩條岐途之間，到底何去何從呢？根據“攘外必先安內”的原則，自然先決定“九分政治，一分軍事”以全力來解決防共問題。因此太原綏靖主任便在去年八月二十九日召集晉西沿河二十一縣（赤色勢力最發展的地方）縣長，及各文武長官在省開防共聯席會議。土地村公有方案也就是此次會議中的產物，它被認為“是防共釜底抽薪之根本方法”。

二 土地問題在山西

許多名流學者們都認為土地問題在黃河流域並不嚴重。陝北的“共禍完全是被蘇聯煽動起來的”。至於在山西，土地問題更不成其為問題了。但我們相信身為綏靖主任的晉閻對於這問題總不至有什麼誇大的嫌疑。在他的“呈國民政府請由山西試辦土地村公有制”的原文中曾說道：“年來山西農村經濟整個破產，自耕農淪為半自耕農，半自耕農淪為佃農僱農，以致十村九困，十家九窮，土地集中之勢漸次形成，在此種情形

之下，不但佃農僱農最易受共匪之煽惑，即自耕農半自耕農，鑒於自己之經濟地位日趨搖動，亦易受共匪之煽惑”。根據晉綏農村建設協進會“農村建設”雜誌第三，第四兩期中所發表的崞縣六村，榆社七村，屯留，長治五村的材料，已經可以表示山西土地集中的一般情形：

	30 畝以下		31畝至50畝		51 畝以上							
	戶數	%	畝數	%	戶數	%	畝數	%				
崞縣六村	363	48	3617	15	218	29	7526	32	175	23	12720	53
榆社七村	299	51	3515	16	168	18	6437	30	125	21	11438	54
屯留長治五村	536	86	3735	39	47	7	1660	17	44	7	4154	44

晉北崞縣六村有地五十一畝以上的村戶佔村戶總數百分之二十三，而佔所有地總數百分之五十三；反之，有地在三十畝以下的村戶佔村戶總數百分之四十八，而所有地却祇佔所有農田總數百分之十五。前者每戶平均有地七十三畝，後者每戶平均有地十畝。後者每戶平均所有地僅有前者百分之十四。在晉南之榆社七村的土地分化更加尖銳化。有地五十一畝以上者佔村戶數百分之三十一，而佔所有農田數百分之五十四。有地三十畝以下者，佔村戶數百分之五十一，而佔所有農田數百分之十六。前者每戶平均有地九十畝；後者每戶平均十一畝。後者每戶平均所有地僅有前者之百分之十二。但更南之屯留，長治五村，其集中程度更比榆社厲害。這五個村共六二七戶，

有田九五四九畝。這裏面有田五十一畝以上的，共四十四戶，僅佔村戶總數百分之七，但是有田四一五四畝，就是佔農田總數百分之四十四。有田三十畝以下的，共五三六戶，佔到村戶總數百分之八十六，而僅有農田三七三五畝，佔農田總面積百分之三十九。有田五十一畝以上的平均每戶有田九十四畝，而有田三十畝以下的平均每戶祇有七畝。後者每戶所有地祇有前者之百分之七。

因為限於材料的緣故，這是僅就村戶中的土地分配而論，但土地分化之尖銳就已經如此。實際上很多的地主尤其是地主中的最大的，都不在村裏居住，僅僅調查村內住戶的田權分配，實在是有意粉飾土地集中之實在情形。例如根據一九三四年國民政府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陝西農村經濟調查團的綏德四個代表村的調查材料，村內地主所有田地僅三一〇·七晌，然而在這四個村裏面，實際上地主所有田地的總數却有一五三九·五晌。即是說，村內地主所有田地祇佔地主所有地總數的五分之一。故此實際上，山西土地分配的兩極化程度必定遠過於前表所說的情形。

卽就另一個關於屯留全縣土地分配的約略估計（見‘高苗屯留農村經濟實況’，‘農村經濟月刊’，二卷三期 101 頁——109 頁）所告訴我們的土地集中程度也較前表為強。我們把這估計數字加以統計之後，可以列成下面的表：

	戶口%	土地%	每戶平均所有畝數	指數
地主富農	1.9	33.3	583	100
中農	68.3	61.4	30	5
貧農	29.8	5.3	6	1

根據這估計，屯留貧農每戶平均所有的田地祇佔富農的百分之一。

但是上黨(屯留,長治等山西東南各縣的總稱),並不是地主多的區域。在山西地主最多的區域在太谷,平遙,祁縣,介休,榆次,徐溝,忻縣,定襄,五台,代縣等縣份。這幾縣有很多出外經商的富戶,家家有百畝以上的田地招人耕種。這裏的居民成爲:不是有地不耕的地主,便是種田而絕無田地的佃戶。例如在忻縣南湖等八個村裏面,一方面有佔村戶百分之四三的地主,另一方面有佔村戶百分之四〇的純佃農和百分之五的半佃農,自耕農只佔村戶百分之十二。在這幾個縣份,所有土地幾乎全在地主手裏,與綏西臨河相仿。所不同的就是在臨河多大地主;但這裏多中小地主。

在山西最北部的天鎮,陽高,大同等縣份是代表長城外的非墾殖區的一般情形。有田地的佔全人口百分之五七,無田地的僱農佃農佔百分之三一,其它人民佔百分之一二。十畝以下的貧農佔戶口百分之四一,自耕農佔百分之三〇,其餘百分之二九是地主富農。佔戶口百分之四一的貧農祇佔百分之八·五的田地,百分之三〇的自耕農佔田地百分之一五·五。其餘

總面積百分之七〇的田地全在百分之二九的地主富農手裏。這裏土地集中的程度比了綏遠西部的安北五原臨河是不及，但和綏遠東部察哈爾西部相仿，比較已經是很集中的了。在長城以南的山西西北各縣，地權較不集中，東南較集中，但最集中的便是太原南北商人地主區域。全山西的政權都在這許多人的手裏，而這次所提出的土地村公有方案也就是代表這一部份人的利益的。

三 山西的租佃和僱傭制度

在這裏，我們順便講一講山西的地主，富農怎樣得到勞動力來耕種他們底土地的辦法。山西的地主富農，當然和其他各省的地主富農一樣，他們的土地全靠別人家的勞力耕種。但山西北部的地主和富農，大多數並不採用普通的雇工制和普通的租佃制。他們所採用的却是一種當地所說的“夥種制”。這種“夥種制”在一九三一年以後，更為流行。因為地主們覺得在現今洋米輸入激增，糧食不值錢的時候雇工耕種是不很值得的。照“夥種制”的辦法，地主們供給種糧，牲口，肥料，和一部份農具，招農民來耕種自己的田。這種農民在當地被稱為“受苦人”。這種“受苦人”隨身帶有自己的鋤頭和鐮刀。他們全家住在地主家裏（如果地主是在本村，那麼亦有住在自己家裏的）。他們吃的糧食也大多是向地主借來的。平日他們除了為

地主種田以外，還要幫助地主家裏做各種雜事，如當跑腿，送接親戚等。至於天天担水喂牲口等當然更是他們的分內事情了。如果他們有事出外，那麼這些事情就要他們的女人代做。“受苦人”這樣受苦了一年之後，可以分到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收穫，其餘四分之三至三分之二的收穫和全部柴草都歸地主所得。一個當“受苦人”的壯丁種了五六十畝田地，才勉強可以維持一家二三口的生活。如果是年老病弱的人只能耕種二三十畝，那就決不夠維持生活了。有時候“受苦人”可以養些豬羊雞等作為副業，但是先要得到他們主人的允許。每年八九月間是地主與“受苦人”“講地”（即是雙方訂立條件）的時期。講地時，並不寫書面契約，只是口頭約定。每年十月間，新的“受苦人”移來，舊的“受苦人”搬去。所訂耕種期間並無一定，雙方同意時可以延長，不同意時，便一年了事。

在山西南部的河東一帶，在一九三一年以前，是用長工耕種，以後出租的漸漸增加。租種辦法普通採取佃三主七或佃四主六的分租制。種籽由佃主各半出，牲口，工具，肥料由地主獨出。

在上黨一帶地主富農很多僱用長工來耕種。一部份地主以定額租的辦法出租給農民耕種。普通租額是每畝五斗，大約佔到田地產額的十分之五。在這裏，一切農本都是由佃戶獨出的。

在山西中部，地主田地出租的很多，種籽，肥料，農具由佃戶和地主各半拿出，牲口是佃戶的。這裏，在以前是用定租制，自一九三一年以後，逐漸改爲分租制，地主拿收穫的十分之六至七，佃戶拿十分之三至四。

在河東地方，長工工錢二十六七元一年，地主供給長工的飯，煙，住宿和被枕(但不能夠帶走的)。在上黨一帶，長工工資每年二十四五元，飯食，住宿，煙草由主人供給。在山西中路，長工工資每年四〇元，主人所供給的東西，同上面一樣；不過，在冬天，還供給喝酒。

一般說來，在山西南部的地主大半是僱工耕種；在中部，採取地主供給農本(一部或全部)的分租制；在北部，大半採用夥種制。山西的地主，很少採用不供給一切農本的佃租制度。但在現今一切都不景氣的時候，投資在中國農業是很危險的。土地村公有後，他們就可完全避免這危險。

四 山西的村政和土地村有

許多人都驚奇閻錫山爲什麼主張土地村有而不主張土地國有。不知道這真是山西政治的特色。

山西的村政是聞名全國的。山西因爲村政而得到了模範省的榮譽。就是研究村政的權威梁漱溟先生也一口稱讚山西村政之得力。他說：“山西近幾年參加幾次戰爭，一切徵發人

夫、馬車、糧草、籌餉、募債，得力於村政府者非常之大。一個命令立時可辦，這幾乎是山西政府中人交口讚嘆的”。（轉引自王寅生等著：‘中國北部的兵差與農民’，頁二一，腳註一）。

然而這裏梁先生所講的還是以前的情形，現在的山西村政更辦得“得力”了。不但“一切徵收人夫、車馬、糧草、籌餉、募債得力於村政者非常之大”，並且經常田賦的徵收也全靠村政府。“在滿清時代以及民國二十一年以前，所有田賦都是由各花戶將自己應納的田賦逕交當地縣政府。里老，單頭不過負一種催交的責任罷了，權限並不很大。現在變更舊制，農民自己應交的田賦，不得逕交官廳。各花戶應當把自己應交的田賦款項交給單頭。單頭再交給里老。然後再由里老交給官廳。……縣政府限令各里老每月交款若干，不足額者即逼令借債。里老的債務利息又分派到各花戶的田賦上。有的里老不到別處張羅，就在縣政府寫一借字據，書明借債若干，月利五分。於是一轉手間，大洋纍纍即飛至官吏手中”（見前引‘農村經濟月刊’頁一〇四）。

村政府（即土地村公有案中所稱的村公所）而有這樣的“得力”，真是其它各省所趕不上的事實。但是這個村政府的實權完全握在紳士地主富農手裏，山西也和其他各省一樣。不過，在山西，多中小地主。他們住在村內，可以直接操縱政權。所以地主富農所把住的村政府底力量在山西也特別強大。山

西的農民沒有一個人敢不服從村政府的指揮。凡是反對山西現當局的人(不問何種色彩)都很難在這裏立腳，這是到過山西的人都知道的事情。

許多名流學者讀了土地村公有方案以後，都覺得向來以小心謹慎出名的閻主任怎麼會提出這樣的過激的土地方案。他們都爲地主富農們抱不平。他們或是說這個方案是侵犯了神聖的私有財產制，或是說村公所發行的無利公債是太沒有保證了，地主以自己的田產去換得一紙沒有確實保證的無利公債是太吃虧了。漢口‘大光報’記者說道：“共黨之潰敗也，固係強半由於武力之不足抗衡，然其仇視富農實亦一大原因；共黨因此而敗，我反效其弊策，此誠不智之甚！”（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該報社評）。其實，說這些話的人都是太不信任自己的軍政長官了。我們的綏靖主任可以告訴他們說：他決不會出賣地主富農的利益的；他的村公所便是無利公債的最好担保，這担保品比任何有利公債都靠得住。

地主富農就是村公所；村公所就是地主富農。他們是辦慣了村裏的征稅攤款等公事的。他們十分知道怎樣可以把自己份內應出的稅捐轉嫁到別人身上，並且十分知道怎樣可以從稅捐徵派中間得到好處。例如“解縣第二區曲莊頭……去年縣府按地徵收軍事糧秣，每地十畝起收白麵二斤，谷草三斤。曲村副竟按白麵二斤半，谷草六斤起收”（見上引‘中國北部的兵

差與農民’，21頁，脚註一)。現在他們利用了這經驗來辦理土地村公有，那麼一定也可以使他們不但不受到損失，而且可以獲得新的利益。所以土地政策無論怎樣改變都沒有問題；祇要這政策是由村公所來執行，那麼地主富農就十分放心了。我們的綏靖主任發表土地村公有方案的目的也就是要幫助地主富農安渡此“兩面夾攻”的難關，名流學者們還要為地主富農們叫不平，那真是太不諒解我們的綏靖主任，太不了解他土地村有的妙處了。

五 地主經濟的衰落和土地村有

在全國和全世界的經濟危機的影響下，山西的地主經濟也受到嚴重的打擊。首先就是糧食賣不出錢。一九三三年屯留地方糧食市價——不論是高粱，小麥，小米，玉蜀黍豆子等——都比一九三一年跌去百分之六〇左右。在河東地方，在一九三〇年值十二元一担的糧食，到一九三三年祇值四塊錢了。糧價的跌落，甚至使定額的錢租也被迫著減低了。下面一張表顯示前三年間隰縣的錢租跌落程度。

	水田租金	旱田租金	山地租金
一九三二年	八·〇元	四·〇元	一·〇元
一九三三年	五·〇元	二·〇元	〇·七元
一九三四年	二·〇元	〇·八元	〇·三元

糧價是跌落了，田租也減低了；但稅捐是反而增加了。我們且不說臨時的攤派，而僅就正稅一項來說，山西省政府在一九三一年度，田賦收入共六、二七二、四〇三元，一九三二年爲六、五二三、八〇三元，一九三四年共七、四一八、五九四元。在這短短的三年間竟增加了一、一四六、一九一元。例如屯留在一九三二年以前每一兩糧銀爲二元九角八分，至一九三四年竟增加到三元以上。所以田產的收入是減少了；而負擔是增加了。如今地主們都很願意把這死的田產變成活的現款。在以前，一般的風氣都重視田產，因爲這是賊偷不動，火燒不掉能夠傳之子孫萬世的產業。但如今這風氣已經變過了。田產的“身價”所以跌落的原因，除了上述的經濟原因（收入減，負擔增）以外，社會的不安（赤色運動的威脅），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近年來山西的土地價格大大的跌落。在以前，在忻縣縣城附近地方，（在我們的綏靖主任的老家的近鄰）每畝地可賣到一五〇元至二〇〇元左右，而且在那時還是祇有買主，而沒有賣主。但是到了一九三五年春間，每畝地價竟跌到三〇元至四〇元左右，而且還找不到買的人。在這種情形下，地主們當然不會反對村公所來收買田地，而讓農民們以勞動所得稅的形式按年來償付田價的。

按照土地村公有案所規定的辦法，地主田地由村公所收買之後，與田地所有權連在一起，田賦等負擔也移到農民肩

勝上去了。地主們如今少去了這重負擔，而且可以逐年收還田價把它變成高利貸商業資本。“這個年頭兒，作什麼也不如放賬”，這是山西目前流行的格言。其次，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三四年前值一二百元一畝的田，現在已經跌成三四十元了。在實施土地村有的時候，田價是由村公所估定的。然而誰也可以相信，在地主富農掌握中的村公所決不會照現在的三四十元一畝的行市估價。恐怕估作一二百元的原價是有八分可靠的事情。根據村公有方案所規定，現在地主們所有的農具，也由村公所作價賣作農民，並由村公所担保，分期付款。這條辦法實施的時候，恐怕誰亦不敢担保村公所不把舊農具當作新貨估價，強迫農民購買。

最後，土地村有之後，村公所發行的無利公債要全村農民共同來擔負償付之責。換句話說，如果村內多一個農民，便是多一個擔負者，而每個農民所擔負的債款也就減輕了一部分；反之，某一個村如果少了一個農民，也就是少了一個負擔者，而每個農民所擔負的債款也就增加一部分。因此，農民們勢必互相監視着，誰也不准離開原有的村落。地主富農們更可以把這個作為藉口，而監視中農貧農僱農的一切行動。土地村有方案所造成的這種監視的辦法，恐怕比了現在政府所推行的保甲制更為可靠，比了現在山西積極所推行的“好人團”的辦法更加具體而更加有防共的效力。這當然是地主們所最高興不

過的事情。

六 結 論

從上面的分析看來，土地村公有辦法之實施對於地主們真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最好出路了。然而這並不是說，地主們就要把這辦法馬上實現，天底下的如意算盤不是一定打得通的。土地村公有方案要實現到上面所說的‘理想化’（地主們的‘理想化’），地主們總還免不了要担些風險。地主們是很保守的，說得好聽些是很安分守己的。如果地主們能夠照原來的秩序，恢復他們的舊有的綿繡山河，那麼他們也何苦再來新翻花樣，自尋煩惱（算盤打得過分如意，將碰到猛烈的反抗也是意料中事）。但萬一連現今的局面都保不住，那麼他們也不妨冒三分險，把這土地村公有方案推行起來，作為以退為進。

如今這土地村公有方案已經預備在綏靖主任的家鄉，河邊村和它的附近村落開始試辦。這次試辦的前途將為兩種事實之演進所決定；換言之，將為威脅着今日山西的兩種勢力之消長所決定。第一，如果前述赤區的勢力繼續發展，而日本軍人袖手旁觀不加援助，那麼地主們或者竟會被迫着來推行土地村公有方案，推行得成功，固然甚好，萬一這方案不能救急，那也可以藉此把自己的田產變成現金，以便帶着逃難。第二，如果日本軍隊能夠積極來維持他們，赤區勢力不能十分發展，地

主們能夠依照原有的秩序來維持自己的統治，那麼這方案就將無形地被取消了。

農本局的性質和前途

三 秋

一 農本局是什麼

農本局是什麼？怎樣辦法？我們現在當祇能知道片段。據已公布的‘農本局辦法大綱’所載：

“政府為流通農業資金，調整農業產品，藉以發展農村起見，特由實業部聯合各銀行，設立農本局”。

另據實業部部長吳鼎昌氏在茶話會中對銀行界報告說：

“我國農村近年日趨衰落，人民購買力缺乏，以致各業不振，欲振復興工商業，首先須振興農業，今擬設立農本局，救濟農業”(四月十四日申報)

根據這簡略的報告，可知農本局是：一、以流通農業資金，及調整農業產品，以發展農村；二、所以要發展農村者，仍是所謂以農業引發工商業，更明白些說，便是想發展農村，以繁榮工商業的市場。

農本局的辦法怎樣？根據大綱，重要的可歸納為下列幾點：

一、農本局之資金，除固定資金三千萬元，由政府撥給外，合放資金三千萬元，由參加之各銀行擔任，流通資金無定額，由參加銀行決定供給。

二、農本局之事務，分農資及農產兩部份。農資部份進行方法是 A，補助審定合格之各縣各農村創辦農業銀行，合作社，農民典當；B，一般農產物抵押放款；C，接受各地方農業銀行，合作社，農民典當所有抵押品之再抵押；D，“於必要時”，向農民作若干信用放款。

三、農產部份中分：押品中農產部份之處分事務，一般農產品買賣事務，代理一般買賣農產品事務，受政府之委託，代理買賣農產農品事務，以及經營倉庫事務，（並得商由各鐵路局建築倉庫，廉價租借之）。

四、國營鐵路輪船關於農產品運費及中央地方關於農產品稅率之規定，須徵求農本局總裁之意見，有異議時，得請政府派員裁定之。

五、此外可注意的是“農本局之盈虧，由政府負之”，“合放資金，週息八釐，由農本局保本保息”。

看了上面，很快的給了我們一個概念：便是，現在所謂農本局者，與近數年來鬧得最熱烈的銀行的農村貸款，並沒有什

麼不同之點。所不同者，不過以前是個別的，分立的，現在是整個的，統一的；以前全是金融資本家個人的行動，現在則加上了政治的勢力而已！

事實上；我們即稱農本局為銀行農村放款之進一步的擴大組織，也無不可。如上列第一點，農本局的資本中政府的三千萬元，可視為政府的補助金；此外所有的資本均來自銀行，和銀團組織並無差異。第二第三兩點也是銀行農村放款過去事業的複述。第四點因有政治勢力的參入，故比過去在運輸與稅捐上更獲得了一些便利。第五點表明政府給銀行界擔保有利可圖，並把利息具體規定為八釐。

誰也知道，中國農村中仍保持着若干落後的因素，有礙金融資本之流暢的發展；自從有些大慈大悲的銀行家，想到除房地產，公債，外匯以外，還可以到農村去“救濟”得利後，其他的銀行家也“見善”紛起，但嘗試的結果，必然會有許多阻礙。（如各銀行競爭放款，農民破產，放款難收，以及農產價格跌落，抵押品無法售出等）。這種困難的體驗，使各銀行家有團結起來的要求。去年中華農業貸款團的組織，便是銀行農村放款的第二個時期。貸款團的成效如何，我們尚沒有獲得報告，但據說已由棉花價格低落，銷出為難（因其事業大部為陝西棉花抵押放款，而中國棉織業在日本棉織業的“提攜”下，已無力多消費原料），頗不得利。但今年因“幣制改革”後，使銀行的活動範

圍又狹隘了不少，多數的游資更非向農村去求出路不可，近日各報紛載，說今年上海各銀行，將以存款的大部，去“救濟”農村，其總數約有五萬萬元之巨，這自非更有一種組織，並以政治的力量來推行不可。所以農本局的產生，可說是農村放款的發展至又一時期。

在農本局尚未正式成立的今日，已有些短視的銀行家，有的惴惴然恐怕利息會低落，有的恐怕政府會搶去了他們“救濟農村”的生意。據五月十四日中華日報載，金融界對農本局的意見以為“欲謀我國農村經濟之復興，此種組織，極為必要；惟銀行除協助政府及社會，努力建設外，對其本身之營業，當求投資之穩妥，及利息之優厚，有請政府保本保息及請增厚利息者……”。

更據五月二十五日申報所載，各銀行所提出之意見書，更可表明銀行救濟農村之真面目。如中，中，交三行的意見書有謂：“農本局設立之使命，為流通農業資金，調整農業產品；查流通農業資金，為金融機關之工作；調整農業產品，則為政府對於農業之行政設施，二者宜分工而不宜兼營，宜合作而不宜分馳……以愚見所及，欲免除此缺點，端在分工合作，由政府設立農本局，由銀行組織農貸團，各任其事，相輔而行……”浙江興業銀行所提更為直截：“一、各銀行合放資金，規定週息八釐，以商業銀行成本論，實有賠本之慮，擬請酌加。二、各銀行

合放資金，並無收回期限，此於放款性質，不相符合，應請訂定至長不得過若干時期，或銀行於需要時，得向農本局收回……”農本局的性質是什麼，不難進一層地瞭解。

二 對於農民及農產的作用

農本局的這樣辦法，在流通農業資金及調整農業產品上，究能發生怎樣作用，且不予論，我們假定農本局在其事業上能充分地達到其目的，是否即足以救濟農村了呢？這祇要知道一些農村經濟 A B C 的人，即可知道單純的貸款不但不能救濟農村，就是想以之達到“調整農業產品”的目的，也是不可能的。

根據大綱的辦法，農資部份主要的是通過農業銀行，合作社，及典當，作農產物抵押放款，這與以前銀行的農村放款方法，毫無二致。依照過去銀行放款所得的經驗，可知所謂抵押放款，不過把農民的農產物以低於成本的抵押價格，掠奪了來（因為，在此農村經濟一般破產的狀態下，農民抵押出去的農產決不會有力再去收回，抵押的價格必然低於產地市價，而產地市價亦常低於成本的）。剷除了農村中原有的土著商業高利貸資本者的剝削而已。而且，放款方法，如經過農業銀行，合作社，典當，則直接生產者的農民，並沒有什麼“恩澤”可沾。如典當，本是典型的農村中剝削貧農的組織，現在又給予一些新

的生命劑，其本質是不會改的。合作社，據過去大家所週知的，仍是農村中豪紳士棍所把持的場所，其利益決不能達到下層農民。如係信用放款，這種情形自必更甚。（參閱本刊以前所發表的此類文字）。因為在農民經濟貧乏深化，農村政權沒有改革的前提之下，即使農本局更有比現在大上數倍數十倍的資金，也不會使農民的生產有什麼改善作用；結果，不論是由抵押或由信用所放出去的資金，無非以還債還租還捐等方式，落在地主豪紳的庫中；即使好一些，也不過是成了農民苟延殘喘的消耗用費，而且這還是極端少數。

在農產部份，農本局辦法大綱中對於如何調整農民，絕未提及一字，有之，仍不過是關於農產物的運銷賣買事項。這和以前銀行的農產運銷放款，並沒有什麼不同，所不同的，是現在加上了政府的力量，在運費及捐稅上，可以比前為有利而已。單純的運銷賣買，如何能“調整農業產品”，如何能改進農產，這是誰也無法答覆的。因為，今日中國的“農產問題”，在生產方面，主要的是小農各自生產，技術低劣，成本過高；在市場方面，是受國際市場的價格影響，進口農產傾銷，以致價格跌落，甚且沒有銷路。這種問題固不是單純的農業資金的流通，所能解決；亦更不是運銷賣買即可作為調整農業產品方法之全部。

反之，農本局的這種方法，對於中國農產不是沒有作用

的；不過它的作用，並不是以農民利益為中心的；而是以原料購買者的利益為中心，使中國農產物更趨於商品化，亦即是更趨於殖民地化。因為有了農本局之大量的抵押與信用放款的結果，必然吸收許多農民，使他們把他們的農產改植，以適應債權人的需要，這樣原料植物必然的會排擠自給植物而發展，而農民的農產更非依賴市場，甚且更非受帝國主義獨佔價格的支配不可；也即是對於殖民地原料供給的意義上，更盡了力量。

三 農本局本身的前途

我們把問題集中於對農民及農產作用上，也許別人會笑我們是笨伯，因為在當事者們，正和以前從事農業放款的各銀行一樣，祇把農本局作本位在着想。要是我們也是這樣想，則儘管農本局對於中國農民及農產無若何有利作用，而農本局本身則自有其客觀的存在意義的。

新華銀行的王志莘氏以為“農本局之以企業為目的，抑以公益為目的，均未有明文規定，此實有加以確定之必要”。實則農本局資金以銀行資本為中心，明定週息八厘，政府又有保本保息之明白表示，其為營利的企業組織，又何待復加以文字上的規定？可成為問題的是，如我們以農本局本身的發展來檢討，則農本局既為企業的組織，究竟有什麼前途？易言之，農本

局對於銀行資金明令“保本保息”，且有八釐週息，是農本局必須要有八釐週息以上（因本身尚有開支用費）之盈利，始能維持發展，是則這在今日是否可能呢？

如在表面上說，農本局要發展其企業性的業務，是有非常的困難的，因為：一、如不損害耕種者的利益，在今日普遍的農業衰落中，生產者農民所投於農業的資金，已很難可有上八釐週息的利潤，大部也都是虧折；二、在進口農產傾銷，中國本來沒有強有力的關稅保障，今在“中日經濟提攜”下全國走私怒潮中，中國農產的價格自必更沒有把握；所收納的抵押農產品的出路，甚或也會成問題。這樣，保本保息自必更成爲難題。

事實上呢？這祇是形式之論。農本局這種企業性的業務，却實是最得天時，地理，人和的。我們不能把問題祇在形式上加以分析，應該深入問題的內層。祇要知道在普遍的農民經濟破產過程中，農村中一部份商業高利貸者却可因農民經濟破產程度加深，而要飛黃騰達。則在性質上作爲商業高利貸資本高級形態的農本局，何以會不能担保有週息八釐以上之盈餘呢？

如政府真正爲流通農業資金，調整農業產品；則進行的方法自以“購買”爲合宜。現在農本局所用的方法不是購買而是抵押，在農本局方面，僅僅是這一點，已足以保證其週息八釐以上的盈餘。何則？因爲購買的價格無論如何不能低于當地市

價，而抵押的價格，却可僅值市價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以下。但在今日，農民在地租，舊債，稅捐，以及各種天災人禍重壓下，一經抵押出去之農產而能有力再回贖者，實已絕無僅有，何況市價的季節漲落，又非農民所能有力應付；即使有能力可回贖，到此時亦必得不償失。過去地主商業高利貸者之掠奪農民的土地，農具，農產，即都是以抵押的方法來進行。現在農本局的收集農產，方式雖是抵押，而實利則與購買無異。

農本局既可以低於市價若干成之下獲得農民的農產，則以後價格雖有低落，亦決不至于低到抵押價之下；這樣，要把農產物售出，並獲得週息八釐以上之盈餘，自非難事。何況，農本局又是最得天時，地理，人和的！

何謂天時？現在正是“中日經濟提攜”勢力最盛之時；所謂“中日經濟提攜”主要的是“農業中國，工業日本”。在這時候，農產原料不怕沒有“國際市場”！根據過去中華農業貸款團的業務，抵押農產以棉花為主，農本局自不能有什麼大的不同。而棉花却正又是我們“友邦”所謂為“經濟提攜”的主要項目。

其次，何謂地理？自然是因為中國還仍保持着落後的農業經濟時期；農業區域的廣大，使農本局有取之不盡的資源。又因為中國農民以貧乏的小農為最多數，使農本局的抵押業務更能易于發展。更進一步說，則中國經濟之殖民地性質愈趨深

刻化，對於原料提供的組織工作自必更形重要。

最後，何謂人和？則是最易明白的。農本局已不是以前銀行似的單純商業組織，而已滲入了政治的力量，因其如此，所以能使運輸費用稅率減低，更可“受政府之委託，代理賣買農產事務”，——這對於農本局的發展，亦是一個重要因素。因為農本局的抵押農產，在目前，主要的不外棉花及食糧。棉花對於“政府”固無用，而食糧則是很有用的；因政府為“安內”“剿匪”，終年所需要的軍糧，為數是很不少的。

再說吧，農本局所標榜的救濟農村，提高人民購買力，以振興工商業，這點也是多少可以達到一點的。因為，依照農本局的辦法，不但使各個小農所生產的零星農產，經過農本局，可以化零為整，而成為原料農產的大量提供——亦即所謂“整理農業產品”，而且經過農本局大量抵押資金的流入，農村某一部份的金融自必得以相當流通；對於工業品的購買力，自必亦可相當的提高。——不過，農村市場的這種購買力的提高，固可“振興工商業”，却不會是中華民國自己的工商業。因為在“經濟提攜”之下，中國的工業品在成本上怎樣也不能和我們的“友邦”相競爭；在關稅無保障，而又全國普遍的大規模走私之形勢下即使農村購買力提到天樣高，中國工商農也不能抬起一分頭來的。

所以，以農本局的本身而論，實是可樂觀的。一部份銀行

家還猶豫利息不高，資金無保障，實在大可不必，因為在吸取中國直接生產者農民之最後血汗的基礎上，農本局保本保息，週息八釐的利潤，是不會有問題的。

站在農民利益與改進農產的立場上，我們無望于農本局，要說有什麼希望的話，祇希望大家能明瞭各種阻礙真正農村改進的所謂“農村經濟”“農村建設”的真面目！

中國當前的災荒問題

楚 辛

申報每天登着如下的廣告：“救災卽救命：多捐一文錢，多救一條命”。“大善士”們想用廣告的力量，激發一般人們的天良，多捐幾文去救濟災民，這是誰也會感激涕零的，豈但災民！

八，九兩日，上海滿街佈着童子軍，逢人便拉，遇車卽勸，滿口好話的向過往人們募捐。做什麼？他們並不想拿這些錢去買糖果，的確的，童子軍是一心一意地爲着數百數千里以外的受災同胞！

中國，是一個“飢餓之國”！是一個“災難之國”！

橫貫着中國有三條大河：黃河，長江，珠江（黑龍江只好除外了）。這三條河的流域，就是華北，華中，華南。換句話說，假使這三條河流如果同時出了毛病，那就是等於全國都鬧水災。今年，就是這三條河流同時舉行“水災競賽”的年頭。

最先，小弟珠江先作短距離賽跑的出發了。結果是東，北，災西三江流域的民逃避山崗，無衣無食者達七萬人！廣三鐵道

被淹而不能通車者數日，此外房屋田畝被水冲塌和淹沒者都以萬計。

然而老大哥長江的身段畢竟比較珠江來得長和大，因而造成的災害也就大得多。我們看，長江流域那四省（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的地圖，一半以上簡直都是黑的了！在那斜黑線下所包含的縣份，據說有一百四十八縣和二市，（湖北五十縣二市，湖南三十七，江西四十八，安徽十三），都是受了水災的。被淹土地，湖北有七千多萬公畝，湖南有五百多萬畝，江西（只有五個縣份的報告），有三十二萬三千畝，安徽有四十一萬多畝。這就是說，假使這許多田畝如果不被水淹，而且拿來分給農民自由耕種的話，那真不知要養活好幾百萬的人口呢！再如棉花一項，單只湖北一省的損失也有五千萬，假使這許多棉花都是農民自己所有，而且沒有被水災淹沒，那末，不是有上千萬的人們都可穿着棉袍過冬了嗎？固然，這土地和棉花大部份都是在地主和商人們的手裏，然而被水冲了去，總是可惜的！并且，最可怕的還是這次大水淹死了許多人，據說湖南澧水等七縣有十萬多！湖北天門等縣也有十萬個以上。這許多死的人當然都是貧苦的農民，有錢的人們早已向外逃跑了。現在留在這個區域內還有一千幾百萬沒有斷氣的災民，餓着肚子，光着身體等待着死神的來臨。長江真可以自豪，今年它已打破二十年大水災的紀錄了。

老二黃河也沒有比長江遜色，說起長距離賽跑來，它實在可算第一。近幾年來那一段時候是黃河平安休息的日子呵？河北貫台口門台龍沒有幾何時，山東董莊又作它這次長途旅行的出發點了。我們看，山東西部十七個縣份不是都快有斜黑線了嗎？現在此地已有五百多萬災民，作它旅行的隨從伴侶了。它的腳一跨進江蘇省門，邳縣，銅山，沛縣，豐縣也就作它奔放的地盤。接着沐陽，宿遷，漣水，泗陽，東海，灌雲等處現在也都有它先遣部隊的足跡。吃飽黃水死子的人自然很多，看着黃水餓着肚子的也有數百萬。老二黃河真出色！看目前的情景，它正健步如飛，要想把全江北人民都收為它的魚鱉門生呢！

我們還需要說什麼河南六十縣水災呵，綏遠黃水遍五縣呵，灤河流域大水呵，錢塘江鐵橋橋基沖毀呵，閩江面上漂着浮屍等事實嗎？總之，我們說一句“全中國滿地都是水”了呵！

可是，究竟有什麼原因造成這樣大的水災呢？所謂“水災是天災”，那是完全由於自然條件嗎？不是的！世界上任何一國沒有像我們中國這樣多天災的例子，就可以證明。而且，聽說最近蘇聯已經漸漸沒有天災的事實，更使我們對於這種“天災自然條件論”的說法，不會去相信。那末，如一般人說的，是“不注意造林”嗎？是“人民與水爭地”嗎？是“水利機關沒有負責防堵”嗎？對的，不過我們對於為什麼會“不注意造林”“與水爭地”“不負責防堵”等原因，需要加一個解釋。

假使諸位走入到鄉村，遇着任何一個農民，你不妨對他說一說“森林如何防禦水旱災害”的常識，並且要他加以保護和培植。那末，我想一定的，他能告訴諸位更多關於他所熟知的森林常識，以及許多別的話給諸位聽。譬如說罷，“我沒有許多山和地，我能夠把森林栽在自己手背上面嗎？”“此地從前本來有許多繁茂的公共森林的，可是有一次却被某大爺單獨作主包給外路商人砍伐了，我們連要一點枝葉兒作燃料都還沒有呢！”這是說明，第一，當一般農民大家自己沒有土地的時候，要他們去提倡森林是毫無用處的；第二，農村中的地主商人正在把舊有公共森林極力破壞，並且佔為已有。所以諸位單對農民說什麼保護森林的話都是空談。年來政府當局的造林運動，不是已經當做農村教育運動的主要科目嗎？然而，運動的效果在那裏呢？

同樣，所謂“與水爭地”，我們也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由於一般農民大眾的失地，農民手上的土地大部集中到地主的手裏去了。農民無地耕種，所以只得向未有主人的沿江沿湖的沙灘湖地，開掘一些出來維持生活。自然，最先受着水災的就是他們這許多土地。並且他們也明知道這種舉動是“與水爭地”，將使河身一天一天淤淺起來，結果會釀成大的災害。但是肚子的飢餓却不允許他們有這種遠見。因為最現實的肚子問題迫着他們不得不解決：“除非從另外一批人的手裏把土地去奪回

來，不與水爭地將怎麼辦？”的問題了。這就是一般農民所以“與水爭地”的原因。然而世界上却另有一批吃飽肚子不怕脹死的人羣。他們從來不種一畝地，却有幾千幾萬畝土地的所有權。假使把這許多土地無代價分給農民，真不知有幾千百萬農民可以舒舒服服的過日子了。然而，他却霸佔了！他要耕種這田地的人出租米，否則連半畝土地也不給。照常理說來，他也應該滿足了。可是他並沒有同諸位一樣的想法。他要把所有的土地都集中到自己的手裏去，他要每個農民都出租米才耕田纔滿足。於是，他大規模的圍田了，洞庭湖，鄱陽湖，江浙的太湖，恨不得想把整個湖水都吞下去。地方政府對於他們這種舉動自然是歡迎的。因為這是能夠增加田賦的收入呢！這種大規模圍田的“與水爭地”，比起農民的開掘五畝十畝來自己耕種真是跟大巫見了小巫一樣。然而鬧了水災最受害的是誰呢？地主們嗎？他們不過少收一點租米罷了。

至於說到“負責防堵”，那末年來中國的水利事業也真可說是注重到透頂了。我們只要一聽到那許多水利機關的名稱也是嚇人！“全國經濟委員會”下面有“全國水利委員會”，黃河有“黃河水利委員會”，長江也有“長江水利委員會”，此外各省如河南，河北，山東又有什麼“河務局”“河工局”，“黃災救濟會”又有什麼“工程組”，江蘇又有“導淮委員會”……單拿這許多機關的名稱去堵口，簡直也可以把洪水堵住了。然而機關自

機關，水災自水災，水利機關多如牛毛，水災却佈滿天下。這是什麼緣故呢？空有機關沒有充足的水利經費自然是大原因。山東黃河堵口工程，經專家會議決定要四百八十萬，而中央治標方法項下却只估一百萬。黃河導大溜歸入正河，需款百五十萬，南京却只撥去工款二十六萬。再如湖北堵口築堤只需百五十萬，而中央連這點款子都毫無辦法可想。假使這點水利經費去同軍事費用一比較，那真值得什麼呵！然而現在“安內”軍事費用却被有些人們當做高於一切了，自然，這不是說這許多水利機關本身都夠盡職了。前“黃河水利委員會”會長李儀祉與孔祥榕互爭地位的傾軋，這是誰都知道的，武漢的武惠堤是二十年大水後出了二十萬元修復的，為什麼不數年到現在又完全傾塌了。此外還有很多的例子。這是表明中國的水利機關如何只見官僚爭權奪利，不見實際工程動工的事實。大水瀰漫，受害的是貧苦百姓，不是這許多水利官員呵！

然而招致災害來臨的是這一羣人們，忍受災害苦難的又是另一羣人們，這是什麼世界呢！但是，但是這個世界使我們發生疑問的還不僅僅這些！

我們回憶一下前面簡略報告的數字吧：中國目下有多少災民？

我們再來問一句：政府有多少拿來救濟災民的賑款？回答是：

災民：長江流域一千數百萬！黃河流域一千萬以上！別的不算罷！

賑款：八月六日行政院通令：本年度歲出預算“第二預算費”項下二百萬減半——一百萬！加上“賑災公債”二千萬！此外還有各省總收入的百分之二的“救災準備金”。究竟多少呢？天曉得！各省“救災準備金”還需要“準備”，“救災公債”是發行了，但經慈善的銀行家們一番抵押折扣以後，實際上也已不留多少！大概“賑務委員會”的捐款總很多吧！是！到十月八日為止，共計撥付五次，總數二十四萬！

唯一的慈善機關“水災義賑會”的捐款呢？到同日為止，五十四萬！

一共是：數千萬的災民！一千數百萬元的賑款！（我們不能相信賑災公債可以如數應用）中國的人民真幸福呵！

可是，賑款雖然如此少，災民的“代表”（？）省當局請撥賑款的勁兒却真夠贊歎！發行“賑災公債”的消息還沒有傳出，大家的目光都還注視在一百萬準備金上面。等到賑災公債將要發行的消息一透露，於是大家也就伸出手來；湖北要五百萬，湖南要五百萬，山東要一千萬，江蘇的紳士也要一千萬。這五百萬，一千萬，假使真的能夠一點一滴都能都使用到災民身上去，自然是值得感激的！好在中央政府也不會有這許多錢，地方政府也不過抄襲一下要求“協款”的老文章而已。災民，恐怕

誰也不會有半點影兒吧！

現在，賑災的捐款是繼續在募集中，捐款的來源是海外華僑的匯款，公務員的普捐，童子軍站立街頭和顏陞色舌敝唇焦的代價。銀行家們却正圖叨賴水災的宏福，可以賺一筆借墊賑款的利息。而另有一批人們，却又借慈善為名，大做其慈善生意。一個山東查賑主任，經手賑款只有二十萬，要領辦公費一千元，已被人們口碑載道了，可見那種由委員長行營通電查緝的湖北賑災舞弊人員，其舞弊數目的巨大是可想而知。華僑們的血汗，童子軍們的熱情，下級公務人員的節衣縮食，究竟是誰得了好處，我們可以明白了。

人民，他們是明白一切非自救不可！所以最先對於這個水災並不是毫無抵抗的。舉個例說，當黃水泛濫到江蘇邳縣的時候，邳縣縣長“僅憑一紙紅鉛筆草成的手諭，要徵集一萬人，一下就來了一萬五千。老老小小各自攜帶着自己的乾糧和鐵鍬，黑漆漆地就由遼遠的村莊趕來。說是五點鐘開工，三點鐘就動了手。一鍬鍬的土，要修起幾十里長的大堤。在堤工方竣時，水漲了，漫過堤身，衝開決口，數晝夜的工程化為烏有，但他們並不灰心！隨着又一紙的手諭，他們又退守到若干里外，重築起套堤來”。有什麼官員，在什麼時候，能夠號召這許多人民如此隨聲呼應呢？這是大眾自身的事情呵！他們是“時常三夜沒有交睫，每個築堤的民衆，戰慄的手臂，拉，拉，拉上堤岸的土包，

樹枝，立刻又被水沖走了。

結果，空中充滿了掙扎，嘶喊……

幾千幾萬的號哭聲，在數丈高的水頭下漸漸的消失了”！

人民一成為災民，那就等於一個兵士解除了武裝。他們只得祈望着救濟。可是救濟呵，却使他們失望了。據說：“八月三日十二點鐘的時候，一架灰藍色的飛機，在山東鄆城縣空中盤旋，每個翹頸待賑的災民的意想裏，以為救濟的官員來了，面上都露出滿意的微笑。但十幾分鐘以後，眼裏含着眼淚，看着牠（“黃河水利委員會”的飛機）在東南方的雲霧裏消失了”。

山東水災救濟的結果是：路上“誰家的孩子誰也不敢認，認了吃啥”？收容所裏日夜嚷着“冷不起”！然而災民却又時時刻刻要耽心着救濟人員把他們出賣去做亡國奴：“你可不准把我們賣給洋人呀！”災民，他們至死也是中國的國民呵！

據‘申報’記者陳鹿雅先生的記載，湖北的災民似乎已經漸漸明白專賴別人的賑濟是無望了，在他們之間流行着一種歌曲：

“……農夫種地不見錢，城裏富翁喫不完，哎呀！龍翻身，天連水，水連天，十萬農戶九萬斷炊烟。走走走，哎呀！鋤頭莫離手！哎呀！先吃漢口，哎呀！後下揚州，哎呀！……”

“救災即救命！”災民呵！你們的命專賴別人來救濟是恐怕

要失望了！

本年內幾種農民糾紛的研究

周文彬

一 引 言

中國的農民現在正在恐慌和災荒的夾攻之中掙扎着，外國資本的侵略，廉價農產品的輸入，特別是目前農民糧食購買力（這種購買力的高低，只能表示人類同禽獸的生活之分，換句話說，這是人類生活最低的衡量標準）的竭度減弱，造成了目前普遍的糧價跌落，下層的農民羣衆，雖然有了相當豐富的收成，可是因為糧價泥賤，也無法賣得起錢，就是得到些錢，也還要納糧完稅，還債償利，他們那裏顧得到自己的生活呢。

在另一方面，水旱災荒已經成爲中國近年來的經常現象。這裏基本的原因自然還在農民們平常受盡剝奪，他們對於各種災害，已經全無防制的能力；同時因為平時已經家無儲糧，一遇到水災旱荒，當然更沒有辦法耐住，因此中國的農民，他們所受災荒的苦痛，也要超過別國幾倍。

中國的農民大眾既然呻吟在這樣慘痛的環境之下，按照通常道德的觀念想來，在人事方面似乎應當可以受到特別的寬待，誰知事實上恰得其反，這些已無噍類的農民，他們目前所受各種剝奪，像高利貸，賒賬，苛捐，雜稅，攤派等等，非但無一倖免而且還變本加厲。這樣使得他們更沒有辦法阻止或減輕農業恐慌和災荒所加於他們的禍害；反之那些更進一步的人事剝奪，使農民在災荒和恐慌中所受的痛苦，益發加重呢。

農民在這種剝奪之前，一部份雖然還俯首聽命，自認是命該如此，可是多數農民已經發動他們本能的反抗，結果在各地造成種種農民的糾紛。

我們在本篇所講的，只限於那些農民因為各地方當局還在加重苛雜，不顧民生，因此而發動的抗捐抗糧等等的舉動。

二 苛捐雜稅與農民糾紛

最近山西綏靖主任閻錫山在省政府紀念週上報告，山西全省田賦雖然並不見重，可是各縣攤派，可說“苛”“雜”之至；結果農民不能安居，生活萬分慘苦。這種情形自然不是限於山西一省，其他各省比它更甚的還是比比皆是。中央當局雖然口口聲聲，要減免苛雜，可是地方當局還是充耳不聞。

上面說過，目前中國農民實在終年挨餓，怎樣還負擔得起

很重的稅捐？事實上呢，各地當局因為由經濟危機所牽動出來的財政危機正在日益深刻，所以更不得不橫征暴斂，安渡難關。

在此情形之下，農民對於各地當局的不滿，有時雖然忍痛咽下肚子，或是敢怒而不敢言，有時却要採取各種原始的形勢，表現出來。

這裏表現得最和平的是向當局請願，減輕捐稅。例如本年一月中旬安徽各縣代表紛向行政院請願，減輕田賦。四月下旬杭縣人民因為政府本年改征新稅，將省縣各稅增加到894,112元，就召集各法團會議，羣起反對，並推舉代表向省方和中央請願。又如獻縣農民於本年一月中旬，因為包商苛徵，甚至徵及年節所殺的豬子，因此大起反感，各鄉民衆就先後到城，到縣政府和縣黨部請願。沿路大喊：“反對包商苛斂”，“護擁年節不納豬捐的舊例！”（天津‘大公報’一月二十二日）。

反對苛雜的方式較為嚴重的是示威式包圍地方公所，我們可以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大家知道，婦女的性情總是比較溫和的，可是她們一到生死關頭，也就要挺身反抗，例如廣東台山“因各鄉所派電桿電線，多未繳納，縣府就派兵隊，下鄉催收，詎抵達溫泉鄉時，乃通知該鄉公所，轉往安和村催收；該村實無法繳納，縣兵不由分說，即將該村父老數人拘縣訊辦。該村婦女，大起恐慌，乃集婦女數百，各持鑷刀棍棒，擁赴溫泉

市，將鄉長朱一毅住宅重重包圍，迫令鄉長交出人來”（香港‘工商日報’三月十六日）。

農民更進一步便‘挺而走險’，“越軌大鬧”了。福建南安縣有王姓數千戶，他們有槍很多，一向抗糧抗捐，本年四五月間又大鬧起來，縣長就派兵包圍搜查，得槍九十餘支，逮捕六十四人。又如浙江杭縣塘棲地方，因當地領照處逼死農民，鄉民就聚眾騷動，搗毀辦事處，焚毀公佈圖照（‘東南日報’五月七日）。又如廣東徐聞縣農民因天時亢旱，縣長絕不關心民瘼，就聚眾數千人，搗毀縣政府（見‘七十二行商報’）。

這種方式表現得最尖銳的，當然要推本年六七月間河南臨漳農民的抗糧圍城風潮了，按該縣農民圍城風潮以前已鬧過六七次。這次因為縣方催賦過嚴，並且勒令追催欠賦，因此民心大憤羣起反對，六月二十六日農民在杜村集開會，謀有所舉動，縣府聞訊，即派隊前往彈壓；當日未見動靜。到二十八日那天，突來農民五六千人，將縣城圍困，鳴鎗示威。縣長無法，一面電專署請示，一面派各機關領袖，出城解釋。後來農民提出十一個條件，脅迫縣長立刻答覆。縣長臨時答應，城圍始解。可是到二十九日，當局方面又將圍城主角逮捕，農民就再度圍城，其時參加的有三四千人。他們割斷電線綁梯攻城，情勢緊急萬分。當時城內僅有槍幾十支。安陽方面派隊馳援，中途又被農民拘留，各機關和商民代表為免城被攻破，就請求將被捕

主角薛某暫時釋放。當時下午五時，即將薛某放出，城圍遂解。

三 地政和水利上的糾紛

農民在反對苛雜的時候，固然是異常堅決，就在反對其他剝奪的時候，也並不見得怎樣“容情”。

目前各地對於土地陳報，公路和水利的建設，都在積極進行，這些建設事宜在農民看來，往往又是增加負擔的泉源。比方說吧，土地陳報在農民目光之中，又是增加賦稅的手段；因此他們常起“誤會”，堅決反對。

兩三年前江蘇揚州農民反對測量土地的大騷亂，我們現在不能細說，我們現在將本年內幾件報上有記載的事件，擇要舉例如下：——

日期	地點	原因及實況
一月	江蘇江都三區	反對土地陳報，聚眾數百人將測量人員細綁，搗毀儀器。
一月	江都新橋鎮	反對土地陳報，鳴鑼暴動，鎮長住宅被毀。
四月	安徽和縣	當地土地原係大弓量，民衆恐土地清丈。即將加賦，故反對陳報。鄉民千餘人，當敢死隊；且有少數槍枝，到縣城請願，請收回成命。

四月 江蘇蕭縣黃口 反對土地陳報，加徵大糧，農民九百餘人，包圍黃口道區公所，並將利民鄉鄉公所搗毀，警民衝突，農民死七十八人。

四月 安徽和縣 反對土地陳報，聚衆千餘人，各持刀矛農具或槍，實行武裝請願，要求收回土地陳報成命。彼等行抵離縣城三里之桃花橋，與縣保安隊相遇，對峙五分鐘，即發生衝突。彼等奪路前進，為保安隊放排槍掃射，頓時倒斃十餘人，遂退至五里地集合，揚言欲到縣城復仇。農民復派人向其他各鄉，鼓動農民，齊起暴動。

五月 安徽和縣 因土地陳報繼續進行，農民再起反對，焚燒聯保長住宅，並與保安隊壯丁隊發生衝突。

其次，我們要看一般農民對於修築公路所抱的態度和所引起的糾紛，我們知道，中國目前公路的敷設，主要地是便利行軍，至對於經濟開發究竟有怎樣的作用，是很成問題的；特別是對於一般農民生計究竟有多少好處，那更成問題了。在另一面，各地建築公路，一面要佔奪民地，一面要征集民伕；

所以對於農民，築路一事，可算人地兩失，這樣，一般農民自然要有所不滿，甚至要引起各種糾紛了。

農民因為反對築路請願鬧事的，時有所聞。例如本年四月江蘇江都第四區徵築公路中揚靖段路面，民衆要求到夏季登場後再行徵築；可是當局不加允許，後來鄉民就聚衆八九百人，阻止繼續舖築，風潮弄得很大。又如江蘇南匯築南川公路的時候，與范家巷一段，忽然不沿原有路線徵築，因此侵佔民田極多。當時就有鄉村婦孺數百人，阻止工人工作，區長出面勸罵還沒有效力，縣府就派警察來彈壓。

至於農民因為不願被徵築路，紛紛起來反對的，也很不少。例如本年五月福建閩侯縣四區各鄉農民因忙於春耕，不願出工造路，聚衆數千人，與駐軍衝突。後來經駐軍和保安隊擊退（上海‘大晚報’，五月五日）。

這裏我們特別要指明的，農民除了公路之外，對於其他交通和軍用場所佔用民田，而挺身反對的，也是數見不鮮。舉例來說，南京中華門外劉家花園一帶的棚戶，因為京燕鐵路建築總站徵用地段，對於當局大為不滿，就聚衆包圍區公所，並把區公所助理員痛毆一頓。後來再把該助理員押到市政府，向市府請願。又如五月間江寧農民一千多人，因為向江南鐵路公司索取地價未遂，發生橫臥車軌，不准開車的糾紛。同時，河南新鄉的農民又因為當地建築飛機場，佔用民地不少，還要徵工。

建築，因此發生糾紛，推派代表向省方請願（‘鄭州日報’，五月二十三日）。

現在我們再來講講農民在水利方面所發生的爭端。上面已經說過，水旱災荒之所以頻仍，其直接原因之一乃在農民對於各種災害，已經窮到全無防制的能力，這是就農民本身說的。至於各地當局對於水利失修，馴至時患浩劫的情形，當然應負最大的責任。在有些地方，官吏中飽水利費用，或者挪借建設經費，以致堤閘頹壞，迨至水災，例如歷年漢口潰堤，黃河衝決，其主要原因都是在此。

這些我們暫且不論。水災已經發生了，大家已經認為有搶險和興修水利的必要了；然而在這時候各地當局竟還有因循敷衍，或是中飽款項，耽誤工程的；也有毫無統盤計劃，貿然開河築堤，因此反而貽害於農民的。在這場合，農民自然會起來反對，舉例來說，本月五月間河北永定河三角淀農民，因為反對華北水利委員會，修築永定河南堤，並在二十二號決口處築滾水壩，就聚衆一百多人，各持紙旗，上面寫着“反對變相放淤”“反對攔河築壩”等標語，整隊到天津，向省政府請願，又如江蘇沛縣農民推派代表，要求政府緩期浚河，縣政府却把他們的代表拘留了，農民就大為忿恨，便聚衆幾千人，包圍縣府，要求釋放代表，縣府答允放出，農民始散。

實際說來，這類的糾紛我們當以最近高郵農民搗毀縣府

一事，來做典型的例子。現在我們就對這“搭大”的事件，做個簡單的敘述：

本年蘇省因為黃河水勢，逐漸浸入蘇北，省府就命令征工積土，加高運河堤身。高郵縣府奉令後，即規定工夫口糧，土地給價津貼辦法，計每公方酌貼茶水費四分，用船裝運者八分，後來就征集農民六七千人，實行開工。各段民夫開工以後，就迭起糾紛，有因口糧無着者，有因不許挖取田土者，有因保甲長詐取民夫點名費每名銅元六枚者，監工員被毆的數見不鮮。

八月十九日上午，縣政府裏面忽然發現手持鐵鋤，肩荷扁担畚箕及其他各種農具的男女農民千餘人，自稱“我們是全縣民夫代表，因為沒有領到口糧；同時秋禾在田將熟，不忍挖土，另一方面，保甲長又收點名費，所以到縣政府來請願”。

當時縣府因縣長不在，守門軍警便高聲吆喝，強迫制止。不料民夫愈聚愈多。到下午二時，突有民夫大敲火油箱，率領羣衆直入，縣府臥室廚房，均遭毀壞，縣長夫人由後門逃出。

當天晚上，另有一部份農民，再去包圍第一區公所，將所內窗格什物，全數搗毀。後來又轉到縣府建設科長賈某住宅，將宅內傢俱什物，搗毀一空。直到深夜一時許，各民夫又集合一處，赴永清寺會議，商定留一部份民夫在城內向縣府交涉，其餘分頭回鄉鳴鑼，徵集遠鄉民夫，到第二天再來城大舉請願。

十九日下午一時後城內民伙因爲縣府仍無具體辦法，又大肆鼓噪，後來被保安隊彈壓；未曾肇事，同時城外又有各鄉民伙到城，要求進城請願，嗣經各分局警士勸阻，沒有發生風潮，最後高郵縣長出示佈告，征工積土仍舊進行，對於工伙每公方土津貼四分，用船八分，一俟發下，即由各鄉長轉發。至於田土給價。也規定分“兩熟”，“一熟”，“荒地”分別給價，偌大風潮，即暫告結束。各當局和地痞土棍，看了這次高郵農民風潮之後，終也能得到些教訓罷。

金 融

1. 幣制改革以後
2. 中國跌進英鎊集團以後
3. 中美白銀協定的透視
4. 中美會談與新幣制的前途
5. 評‘中國增加籌碼問題的意見書’
6. 從物產證券談到一般的貨幣理論

幣制改革以後

章乃器

中國的貨幣制度，經過了三個星期的謠言，投機和紛擾，結果是於本月四日明令改革了。改革後的貨幣，就是所謂“管理貨幣”；在國內流通的是紙幣，對國際的匯價，是由國家銀行用營業手段把牠穩定起來。依目下的情形，匯價是和英鎊以每中國法幣一元合一先令二辨士半的比率聯繫起來。這樣，中國在事實上已經加入英鎊集團，但是並沒有法令的訂定，而且據說也沒有條約的束縛。

爲了通貨膨脹的四個字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很壞——許多人以為通貨膨脹就是濫發紙幣，而馬上聯想到大戰後的德國馬克，——所以，財政當局告訴我們，這次的幣制改革並不是通貨膨脹。其實呢，管理貨幣就是膨脹政策的運用；在學理上面，各國學者往往是不諱言其爲通貨膨脹的。倘使要格外謹嚴一些，或者我們不妨說：牠是有限制的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政策到底能有多少效力呢？關於這問題，恐怕最

公平的答復，是：通貨膨脹能刺激購買力，然而不能產生購買；能刺激物價，然而不能穩定物價。比方，在過去的一箇月中間，有許多人得着了改革幣制的消息，馬上就向交易所買進“期貨”棉花，棉紗，小麥，麵粉……的行市，因此便飛漲起來。這種購買力，就是刺激起來的購買力，而不是真正的購買力；因為投機家在買進“期貨”的時候，不但沒有消費的意思，而且沒有販賣的意思。在價格抬高之後，他就要賣出“期貨”，“了結”了原來的交易，而賺取那中間的贏餘。因此，這種物價的上漲，也不過是一時的刺激，是不久便要跌落的。

就在幣制改革之後，有許多人看見各大百貨公司依然在“大減價”，便跑進去乘機多買一些日用品，免得將來漲價之後，買不到便宜貨。更有些人看見米價已經漲到每石十二元，恐怕再要漲上去，便趕早囤積了三箇月的糧食。這種購買力，都是通貨膨脹刺激出來的；這是“預支的”購買力，是購買力的提前，是不能持久的。這種購買力所刺激出來的物價上漲，自然也是靠不住的。

爲甚麼我說通貨膨脹不能產生購買力呢？先就薪金階級來講，如果他們的工資不增加，他們的購買力是不會增加的。反而，在物價高昂的狀況之下，他們的購買力只有減少。此外，失業工人能不能得着工作而增加他們的購買力，也是一個問題。且說占民族工業主要成分的紡織業吧，倘使農民的購買力

不增加，棉紗的銷路就不會暢旺，紗廠就不見得可能加工。棉紗出口的起色，是可能的，然而也要紗價上漲不多。否則匯價下跌的利益，被紗價上漲的損失抵銷了，出口的形勢就無從轉機。

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的購買力，能不能增加，是一個更嚴重的問題。關於這問題的答復，我們可以說：如果農產物價格的上漲，不及工業品價格上漲之多，農民的購買力就只有減少。從一般的趨勢看來，農產物在跌價的時候，往往比工業品跌得多，而在漲價的時候，却往往漲得比工業品少。因此，通貨膨脹刺激物價上漲的時候，農民的購買力是不會增加的。美國在通貨膨脹之後，農產物的漲價之所以能夠超過工業品，並不是通貨膨脹的力量，而是政府農業政策的力量。在農業政策之下，政府一面限制農業生產，一面購買過剩的農產物，農產物價格才會飛漲。簡單的說：通貨膨脹的本身，是不會增加農民的購買力的。

如果我們要給通貨膨脹一個比喻，那末，我們不妨說牠是一注強心針。假如一個人的元氣未竭，打了一注強心針之後，身體裏的自然抵抗力就出來了；那末，憑藉這一注強心針接一接氣，那效力是可以寶貴的。但是，如果那個人的元氣已竭，那末，一注強心針的作用，就不過是苟延殘喘罷了。

然而，流俗的經濟學者，他們的見解便和我們不同。他們

慣於提出經濟恐慌中的一個小小的因素，把牠放大起來，以掩蓋了恐慌的根本因素，同時掩蓋了恐慌的嚴重性。他們說：日下的世界恐慌，並不是怎樣了不得的事情，也沒有了不起的重大因素，唯一重要的原因，就是貨幣價值的上漲。這樣，在“只怨尺長，不怨布短”的飾辭之下，他們就反果為因，把一切恐慌的罪惡都輕輕的推到貨幣頭上去，而主張只要膨脹通貨，使貨幣價值貶低，就可以根本的掃除恐慌了。在中國，他們便把白銀問題提得比天還要高，以為一切喜怒哀樂，都是白銀在那裏作祟；而把更基本的半殖民地形態，整個的帝國主義勢力，更嚴重的帝國主義軍事侵略，以及種種一切國內封建勢力的肆虐，都一筆撇開了。

近年來各國膨脹通貨的結果，在事實上證明流俗經濟學者的理論，是以小蔽大，是避重就輕，是虛偽，是詐欺。如果通貨膨脹能夠解決恐慌，為甚麼帝國主義現在還要用戰爭來解決恐慌呢？同樣的，如果說通貨膨脹了之後，中國的恐慌就會過去，中國就可以恢復繁榮，中國民族有這樣便宜的事嗎？那恐怕我們只算是“託天之福”，或者在夢中去求吧！

我們應該確信：在中國民族未曾得着解放以前，一切的繁榮都是虛偽的。——這是少數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在大眾啼饑號寒當中誇耀他們富貴尊榮的把戲；而中國民族解放的取得，也決不是靠少數人玩把戲，掉槍花，眼睛一霎，老母雞便會變

成鴨的；牠是需要大衆在艱難困苦的鬪爭中奪取過來的。

的確，有許多國家，在通貨膨脹以後，依然能穩定牠們的物價。然而要明白，這也並不是通貨膨脹的效力，而是靠着別種力量的扶持。關於這問題，我們可以舉出兩個國家做代表。第一個是英國，牠是用壟斷殖民地市場手段以維持通貨膨脹的力量的。英國自從一九三一年冬間放棄金本位以後，立刻就進行加緊大不列顛帝國內主屬地間的團結工作；在一九三二年，牠在沃太華舉行一次殖民地會議，使主屬國間和屬國間的矛盾，儘可能的加以調和。牠逐漸的在殖民地用關稅壁壘和限制輸入等方法，把他國的商品，從殖民地市場裏排擠出去；殖民地對英國的貿易，自然就會增加了。這種殖民地購買力的奪取，就使英國可能在這幾年中間，穩定牠的物價。自然，除此以外，穩定物價的力量，還有軍需購買的增加，但是還沒有壟斷殖民地市場的那樣顯著。

第二個代表國家是日本，牠是用財政膨脹的手段，維持通貨膨脹的力量的。牠自從“九一八”瀋陽事變後，不久就跟着英國，放棄金本位。國家預算，在所謂“非常時”的口號之下，不斷的膨脹，國債額由一九三二年末之日金六十三億圓，跳到本年九月末之九十三億圓。這樣，政府就可以大量購買軍需品，維持市面；而軍需製造的急進，也可以使一部分失業工人，恢復了購買力。在這種“非常時”的購買力之下，日本物價不單是沒

有跌落，而且是相當的高漲；這就是所謂火藥氣味的“軍需繁榮”。

我們總還記得：在“九一八”事變以前，所謂“赤字預算”問題，在日本是十分嚴重的；好幾次的內閣，都因為預算不能平衡——赤字預算——而倒台。爲甚麼在“九一八”事變以後，這問題就平淡下去呢？這就是“非常時”的效力呀！本來，一個國家也同個人一樣在平時靠薪工度日，便應該量入爲出，而使預算能夠平衡；只有在開展新事業的時候，他才可以“堂而皇之”的舉債。一個國家的戰時預算，因此就不必平衡了，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大發公債了。因爲“戰時”兩個字太觸目，而日本這幾年來還只有幾次“不宜之戰”，所以就只好發明了“非常時”三個字來代替牠。日本在“非常時”的狀態之下用“大陸政策的推進”，來安定國內的人心，來掩蓋財政的危機。牠可以和牠的人民說：“只要大陸政策完成，九十三億圓的國債就可以讓四億五千萬的中國人來分担，你們不必害怕”！這就和一位事業家和他的銀行家說一樣：“只要我的金鑛開掘成功，本利可以立刻付還，請放心！”

果然，東北四省是不化什麼代價，就落到日本的手裏去了。事業家便可以用不化什麼成本而開採出來的一大塊黃金，向他的銀行家誇耀。這樣，日本在近四年來，預算是一天一天的膨脹，而政府的信用，却可以用大陸政策的局部成功，而支

持下去；同時，還可以大陸政策的“前途遠大”，來要求更多一些的軍事費。在這種狀況下，日本的財政膨脹，成爲“積重難返”，而日本的大陸政策，也成爲“騎虎難下”。如果牠停止了大陸政策，或者放棄了大陸政策，那就等於事業家宣告金鑛開採失敗，也就只好宣告破產。“生命線”三個字，就是這樣來解釋的。

從這兩個國家的前例看起來，我們可以得着一個結論：通貨膨脹非但不能消滅恐慌，而且要促成戰爭；也可以說通貨膨脹是戰時的幣制。英國壟斷殖民地市場的手段，雖然不是戰爭，然而無疑的要促進帝國主義間的矛盾，而造成新的殖民地分割戰爭。

現在歸到中國的幣制改革問題。——我們在膨脹通貨之後，用什麼手段來維持牠的力量呢？

我們不能抄英國的方案，因爲我們沒有殖民地；我們也不能抄日本的方案，因爲我們不是一個開金鑛的事業家，而是一個賣田地過日子的“破落戶”。但是，我們的元氣有沒有枯竭呢？並沒有，我們有豐厚的先天元氣，只是缺乏一種方藥去開發牠。我們不必壟斷殖民地市場，而只須收復國內的市場；我們也不必開闢新領土，而只須收復已失去的領土。“敗子回頭”，我們只須把已經失去的購買力，從敵人的手裏奪回來，就儘足維持通貨膨脹的力量。而且也只有這樣，才能取得幣制改

革的最後成功。

然而，流俗的經濟學者，又認為我們只須平衡國際收支，平衡預算，以及統一幣制，一切問題就都解決了。

是的，倘使這三種目的，都能安然的落到我們的手裏，至少目前我們可以“高枕無憂”。然而，這三種目的，都不可能在維持現狀之下，安然達到的。

如果我們要平衡國際收支，第一步自然就要從減少貿易入超着手，因此有些人便主張管理匯兌，藉以統制貿易。但是，我個人覺得，帝國主義爲了爭取中國的貨幣權，可以幫助中國改革幣制，爲了資本的輸出，可以借款給中國；但是決不能任聽中國管理匯兌，甚至統制貿易。半殖民地的貿易如果都要求平衡，牠們的過剩商品又向何處傾銷呢？

說到預算的平衡，我們應該認明：在減少入超的條件之下，原有的主要稅源——關稅——是要減收的。新稅源的開發，主要自然逃不出遺產稅和所得稅。但是，在外人可以代中國出面管理財產的現況之下，遺產的大本營上海就不可能推行有效的稅則。在外商產業不受中國法令節制的現況之下，所得稅就不能苦樂不均的只施行於華商產業。所得稅放棄了主要的來源——產業利潤，而只向薪工階級徵取，那是沒有多大出息的。

再說到幣制統一，我們現在所看見的，還只有捐出中央

“白銀國有”的招牌，以推行封建割据的“省法幣”，那就更不易談了。

這樣，中國在帝國主義勢力重重的束縛之下，在封建勢力的塊塊割据之下，能談得到平衡國際收支，平衡預算，以至統一幣制嗎？

因此我們不得不主張：目下幣制改革的力量，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國策去維持牠；而這個國策，必然是革命的，而不是和平妥洽的。這是“敗子回頭”的唯一做法；也只有這樣才能開發潛伏中的元氣，使一注強心針能有可以寶貴的效力。

二四，一一，九。（‘大眾生活’一卷一期）

中國跌進英鎊集團以後

錢 俊 瑞

著者在“中國貨幣制度往那裏去？”那本小冊子裏，早就估量，“羅斯爵士跟中國當局的接洽如果得到相當的成功，那末華北至華南恐怕又會聽到日本的炮聲”，同時美國也必然會“待時而動”的（該書頁七八—八〇）。

果然，十一月四日中國實行新幣制了，同時做照美國的辦法，宣佈白銀國有，一面將一元法幣的匯價，定為一先令兩便士半，這無形間就把中國的貨幣聯繫到英鎊上去。所以，假使我們認為新幣制的實施，是一種“劃時代的”勝利的話，那末我們應當在中英兩國國旗交叉之下來慶祝它的。至於倫敦方面和羅斯爵士屢次聲明，英方對於此次幣制改革並無關係，那只能教我們格外欽佩他們“功成不居”的美德，和圓滑沈着的外交技藝罷了。

國內有些經濟學家頗藐視帝國主義列強奪取貨幣權的問題。他們認為幣制改革只是一個技術問題，至多也只跟市場問

題有關；至於它跟英鎊，美元和法郎會發生什麼關係，他們認為是無足輕重的。甚至還有些樸素的專家，他們以為此次政府規定紙幣為法幣，“亦僅與歐戰及各國之習慣相似，不必對任何外幣發生特殊之關係”（如劉大鈞先生）。

是的，中國如果夠得上稱做“中國帝國主義”，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跟歐美資本主義列強並駕齊驅，那末我們的貨幣改革，我們的“通貨管理政策”，都能夠自由自在，至多只跟外幣發生一定的技術上的聯繫，並沒有什麼特殊的關係。無奈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中國的咽喉是緊握在帝國主義手裏；同時國內割據的情勢，還依然存在。在這些條件之下，我們能“自力更生”，不借用外力，實行“管理通貨”嗎？那是絕對不能的。為什麼？因為要實行通貨管理，第一要有統一的主權和局面；第二要有豐富的資金。沒有統一的主權，外商銀行和列強經濟和政治的勢力，顯然是在中國政府的統制之外；所有對外貿易，金融和工商業，中國自身都沒有加以統馭的可能。沒有統一的局面，各地的貨幣流通以及工商各業都無從統制。同時，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外受列強的束縛，內有各地勢力的割裂，所以資金便無從集中。既沒有豐富的資金，則法幣的匯價，就很難穩定起來。

主權不統一，局面又是割裂，同時全國的現銀又無從集中，在這情形之下，我們要“自主的”維持法幣的價格，是絕對

不可能的。所以，唯一可能的辦法，只有在世界貨幣中間，在國際政局所容許的條件之下，選擇一種比較最為適當的貨幣，跟它結成一定的聯繫；同時再靠借款和“精神的援助”使幣價得到相當的穩定。

中國在實行新幣制的時候，它所選擇的貨幣便是英鎊；因此，儘管“在發表新幣制政策之後，中央銀行曾維持對英美法日各國一種預定之匯價”（劉大鈞先生語），可是它跟英鎊的聯繫確乎特別密切，它以一先令兩便士半做它標準的匯價。因此，中國在事實上已經可以說是英鎊集團的一員了。

實際說來，一國的貨幣跟別國的貨幣發生固定的聯繫，本來不是怎樣可怕的事情。比方，日本的貨幣，年來差不多是用每日金一圓等於一先令兩便士的匯價和英鎊聯繫；日本在事實上可以說是屬於英鎊集團。然而日本却並不因為跟英鎊聯繫而受累，恰恰相反，日本却在對它自己最有利的條件之下，利用跟英鎊的聯繫，匯價亦保持自由升降的可能。中國的情形怎樣呢？日本是一個征服者，而中國是一個被征服者；日本有相當雄厚的金融資本，中國的銀行資本只是列強資本的附庸；日本有在世界市場上橫衝直撞的商品，而中國的工業却幼弱得可憐；最後，日本有從事對外侵略的軍備；而中國的軍備在對外的關係上，只夠做“不抵抗主義”的礎石。所以中國的貨幣加入了英鎊集團，儘管沒有條約和法令的拘束，它一定不能自

由自在；相反的，中國在財政和金融上，一定要受英國方面相當的統制。

不消說得，中國跌進英鎊的懷裏是有嚴重的國際意義的。帝國主義列強的資本家和學者決不像中國學者那樣“樸素”，他們早已看到，中國改革幣制，就是使中國加入英鎊集團，英國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以後就有加強控制的可能。同時，如果英國真個貸款給中國，那末這種可能也就愈大。

我們先說日本怎樣對付這個局面。

我們知道，中國實行新幣制後最大的成績，就是在財政上得到很大的幫助。對外借款不必說了，增發紙幣就是彌補財庫不足的妙法；同時集中現銀，把它高價出賣，也是肥沃的收入來源。在這裏，我們一面可以看到中國政府跟英國的關係密切；這一點跟日本獨佔中國的大陸政策處於正面衝突的地位。另一方面，中國中央政府財政基礎的鞏固，就使中央對於地方政治集團的控制加強；換句話說，中央財政的穩固相當地可以促進中國統一的局面。然而，這一點也是日本所最畏忌的。誰都知道，日本要實現其獨吞中國的計劃，它是採取分離主義的策略的，它要竭力慫恿各地的當局造成獨立和半獨立的局面，以對抗南京，它在這裏，就用個別擊破的辦法，得到最大限度的漁人之利。因此，它看到南京權力對於各地當局相對的增強，特別是看到這種力量的增強，是受了它敵人的接濟，它就

老大的不滿。

所以，日本一看到中國實行新幣制，就動手反對了。它一面怪怨英國的“不信行爲”，一面指責中國依然“以夷制夷”。在實際行動上，日本的銀行首先就反對把現銀移交中國銀行；同時日本浪人就在上海廈門廣州等處拚命用高價收買白銀偷運出境。另一方面，指使華北當局截留現銀，不准南運；迫得中國當局只好在平津濟南青島，破格設立現銀準備分庫。

這樣還不夠，日本就藉口華北人民反對白銀國有，擴大自治運動，促成華北“準獨立”的自治政權，實際佔領華北五省。在貨幣方面，它在華北積極設法排擠中國的法幣（冀東各縣已經禁用法幣；在華北其他各地法幣亦跌價），同時更進一步用朝鮮銀行的鈔票在華北通行。這樣，華北將來的貨幣也就不見得會跟英鎊聯繫，而將變成日圓的俘虜吧。

日本是並不以奪取華北的貨幣權滿足的。據東京傳來的消息，日本很想利用中國力求日方對新幣制諒解，同時因銀價慘跌，願請日方幫忙的好機會，向中國建議建立金銀複準備的匯兌本位制，以英鎊為中心，把日本中國和滿洲偽國的幣制互相聯繫起來。日本這種計劃能不能如願實現，固然是很大的疑問，然而日本處心積慮，要使中國脫離英國的影響，走進它自己的懷裏，那是很顯然的。你看，日本最近不是又在上海發行日本紙幣嗎？他們表面上說是只限於日僑使用；實際上却想

把日圓勢力，擴充到中國金融市場的中心——上海，來擾亂中國的幣制，僭奪中國的貨幣權呀！

× × × ×

如果日本是用飛機大炮和利用漢奸的辦法，想使已經跌入英鎊懷裏的中國，脫離英國控制的話，那末美國便正在用它雄厚無比的資本，想把中國從英鎊集團重新拉回自己的身邊了。

誰都知道，英鎊美元的衝突，是目前國際貨幣戰爭中的主力戰。在一九三三年，鎊元的廝殺，美元佔了相當的優勢，到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情形巧恰相反，鎊價的拚命跌落，英鎊集團的不斷擴大，使英鎊的力量，遠駕美元之上。英鎊和美元最近爭奪的對象，在西方，是金集團諸國，在東方便是中國。美元在法比荷蘭等金集團國家對於英鎊的側面戰，固然也很激烈，可是“近水樓台”的英國畢竟佔了上風，比利時早於今年春季，放棄金本位，加入英鎊集團了，金集團“搖曳欲墜”的暮景，就是英鎊勝利的象徵。美國那裏能夠保證，金集團各國放棄金本位，會跟美元發生聯繫呢。

因此，美元和英鎊之戰，還要在中國決定它們最後的勝負。同時，美元在中國也似乎比較的有些把握。一九三四年，美國厲行白銀政策，其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要想在銀價提高到適當程度的時候，把銀價穩定下來，這樣把中國的銀元，由白

銀做個媒介，聯結到美元上去。所以它不惜國內一部份資本家的反對，不惜喪失中國全部的同情，拚命提高銀價，使中國經濟，陷入空前的危機。

可是，乖巧的英國金融資本，却盡量利用了美國在華造成的情勢，第一步以退為進，由英商銀行把白銀大批運出中國境界，加甚中國的破產；第二步，就來“幫助”中國，如提議國際借款呀，舉行貨幣會議呀，條陳救濟上海金融計劃呀（沙遜爵士），進行單獨借款呀，這樣，就把中國的貨幣權，輕輕地奪到自己手裏。

這樣，你說美國肯甘心讓英國安安穩穩把中國放在懷裏嗎？自然是不會的。那麼怎樣辦呢？

美國的政策自然要看國際一般的情勢來決定。當中國幣制一經改革之後，日本在華北的進攻格外急進，同時海軍會議又要開會，所以美國在那時確乎要想取得和英國相當的一致，共同對付日本。當時英國也有這樣的表示。所以美國在對意制裁問題上，就積極支持英國，同時對於使它“心痛”的中國幣制改革，也抱緘默的態度了。

後來日本在華北的活動變本加厲，英國在遠東也並沒有較強的政策；同時英國在海軍會議上也表示出“騎牆”的態度。美國明知要跟英國合作，本來比“上青天”還難，同時中國貨幣權的問題又是鎊元之爭的最後關鍵。所以美國政府便向英國

作一個猛烈的反攻，一方面威脅英國，使它在國際談判中表露更明顯的態度；另一方面要想從英國手裏把中國貨幣權拉回自己身邊。

在中國新幣制實行了一個多月以後的十二月九日，倫敦的白銀價格忽然慘跌，十一日起跌風尤甚，倫敦銀市場竟弄到不能決定市價。在十二月九日以前銀價徘徊於二十九便士八分之三左右；到十四日倫敦期貨交易絕跡，現貨銀塊價格跌到二十六便士十六分之七；以後還繼續跌落。銀價這樣跌落，原因是美國停止在倫敦購銀。我們知道，美國一面是白銀最大的生產者，同時又是白銀最大的購買者。美國如果停止購銀，那末銀價的慘落，自在意料之中；何況，中國目前已經不能吸收白銀，反而還要向世界市場拋售大批白銀呢。

在這裏，美國的資本家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他們知道，英國協助中國改革幣制以後，中國已經加入英鎊集團；同時英國正在繼續幫助中國，出售白銀，購進黃金和外匯，作為穩定華幣匯價的基金。他們明知中國新幣制的成敗關鍵，就在匯兌基金的足夠不足夠；同時，他們又知道，那一方面能夠控制中國這筆匯兌基金，那麼那一方面就握有中國幣制的最高支配權。

所以美國財部停止在倫敦購銀，使銀價慘落，首先使中國政府受到重大打擊。中國政府要高價出售白銀，可是價既不高，顧主也找不到；這對中國匯價的穩定和政府的收入，都是

嚴重的威脅。所以美國主張提高銀價最烈的銀派巨頭湯姆士也要坦白的說，“美國停止購銀，確為正常辦法；吾人何必幫助英國，以解決中國難題，致有益於英國，有損於美國？”

美國停止購銀，是在使“中國難題”更難，表示它不願使英國受益，使美國受損；然而這樣還是不夠的，它一定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英國可以利用美國在中國所造成的難局，完成“有益於英國，有損於美國”的貨幣改革；難道它又不能利用英國所造成的已成局面，取得中國新幣制的控制權嗎。

美國政府是這樣幹的。它一方面在倫敦停止購銀，同時聲明它並沒有變更購銀政策，不過不在倫敦購進，而在別的市場上收買吧了。我們上面說過，美國是目前白銀最大的顧主，它不在倫敦，而在別處大批購進白銀，那末國際白銀市場中心就從倫敦移到別的地方；也就是說，倫敦此後便失去了左右銀價的力量。照目前情勢觀察，世界銀市的統制權已經移歸紐約資本家手裏去了。

事實告訴我們，美國政府並沒有停止購銀；它在孟買，在蒙特里，特別從中國，正在購進大批的白銀。據路透社二十五日倫敦電訊，紐約大通銀行和花旗銀行已經代替美國政府向中國政府購進白銀五千萬盎司；同時說明用外匯維持中國貨幣。同時據國內的消息，中國政府已將一二千萬盎司白銀，由林肯號輪船運赴美國；到一九三五年年底中國政府運往美國

的白銀據說已達七千五百萬元之多。

美國爲什麼要直接向中國購買白銀？美國爲什麼又願意用外匯來維持中國的貨幣？這裏的關鍵，就在這時已經不是美國“幫助英國，解決中國難題”；而是美國幫助自己“解決中國難題，致有損於英國，有益於美國”了。同時，據華盛頓方面的消息，中國跟美國正在進行締結銀價協定的談判，而且美國方面認爲最近中國政府將大批白銀售與美國，就是此種協定可能締結的表示。另一方面，據路透社電訊，參議員湯姆士謂：“美國應先聯合墨西哥，加拿大及南美各產銀國，然後再聯合遠東用銀國，以期與管理的貨幣集團（即指英鎊集團）相抗爭”。同時美國政府又準備召開世界白銀會議。

美國就想這樣利用牠對於銀價的壟斷，來把中國拉出英鎊集團。

中美白銀協定的透視

錢 俊 瑞

我在‘世界知識’第三卷第九號所載中國跌進英鎊集團以後那篇短文裏，曾經指出“美國想利用牠對於銀價的壟斷，來把中國拉出英鎊集團”。在當時，華盛頓方面也盛傳中美兩國正在進行締結銀價協定的談判，而且美國方面認為中國政府願把大批白銀售與美國，就是此種協定可能締結的一種表示。

到現在，一切都變成了事實。金圓王國在對華貨幣權和財政權的爭霸上，已經很巧妙地運用牠在貨幣戰上的戰略工具——白銀，轉敗為勝，同時英美間的貨幣戰爭又跨進一個新的更尖銳的階段。

目前英美兩國貨幣戰進行主力戰的場面，一個是在法國和其他金集團國家，一個就是我們中國。法郎的搖曳不定以及一切金集團國家的狼狽，都將便宜了英國，因為牠們如果一旦放棄金本位，牠們無疑的會走進英鎊的懷裏去。因此在歐洲的

戰場上，英鎊是佔有不可侮的優勢的。去年春季比利時一放棄金本位，馬上加入了英鎊集團，這不是很明顯的例子嗎？

然而在另一個戰場——中國，情形就大不相同。不錯，英國在遠東有雄厚的金融勢力，牠在中國的金融市場具有巨大的傳統勢力。當一九三四年美國厲行白銀政策，要想把中國的貨幣聯結到美元上去的時候，英國的金融資本，曾經運用“誘敵深入”“以退爲進”的戰略，一舉手間把中國雪白的銀元，變成輕飄的法幣，而且安穩穩放進英鎊的懷裏。然而在這裏，美國的金融資本却絕對不甘讓步，而且也不能讓步。牠在這裏可以使用牠最有力的武器，跟狡猾的英鎊相周旋。這柄武器就是白銀。誰都知道，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銀生產者，同時又是白銀最大的主顧，世界白銀的市場完全操在美國金融資本手裏。美國金融資本目前最怕的是，白銀成爲廢物，所以牠最不願意人家放棄銀本位；即使人家已經放棄銀本位了，牠還得百般想法，不是勉強人家恢復銀本位，就是勸誘人家採用金銀複本位。因爲只有這樣，才可以使白銀保持牠原來的價格，而美國資本家就能操縱自如，使白銀成爲貨幣戰上一種有力的武器。

美國金融資本就把幾千年來習慣用銀的中國，當作牠的用武之地。牠用牠犀利的武器在中國金融市場上，殺進又殺出。一九三四年牠運用牠的白銀政策，使中國的金融財政遭受

到空前的災禍，結果雖然是“功敗垂成”，中國的貨幣權竟給乖巧的英國半途襲劫了去，可是中國國民經濟和國家財政，已給美國那柄武器，殺得個“落花流水”。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日，中國就在英國金融資本的扶持之下，實行新幣制了，法幣的匯率是一先令兩便士半，這和五年來中英匯率平均數完全吻合，而中美的匯率却較五年來平均匯率放長一成，日匯放長二成以上。這一點“足證政府施行新政策之時，即有與英國貨幣聯繫之意”（見馬寅初“中國新金融政策與銀價跌落之關係”，大美晚報本年五月二十一日）。英國金融資本為幫助中國穩定匯價起見，就慫恿中國在倫敦出賣白銀，購進黃金，作為穩定法幣匯價的資金。

美國眼明手快，牠看清這點，便又用起牠的武器，向倫敦銀市場出其不意地襲擊。去年十二月九日倫敦的白銀價格忽然慘跌，原因就是美國停止在倫敦購銀。當時銀派議員湯姆士曾這樣說：“美國停止購銀，確為正常辦法；吾人何必幫助英國，以解決中國難題，致有益於英國，有損於美國”。實際上湯姆士還沒有坦白到把他們的戰略完全宣佈的程度。以後的事實告訴我們，美國並沒有停止購銀，牠不過不向倫敦購進，而主要的在紐約市場上大批購進吧了。這樣，世界銀市，就無形中移到紐約。據美財長莫根索最近報告，一九三五年美國向中國所購白銀，計有兩批，一批為一千九百萬盎司，一批為五千

萬盎斯。據當時可靠的消息，第二批五千萬盎斯，就是由紐約大通銀行和花旗銀行代替美國政府收購，同時說明用外匯維持中國貨幣。在這裏我們清清楚楚看到，美國資本家並不想要破壞由英國紳士一手造成的中國新幣制，牠所企圖的，不過是利用英國造成的已成局面，把新幣制的控制權操到牠自己手裏去罷了。

這戰略自然是聰明的。華爾街的主人們明明知道：中國新幣制的成敗關鍵，就在一筆匯兌基金上面。匯兌基金夠，法幣的匯價，就穩定，新幣制就能繼續維持；匯兌基金不夠，法幣的信用就根本動搖，新幣制就得塌台，而中國國民經濟就要更快的崩壞。所以，誰能控制中國的匯兌基金，那末誰就能奪取中國貨幣和財政的支配權。

倫敦的紳士們當然也不是傻瓜，他們在先前曾經乖巧到會“乘人之弱”，半途把助成中國新幣制的掛冠戴到自己頭上，難道他們會讓他們的“敵人”，來把自己佔來的便宜，平平穩穩奪回去嗎？那當然是不會的。要不然，李滋羅斯爵士早就應該凱旋回鄉，向“江東父老”報功，不再“遲遲其行”，奔走於華北華南之間了。英國的金融資本雖然一再替中國的新幣制歌功頌德，然而牠明知問題並沒有澈底解決。日本的指揮刀勒令華北當局不准將白銀南運，固然使英國感到頭痛；而去年十二月間美國的退出倫敦白銀市場，更使英國紳士“焦頭爛額”。他們

關於中國問題在指揮刀上固然目前敵不住日本；同樣的在以白銀為最有效的武器的遠東貨幣戰上，英國顯然也敵不過美國。英國紳士們“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是可佩的，他們明知事實上有重重困難，可是他們對中國的借款還要磋商。不消說，英國紳士對於中國借款的担保始終是疑懼的，特別到最近，中國除了“無用”的白銀以外，其餘關稅鹽稅以及一切其它的担保，都天天在日本指揮刀的威脅之下。說到白銀，英國也沒有這樣的胃口，可能把它作為有力的担保，因為銀價的漲落，權在美國手裏，因此中英借款至今未能成立。所以，英國對於中國新幣制的保證，也只能“口惠而實不至”。

中國幣制的穩定，是不能單靠口惠的。中國法幣的匯價如果不能穩定，那鬧出的亂子一定非常之大。比方最近倫敦銀價大大跌落，標準銀每盎斯只賣十九便士，法幣純銀按倫敦銀價計算，不久恐怕就要不到法定匯價之數。在這種情形之下，要勉強維持法定的匯率的确是非常困難，假定法定匯價不能維持，那麼人民對於法幣的信用，將一掃而光；資本向外的逃亡一定更加厲害，銀行存戶一定紛紛前往提款，結果市面弄得異常緊急，資金的流通差不多完全窒息，工商業將更多的倒閉，於是一個更嚴重的恐慌就會到來。財政的危機更不消說了。

所以中國當局在這一方面是不能不想個實實在在的辦法。去年年底盛傳中美舉行銀價談判，大概並不是個事實，然

而我們由此可以知道，中國當局是會投到美國的懷裏去想辦法的。這一次以陳光甫為領袖的中國銀行團跟美財長的談判，就是負着這個使命去的。現在中美白銀協定已經成立了。五月十四日華盛頓傳出的消息，說是中美協定“規定美國財部應向中國購買白銀五千萬盎司，每盎司以美金五角作價，俾以賣價所得，而在匯兌市場上維護中國貨幣現行價格”。十八日美財長莫根索正式發表協定內容，他覺得上述消息太過具體，他只說，“中美兩國已成立協定，美國即將開始購買大批華銀。購買之宗旨，在於協助中國政府之新幣制政策，並履行一九三四年美國國會所通過之購銀法”。同時說明“購買華銀之款項，將以現金或美元交付，至於購買之數量，則守祕密”。當時又傳稱中美兩國已成立二千五百萬美元的借款協定，這大概不是事實。所謂借款，大概就是華方出售白銀，美方提供美元或現金之誤。這種美元或現金，可能用一種信用的形式表現出來，這正如耿愛德君所說“這種信用是用存銀獲得，必待中國貨幣受打擊時才利用它”。中國在必要的時候，可以透支一筆美金，來維持匯價。

這樣，從美國說來。中國貨幣的匯價已經在牠掌握之中。牠在勝利之餘，認為“該項協定足以協助國際通貨穩定之成功，以後並準備與他國採取穩定通貨之同樣行動”。（莫根索語）同時中國担任重新鼓鑄銀幣，修正銀製品管理規則（將

所含銀量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的規定取銷)，這正像耿愛德君所說，是“要博得美國銀派議員的歡心”。美國資本家看出中國一時要恢復銀本位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他們就將計就計，以金換銀，同時保留銀幣在中國市場上的流通。以實現他們“寤寐求之”的複本位制，確立他們對中國幣制最堅定的霸權。

美國還有一件事情留下來沒有做完，那就是中國匯率的改訂。目前的匯率是有利於英，而有損於美的。過去牠無可如何，現在牠可能主動地把牠改訂。中美白銀協定締結以後，雙方還在做商務和投資談判，這些談判也許就是把匯率問題解決，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完成莫根索“促進中美貿易”的諾言。

中國政府在得到這樣一個實實在在的辦法之後，就於五月十七日晚發表宣言，規定幣制新辦法，規定法幣“現金準備部份，仍(?)以金銀及外匯充之，而白銀準備最低限度應佔發行總額百分之二十五”。同時規定鑄造一元半元的銀幣。在這裏我們要注意兩點：

第一，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孔財長曾經宣稱“法幣準備額仍照舊例為現銀六成，保證四成”。而最近忽將現金準備部份改由金銀及外匯充之，白銀減到百分之二十五而準備金總額，並未規定一定比例。根據孔財長所著‘新貨幣政策與經濟復興’一文，通貨膨脹必具有三種條件之一，其二為減低發行準備

比例，那麼通貨膨脹，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事了吧。

第二，這次政府規定鑄造一元半元的銀幣。根據十八日陳光甫在華盛頓的談話：“將來開鑄新幣，所用白銀成份將使於銀價劇變之時，不致有融化運出之虞”，意思就是要減低白銀成色。而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孔財長聲明“中央造幣廠仍繼續鼓鑄銀本位幣，其成色重量，亦未減低”，以證明新幣制不合他所說的通貨膨脹第三個條件減低硬幣所含成色與重量。誰都不能否認，中國法幣跟銀價還保持密切的關係，那麼此次鼓鑄新幣，減低白銀成色，一定要影響到幣價是無疑的。

實在說吧，中國通貨的膨脹不膨脹，並不要拘泥於上面那些技術的條件。中國財政的困難已是誰都知道的事，如果美國能夠替中國法幣維持一定匯價，那麼中國政府大發紙幣，以補苴其財政，當然非但是可能，而且是必然的。

現在，美國在中國的貨幣戰場上又是勝利了。英國是有苦說不出，牠慫恿了中國建立新幣制，現在別人想法來鞏固那種新幣制，因此倫敦金融家表面只能表示“滿意”。可是據東京傳來的消息，英國敵視中國加入美元集團，將盡舉印度藏金流放出來，使銀價暴落，破壞中國的幣制。此說是否可靠，且不必問，而英國紳士的納悶，却是無疑的。牠之想及時反攻，也是無疑的。日本則在“嚴重監視”之中，牠正在用武裝走私等海盜行為破壞中國的財政，蹂躪中國的經濟。

我們中國人民目前最重要的問題，不在美元和英鎊的誰勝誰敗，也不是英國紳士將如何報復。帝國主義者都要宰割中國人民是沒有問題的。我們今天所要求的是怎樣把美元對中國貨幣的勝利，不只使牠荼毒我民衆，而要更進一步運用牠來打擊我們最大的敵人。到那時，通貨膨脹固然不是好辦法，然而比起在目前狀況下厲行通貨膨脹，那情形就要好過千萬倍了。

中美會談與新幣制的前途

駱耕漠

最近半月來，國內人士對於新幣制的前途又重新注意起來了；這主要因為海外各通訊社批露了中國銀行董事兼上海銀行總理陳光甫氏領導中國銀行團，迭次與美財長毛根韜會談的消息，同時他們的話題又集中在中國新幣制改革的緣故。據美財長表示，這次的會談將繼續十日乃至兩週之久，這確是中美外交史上不很多見的一頁。其實，在陳光甫氏未啓程赴美之前，上海的日文報紙，已經大加評論，不過一般人還不曾十分注意罷了。現在只要是平時略微關心國內外的政治經濟的人們，心裏差不多都徘徊着這樣一個問題，就是陳光甫氏為什麼要到美國呢？

這樣的提出問題是十分必要的，因為這次陳光甫氏及其同伴的赴美，決不是如官場所傳，是單純地爲了考察一般的銀行業務或是單純地爲了籌設中國銀行的紐約分行，而是反映着中國新幣制的一種演變，對於新幣制的前途是很有左右的

力量。固然，國外傳來的電訊，也有明說中美這次的會談是爲了“交換中美兩國關於貨幣政策之意見，擬商定兩國間關於財政問題之更密切的辦法”，但其究竟還是吞吐不明。現在我們就想把這“吞吐不明”的弄個明白！

我們認爲，要了解中美這次會談究竟爲了什麼，它對於中國的新幣制又可能發生怎樣一種影響，有兩點是必須記住的：一點是中國新幣制本身的主要關鍵在如何穩定外匯，還有一點是這個外匯穩定問題直到現在還是不曾解決。爲了容易明白起見，我們再把這兩點先來解釋一下。

我們曉得，一個國家到了財政收支不能平衡，而走上發行不兌現紙幣和通貨膨脹的道路上去的時候，外匯是必需維持的。因爲對內在某種限度內，政府可以借用政治力量，強使人民接受濫發出去的實際價值一天減少一天的不兌現紙幣，藉以取得民間的糧食和貨物。但是對外，政府却不能如法泡製了，因爲別國不會接受你的不兌現紙幣；你假使不能使國內的不兌現幣對外兌現（即購得一定量的外幣，亦即維持外匯），那末它就要和你斷絕貿易和借貸的關係，而這却是現代國家所經受不下的。同時，這樣一來，那種不兌現紙幣在國內的流通性也要大受障礙。中國自去年十一月以後，實際上已經因爲財庫貧乏，開始走上通貨膨脹的險徑了，財部說明書中的“新貨幣制度絕非放棄銀本位，絕非通貨膨脹”的辯白，到現在就是

宋子文馬寅初諸公，差不多也要說它是一種強辯了。所以新幣制無疑地有穩定外匯的必要。這就是說，假使政府不設法使不兌現的新法幣對外能夠購得一定量的外幣，以清理國際間的收支（因為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每年總有巨額入超，需要平衡）。那末，必然要在內外的擯棄之下，不能推行下去；因此我們說：新幣制本身的主要關鍵，在如何穩定外匯。

但是這樣迫待解決的外匯穩定問題，直到現在還是不曾解決。因為要使不兌現的新法幣購得一定量的外幣，政府就非有充分的生金生銀不可，不然，它拿什麼去換得外幣呢？然而南京財庫所缺乏的又正是生金和生銀。有些人以為過去數月，英匯總在十四便士半左右，美匯總二十九元半左右，就是外匯穩定問題已經得到解決的反映，其實這種看法是太膚淺，太短視了！固然，我們並不否認過去數月的外匯，確是穩定一些；但是這種穩定是非常暫時的：第一、因為過去數月，政府用來應付外匯的一部份的白銀餘利（即政府運銀出口，藉匯價低於海外銀價而賺得的餘利），是很有限的，它斷難應付累年的三四萬萬元的入超，而且過去以出售白銀來換取外幣或黃金，還是受着白銀大顯主美國的支配。第二、因為過去數月的穩定，主要是建築在英國的“維護”之上，但是直到現在為止，它的“維護”還是輿論方面的成份多，所謂英鎊大借款（這是目下的中國穩定外匯所迫切需要的），縱在日益具體化，但迄今仍未成

功，因此這種“維護”實在不能保證以後的歲月能和過去的時日一樣；第三、因為新法幣雖然出現了，但是英美在華的貨幣爭霸戰依然未了，金元帝國早已開始新的反攻，而外匯的控制恰巧又是它們的集矢之的。所以我們說：外匯穩定，問題直到現在還是不曾解決。

說明了前面兩點以後，我們就可懂得陳光甫氏及其同伴爲什麼要到美國，因為他們近數日來忙於和美財長磋商的，就是如何設法在美國的協助之下，來解決新幣制所迫待解決而又不曾解決的外匯問題；具體的說，不外兩點：一點是和美國這位大顧主談判如何繼續出賣大批的白銀，還有一點是向美國商量借一筆大債，而這兩點都是朝着一個目標，即求得比較充實的作爲穩定外匯之用的外幣準備或黃金準備。

× × × ×

那麼南京財部的代表們爲什麼不向滯留在中國的羅斯爵士繼續求援，或者少費一點精力，跟在吳鼎昌氏之後，到附近的日本去跑一趟呢？

從前面，我們已經曉得：要穩定中國新法幣的對外匯兌，不是日本軍部的槍桿，或是英國的紳士態度所能濟事，而必需要大量的生金和生銀。日本在太平洋上只有武力，同時它本身又正在鬧着財政危機，金融資本家沒有餘力，而且也不放心對華放款。至於英國，雖然老大，但究竟與日本不同，對華放款的

金融力量是有的，而且也有放款的準備，譬如它過去策動並維護中國的新幣制，就是一個先例；但是第一因為中國財政既已到了膨脹通貨的境地，未來的債信是很成問題的，第二因為日本這個老盟友那樣不易就範，而巨敵的金元帝國又在金融戰野上向它一再反攻，未來中國究竟落在誰手，也難定奪，所以它雖向前進了，終於又遲疑下來。然而中國的財政當局，爲了經濟的緊迫，却不能作從容的等待了，因此陳光甫氏就跑向美國去了。

美國確是有錢地方，它的金融勢力的確比英國還大，而且還始終有情於中國的貨幣權；這可從它積極勵行白銀政策一點上看出，同時去年十二月十日它突然停止向倫敦購銀，也能反映出它的金融勢力如何偉大，它如何不甘於讓中國的貨幣權落在英國之手。現在我們要把這件事重新提出來，幫助大家了解陳光甫氏爲什麼要不辭勞瘁地跑到遠遠的美國去。

自從去年下半年羅斯爵士繞道日本來到中國，接着新貨幣制度又在他的策劃之下推薦出來以後，金元帝國確是萬分難過，因在它自己苦苦推行白銀政策，結果徒然替英國造機會，所以繼續對英反攻，自然是它的重要課題了。後來它看到英國支持中國新法幣的外匯的方法，除了在輿論上給以慷慨的幫助之外，主要就不過替中國向倫敦白銀市場拋售存銀，以換取黃金或外幣，作爲一時的外匯基金而已。因此它就趁機於

去年十二月十日停止向倫敦購買白銀，使銀價繼續下跌，譬如十日以前，每盎斯為二十九便士餘，至十六日即跌為二十六便士，再下去便是十九便士至二十便士，結果英國的如意算盤就遭受莫大的打擊。關於美國這種反攻，當時國民社華盛頓曾有一個很好的電訊從華盛頓傳出，它說：

“國會銀派領袖，今日對於財部之使倫敦銀市陷於停頓，頗為稱讚，因此舉表示美國已控制世界基本錢幣之資源，並間接表示美國政治勢力對於遠東之重要。據接近畢德門調查委員會之某方稱，財部此次之策略，已表示美國稍有舉動，則無論金銀本位或管理通貨之國家，皆將受其影響。參議員湯默斯之意見亦與此略同，彼以為英國雖已吸引不少國家(中國亦已在內——作者按)，成為金鎊集團，然美仍能控制世界幣制……”。

倫敦的金融新聞當時也稱“美國欲強迫中國恢復銀本位，美國力能強迫中政府為之，如美國不向中國政府購銀，即可破壞中政府新近採行之貨幣改革計劃，蓋中政府將不能以新價維護其國幣也(意即新法幣之外匯——作者按)”。所以中國政府在羅斯爵士不能積極撮合中英大借款，以切實“維護”新法幣的外匯的條件之下，必然還要去懇求力能“控制世界基本錢幣之資源”的美國，給於更切實的幫助。現在我們又可明白：為什麼中國政府一面留住羅斯爵士，一面和日使有田一再密談，

同時又派遣金融巨子陳光甫遠渡重洋，去拜訪美國紐約的原委了。

X X X X

最後我們要來探討一下，這次的美中談話將可能發生怎樣一種影響，它的發展前途又將如何。

我們曉得，美國去年十二月停止向倫敦購買白銀，其目的並不在“不向中國政府購銀，以破壞中政府新近採行之貨幣改革計劃”，不過要想使已被金鎊集團“吸引”去的中國新法幣，更直接地“受其影響”，換言之，它一方面要使英國認識它在遠東和世界上的金融勢力，另一方面要使中國改弦易轍，參加美元集團中去。本年二月間，它直接向中國政府購進白銀五千萬盎斯，就是一個很好的反證。其中還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成交價格為六角五分，遠在當時紐約一般銀價之上（去年十二月紐約銀市跌為五角八分，一月以後，更跌至四角五分上下），二是換得的美元大半都“暫存紐約各銀行”（詳細請參看二月十三日國民社華盛頓電）。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美國變格收買中國存銀，無非要把中國的新幣制搶回自己的腰包中去，因為中國的存銀變為“暫存紐約各銀行”的美元以後，則美元的漲落對於中國整個的外匯市場，都會具有支配的力量了。這次美財長不怕麻煩地願意和中國銀行家續談十日或二週之久，一半也就是為了白銀的換元（自然是美元）運動。我們且看下面

的電訊吧：

“華盛頓八日國民社電：財長毛根韜今日與中國銀行界代表陳光甫等繼續談話，若干參議員表示，中國以後或可多用白銀，銀派領袖湯默斯謂：毛財長於邀請中國代表團來美以前，已與墨西哥及加拿大談判白銀協定。墨加二國及中國實與美國為天然之幣制聯盟，因四國皆用白銀，倘能結成集團，則對於世界重用白銀一事，將非常有利。彼以為中國仍欲恢復銀根本位云。其他消息靈通方面聲稱，美國之邀請中國代表團，第一係欲使華元與美金發生密切之關係，第二係欲不費美國金錢；而協助中國穩定通貨。最近美國購買墨西哥新出土之生銀，亦為惠而不費之協助。此間若干方面推測，美國或將向中國購買大批現銀。……”（四月十日上海‘大公報’）

我們應該注意，這段消息在同日的申報上是用非常重要的地位登載，同時編輯先生也以扼要的辭句將其內容標出，可是消息本身却不翼而飛了，這可說是中國新聞界的“奇蹟”！好奇的人，不妨將該日申報研究一下。這段消息所以不見，當然不是由於手民之誤，而是因為它告訴我們說：“美國之邀請中國代表團，第一係欲使華元與美金發生密切之關係，第二係欲不費美國之金錢，而協助中國穩定通貨”，以及“美國或將向中國購買大批現銀”。現在，照現有的海外電訊看來，美國大概會

接受陳光甫氏的第一個要求，即繼續收買中國的白銀，因為這可‘不費美國之金錢’而將中國驅入美元集團中去。

至於陳氏赴美的第二個目的，即向美國借得一大筆債款，究竟能否同時成功，則很難說。據法國經濟金融通訊社駐紐約訪員探詢所得，說這次中美會談之後，中美英三國之間已成立協定，即“美國繼續向中國購買白銀”，“英國則施以款項貸予中國”，以“維護中國幣制”（詳見四月十八日巴黎哈瓦斯電）。對於這個消息，我個人的估計是這樣：第一、這多半是代表中國當局的願望，因為他們不能獲得英美的單獨放款，則希望他們妥協下借錢給中國，因此第二、英美大致不會是該項傳說中的“協定”的策動者，同時爲了鎊元的根本對立，他們也不見得會真的“協定”下來。尤其是在日本的威逼之下，英國棄日就美就更少可能。因為英國的遠東政策，大致還和去年羅斯來華時一樣，是偏向於疏美親日，雖然日本在華北非常猖獗，走私問題更直接侵害了英國對華北關稅的支配。賈德幹這次親自繞道日本，同時更提出在中日兩英使館間共設一財政官，就是想恢復英日的老同盟。至於美國這次會不會站在相反的一方，單獨允諾陳光甫氏的借款要求，也要看它在太平洋上軍事的經濟的一般發展，才能決定。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日。

評“對於增加籌碼問題意見書”

駱 耕 漠

兩年以前，上海託了帝國主義底福，還是恐慌中的一個驕子，房地產業承着“一二八”的浩劫以後，依然是一日繁榮一日，債券市場非常熱鬧，市價頻頻上漲，銀行底存庫空前地堆積着，本埠的分支行以驚人的速度發展。當然，我們並不是說這些現象是反映真的產業上的繁榮，實際上上海的工商業當時已經日趨衰落，不過不像內地的農村破產那樣，帶着乾乾脆脆的破落氣象而已。可是自去年美國積極厲行購銀政策以來，這些虛偽繁榮的現象，有的固然還在繼續發展，但是多半已經不復存在，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地產價格底狂跌。至於一般工商業就更激急地潰崩下去，失業工人成羣地擁到街頭，社會各方面的人士已經不得不加以注意了。不久以前，上海市商會發起組織上海工商業復興委員會，其動因即在企圖恢復上海的繁榮。最近該會發表了一篇“對於增加籌碼問題意見書”，提出了解救一般工商危機的“治標”方案，內中有好些說素是值得我

們鄭重考慮的。該意見書底內容，簡括地說起來，只有兩點：第一，牠指出中國金融市場的危機不是支付籌碼的枯竭，而是信用籌碼的空缺；第二，牠主張以發行承兌匯票、公司債票來填補這種空缺，解決當前的金融危機。現在我們就將牠分成這樣兩個部分來檢討一下。

一 “支付籌碼並不枯竭”

該意見書開頭就將“金融市場中之籌碼分爲二大類：一曰信用籌碼，即信用工具，爲金融業授信之對象，證券票據等屬之；二曰支付籌碼，即支付工具，爲最後清算債務債權之手段，硬幣紙幣屬之。”牠這樣區分以後，就提出“我國當前之困難，究爲信用籌碼之消乏，抑爲支付籌碼之枯竭”這一問題，牠底答案是“支付籌碼並不枯竭”，至其理由可有兩點，第一，牠說：

“滬市存銀……屬於華商者，仍達二億九千八百萬元之多，除發行鈔票分配六成現金準備外，尙頗有裕餘，則枯竭二字，似屬過言”。

在這裏，我們可以明白見到：意見書底代表者們是單從上海華商銀行的庫存數字來討論中國當前的籌碼問題（亦即金融問題），但是以這樣的觀點來討論中國當前的金融問題，是不是太機械，太孤立，換言之，是不是太不合現實呢？中國和英

美不同，牠底存銀（主要即充支付籌碼之用的）一向是分散在民間，就像近代金融市場比較發展的上海，也有許多存銀是存放在一般工商機關之中。中國商店兼營金融上的存放業務，不但是普遍農村，甚至也是普遍城市的現象。所以當我們發問“我國當前之困難……抑為支付籌碼之枯竭”的時候，單從上海華商銀行底庫存出發，而不把視線投到整個的農村和城市中的工商業者乃至舊式錢莊，無疑地是非常錯誤的偏狹看法，換言之，討論這種問題，我們非從整個國民經濟的立場出發不可。我們就引用上海華商銀行底庫存數字來說明這點：

1930年與1934年上海華商銀行庫存比較表

1930	166,293,000元
1934	280,325,000元

從這個比較表中，意見書的代表者們可以得出中國（或即上海）金融市場上的支付籌碼，一九三四年比一九三〇年更不枯竭，因為上海華商銀行庫存，一九三四年比一九三〇年更多。但是這種說法，只要略微注意中國金融動態的人們即可知其完全錯誤。一九三〇年前後，中國因列強白銀傾銷的結果，大有存銀泛濫之患，而一九三四年特別因美國厲行白銀政策之故，整個中國都深陷在以支付籌碼極度枯竭為基礎的金融恐慌之中。這是什麼理由呢？原因很簡單，即在一九三〇年時中國農村中和一般工商業者手中，都還儲有較多的現銀，至一

九三四年情形已全相反，掌有較多現銀的只是城市中（主要即上海）的幾大銀行而已。同時，我們還更曉得：自一九三二年以後，上海華商銀行庫存突然猛增，正是全國金融枯竭乃至崩潰的結果和表徵。所以意見書的代表者們看見上海華商銀行庫存有二萬九千餘萬元，即說目下支付籌碼並不枯竭，真和一位留美博士碰見煤油大王那麼財富，就說美國人民並不貧窮一樣的盲目。一樣的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現在我們姑且退一步說，就算上海華商銀行庫存的充實，即為目下支付籌碼並不枯竭的指標，那末我們自然也要發生和意見書代表者們所曾發生過的一樣的疑問，即“何以支付籌碼未至枯竭之境，而金融周轉已極度艱難”呢？對於這一疑問，意見書也給有明確的答覆，那就是前述支付籌碼並不枯竭的第二理由；該意見書說：

“吾國目下金融體系之病態，與其歸咎於支付籌碼之不敷周轉，毋寧謂為信用籌碼之不善用。分析言之，則一為短期資金市場中信用籌碼之缺乏，二為長期資金市場信用籌碼之畸形發展，三為金融制度之缺陷，未能運用現代信用籌碼，以造成資金有系統的循環”。

關於這一說素的批判，詳細還要留待下節；現在我們只指出此種思考之方法論上的錯誤。該意見書開頭將籌碼劃分為支付籌碼與信用籌碼，對於問題的了解是必要的；但是考察事

態之現實的過程時，機械的絕對的強加劃分却是有害無益，妨礙求將問題之真正的了解。研究中國目下的支付籌碼是否枯竭這一問題，我們固然絕對不應單從上海華商銀行的庫存出發，同時就是退一步說，我們也不應單是抽象地（即離開實踐過程中的現實作用）來考察那種庫存額。譬如一個人已經患了不醫之症，對社會已經失去工作的活力，實際上已與死人無異。在這時，我們說：這個人是有活力的，現在所以沒有活力，是因為他患了不醫之症，試問這話有什麼意義？我們是不能離開他的病象，他在實際上有否活力，而來抽象地說他原有活力。意見書的代表者們說，支付籌碼並不枯竭，而金融市場所以感到枯竭者，全因信用籌碼之缺乏，在邏輯上實是犯着同樣的錯誤。我們曉得支付籌碼枯竭可以採取兩種形態：第一是支付籌碼本身絕對地減少與消失，如去年中國存款滾滾外流，就是造成支付籌碼之絕對枯竭。第二，支付籌碼縱未減少，但因工商業破產而收縮或竟停止其流轉的作用，這樣整個社會也就陷於支付籌碼相對枯竭的絕境中。這兩種形態的枯竭對於中國目下的金融危機具有同樣的策動力量。我們明白了支付籌碼相對枯竭的形態和動因以後，就很容易認清意見書的代表者們抽象地從庫存數字來論斷“支付籌碼並不枯竭”，又是如何的偏狹和機械了。

二 “固定者使之變為流通”

對於支付籌碼是否枯竭這一問題，我們應從支付籌碼在實踐過程中的現實作用來看，換言之，即我們更應在相對枯竭這一意義下來看，這在前面已經說過。現在我們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支付籌碼在中國為什麼已經必然地陷於相對的枯竭之中。在意見書的代表者們看來，目下的病症在信用籌碼之不善運用，所以只要發行承兌匯票與公司債券，使固定者（指支付籌碼而言）變為流通，當前的病態就可除掉。他們說：

“就現況而論，金融業固尚留於原始的放賬制度之下，工商業又何獨不然……此不良信用制度之結果，則為工商業者之資金，因放賬制度而變為呆滯的賬面債權。工商業者之資金，因放賬制度而變為呆滯的賬面債權。工商業者資金之凍結，轉嫁於金融業，而成為金融業賬面之結凍……遇外來之誘因，恐慌自必急劇爆發”。

他們接着更說：

“為指導計，各銀行可即擇信用卓著之公司，勸令發行債票，而自為之承受，一面與華商證券交易所合作，為之公開拍板……將來凡有要求以工廠抵押款項者，概為之計劃發行公司債票，銀行承受公司債票之際，雖亦須同樣付出資金，然債券在交易所拍板之後，即可逐漸流入一

般投資者之手……較之工廠押款之呆滯賬面，真不可同日而語矣”。

他們所提倡的銀行承兌匯票與商業承兌匯票，其目的亦即在化呆滯的賬面為流動的資金。但是此項方法，實際上究竟能夠幾分有效呢？我們且先舉兩個事實：一，美國是近代信用制度最完善的國家，什麼承兌匯票，什麼公司債票在那兒是行之久矣：但是一九二九年垣街的交易所風潮揭穿完善的信用制度之無能，當時拍板自拍板，公司債票還是無人承受，投資者早已退藏到銅錢的窩裏去了。二，再如一九三〇年前後，虛偽繁榮還籠罩着中國工商界的時候，所謂賬面，所謂押款也並不怎樣停滯，也不致如何凍結。在這裏，我們舉這兩例子的用意當然不是說：舊式的放賬制度，更較公司債票等新式信用籌碼為好（我們在這裏沒有必要來計較牠們在技術上的上下），而只是想指出：信用制度的好壞，主要並不在於牠底形態，而在於牠底基礎——即工商業的興衰。誰都可明白見到：當舊式的放賬制度變為呆滯的賬面債權的時候，手中攜有新式公司債券的人要想借助拍板，流入他人之手，以收回資金，亦是絕對的不可能了。所謂“不可同日而語”云者，實際上只是筆頭上的兒戲呀！意見書的代表者們說：“此種技術的改進，表面上區別幾微，而涵義則甚遠大，亦猶壺中蒸氣，一導入汽機，竟不期而為人類文明劃時代的動力也”，真可謂空前的金融制度的誇

大狂！

不過，發行公司債票等辦法亦確有與舊式放賬制度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資本愈厚的銀行家，就愈能操縱金融市場，愈可將自己的賬面債權轉嫁給他人去倒霉。經驗告訴我們：資金雄厚的財閥，可以利用周密的調查組織，探測工商業的市況，他們可以挾其雄資造成交易所內人爲的供求和債票市價的漲落，他們可以利用各種方法，將那等於賬面債權的“票面債權”——公司債票，相當地塞進他人的口袋裏去。這是新式信用制度所附帶產生的投機作用，也就是新舊兩者底“不可同日而語”的地方，此外就談不上什麼天大的區別了！

以上還是從一般的原則上來鑑別公司債票等等和舊式放賬制度的異同，現在要回到此種新方案能否使固定者變爲流通這一問題。支付籌碼是否能藉此種善良信用籌碼之運用而不陷於相對的枯竭呢？這是容易解答的：在日下的中國，少數城市中（主要即上海）所以發生支付籌碼相對枯竭的現象，絕非由於什麼“金融制度之缺陷，或是信用籌碼之缺如，而是由於根本無建立信用籌碼之基礎，申言之，即在國內工商業這樣蕭條破產條件之下，你拿了廠基向銀行抵借也好，你發行公司債票以後再去抵押也好，銀行家總是不會輕易將他底資金從庫房中流到市面上來。支付籌碼相對枯竭，是工商業衰落所規定了的必然的命運，決非治標的紙上方案所能更變！

總結一句：規避現實的真正核心。在事態的表面上企圖問題的解決，是該意見書底特色，是上海工商業復興委員會的社會存在所容許見到的狹隘天空，是我們必需指出的一句評言。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日。

從“物產證券”談到一般的貨幣理論

孫 治 方

在‘中國農村’第一二兩期上，接連登載了兩篇關於土地村有方案的批評文字。這兩篇文章已經從理論上和事實上揭露了土地村有方案底內容。但土地村有還不是“閻錫山主義”底全面。土地村有方案僅是我們的綏靖主任“解決”農民問題的對策。他對於整個社會問題的解決辦法另外提出了推行“物產證券”的方案。我們爲要了解土地村有方案底提議人底整個“理論”系統起見，仍舊借重‘中國農村’底篇幅，來談一談物產證券底內容。我們在未曾批評物產證券理論之前，先把這理論底內容介紹一下。(註)

提倡物產證券的人認爲現社會中一切生產品（他們的術語稱爲物產）底價值都要用金銀貨幣來表示（代表），而且必需換成金銀貨幣以後，方才能夠同其它生產品相交換。因此社會上的生產品（物產）便分成了兩層：一方面是金銀以外的一切生產品，另一方面是代表這些生產品底價值的金銀。物產證券

論者便把這種現象稱爲“金代值”的“二層物產制”。據他們說，這種制度產生了下列四種弊端：

(一)使人類不爲生產生活用品而勞動，乃爲獲得金銀而勞動。每個人都想集中並貯藏金銀：以至造成“金銀爲主物產爲奴”的現象。(二)因爲“一遇某種生產物過多，爭相求售，價格跌落，……其換得之金銀亦不足轉換其它物產以供需用。生產愈多，剩餘愈甚，生活乃愈困”。(三)因“政府不能無償獲得金銀，以儘量接受人民之工作產物，一遇交易壅塞物產滯銷，人民卽失業”。(四)國家努力增加物產非爲供國人之需，而爲“聚得金銀把握別國經濟命脈”。因此“違反互通有無之國際貿易原則，及開商戰之路，增兵戰之端”。

在物產證券論者看來，現社會底這些罪惡完全是金銀貨幣所造成的；而且主要是由於金銀有自身價值，“政府不能無償取得，以儘量接受人民之工作產物”。因此主張廢除金銀貨幣(金代值)，消滅“二層物產制”，發行“物產證券”。

然而物產證券是怎樣的東西呢？它底“發明人”解釋道：

“物產證券者，政府用法令規定，代表一定價值之法貨，用以接受人民工作產物，並作人民兌換所需物產，及公私支付一切需用者也。收產發券，券如同物之照相片；以券易物，物爲券之兌換品。物有若干多，券可發若干多，

政府不患不能盡量接受人民之工作產物。發券時既收還物產，則券有若干多，物即有若干多，人民不患有券而不能兌物。券之數量，隨物產多寡以伸縮。就物之價格言，則物之價格穩定；就券之信用言，則券之担保確實。此項證券，其作交易媒介，物價尺度等之効用，與金銀貨幣同，而無“金代值”“二層物產制”比限物產，限制生產之弊病；故可擴大造產途徑，保障人民生活，增加社會富力……”。

從上面所引證的這一段話看來，物產證券簡直比了張天師的符咒還要靈驗；一旦發行之後，現社會底一切病根就可以完全剷除了。但實際上到底怎樣呢？這裏我們首先且來看一看物產證券論者對現存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認識如何？

近代許多貨幣改革論者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都不敢從正面來觀察現社會底病徵。這好比是肺結核病的患者最怕人家說他是肺癆病一樣；一切布爾喬亞的學者也最怕指摘資本主義社會底真正病源。他們把現社會底一切“病症”都歸罪於貨幣。所以自從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以後，各國的政治家和學者都想從貨幣改革（如放棄金銀本位，管理通貨等）着手來挽救大局。物產證券論者實際上就是這些貨幣改革家之中的一派。

物產證券論者把他們所指出的現社會四大弊病統統歸罪於金銀貨幣。當然金銀沒有嘴巴，不會喊“青天大老爺伸冤”。

的。不過事實上他們是把金銀底作用神化了，把金銀當作是可以左右社會禍福的妖神。他們沒有了解，金銀貨幣在現社會所起的作用完全是現社會的生產關係——說得明白些，即現社會制度，——所賦與它的，物產證券論者嘲笑本位貨幣底擁護者是拜金主義者，但他們自己是變成了貨幣拜物教底信徒。

物產證券論者所指摘的現社會的第一個大弊端就是爲金銀而生產這一點。其實，他們對於這個事實的了解，祇看到了事物底皮相，而沒有看到事物底實質。現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這社會裏面的生產經營者是資本家。資本家從事生產某種生產品不是爲了自己需用，而是爲了賺錢；換句話說，是爲了利潤。但是在商品經濟社會裏，貨幣(金銀)是公認的價值形式，是一切商品共同的“等值形式”。任何商品祇有換成了貨幣以後，方才能夠證明生產者在生產這商品的時候，所花費的勞動是社會所需要的，是沒有白費掉；到了這時候，方才能夠使某個商品中所包含的私人的勞動被公認爲社會的勞動(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以後講到貨幣本質的時候，還要詳細說到的)。資本家祇有把自己所生產的商品統統變成貨幣之後(或者有十二分的把握，知道他的商品確實可以變成貨幣之後)，纔能證明他的經營是否是賺了錢(獲得利潤)，抑是虧了本。於是貨幣便成了一切商品底愛人，成了大家底追求對象。所以“勞動不爲產物而爲金銀”的弊端，不是金銀本身所造成的，而是以追

逐利潤爲目的的資本主義私有生產制度所造成功的，金銀祇是代人受過而已。

物產證券論者所指摘的現社會第二個弊端便是“一遇某種物產過多，爭相求售，價格跌落”，因而造成現社會的週期經濟危機。他們認爲這裏的罪魁禍首也是金銀。其實這更是冤哉枉也了。誰也知道經濟危機是無政府狀態的生產所必然造成的結果。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許多獨立的資本家各自經營他們的生產，相互間不發生任何聯絡。遇到某一生產部門底出產短少的時候，價格便飛漲，使這一業的資本家獲得豐厚的利潤。於是其它各業的資本家便蜂擁地把自己的資本投向這一生產部門來，這部門的生產便迅速擴大起來。但是在無政府狀態的生產下，誰也不知道每個部門的生產可以擴大到什麼程度爲止。等到生產品的價格開始跌落，市場向他們下警告的時候，生產量已經超過了市場容納量不知多少了。到這時候，資本家便不得不縮小生產範圍，以至於完全停閉工廠。這樣便造成了經濟危機，就是物產證券論者所謂“生產愈多，生活愈困”的禍災。

物產證券論者把上述這種經濟危機之爆發完全歸罪於金銀貨幣。他們說商品所以銷不出去，是因爲缺乏現金的緣故。這種解釋非但是忽視了上面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特徵，而且完全是與事實相矛盾的。大家知道在資本主義社會中

經濟危機之爆發大概是有一定的週期的，在過去普通是每隔十年一次。每次危機結束以後，便來一個較長的經濟繁榮時期。過了幾年，接着又來一次危機。危機和繁榮總是這樣不息地輪流着。但是在另一方面社會上所存在的現金總數在一個短時期內是不會發生什麼激烈的變動的；而且一般說來，社會上金銀的總數祇會逐漸地增加，而不會減少的。社會上的金銀總數決不會每隔若干年忽而失掉了一大批，再經過幾年便忽而增加了一大批的。由此看來，資本主義社會底週期的經濟危機必然是與金銀數量之增加沒有連帶關係的。

同時，在市面繁榮的時候，商業流轉量往往比較平常時期要增加幾倍，但並不會感覺到現金的缺乏；在經濟危機期間，商業流轉量祇會比平時縮小，所以更沒有發生現金缺乏的理由。事實告訴我們，當經濟危機爆發的時候，現金並沒有減少，而是整批地藏在銀行的地窖裏，沒有人去提用。這時候，非但現金不缺乏，而且就是生產必需的一切要素也都不缺乏：社會上有閑放着生鏽的機器，有堆在棧房裏無人過問的原料，有因為無人購買而用水火銷燬的糧食，同時也有餓着肚子沒有飯吃的勞動者。危機之發生不是因為缺乏這些生產所必需的要素，而是因為私有財產的社會制度把這些要素分隔了起來，因為無政府狀態的生產制度不能把它們有計劃地配合起來。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物價證券底“發明人”把金銀缺乏來解釋經濟危機已經是很可笑了；但是他們所指出的金銀缺乏的原因愈加可笑。他們說道：“至需用已足，人不肯以獨佔貯藏之金銀購買生活夠用以外之物產；則持剩餘物產之生產者，不能再行銷售以換金銀；……”。在這裏，我們可以告訴我們的聰明的“發明人”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購進商品根本不是爲了“需用”，而是爲了賺錢（卽爲獲得利潤）。在市面繁榮，有錢可以賺的時候，投機商人可以在交易所裏購進大批商品，雖則他們自己並不需要這些商品。同時，每個稍爲懂得些生意經的商人都知道：會做生意的人應該使他的資本不要死攔在家裏，應該有了資本就辦貨，辦進了貨馬上就賣出去。商人底資本祇有這樣川流不息地流轉着，纔能多多地賺錢。所以喜歡獨佔雖是資本家底天性，但喜歡貯藏祇是鄉下土財主底本能。我們不相信以善於經商聞名全國的山西商人會如此落後。

再則，普通遇到發生經濟危機的時候，總說是由於“生產過剩”。但“生產過剩”這句話完全是相對的。我們決不能如物產證券論者一樣把“生產過剩”當作“需用已足”解釋。反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過剩”永遠是與“消費不足”連在一起的。當農業資本家或出口商人把糧食用火銷燬，或沉入大海的時候，一定有無數勞動農民大眾是破產了，是在挨餓了。真正的生產過剩（卽生產品超過了人類的需要量）祇有在社會主義

社會中才會發生。但是在這時候，生產過剩祇會增進人類底享受，減少人類的工作；即真正促成人類的幸福，而決不會造成社會的大災禍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過剩”決不是人民消費不掉的意思，而是人民購買力不足的問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民底購買力是被剝削所限制着的。生產力愈發展，剝削率愈增高，資本家所得的利潤愈大，而工人所得的收入相對地愈是減少。因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大多數人民底購買力相對地永遠是減少着的。

物產證券底“發明人”對於這一點牽強附會地解釋道：

“被剝削者，在分配上，因受剝削減少所得，固有不足需用之感。而剝削者因剝削增加所得，却有超足需用之實。且所得咸用於購買，無論購供生活，抑購供生產，均是購買。在所得，雖有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不同，在所得用於購買，却無剝削與被剝削之歧異，社會上之總購買力，固未嘗因剝削而減少也”。

這一段話初聽起來真是頭頭是道，沒有可以反駁的了。資本家因為剝削率之提高，利潤收入之增多，自己的生活毫無疑義是愈加奢華了。即是說他們私人底購買力增加了。另一方面，資本家為了和其他資本家競爭，不得不設法減低自己的生產品底成本。因此他不得不把剝削來的一大部份利潤用於擴

大生產和改良技術方面。因此他們需要購入大批機器和原料等等。初看起來，資本家剝削工人所得的利潤完全用在購買生活資料和購買生產資料上面去了；剝削的增加真的並不會減少社會上的總購買力。但是我們再進一步的考察下去，就可以知道這結論完全是不真確的。第一，擴大生產的最後目的還是在製造消費資料，但資本家階級自身所消費的東西僅是社會所生產的消費品中間的最精細而是較少數的一部份，其餘大部份的消費品仍舊要靠人民大眾來消費。第二，資本家改良技術和擴大生產規模的結果，消費品底生產量是迅速地增加了。這種生產品增加底速度超過了被限制的人民大眾底購買力之增加速度，所以結果是愈加促成了“生產過剩”之發生，即促成了經濟危機之爆發。

物產證券論者所指摘的現社會第三種弊病就是因金銀自身有價值“政府不能無償獲得金銀以儘量接受人民之工作產物”這一層。經濟危機之爆發並不是起因於金銀貨幣之缺乏，這在前面我們已經說過了。在無政府狀態的生產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度沒有消滅之前，政府縱能儘量接受人民的工作產物，也沒法可以阻止危機發生。因為我們的山西省的執政者太窮了，所以會挖空了心思發明不花本錢的“物產證券”來接受人民的工作產物。但金元帝國的華盛頓政府到底與衆不同，它有大批資本可以收買人民的剩餘產物（農產物）。可是這種收

買政策對於挽救經濟危機不曾有顯著的成效也是衆所週知的事情。不論政府用何種方式(現金或“空頭支票”)來接受資本家底剩餘生產品，但政府不能自己來消費這許多東西的，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度的原則下，政府既不能白白地把這些東西送給消費者，那麼在大衆購買力日益跌落(尤其在危機期間)的條件下，這些生產品祇能永久留在政府的倉庫中等待顧客光臨了。所以如果物產證券可以解決掉危機，那麼轉運公司的提單和貨棧房的棧單早已把經濟危機解決掉了。

物產證券論者所指摘的現社會第四種弊病就是各國因爭奪金銀而引起戰爭的問題。他們對於這問題的見解之錯誤，與前述第一項完全相同的。個別的資本家所追逐的是利潤。整個資本主義國家所追逐的也是利潤。殖民地侵略和帝國主義戰爭都是追逐利潤所造成的結果。所以當着以獲取利潤爲目的的資本主義生產制度本身未被取消之前，即使單獨取消了金銀貨幣也不能使戰爭消滅的。

以上是批評物產證券論者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認識。如今我們再來分析物產證券本身。

大多數的布爾喬亞的經濟學者(連物產證券論者在內)，都把貨幣看做是一種“便利”，而不認爲這是商品經濟中不可缺乏的東西。甚至像布爾喬亞經濟學底始祖，亞丹斯密都把貨幣比作公路。他說，有了公路祇是使人可以比較舒服地，比較

便利地，乘着車子回家去而已。約翰·史丟華德·密爾說“貨幣是用以迅速而便利地完成某種工作的機器。但沒有這機器的時候，這工作也一樣可以完成的，雖則沒有這樣迅速和便利”。此外說過類似的意見的經濟學者還有很多。總括起來他們都把貨幣看作是便利商品交換的工具。他們說貨幣是貨物交換感到困難以後，才發生的。他們既然以為貨幣是爲了便利交換而設立的，並不是商品經濟中不可缺少的東西，所以當他們認爲貨幣不能給人類以便利，並且反而成了各種災害底來源之後，自然就可以用一紙命令把它廢除掉的了。

貨幣在商品社會中，是不是這樣爛賤的東西，要它就可以來，不要它就可以廢去的呢？爲解答這問題，我們不得不簡單地談一談貨幣底本質和它底起源。當貨幣改革成了一種有求必應的“仙丹”的時候，我想在這裏談一談關於貨幣的純理論問題，想來不至於爲讀者所反對吧。不過因爲貨幣（價值形式）問題，是理論政治經濟學中最抽象，最複雜，亦即是最難懂的一章，很不容易把它解釋得簡單而又通俗。所以讀的時候，或者未免吃力一些。

商品經濟底基本條件是盲目的社會分工和生產資料之私人佔有。所以在這經濟中存在着私的勞動對社會勞動的矛盾，具體勞動對抽象勞動的矛盾和使用價值對交換價值的矛盾。這種矛盾表現在下列事實中：任何商品首先總是私人的生產

品，但是同時，不管生產者本人的意志和覺悟如何，任何商品都是社會勞動的生產品。每個商品生產者完全各自獨立地勞動着，各人祇對自己負責；但是同時他們亦是為社會而勞動着，因為他們所生產的東西，都不是自己用的，而是賣給別人用的。然而在商品經濟中，勞動底這種社會性質都是隱伏着的。它直到商品交換時方才表現出來。生產者在比較並交換自己的勞動生產品的時候，實際上就是在比較各人自己的不相同的私的勞動，而把它化為同樣的人類的勞動；可是這不是一個主觀的過程，不是自覺的過程，而是完全客觀的過程，是不受生產者的意志和意識之支配而完成的。

上述這種矛盾，在商品交換底初期，表現得非常軟弱。隨着商品生產之發展，商品交換底範圍逐漸擴大，製造商品已經成了生產底唯一目的。“生產品就是價值”的這種意識在開始生產的時候，就已經注意到了。到這時候上述各種矛盾便愈加顯露而尖銳了。商品生產者製造商品是爲了出賣，而不是爲了自己消費，所以商品對於生產者祇有交換價值而沒有使用價值。他願意出讓自己所製造的商品底使用價值，而收還它底交換價值。換句話說，商品生產者願意商品本身所包含的兩種矛盾的本質在形式上，具體地分離開來。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因於整個商品世界中分離出了一個特殊的商品，——即貨幣，——就使上面所說的那種矛盾得到了解決辦法。貨幣本身

原來也是一種商品(如金銀)，它自己原來也有價值和使用價值。但如今，商品社會底社會生產關係給了它新的使用價值，就是使它成爲一切商品價值底代表。以前商品生產者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如今得到了圓滿的解決。他儘可以把自己所不需要的使用價值(商品本身)出讓掉，但同時又可以把商品中所包含的價值(貨幣)收還來。

貨幣底形成是價值形式長期發展底結果。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根據豐富的歷史材料，把價值形式分爲三個主要的階段。在原始社會中，某一個部落同其它一個部落相遇到的時候，偶然把自己的剩餘的生產品作爲交換。某一種生產品底價值偶然地用另一種生產品表示出來，如一條牛值五担穀。這種價值的形式稱爲偶然的簡單的價值形式。交換逐漸發展以後，參加交換的商品種類也逐漸增加。一條牛不僅可以與五担穀交換，而且已經可以與十五雙靴子，二十把斧頭和其它種種商品相交換的。換句話說，牛的價值不僅可以用五担穀來表示，而且可以用其它各種生產品來表示了。這階段稱爲擴大的價值形式。交換愈發展，商品的種類愈擴大以後，商品生產者往往把自己的商品先換成一種在市場上出現最多的(即最容易出售的)商品，然後再把這商品去換得自己所需要的東西。這時候，一切商品底價值都用市場上最活動的這種商品來表示了。這稱爲共同的等值形式。在現社會中充作這種等值形式的商

品稱為貨幣，最普通的便是金子，其次便是銀子。但在歷史上充作這種等值形式，而執行現今的貨幣所做的工作的商品曾經有很多種。最普通的便是皮革，鹽，貝殼等等。在奴隸社會中，奴隸也曾充作“貨幣”，因此少壯力強的青年男子，和嬌嫩美貌的少女便成了最貴重的“貨幣”。

我們說了這麼一大段的價值形式底發展史，為的是要證明貨幣不是那一個聰明人發明起來的，而是長期的歷史發展底結果；貨幣自身也是商品，它所以會脫離了全體商品的隊伍而獨立起來，為的是要執行商品生產所賦與它的任務，解決商品本身所包含的矛盾，也就是整個商品社會所包含的矛盾，因此在商品社會本身的矛盾未被解決而要廢除貨幣那也是捨本逐末的辦法了。

我們說貨幣之發生是用以解決商品和商品社會自身的矛盾的。但是貨幣雖解決這個矛盾，而沒有取消這個矛盾；反之，這是表示商品社會底矛盾又以新的形式在發展而擴大着。最顯著的就是貨幣發生以後，把商品生產者底出賣和購買這兩種行為分離開來了。如今商品生產者在出售了自己的商品換得貨幣以後，不一定接着馬上便購進其它商品在市面不好的時候，他可以把得到的貨幣貯藏起來。所以出賣和購買這兩種行為的分離，在理論上便形成了經濟危機底可能性，但是這裏讀者應了解兩點：第一，可能性不就是現實性，這種危機的可

能性如果沒有前述各種客觀條件之配合，決不會促成現實的經濟危機的；第二，這並不能證明物產證券論者底金銀萬惡論，因為這種可能性也是商品生產自身的矛盾促成的，貨幣是不能負擔這責任的。

物產證券論者說：

“原夫貨幣之產生也，……其基本效能，一為交易媒介，一為價值尺度。但作此交易媒介，價值尺度之效能，不在其本身為有相當價值之實物，而在賦與法貨資格，使其代表一定之價值”。所以物產證券“作交易媒介，價值尺度等效用與金銀貨幣同，而無……比限物產，限制生產之弊病”。

但是我們從前面所說的貨幣發展史中，可以知道，貨幣之所以能夠成為商品價值底共同等值形式，正因為貨幣自己是商品出身，正因為它有自己的獨立的價值。自身沒有價值的貨幣（如紙幣）做交換的媒介（即流通工具）是可以的，但是做價值尺度是絕對不可能的。祇有自身有長短的東西才可以度量別的東西底長短，祇有自身有重量的東西才可以去權衡別的東西底輕重；同樣也只有自身有價值的貨幣才可以測度別的商品底價值。如果物產證券論者不願意承認“秤可以量長短，尺可以秤輕重”的無稽之談，那麼亦祇好承認物產證券的貨幣論是同樣的無稽之談。

所以，物產證券論者對於這一點後來不得不做了相當的讓步。根據太原物產證券研究會覆申報月刊的信中說（‘益世報’，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物產證券“仍以現有之元為單位，……依現有市場之價格，以定物產證券與百物之比價”。或者說，物產證券的“尺度單位仍應沿用以往貨幣七錢二分之銀元單位，其名稱仍應稱為元角分厘”。不過“一經規定與銀元永遠脫離，不因銀價之漲落而生變動”（轉引自‘新中華’三卷二十四期，二十二頁）。如此說來，物產證券論者仍舊不得不借重銀元來做尺度價值的工具，在這一點上，物價證券正與發行紙幣相類似了。

但是商品價值既然是勞動量來規定的，那麼物產證券正可以如俞寰澄先生所說的直接用勞動時間來做計算單位了，例如他提倡“發行半工，一工，雙工，五工，十工之證券”（‘申報月刊’四卷一號，八一頁）。關於這一點，太原物產證券研究會曾加以駁覆過了，不過還不充分。

不能以工作時間直接來表示物品價格的主要原因是在於私的勞動和社會勞動之矛盾，在於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之矛盾。兩樣東西一定要具有同樣的性質才可以相比較。商品之所以能夠交換，因為它們具有同樣性質的社會的抽象的勞動。但是在商品社會中社會的抽象的勞動不經過交換不能直接體現出來。而每個具體的私的勞動却有形式、複雜程度和生產率大

小之不同，同時每個商品是許多生產部門中許多職業不同的勞動者所創造成的，所以在商品社會中絕對沒有可能計算每個商品中所包含的勞動時間。我們說一條牛值五担穀，這僅是表示一條牛和五担穀包含同量的社會的抽象勞動；但實際上它們所包含的私的具體勞動是可以完全不相等的。

我們在前面用過物產證券“發明者”這名稱。但事實上這種思想是許多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所早已發表過了。“物產證券”實際上便是格策和歐文的“勞動證券”之變形，“公營商場”實際上也就是歐文的特設商場。“勞動證券”和“特設商場”之失敗是這些烏托邦社會主義思想的實際的批評。

我們讀完了物產證券底理論，倒並不佩服閻錫山能夠“復活”前數世紀的西歐的烏托邦思想，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綏靖主任正忙着料理許多軍政事務，翻古書抄文章自有許多祕書官和清客們替他做。我們佩服他的，是他常能夠把這種“美麗的”思想同他的“實際工作”聯繫起來。在前數年（民廿二，廿三年），因鄉村金融恐慌，銀根緊急的時候，在山西曾以田產作抵，發行了一種“土地合作券”，用作抵債付款等用途，結果因發兌者不能兌現而失敗了。如今又在“新的”理論掩擁下想發行“物產證券”了，可惜這理論被遲發現了幾天，否則一九三一年內戰時，山西省銀行的紙幣政策也可以得到一個絕好的理論根據了。

(註)本文所引用的物產證券的原文均引自‘中外論壇’所載閻錫山原著
原文。

財 政

1. 由平時財政說到戰時財政
2. 非常時財政問題的再檢討
3. 中國新公債案與財政
4. 所得稅的開徵及其前途

由平時財政說到戰時財政

章 乃 器

財政是整個經濟機構中之一環；牠和貨幣、金融，固然是互為表裏，和一般的生產，分配關係，也是互相作用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財政的基礎，建築在利潤上面；牠分沾了一小部分的利潤，然而不可能消滅利潤。統治者在表面上，雖然提出很好聽的“以負擔力量決定徵取標準”的口號；而在事實上，對於資本集中的趨勢，是無損毫末的。

在財政的收入方面，所徵收的不過是利潤中極小的一部分；而在財政的支出方面，往往再要增加資本家的利潤。在購買上，在軍需製造上，在債務費的支出上，資本家往往要藉以取得很大的利潤；在公務員的消費上，一部分的薪俸就變成資本家的利潤。經過了儲蓄的過程，別一部分的薪俸，也直接或間接的加入生產過程，和利潤一樣的變成資本，要之，在財政支出方面，是剛好的助長資本集中的趨勢。

因為財政是整個經濟機構中之一環，所以，一般經濟關係

上所有的矛盾，也正是財政上所有的矛盾。在經濟走向繁榮的時候，資本家利潤的豐厚使財政收入大增，財政收支就自然膨脹起來。財政收支的膨脹，便會增加了通貨的膨脹，便會使無政府的生產狀態增加牠的速度。這樣，財政上盲目的膨脹便成爲以後經濟恐慌的一個因素。等到經濟恐慌發生，資本家利潤的減縮，使財政收入低落，這便造成財政恐慌。財政恐慌中支出的減縮，加重了一般購買力的減縮，而使一般經濟恐慌增加了嚴重性。這樣，財政上的矛盾和一般經濟關係上的矛盾，就成爲互爲因果之勢，而循環往復的開展起來。

X X X X

在半殖民地的中國，財政上所表現的，自然是和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同。在收入方面，因爲所採取的是間接稅制，牠往往是通過了帝國主義的販賣網和封建勢力的剝削網，而把大部分的負擔轉嫁給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比方：關稅的徵收——主要的是進口稅的徵收，進口洋商所繳納的，並不出自他們的利潤項下，而不過是一筆墊款；他們馬上把所繳的稅額，加入商品的成本上去，輾轉的經過販賣網，向消費大眾收回這一筆墊款，而還要加上一些屬於墊款的利潤。鹽稅的徵收，鹽商所繳納也照樣的是一筆墊款。他們通過了封建的剝削網——“引岸”向消費大眾收回比墊款數更大的一筆款子。且看，差不多每次政府增加鹽稅的稅率，鹽商必然要加重的取

償於人民的。統稅的徵收，形態比較的不同；那中間向帝國主義在華產業徵收的，還不到半數，大部分是出自民族工業的。但是，轉嫁的方式，是一樣的。田賦的徵收，取自地主，地主也可以轉嫁於佃農；同時負擔的不公平，也超過其他的捐稅；紳豪階級，往往是能夠得着很大的便宜的。

財政上的弊害，在古代，是取自民間者，未能盡散諸民間；因之，資財集中於貴族，而民間無蓋藏。這種弊害到現在依然存在，但是嚴重性是格外大了。我們要分析目下財政的弊害，必須再把財政的支出方面，加以研究。中國財政上的收入，中央和地方併計，每年不下十五萬萬元，那中間散諸民間的，能有幾多呢？巨額債務費的支出，一部分是流出國外，一部分是留滯在金融資本家的手裏。官僚軍閥的高樓大廈，多數是建築在租界裏，他們的巨額存款，一部分在租界裏，另一部分却早已逃到海外去。政府的購買和建設上的支出，一部分是留滯在都市，而另一部分也要流出國外。頂頂嚴重的，恐怕要算是內戰上的消耗：牠一面在軍用品的購買上使金錢大量外流，而另一面却還要毀滅人民的財產，阻礙人民的生產。因此，目下財政的弊害，遠不止取諸民間者，未能盡散諸民間，而是取諸農村者，未能盡還諸農村，取諸國內者，未能盡留諸國內，甚至應造福於人民者，轉而貽禍於人民。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不能不咀咒目下的財政，是封建殘餘的把戲，是帝國主義的工

具，是民族的毒害者。

無疑的，目下農村的破產，財政要負很大的責任。往昔豪紳階級掠奪農民，他們所得的金錢，往往仍以高利貸及購買耕地等方式，再付給農民；那中間雖然有財產的變遷，然而對於農村金融是沒有多大的妨害的。目下軍閥、官僚、以及紳豪的掠奪，結果就不同了。軍閥、官僚固然要把農村裏括來的金錢，移到都市甚至海外去消費或者投資，豪紳們的消費和投資，也有同樣的趨勢。再因為在內地的金融機關，多為都市金融機關的分支行；牠們的主要任務，是吸收內地存款，攜赴都市。豪紳們在這農村經濟衰落，農民到處暴動的時候，為安全計，也寧願把往昔高利貸及購買耕地的資本，存入當地的金融機關；而一轉移間，這一部門的資金也就流入都市了。因此，目下的農村問題，不單是農民貧窮化問題，而同時是農村金融枯竭的問題；不單是農民喪失了土地和生產工具問題；而同時是農民被剝奪了交換工具問題。農民甚至要藉高利貸苟延殘喘，要出賣耕地和家畜以度日，而都不可得了。

× × × ×

在理想上，一個國家倘使能在財政徵稅上吸收人民所有的利潤，——自然連公務員的儲蓄也在內，而把牠運用起來，作為國家資本建設之用，資本便不可能集中到少數私人的手裏去。資本家和官吏，假如不過在消費上享受較高的生活，雖

然不公平，但對於社會，是沒有很大的危險的。國家徵收了全部的利潤之後，建設國家資本，增加國家的生產力，反過來就可以提高人民的幸福。

退一步說，國家在財政徵收上，即使不能公平到剛好吸收人民的全部利潤，只要牠一面不苛刻到超過了某一部分人的利潤，而變成超經濟的剝削，另一面不縱容別一部人把他們的利潤轉變成土地資本、工業資本、以至金融資本，那也就很好。把私有資本限制在商業資本和借貸資本的領域裏面，對於社會，是不會有很大的危險的。國家只要能夠把握住金融機關，大產業機關和土地，便可以用發展合作社和民間借貸機關的手段，逐漸的消滅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牠一面更可以運用公債政策和鼓勵人民投資國營事業政策，逐漸的吸收民間的借貸資本。爲甚麼單說大產業呢？因爲小產業國家依然可以暫時放棄；牠只須控制住動力，燃料和原料的供給，小產業是不可能有害社會的發展的。

再退一步說，國家對於資本的發展，即使取放任態度，牠只須能使取諸國內者留在國內，那對於社會，固然有資本集中於少數私人的弊害。然對於整個民族資本的力量，是不會減少的。那樣，財政上的收支，只有因爲增加一些貨幣在流通中效力的喪失，可能使金融一時不敷周轉，然而決不會使金融陷於枯竭。只要同時能產生多一些的信用貨幣，以節省硬幣的流

通，以補償貨幣在流通中效力的喪失，金融便也不至有不敷周轉之苦。

我們應該不應該主張取之於農村者盡數還諸農村呢？我們不能這樣主張。因為，農業資本轉變為工業資本，是社會進化必經的階段。我們的合理主張，是要把農村中窖藏的一部份資本，轉變為國營產業資本，而農村中僅供流通的一部分資本，依然還之農村。自然，那時候還可以運用信用機構，以信用貨幣還之農村，而把貴金屬騰出來，以作國家資本建設之用。

因此，中國平時財政政策的運用，主要的是防止民間資本變成內戰資本，防止農業資本變成都市中的買辦資本和享樂資本，防止國內資本變成國外資本。頂合理的方式，是運用民間的窖藏資本，運用信用機構所能騰讓出來的金銀，作為國家產業開展之用，而同時使農村依然保有着適度的流動資本。

× × × ×

說到中國的戰時財政，牠是和貨幣、金融、貿易、國際收支、以及物價等問題聯繫的。在貨幣上，我們必須充分的用紙幣作國內交換媒介之用，而騰出來的全部金銀，作國際支付之用。在金融上，我們必須要限制私人存款的支付，限制對於私人信用的膨脹，同時努力吸收公務員和一般人民的積蓄，務使私人不至有有餘的購買力，以從事於日用品的囤積居奇。我們要把全部的膨脹力量留給國家，要把所有的剩餘購買力交給

國家。在貿易方面，我們要管理貿易，限制私人對於非必需品的購買，同時，限制戰時資源的輸出。在國際收支上，我們要鼓勵華僑匯款，使牠不至因戰爭恐慌而減少，反而因對於祖國熱情的提高而增加。我們同時管理匯兌，使國內資本，無法逃避國外；停付外債，以保存巨數的外流資本。對於物價，我們要統制市場，使日用品價格，不致劇烈的上漲。自然，這在一方面，是和統制金融交相爲用的，而在別一方面，根本的還須維持生產力，甚至要提高生產力。關於生產力問題，農產物的生產，只須在抽調農民壯丁服務兵役的時候，能動員鄉村中的婦女，繼續耕作，大致就不成問題。只有工業品的生產，因爲工業中心，都在口岸，倘使沒有方法把牠移到安全地帶，那真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

× × × ×

目下有許多人把戰時財政問題集中在徵收的方式上，那是輕重倒置，見小不見大，而永遠也搔不着癢處的。

因爲中國目下的徵收方式是買辦的方式，是集中在敵人炮火所及的口岸的，所以，一到戰時，自然大部份都不適用。這在徵收方式上面，自然要有一個大大的改革，然而，只要我們能夠把握着上述對於貨幣、金融、貿易、國際收支、以及物價的幾個樞紐，徵收方式的澈底改革，對於整個的財政，倒並不是最嚴重的問題。

因為中國未來的戰爭是一個存亡所繫的民族解放戰爭，我們是必須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去對付牠的。多數人在前方拼了死命，讓少數人依然躲在後方享樂，那固然是不應該有的事；多數人的血肉犧牲爭取了民族解放之後，讓少數人再來在那基礎上面建立起資產階級的天堂，那更是不可能的事。老實說：在未來的戰爭當中，我們不但要推翻帝國主義的勢力，而且要同時解決社會問題——我們是要在戰爭的過程當中，奠定了新社會制度的基礎的。中國的財富階級中有天良、有民族意識的人們，應該會明白“毀家紓難”本來是分所應爾。少數沒有天良、沒有民族意識的，我們還能顧惜他們的私利、助長他們的私心嗎？簡單的說：爲了要解決戰時財政問題，我們是要管理人民的財產，徵收一切人民的剩餘資財的。

自然，在實行的時候，我們要運用高度的技術，保持極度的公平。在技術方面，我們要有先後的層次，要有不同的方式。在公平的原則之下，我們要運用民衆組織，作很精密的調查；我們更得運用民衆互相勸說的力量，儘可能的使大家了解而悅服。

累進的所得稅和遺產稅，不但應該是戰時的財政來源，而且應該是平時的財政來源。可是，在日下，因為帝國主義勢力的庇護，因為封建殘餘勢力的阻礙，我們外不能徵取集中在租界的大數產業利潤和遺產，內不能徵取依舊分散在軍閥、官

僚、以及豪紳階級掌握中的利潤和遺產。等到戰爭起來的時候，那個情形就大不同了。多數依然還需要一個祖國的資本家，自然會放棄了他們的託庇外人的生活，自然會提取他們寄生在租界或者國外的財產，而繳納到國民經濟的體系裏面來。少數甘心做亡國奴的，甘心和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絕緣的，便會毅然決然的，攜捲所有，到外洋去做一個無國之人——自然，那時候外洋能不能有他們安居的地帶，也是一個問題。這樣，就把一向寄生在租界的中國資本家，劃成了兩條截然不同的陣線——奴隸陣線和國民陣線。奴隸陣線裏面不需要祖國而願意讓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吐棄的一小部份人，自然不能再要他們負擔戰時的經費；這就在帝國主義列強，也是無法制裁這一類無恥之徒的。大多數願意回到國民陣線裏來的資本家，在平時國家無法徵收他們的所得稅和遺產稅的，到這時却一律可以依法徵收了。這種陣線的劃份，不但是在戰時財政徵收上有極大的補助，在鞏固民族陣線的意義上尤其是十分重大。然而，這種偉大的功業，不是有一個反帝的戰爭，是不可能完成的。

對於留滯在內地的軍閥、官僚、以及豪紳階級，也只有再在戰爭的時期，在“全力對外”的口號之下，才能用民衆的力量，使他們很自然的放棄了特權，而順服在抗敵的政權之下。在那時，在民衆的檢舉之下，他們不可能隱蔽他們的利潤和財產，

在民衆的監督之下，他們也不可能違抗國家的徵收。所以封建殘餘的勢力，在戰爭當中是可能自然肅清的。這也不但對戰時財政有極大的補助，在整個民族解放上，也有重的意義。這種功業，我們只有在戰爭當中是可以很自然的取得。不然的話，我們便得用專門對內的革命手段去爭取，那就比較的艱難了。

× × × ×

除了捐稅政策之外，我們自然還要充分運用公債政策，以吸收民間的儲蓄，和捐稅政策所徵收不到的利潤。自然，捐稅是不能過於苛重的，否則便要使一部分的資本家起了反感，甚至起了反抗；在統一戰線的意義之下，這種不必需的反感，我們要儘可能的避免。我們假如用公債政策，補助捐稅政策的不足，那末，在國家戰時財政的需要上，是同樣的可以達到目的；而在負擔的人們看起來，接收了有價值有利益的公債，却比較一去不回的捐稅好得多。而且，只要國家能夠有很正確的整個經濟政策，公債的收益是不可能造成資本的集中，而危害將來的社會的。

一個國家在平時預算內，不應該以公債發行來抵補財政的虧缺；而在戰時，公債的發行却是天經地義。我們要用公債的發行，避免通貨的直接膨脹。那就是說，我們應該以公債發行彌補財政上的全部虧缺，而不能用紙幣發行彌補這種虧缺。

但是通貨應該不應該膨脹呢？換句話說：紙幣是不是需要

增發呢？自然是需要的。在軍事收支浩繁的時候，平時的一些紙幣發行數，自然是不夠流通的；所以，我們必須有更大的發行數。不過，增加發行的數目，也不能超過實際的需要。倘使民間在通貨膨脹的過程中，留存着過多的游資，那末，那種游資就會變成商品市場中囤積居奇的資本，而要抬高物價，或者甚至因為人民購買力的增高，而變成資財的浪費。因此，政府在紙幣發行的時候，固然應該十分審慎；在發行以後，還要不斷用強制儲蓄及發行公債等手段，吸收民間的游資。

除了上述的種種之外，募捐運動自然要努力推進；範圍不限於國內，而且要普及於國外，使華僑和各國的同情大眾，都能貢獻他們的熱情。又年來民衆呼聲中，尚有沒收敵人及賣國賊財產之一項，這當然是應有的，不過能得幾何，却是一個問題。敵人的財產，多在口岸，即使沒收，恐怕因為敵人海空軍力的攪擾，不見得能利用。唯一可能沒收的敵人財產，恐怕只有債款；但是，到那時，應該是一切外債都停付的。至於賣國賊的財產，因為他們早已不準備做中國人，恐怕已經全數在國外了吧！

有人主張恢復厘金，我們是要反對的。這種割裂民族的封建方法，我們還應該使之還魂嗎？

總之，中國戰時財政的意義，是兩方面的。牠一面要集中民族力量，加以妥善的運用，以延長抵抗時間，以取得最後的勝利；一面還要消滅階級和特權，以樹立新社會的規模。

非常時財政問題的再檢討

莫 湮

一 先決問題

在亡國滅種的危機瀕於千鈞一髮的今日，我們的學壇上突然提出了一個非常時的財政問題。雖則這個問題的提出是已嫌太遲的了，不過正因為是如此，我們就更有加緊研究的必要。因為這是一個這麼重大的問題，既足以左右我國在非常時期的國力，又是與整個國民的生活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不過所謂非常時究竟是指什麼時候呢？這是我們討論非常時財政的先決問題。雖然誰也不曾對此作過具體的說明，但是在一般的語意中，似乎都是指“神聖的救亡戰爭時期”而言。然而這裏我們覺得有些可疑：即第一，把非常時的內容解釋得這樣是否有武斷的嫌疑呢？第二，將來我國是不是真有這樣一個非常時呢？我們之所以有這樣的疑問者，那是因為有人這樣告訴我們：“中國既未準備以武力收回東北”，而可解決中日問

題的唯一方法，只有“力求中日利益兩全之道，一方面保全我們的領土完整與主權，同時亦設法滿足日本國民(?)所期望的需要！”（見外交部半機關報的‘外交評論’第六卷第一期‘中日問題與遠東局勢’一文中）在我們的“貴人”這樣的信條之下，那還有什麼“神聖的救亡戰爭”的非常時可言呢？

不過無論如何，從民族與國家的立場上說，神聖的救亡戰爭是急需有的，而且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也必定會有的。因此真實的非常時也必有一天會到臨的，而非常時的財政，也應有準備的必要。蓋我國的財政，平時早已大失均衡，軍費政費，向來多賴公債、增稅來調濟的。現在公債已至發無可發的地步，銀行的準備也大部份都變了政府的債券；同時增稅又使全國的產業與國民的經濟生活，直接受其侵蝕。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若神聖的救亡戰爭一旦爆發，則不但軍費上的支出將幾倍地增加起來，並且關稅、鹽稅、統稅以及一切國庫收入的泉源，因受軍事的影響（如海口被敵軍封鎖，沿海城市化作戰場或甚至被敵軍佔領等等）也必將大形減少。這樣很明顯的，在將來戰爭期內，我國的財政將成怎樣困難的問題是不難想像的了。

二 非常時財政政策的原則

我們知道，戰鬥力之決定於財政關係的是非常密切。現在

擺在我們面前的財政狀態是這樣的惡劣，那麼爲保證我們神聖的救亡戰爭的勝利起見，擬用某種最合理的辦法來調節將來財政的困難，使我國的戰鬥力不因財政的缺陷而受損挫。這在今日，確是一個非常迫切而且非常嚴重的問題，所謂非常時財政問題的意義與實質，我想也就在這裏。

爲着便於我們的討論起見，這裏我想把非常時財政政策的原則問題先來說明一下。

非常時的財政政策，固然已不能如平時的原則，必需以不損害國民經濟生活的發展爲條件的。但是因籌劃非常時的財政，其所給與國民經濟上的損害則又需減少到最低限度。因爲國民的經濟生活若受過份的打擊，雖則當時的戰費是有了辦法，但國民對於戰爭的意志力就將因此低下了。這樣戰費的有着落，固然在表面上是增大了我們的戰鬥力，但是無形中却因國民對於戰爭熱情的衰落，我們的戰鬥力實際上反可低落的。所以在非常時期內，爲着保持優勢的戰鬥力起見，浩大的軍費支出雖則使國民的經濟生活不能不受多少損失，但是這種損失，在原則上必需減少到最低限度是對的。

尤其是像現在的我國，平時的政策已普遍地損及了國民的經濟生活，到了戰時，國民的經濟生活自然是將受更大的損害的，因此，上述所謂避免戰費的過分損害國民的經濟生活，在我國說來就有特別嚴重的意義了。

其次，我們覺得確立非常時的財政政策時，原則上還有一點應該注意的，就是財政負擔的分配問題。因為籌劃同樣的一筆款子，因其分擔情形的不同，則其影響於國民戰鬥意志力也是不同的。例如現在我們要籌劃一筆龐大的戰費，若籌劃的方法是基於國民均擔主義的，則全國貧民的生活，就將從此陷於絕境。因為我國的貧民大部份都是赤貧的。平時國稅既已偏重於國民均擔主義，而貧民們的國稅擔負實已超過了應有的負擔力以上了。現在若再將其負擔加重，則他們的生存餘地就將完全喪失。這樣國民對於戰爭的意志力將受重大的打擊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一個人如見其家屬在飢餓之中，則他的本人雖有捨身救國的決意，但在長期的戰爭過程中，他的最初抗敵的決心畢竟是難保不發生動搖的。

反之，若籌劃戰費的辦法，是側重於富有者方面，則富有者雖然因此所受的損失較大，但是其影響於全體國民的戰鬥意志力則就不同了。因為第一，富有者人數是來得少，而且他們的負擔重些畢竟不至於使他們的生活降低到和常人一樣。第二，我們知道在將來的救亡戰爭中，是需要非常廣大的作戰人員的。這種作戰人員，自然都是貧民。若富者能多擔負戰費，表示他們也有抗敵的決心，則這不但不會減低國民對於戰爭的意志力，並且還多少可以因此以提高國民們對於戰爭的熱情。

所以籌劃一筆同樣大小的戰費因其籌劃方法——即所謂非常時的財政政策的不同，則其影響於救亡戰爭中戰鬥力的作用也有不同。我們知道在戰爭時期中國家最大的目的就在於爭得戰爭的勝利，而財政上最大的任務就在於充實國家的戰鬥力。遵守着這樣的原則，再配以我國現有的具體條件，則我們認為非常時的財政政策，不但是應該盡量減少國民的經濟生活受過分坦負的損害，並且籌劃戰費，還應該盡力避免增加對貧民們的坦負。

三 非常時財政政策的批評與建議

明白了上述的原則之後，我們就開始來討論非常時的財政政策吧。

各地的學者們，對於非常時的財政問題已提出了許多意見與辦法。把他們的意見總括起來，大概最主要的辦法可分下述諸點。(一)有限度的通貨膨脹。(二)徵收所得稅。(三)食鹽公賣。(四)加緊經濟建設。(五)增發公債。現在我們就順着這個次序來討論吧。

一、實行有限度的通貨膨脹。主張這種辦法以調濟非常時的財政的，有馬寅初，蕭淑宇等諸氏。馬氏初未把有限度明顯的說明，而蕭氏則以為法幣增發至現有發行額的（約十億圓）二倍（約二十億圓），法幣的信用是不會動搖的。從表面上看來

這好像是一個很好的辦法，有效力而且又簡單。但是按諸實際則事情未必是這樣的。首先我以為蕭淑宇先生的主張即將法幣增發至二十億圓，而法幣的信用不致動搖，這是完完全全的空話。在原則上說，紙幣的流通量超過社會必需的限度時，牠的購買力是與其數量成反比例的。這是經濟學上最基本的常識。假定現在我國必需的貨幣量為十億圓（大概實際上與這一數目是相去不遠），那麼若再增發十億圓，這顯然必使法幣的購買力將跌落一半的。誠然，社會的敏感性有時常沒有像天平秤般的那麼機械，在現在的我國社會中，多發行十萬廿萬元的法幣，的確法幣的購買力（即法幣的信用）也許不見得會動搖，但是若增發至二倍，而法幣的信用還不致發生動搖，這似乎是大近於“神話”了。是的，蕭先生主張將增發的法幣用於建設生產上的，但是這畢竟不能使法幣流通手段的本質有什麼改變。

其次通貨膨脹是否能有限度，也是個可疑的問題。因為所謂非常時，決不是一年半載的短期間的。眼前認為財政困難沒有法子，只得增發幾億元法幣以資調節。但是過了不久，財政顯然還將更加困難的了。因為（A）戰費支出只會增加的，（B）因第一次增發幣後，法幣的購買力必定低下，這樣就使原來國庫的收入也即形減少。那麼在這樣的時候，試問是否還將增發法幣呢？如果增發，眼前的財政困難固然得暫時解決，但是不

久，因第二次增發法幣的結果，法幣的購買力就更低落了。而軍費尚繼續需要，則這時候又將怎樣呢？固然我們若有決意，此後不發紙幣了，而財政則從別方面去設法，則通貨膨脹就成爲有限度的了。但是這是理想，在現實的事實上恐怕既經一次膨脹過，很難有限度的吧。歐戰時，德法等國的實例不是這樣的嗎？

再則根據我們前述非常時財政政策的原則來說，以通貨膨脹來調節財政的困難，這是非常之不合理的。因爲在通貨膨脹之下，物價普遍的騰貴是不可避免的。這樣其作用就等於把戰費的擔負側重於多數的貧民方面，這對於國民的戰鬥意志力有多重大的損害是顯而易見的。既然非常時的財政是以充實國家的戰鬥力爲其首要的任務，則通貨膨脹，在原則上顯然是不能當作調節非常時財政的辦法的。固然當我們神聖的救亡戰爭，已達最後的決戰階段，而因爲這樣的緣故，戰費又將大增的時候，如果戰費無法調達，則爲着保證我們最後的勝利起見，通貨膨脹政策也可暫時採用一下的。因爲這時候戰爭已即可結束，採用通貨膨脹政策是既不至繼續膨脹下去，又不會怎樣影響於國民戰鬥意志的放下了。但是現在戰爭尚未開始已準備通貨膨脹，而將來戰爭一爆發即實行通貨膨脹，這種辦法顯然是等於我們自己破壞自己的戰鬥力。這那裏還能算是非常時的財政政策呢？

二、至於第二點徵收所得稅的問題，馬寅初何濂等諸氏是主張最劇烈的了。我們覺得這種辦法，也有相當的妥當性，不過，我們同時覺得有補充的必要。就是現在財部所擬定的所得稅範圍應該局限於有產者方面，第二所得稅的基礎不應該建立自俸給生活者方面。但是，徵收所得稅，也不是頂可靠的辦法。因為第一、在領事裁判權保護下的外人財產，當然無法徵收所得稅，第二、中國資本家多數是外人的買辦，倘使他們因此而求得外人的掩護，所得稅也不可能在他們身上發生效力，結局，所得稅只有轉嫁於薪俸生活者和勞苦大眾。

三、食鹽公賣，這是蕭淑宇先生的主張。蕭先生以為食鹽公賣也可以增加非常時財政的來源，抽象地說來，這的確是有可能的，而且這對於戰時經濟調節上也有幫助的，不過非常時的財政泉源若從食鹽公賣上來補充，這似乎是與非常時財政的任務相矛盾的。因為這樣的結果無疑將抬高鹽價，而其作用就等於增加現時的鹽稅，蓋其負擔是偏重於貧民方面的。

四、加緊經濟建設，積極地謀國庫收入的增加。這也是蕭淑宇先生的主張。發展國民經濟，原是充實財政的積極辦法。但是現在的問題不是抽象的理論而是要求有現實的效力。現在我國經濟在世界經濟恐慌與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顯然是在不斷的破產過程中；而幾年來我國“經濟建設”的成績，除了幾條汽車公路之外，似乎再沒有什麼可言了。在這樣的情形之

下，誰說有回天之力能使現在殘存着的工廠商店不關門，這已是無人能相信的。那麼要想從加緊經濟建設來謀國庫收入的自然增加，以充實非常的財政，那恐怕是過於理想了吧。

五、最後關於增發公債，我想馬寅初氏這種意見，對於非常時的財政，恐怕不會有什麼幫助的吧。因為在那時候現有的公債是否還有餘力來償付，這完全是個疑問。如果舊債無法償付，新債似乎是沒有再發的可能了。假使說，舊債的信用在非常時尚能維持，則此後所能新發的債額，恐怕也是很少的了。因為我國的公債實已發至無可再發的限度了。

此外，在許多學者的意見中有主張舉行外債，實行統制經濟等等辦法來調濟非常時財政困難的，但是因為外債的決定權不是在我國，所以我們現在尚不能先打如意算盤。而統制經濟又不易實行，更談不到是非常時的財政政策。所以我們不再一一批評了。

依據上述非常時財政政策的原則在我國可以實行的辦法，我以為還有三種：第一就是以前已經有人提出過的，沒收敵人與漢奸們的財產以及我們應付敵國的賠款借款等，將其全部撥充非常時財政的開支。第二就是改造我們現時中央及地方的財政支出。第三就是開徵戰時財產稅與遺產稅。

前述第一點很簡單，這裏想不必再加說明了。第三點只要能夠切實施行，事先嚴格地舉行全國的財產調查，則所成爲問

題的都是技術上的了。至於第二點，因一般的人比較不易明白，這裏我想約略解釋幾句。

所謂改造財政的支出，可以分爲如下三端：

A. 就是停止建設費的支付而轉充非常時的戰費。因爲現在不論中央與各地方的建設都是集中在幾條汽車公路上的，這種公路極大部份在經濟的意義上簡直是非常之少。而平時各公路上的長途汽車公司的營業，也多半是收入不抵支出，這種汽車路繼續建設下去，簡直等於將國民的餘款自送給外國汽車汽油公司的資本家，所以在非常時期內，不但現有各級官廳的一切公路建築工程應該停止而將其所有的費用都搬入國庫，以充非常時財政的開支。並且各省的建設廳與建設委員會等機關也可裁掉，而將原來用於該項機關上的政費也撥歸國庫，因爲這類機關都是衙門大而事情少的，縱有必要也只要在省政府中設一建設科就行了。

B. 在非常時期內黨費或者也可調用。若國民黨的諸公能更進一步，求其“以身作則，爲民效勞”的精神，則在非常時期內恐怕是自動地會替國庫與人民節省這筆開支，而將其取自黨外的黨費全部歸給國庫的。如果能夠如此，則國庫不但可節省一筆開支，並且各公務人員百分之二的黨稅等就成爲國庫的新泉源了。事實上國民黨之擔負我國政治上的實際責任者，是出於其自願的，他決不是一個普通統治機關。所以他的政

費，在原則上說來是應該自己擔負的，猶如意大利的法西斯黨，蘇聯的共產黨，德國的國社黨以及英美日法等各政府黨一樣。

C. 就是勵行會計檢查制度，節省貪污官員的私支。在官員之中貪污之徒自屬難免，俗諺所謂“做官發財”，自然不是偶然的話，我國公費每年入於貪污官吏私囊者，究有多少，這雖不得詳知，但是大凡做過幾年官將的，往往私產巨萬，這就不難見其大概了。如果能夠嚴格的執行會計檢查制度，并加嚴貪污官員的治罪條例，則在這方面，必可節省國庫與地方財政不少的支出，是無疑的。

上述各點，是我就個人所想到的而言，實際上或者還有其他更好辦法的，希望大家都來加緊研究，庶幾能完成一個最合理的非常時財政方案。

中國的新公債案與財政

千家駒

財政部於本月一日發表發行統一公債與整理公債一案，是近幾年來中國財政史上的一件大事，他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政府歷年發行的公債庫券憑證等，截至本年一月底止，總共是十四萬六千餘萬元，名稱有三十多種，自二月一日起，概調換為統一公債。統一公債的發行額為十四萬六千萬，年息六厘，償還年限設為五類，甲種債票十二年還清，乙種十五年，丙種十八年，丁種二十一年，戊種二十四年。上列五種債票，概為每六個月還本付息一次。

(二)政府為“完成法幣政策，健全金融組織，扶助生產建設，平衡國庫收支及撥存平準債市金融”之用，發行復興公債三萬四千萬元，本年二月一日起發行。

在表面上看來，這種公債的整理和發行似乎和我們老百姓沒有多大關係，其實是大大不然的。我們要知道，公債和租稅在本質上沒有什麼大的差別，不過租稅課徵於現在，公債責

償於將來；租稅是赤裸裸的人民對國家經費的負擔，而公債却是租稅之一種特殊形態，即應募者與納稅者，非同於一人，應募者以投資的方式購買公債，納稅者須在將來始負擔此項債額。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終的償債者還不是我們民衆！（關於公債的本質，我想將來有機會再談）。所以這一次財政部的整理公債，我們站在民衆的立場，是需要一個正確的認識的。

本文的要旨，便是極簡單的說明這一次財政部爲什麼要整理舊債，發行新債？牠所包含的意義是什麼？牠將給予我國財政以及我國的國民經濟以怎樣的影響？這種問題的檢討，不特可以使我們明瞭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地位，而且我們還可藉此推測此後政府財政的動向若何？

舊債爲什麼不得不出於整理，很顯然的爲的是要騰出基金來發行新公債，新公債爲什麼不得不發行，則唯一的理由是要彌補中央財政收支的不敷。原來我國政府好像一個破落戶，他每年雖有六七萬萬元以上的收入，然因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用在軍務費和債務費上，所以天天在鬧窮。不過所謂軍務費並不是什麼“國防費”，也不是預備帝國主義的侵略的軍事支出，牠大部分多用在內戰或“剿匪”軍事上。債務費則一部分是用來償還外債及賠款，一部分爲償還內債基金。這種軍務費及債務費的支出，在民國二十三年度的預算中，是五萬八千九百萬元，二十四年度是五萬九千五百萬元（這都是經中央國

庫的支出，事實上尚不止此數）。因為軍債費的逐年增加，所以中央收支表現為長期的不敷，民十八年前每年不敷尚不過為數千萬元的，到十八年後即激增為一萬萬元以上，近年不敷額更增至二萬萬元左右。例如有人估計最近三個月中央財政的不敷即達八千萬元，這是多麼驚人的數字呵！財政當局彌補收支不敷的手段不外下述數種：一、發行公債；二、開闢稅源；三、舉借外債；四、通貨膨脹。先說第一種，這是宋子文長財政部時代所視為籌款之唯一法寶的，綜計宋部長時期共發行內債達十一萬萬元左右，但到了以後終於走到此路不通了，因為公債發行得太多，基金便要感不敷，舉債以還債的結果，就至稅收所入尚不足以償債（且不說公債濫發給予國民經濟及金融市場的壞影響），所以卒有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債券延期還本付息的實行，我當時即曾指出了二十一年債券變更還本付息是南京政府公債政策破產的標誌，而宋子文先生之所以不得不辭去財長，原因亦即在公債的此路不通。迨宋辭孔繼，孔對開源方針，似已移轉其目標於增稅（自然亦不放棄公債之發行），綜計在孔任期內，為國家稅收的最大宗的關、鹽、統三稅，稅率無不一增再增，其間雖亦頗著成效；然因第一，稅收的增加，尚不如支出加增之速。第二，近年內大批版圖的喪失，東北國稅全被偽國截留；走私又復盛行。第三，近年來因國內外經濟的不景氣，稅源自難旺盛。這是關鹽統三稅增稅結果，仍不能平

衡收支的一般的原因。再就個別來說，關稅因有國際帝國主義的利害關係（民十八年所謂關稅自主，原屬欺人之談），稅率祇能為有限度的增加，且稅率過高，輸出入貿易即因之而萎縮，得之於此者將失之於彼，故關稅收入雖年有進展，但決不能無限度的增加，此其一。以言鹽稅，鹽稅自經十九年後，經三數次的名為整理實則加稅的成績，稅收增加，如響斯應，馴至產鹽之區，人民買不起鹽吃，冀省人民刮食硝鹽，還要受稅警的武力干涉，然而等到大多數農民都不得不淡食時，政府的稅收自然也大受打擊了。三言統稅，統稅為國民政府舉辦新稅中之最著成效者，年來迭次加稅，雖然是洋商稱便，華商叫苦，每增稅一回，華商則加一重桎梏，真所謂“一擱一掌血，一鞭一條痕”，其中詳情，我們也不忍細說，然而等到華廠都關門相繼倒閉迭見時，政府由增加統稅所得的收入，也就着實可憐了。（關於統稅增加稅率，給予我民族工業的影響，作者曾在二十四年一月在大公報發表一文，題‘去年中國財政之回顧’可以參看）。占國家總歲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關鹽統三稅，其所收的增稅成效都不過如此；其他稅收更不必說了。說到舉辦新稅，如所得遺產等稅，本為歐西各資本主義國租稅收入的大宗，然我國一則因工商業素不發達，收益及財產均無統計及調查，再則被課者既為富商及大資本家，課之易遭反感；且舉辦新稅，非叱嗟所能辦，而軍事孔亟，豈容稍稽時日，此增稅一條路，亦談不

容易者二也。舉借外債，自然是一個好辦法，無如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國際的暗礁方多，尤其是“友邦”反對我國向英美舉行借款，此所以近數年來的外債，除棉麥借款終算代美國義務的推銷一回過剩商品外，尚少有所成就者三也。通貨膨脹，這雖然也是一種辦法，可惜同時也是最危險的一種辦法，稍一不慎，便足以招致全國國民經濟的總崩潰。自中央、中、交三行改組及去年十一月四日廢棄銀本位後，各方面對政府的是否將採取通貨膨脹以救濟財政難關都抱懷疑態度，但到最近為止，政府似乎還不曾毅然決然走這一條路，然此乃非不敢也，蓋有待也。

在這政府的財政政策徬徨歧途的時期內，財政難關將怎樣被打破，自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件事。依我個人推測，大概還不外乎用老方法，即向銀行暫時借墊，但這種借墊究竟不是久遠之計，雖然中央、中、交和財政部現在都已一家了，然借墊過多，是要影響到銀行本身的安全的。所以這時的財政展望就祇有兩種前途，犧牲通貨呢；還是犧牲公債。犧牲通貨即走紙幣膨脹的路，犧牲公債，即取公債延期還本付息的辦法。結果財政當局決定走第二條路了，二月一日統一公債案的決定，便是度過目前財政難關的一種緊急措施。

按照統一公債的規定，所有的債券，利息不變，但還本付息的期限，則一律予以延長。例如二十二年愛國公債本應於二

十五年十一月償清的，現在則展至民三十七年一月，約延至十一年有奇，這樣一來，每期的內債基金自然可以騰出大部分來，發行新債，即有可能。第二，統一公債一律是每六個月還本付息一次，這與以前也是不一樣的，以前凡庫券多每月還本付息一次，亦有每三個月還本付息者，現在則一律改為每半年。此後，財政部於財政的調度上當有很多的方便，正如一個人以前月月要還債的，現在隔半年總一回還，省得每月之“臨時籌墊”。手續固方便，但在債信的維持上，却無疑的更投了一重暗影。不過，現在我們倒不必站在債權人（持票人）之地位，為他們來打算盤，我們祇要站在民衆立場，看看這次變更舊債及發行新債到底表示着怎樣的一種意義？

第一，這次舊債的整理是表示政府公債政策的再度破產。我國自有內債以來，整理公債共已有過兩次，一為民國十年的整理案，一為民國二十一年的延期減息案，至此次統一公債則可稱為第三次。凡此三次莫不是濫發公債後的反動，即基金既不足以償債，勢惟為宣告舊債破棄的一途，變更舊債還本付息期限或減低債券利息即為舊債破棄的一種方式。我們這兒決不是站在持券人立場而主張債信的必須維持（事實上中國持券人多半是高利貸性質的債權人，叫他們再多吃點虧也使得的），但債信之不能維持却無疑是政府公債政策破產的明證。（自然，這我所說的是在現存制度下的債信問題，若在社會生

產關係變更的國度，則國債全部破棄，亦屬理所當然，不能視為財政基礎動搖的明證）。

第二，這次舊債的所以不得不出於整理，是因為財政部要騰出基金以發行新債，復興公債的三萬四千萬元，不但在發行額的巨大上是中國空前的一次內債，且由此更可以知道中央財政不敷之數，已決非三數千萬元所能救濟。但即此三萬四千萬元而論，依我看來，最多也不過使度支當局在半年內免得東借西挪而已。因為這三萬四千萬元當然還是拿到銀行去抵押的，抵押之數，則不過二萬萬元左右，這二萬萬元除去償還中央，中，交三行之墊款外，所餘當已無幾，而現在中央預算的不敷，每月即達二千萬元之譜。所以這巨額新公債最多亦不過維持政府半年的開支，在半年後中央財政如何支撐，依然是一個絕大的疑問。

第三，今後南京財政的動向恐怕還是不可避免的要走向通貨膨脹一條路上，而事實上這次復興公債的發行，與通貨膨脹也是異曲而同工的，因為這項公債既並不在市面流通，即並不在證券市場公開出售，牠的大部分即存在中央、中國、交通三行手中，三行即可以之作保證準備而發行鈔票。

第四，這項新公債的用途，大部份當為“平衡國庫收支”，質直地說，即為彌補軍政費的不足。至於所謂“完成法幣政策，健全金融組織，扶助生產事業”等等美麗的辭句，當不過為一

種陪襯，這又是明眼的人一眼可以看得出來的。

第五，這次變更舊債還本期限，爲什麼不會遭到持券人的反對呢？這我們祇要想一想現在持券人的大部分實爲滬上幾個與政府有密切關係的金融資本家，中交兩行自改組後且已與中央銀行鼎足而三，成爲財部的官辦銀行，他們與政府正所謂是“患難與共，禍福相同”的難兄難弟，爲了維護政府的政權，爲了維護自己的地位，勢都不得不擁護財部的公債政策；至小額之持券人則根本沒有發言的可能和機會。二月一日的統一公債案發表後，立即取得了上海銀行家的同意與贊助，這決不是偶然的。同時因爲上海金融家的與政府的財政當局打成一片，南京政府此後再不得不執行與上海金融資本（殖民地的金融資本又是由買辦資本蛻化而來的）利益相一致的國策，這是我們所應該認識的又一點。

三萬四千萬元的復興公債依舊救濟不了南京政府的財政困難，犧牲公債的結果祇不過使中央能勉渡五六個月的難關，而因債信喪失，債市跌落，此後欲發行新債，當更感困難。故我預料在不久的將來，犧牲通貨問題仍將不可避免的提出於財政當局的面前，但犧牲通貨又必然會變成全國經濟大破產的導火線。不過無論是犧牲公債也吧，或犧牲通貨也吧，最後的負擔者和被犧牲者，怕還是我們一般下層民衆們，所以我們倒底是不應該取隔岸觀火態度的！

所得稅的開徵及其前途

蔡 問 寰

跟着財政危機的尖銳化，屢次流產的所得稅開徵問題，又被財政當局提出來了。

這一次的舊案重提，似乎不能和過去的“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官樣文章相提並論；反之，這一次要在立法院休假前趕完立法手續，似乎表示着財政當局對於所得稅的開徵，確有幾分決心，這種決心是在財政危機空前嚴重的環境下面增長起來的。我們知道，目前的中央財政，的確已走入了絕境，二十四年度的財政赤字，竟達三萬萬二千餘萬元之多（一九三五年中國經濟年報）而二十五年度的實際虧空，也將達到二萬萬元的高度（立法委員陳長蘅氏在立法院報告審查廿五年度總預算時的話），儘管在六月三十日立法院所通過的二十五年度總預算案中，歲入歲出各列九萬萬九千餘萬元，表面上是“收支適相抵合”了。而實際上這種魔術上底玩意的預算表，絕對不能掩蓋赤字的日益增大的，特別是在受到走私的嚴重打擊

以後，成爲中央財政底台柱的關稅，發生了根本動搖。這使財政危機的程度，更加深沉而尖銳了。財政當局對於這樣一步緊迫一步的財政危機的對策，在二十四年度下半年是增發不兌現的新法幣來暫時支撐過去了。可是緊接着而來的二十五年度的新危機，將要怎樣應付過去呢？“節流”是無“流”可“節”了，而“開源”也無“源”可“開”了，結果，除了更進一步地向“友邦”求援以外，不得不在國內拚命地羅掘，於是，這個難開的源——所得稅，便成爲財政當局企圖羅掘的對象之一了。

所得稅在許多租稅中，確是比較“公平”的一種直接稅，因爲我國的中央稅收，過去和現在百分之九十以上，還是建築在間接稅上面，如關稅鹽稅統稅等等，都是可以轉嫁的，於是捐稅的全部負擔，便大部分落到勞苦大眾的身上。至於所得稅，牠是採用累進稅率，直接從納稅者身上徵收，沒有轉嫁的可能，同時，在戰爭期間，可以利用牠的伸縮性，而避免戰時的財政恐慌，所以就所得稅的稅制本身說，是比間接稅好得多了。因此，在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中所得稅在全部稅收裏面，已站在重要的地位。在一九三二年，英國所得稅在全部稅收上所佔的百分比是四三·三，德國是二三·〇六，法國是三〇·一，美國是五〇·七，日本是二〇·二。而且徵收所得稅的國家，在一九二六年歐洲已有四十國，亞洲也有三十二國，美洲大部分國家，也都徵收所得稅了。

我國對於所得稅的倡議，遠在清末就開始醞釀，民國三年公布了條例二八條，民十民十七民十八又相繼被提出來，終因難於實行而擱下了。去年又草成所得稅條例三一條，但是在“決而不行”中溜過去了。到了今年，財政危機實在太嚴重了，最可靠的海關稅收，已經在這次總預算案中自動減少了二千餘萬元之鉅，而跟着帝國主義侵略的加緊和國民經濟破產的加深，危機更會劇急地尖銳化起來，這個嚴重的威嚇，使財政當局不得不拚命地想法開源，雖然明知會碰着許許多多的硬釘子，但爲着挽救垂危的命運，也祇好硬着頭皮來碰碰看了。因此，舊的所得稅條例草案，便被當局很認真而熱烈地由修正而辯論，而審查，而通過了。

現在把本月九日立法院所通過的所得稅暫行條例的主要內容來檢視一下吧。

徵稅範圍與免稅範圍：

第一類(營利事業所得)		第二類(薪給報酬所得)		第三類(證券存款所得)	
徵稅	免稅	徵稅	免稅	徵稅	免稅
(甲)公司商號行棧工廠或個人資本在二千元以上者 (乙)官商合辦者 (丙)屬於一時者	不以營利爲目的之法人所得	凡公務人員自由職業者及其他靠薪俸爲生者	(甲)每月平均不及三十元者 (乙)軍警官佐士兵公務員因公傷亡之卹金 (丙)小學教員之薪金 (丁)殘廢者及無力生活者之卹金養老金贍養金	凡公債公司股票及存款等利息所得	(甲)各級政府機關存款 (乙)公務員及勞工之法定儲蓄金 (丙)教育慈善機關或團體之基金存款 (丁)教育儲蓄金之每年所得未達一百元者

稅率：

第一類

所得合資本實額	稅率
百分之五至不滿百分之十	千分之三十
百分之十至不滿百分之十五	千分之四十
百分之十五至不滿百分之二十	千分之六十
百分之二十至不滿百分之二十五	千分之八十
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者	一律千分之一百

至於第一類丙項所得不能依資本額計算者，依其所得額

課稅。

第二類

每月平均所得超過額	超過額十元課稅率
超過六十——一百	一角
一百——二百	二角
二百——三百	三角
三百——四百	四角
四百——五百	六角
五百——六百	八角
六百——七百	一元
七百——八百	一元二角
八百以上(每超過一百元超過額每十元增加二角)	

第三類 一律千分之五十

估稅方法：

計算所得稅的方法是：第一類以純益額計算課稅，第二類按月平均計算，第三類以每次或結算時所付給之利息計算。至

於估稅的根據，是依據扣繳所得稅者或自繳所得稅者的報告，然後再由主管征收機關審查。

從這個內容看起來，牠的範圍已經縮小了許多。比方課稅範圍祇是拿純收益為標準，而不是拿總所得為標準，而且農村和都市中的巨量地租以及每年有幾十萬萬交易的房地產公債等等的投機所得等等，都沒有包括在徵稅的範圍內，然而這些我們不要管牠，我們現在所要指出的，就是連這樣範圍狹小的特殊所得稅，是不是能夠全部實現。

現在，我們就來看一看，這些書面上的決議能否成為施行後的事實。這裡，我們不想批評所得稅暫行條例是不是完善以及有沒有缺點的問題。這些技術問題，祇好讓那些專家學者們去貢獻他們的意見。我們目前所要注意到的，不是所得稅的本身問題，而是所得稅以外的客觀條件問題，換言之，就是可能不可能實行的問題。

我們可以大膽地說一句話，所得稅暫行條例所能夠實現的，恐怕祇有那些最不重要的部分，換句話說，就是那些抵抗力最小的部分，至於要想全部或主要部分的實現，恐怕在碰到許多不可超越的困難的打擊之後，祇有感到幻滅的悲哀！

所得稅順利施行的基礎，必須建築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上面，就是說，必須建築在資本主義經濟的高度發展上面，因為國民經濟的高度發展，社會各階層的所得，也跟着增高。同時，

政治權力的集中，主權領土的完整，以及賬簿組織的完備等等，都是所得稅順利推行的先決條件，而在我們中國，正缺乏了這些條件。

首先，在所得稅施行的過程中所碰到的巨大阻礙物，便是帝國主義的勢力。因為中國的發號施令者，始終帶着“奴隸相”。因而帝國主義的勢力便能夠絞殺中國的一切設施，所得稅也不能逃脫這個命運，但是據馬寅初先生說：“……至在華外人決同樣徵收”，似乎當局能夠衝破外人的牽制，可是這句話在口頭上說說，倒是噫哈，如果要動手實行，恐怕老鼠碰到貓兒，就會表現出另外一副面孔。外人在中國領土上所開設的以及間接在他支配下的“營利事業”，如銀行工廠航業鐵路礦山以及許多公司行棧等等，資本遠遠地壓倒中國的民族資本。他們每年在中華民族身上所榨取的“營利所得”，數目是多麼驚人，如果也能夠仿倣那些主權獨立領土完整的國家，對於那些在自己領土內開設的工商業，不分賓主，一律徵收所得稅的話，那倒是“漪歟盛哉”的一回事；可是在‘敦睦邦交’的原則之下，這種違反邦交的事，當然是“着毋庸議”！但是，這個巨大的“源”，放着“不開”，那末，所謂所得稅，已經是一個畸形的東西了。可是這還不算，更糟糕的還有一個為中國法律所不及的租界的存在。在租界內開設的外資工商業，當然是無法徵收他們的所得稅，就是華資的工商業，也會處處受着不平等條約的束

縛而無法徵收，比方，當二十年營業稅開始施行的時候，上海就因為外商租界納稅問題不能解決，結果不能開徵，就是一個明證。那末，這些成為華資工商業的重鎮的租界，既然因為碰到帝國主義勢力的阻礙而又喪失了一個重要的稅源，於是，這個畸形的所得稅，更加支離破碎了。可是再說吧，這還不算，還有更重要的致命傷在！那就是租界的存在，是一個絕好的資本逃亡的淵藪。本來，中國的大宗財產，是公債執券人，銀行存戶，和大公司大銀行的股東等等，對於這些“證券存款”和“營利事業”的所得，應該是所得稅徵課的主要對象，可是你有什麼辦法去阻止他們把存款移到外商銀行裏去，把產業移到租界內來，把流資去買外國的股票？很明顯的，如果所得稅雷厲風行地實行起來的時候，這種逃稅的現象，是必然發生的，那末，這樣“為淵毆魚”的結果，祇是加強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而已。在這樣情形下所勉強支撐起來的所得稅，不但是殘缺不全的東西，而且是有名無實的一個空架子！

其次，就是我們不要提起資本逃亡這一事實，其他的阻力，也會使所得稅擱淺的。資本逃亡還是一種消極的抵抗，他們除了消極的抵抗外，還可以來一個積極的正面的抵抗。我們知道中國式的“財主”，往往在政治上和社會上潛伏着巨大的勢力。現在要把租稅的負擔，放在他們的肩頭上，無疑的他們是要咆哮起來的。然而用政治的權力去強制執行吧，可是現政

權的基礎，基本上就是建築在他們的身上，而且執政者的本身，也就是所得稅所應該徵課的對象。他們當然自己不願挖自己的骨肉的。那末好了，這些在中外銀行動不動就有幾百萬幾千萬的存款底豪富們，以及那些擁有巨大資產的軍閥官僚地主買辦資本家們，既然所得稅的槍口，不能向他們瞄準，那末，這樣的所得稅已經喪失了所謂‘調劑貧富’的根本精神，所得稅云乎哉？

同時，我們還要指出，在四分五裂的中國封建割據勢力下，所得稅的施行，恐怕不會超出中央勢力所能達到的範圍內。那末，在這樣局部施行起來的所得稅，即使拋開其他的條件不說，而所得的效果，恐怕也是很有限的了。

再則，開徵所得稅的聲浪，恰巧是在救濟工商業的聲浪叫得很響的時候發出，這樣“落井下石”的政策，牠所盡的作用，不能不說是替帝國主義把“奄奄一息”的民族資本，更快地使牠斷氣！實際上在工商業紛紛破產的現在，除了極少數以外，都是虧蝕的虧蝕，倒閉的倒閉，根本上說不到盈餘，既然沒有盈餘，那末，拿純收益為課稅標準的所得稅，將用什麼理由去徵收呢？而且，商人們抵抗所得稅的方法，除了資本逃亡這一武器以外，還有一個更有力的武器——匿報和虛報。而匿報和虛報的可能，是存在賬簿組織非常混亂的中國社會內。我們知道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內，政府機關有工商業的詳細

登記，工商企業有完備的會計制度，所以要計劃牠們的盈虧是不大困難的事情。可是在我們中國，因為經濟的落後，賬簿組織的混亂情形，就是局內人，有時也莫名其妙，局外人更無法知道他們的內幕了。在平時，有的商人已經用着兩種賬簿，而在所得稅開徵時，他們更會施展出欺騙蒙蔽的手段來，他們可以裝出“窮相”，就是稍有多少盈餘，也要在呈報中說是虧蝕，在這樣情形下，你簡直是束手無策，雖然堂皇地規定着虛報匿報遲報等等的罰則，但你有什麼證據去證明他們的虛實？假使要進行調查，恐怕調查費用的支出，就得超過所得稅的收入，如果由主管徵收機關來審查估定，恐怕層出不窮的糾紛事件，就會使你窮於應付！

一句話說完：在缺乏主權的獨立，政權的集中，產業的發達，會計的完備等等的社會條件之下，要毫無阻礙地實行徵收所得稅，可以說是不可可能的。

然而，我們一方面固然要強調着在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中實行所得稅時所發生的許多不可能的事實；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否認這個所得稅暫行條例是會發生多少作用的，反之，我們正要指出牠在半殖民地的中國所僅能發生的作用。我們在上面就已經指出，牠所能夠實現的，祇是那些最不重要的部分，這最不重要的部分就是條例中的第二類和第一類中的中小資本的工商業，因為勞力出賣者和自由職業者，他

們的反抗力比較小，而徵收起來也比較容易（課源法），同時，中小資本的工商業，政治的勢力可以壓服他們，而他們有時要逃避也無法逃避的。

這里，我們可以明白知道，一方面因為財政危機一天天的嚴重，當局對於所得稅的開徵，確具相當決心，同時另一方面我們也相信當局是會避開那些比較大的阻力而朝向這個比較小的阻力而下手的，雖然從這方面所得到的僅是很可憐的數目，可是在“聊勝於無”的安慰之下，當局是具有很大的勇氣呵！

假如以“公平”“普遍”為號召的所得稅，結果却落到這樣的下場。那末，我們不知道這種所得稅，究竟和所得捐有什麼分別！

交 通

1. 論鐵路建設與鞏固國防
2. 論滄石路的建築

論鐵路建設與鞏固國防

駱耕漢

一 一個“空前未有之舉”！

本年一月廿一日，孔祥熙，蔣作賓、張羣等十一位要公，在國府舉行第二四六次行政院會議，當時通過議案多件，其中有一件是孔財長和張鐵長聯合提出的，即由財鐵兩部發行鐵路建設公債一萬二千萬元，作興築新路和展延舊路之用。隔了一天，號稱大公無私的天津大公報就評論說：“此為中樞改造後在經濟建設上第一重要計劃，亦為政府多年空前未有之舉”。最後它還要求“全國各界重視此決議，應監督並扶助政府，完成此自力建設之第一步事業，……使世界人知中國國民在如此國難中，尚能為偉大建設，在如此貧窮中，居然不倚賴外援”！

真的，這確是“空前未有之舉”！為什麼呢？因為國家如此窮，窮得連舊有債券的本息都無法償付的時候，還要不顧一切

地發行這樣一大筆新債；而且這筆公債，在國難這樣危迫的關頭，還不是用來武裝人民，而是用到鐵路建設上面去的。

不過，據說此中也有高深的哲理；簡單地說，還是爲了鞏固“國防”！在前述議案提出前三日，即一月十八日，天津益世報的社論就預先告訴我們說：“政府方面以本年爲鐵路年”。我們曉得，所謂什麼什麼年，無疑地是含有國策的意味的，如上海去年的學生國貨年和民衆識字年，就是含有振興中國的心願。所以在“鐵路年”的號召之下發行一萬二千萬元的鐵路建設公債，無疑地也就帶有鞏固“國防”的作用了。嗣後據香港工商日報探訪所得，張鐵道部長於三月間南下策劃西南鐵路，與粵桂當局磋商各項問題的時候，更言明是爲了“國防”，是爲了“整個的國家利害”，這樣，間接的臆說就更成爲現實的斷語了。此外還有一個有趣的證明，值得介紹出來，即日本軍部御用的通訊機關同盟社，於一月廿五日從東京發出一個電訊，說張鐵道部長一月間的北上，與一萬二千萬元鐵路建設公債的發行，完全是爲了阻止日本和冀察政委會合作，以開發華北的鐵道網；假使用日本軍部所慣用的術語來說，即在作排日之陰謀與準備！

然而真正的事實到底怎樣呢？他們積極從事鐵路建設，真的是自動地爲了鞏固自己的國防嗎？

二 英國的國防和自己的省防

爲了使問題能夠得到最適切和最現實的解答，我們且舉一段最恰當的事實來看看。前面說過，這次的鐵路建設公債是用來興築新路和展延舊路，若按地域分佈來說，前者是偏於西南，後者是偏於華北。當然，這兩項建設計劃是不會同速度進行的；按照目前的情勢而論，前者似更重於後者，譬如自衡州至南寧之湘桂路，和自長沙至貴陽之湘黔路，據張部長聲稱，均已派員測量，并可照原定計劃進行。至於張部長這次兼程南下，具體磋商粵漢路通車後的總站問題，粵漢廣九兩路的接軌問題等等，自然更能顯出西南鐵路網的推進，是這次鐵路建設運動的中心。這點是非常重要的，它決不是單純的程序上的先後問題，而是了解今年的鐵路年的關鍵。這話怎麼說呢？

我們總還記得：去年五月間英國鐵路專家哈蒙德將軍，來華受聘鐵道部顧問，同時在短短的一二個月中間，他還踏遍了中國的各大幹路。日本對於這件事，當時表示極大的不滿和戒心，因爲它認爲這是老盟友拒絕它向南發展的準備工作。同時，我們當然更不會忘記：英國最近曾以驚人的速度在擴充香港的空軍勢力，因爲它見到日本那樣猖獗，甚至從冀東伸展到閩南，假使不再起而準備，太平洋上將沒有它的立足餘地了。因此將哈蒙德將軍開其端的工程完成起來，就非常迫要了，同

時羅斯爵士也就負使命南下了！然而，湊巧得很，哈蒙德和羅斯所努力的工程，正是張部長近來所積極策劃的西南鐵道網的完成，即第一完成粵漢通車，并與廣九接軌，第二完成川黔幹路及其附近幹路。因為這種大功告成以後，香港既與武漢打成一片，西藏也不遠離華中了，它不僅使英國可以坐鎮原有的半個中國，必要時還可趁機回到華北去呢！所以目下的鐵路建設運動，假使真的是爲了鞏固國防的話，那末這國防與其說是中國的，或者還不如說是英國的，更來得適當，因為西南鐵路網的完成，確是大英帝國在香港的國際防線的延長呀！

不過，我們因此而即論斷：目下的鐵路建設運動（主要限於西南，是完全爲了鞏固英國在華的國際防線，也是不夠充分的，爲什麼呢？因爲誰都知道：中國還在割據的局面之下，每一個軍事集團都想兼併另一軍事集團，而這次完成西南鐵路網，尤其是完成粵漢廣九兩路接軌的計劃，很明顯的就帶有這種作用。據香港工商日報所載，中央爲了實現兩路接軌，這次除掉派遣張部長南下疏通以外，同時還電令海外的王寵惠氏於抵粵後亦將此事提出磋商。這樣的忙於籌謀，甚至以“救國大計”相標榜，一方固然是爲了促使中英兩國經濟，“更趨密切”，同時也是爲了“南北政局更能統一呢”！廣東當局力加反對，自然也不僅爲了廣州一市的花捐，同時也是爲了還有更大的戒備。從這裏我們所看到的也不是鞏固國防，而是鞏固省防或是

“團”防呢。

三 帝國主義的開路先鋒

現在我們姑且退一步，假定目下的鐵路建設運動，的確是自發的，而不是被人牽着鼻子的，那末它究竟能否如當局所期望的，即鞏固自己的國防呢？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當然還得依循客觀的事實。

第一，我們且來溫一溫歷史。記得一八八七年時，滿清政府也痛感到國防的鞏固有賴於鐵路建設，於是就命重臣李鴻章氏計劃興築津沽鐵路，但其結果不僅無助於國防的鞏固，反而方便了各帝國主義各自奠定在華的勢力圈，形成瓜分中國的基礎。試問：中國現有的國有鐵路，那一條不是操縱在列強手裏？老實說，到必要時，全是列強運兵輸卒的利器呀！事實所以會和計劃或預定目標差得這樣遠，主要不外下列兩種原因：一是當時的中國已經成了列強爭奪的對象，它們伺候各種機會來實現已定下的野心；二是滿清政府對於這種外力一點也不能防範，同時財庫空虛，爲了築路，又非大舉外債不可，這樣整個中國就開始成爲俎上肉了！到了現在，客觀的情勢更比滿清時代險惡，財庫既一空如洗，列強又復加倍凶暴，那末誰能担保未來新築的鐵道不受列強的霸佔或操縱呢？而且我們已經有了眼前的實例，那就是粵漢路的株韶段了。該段是前年六

月動工的，一開始就在六厘英金庚款公債的扶翼之下，所以到現在也就成爲英軍勢力或英國商品自香港直趨長江的唯一橋樑，將來的湘桂路與湘黔路，其前途究將怎樣，於此也可想見一斑了！

第二，目下是國難的時期，而且這個國難不是將要開始，而是一天厲害一天地在實現了；在這裏，我們只要想起日本的大陸政策，現在已從東北，華北而閩南，就可洞悉國難已經到如何嚴重的程度。試問在這樣的條件之下來建設鐵道以鞏固國防，不是大有“賊去關門”的背時之感嗎？何況敵人還絕對不容許你有真正的“自力建設”呢！這是一。其次，就算鐵路建設來得及進行而且可能進行，對於一切均極落後的中國，不特不能增強國防，甚至要破壞國防。鐵路建設的推進，可以幫助英日的陸戰隊深入中國腹地，而不受游擊隊的牽制和威脅，所以無怪英國要積極完成西南鐵路網，日本也要在華北敷設滄石彰濟各鐵道，在這裏鐵路建設公債只是做了他們的開路先鋒，國防云何哉！

把前面所說兩點歸納起來，我們可以明白認識，在目下以建設鐵路來鞏固國防，不僅不可能，而且是自殺。假使執政當局真的是爲了鞏固自己的國防而來提倡鐵道建設，那末我們希望他們及早回頭，因爲時至今日，就鐵路而言，我們當前的任務不是建築新路，而是保全原有的舊路。要曉得自殷逆汝耕

在冀東成立偽政府以來，已經輕易將北寧路的新榆段竊奪過去了。據報載唐山站自去年十一月底起，至今年一月十一日止，被扣去路款四萬餘元，榆關站自去年十二月廿九日起至一月八日止，扣去二萬六千餘元，嗣後扣款之風雖告停止，但是這是張鐵道部長和陳覺生局長認真“交涉”，答應每月先由北寧路局自動貢獻十萬元的結果。試問：這樣順服下去，將原有的鐵路一段一段地割讓，那末還談得上什麼新路的建築呢？

——一九三六年，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紀念節。

論滄石路的建築

路 耕 漢

在‘永生週刊’第三期第六十五頁上，載有一幅非常時期的時事圖解，描畫着華北鐵道的分佈情形。它告訴我們說：縱貫華北的有兩大鐵道，一條是津浦路，在該路北段有一滄州；還有一條是平漢路，在該路北段有一石家莊。從滄州到石家莊又有一條尚未完成的鐵道，那就是本文所要特別討論的滄石路。

這條未成鐵路雖然不很長，計僅二百二十一公里，然而却甚重要：第一因為它將華北兩大幹路（即津浦與平漢）直接溝通起來，使運輸上敏捷得不知多少；第二因為它與正太路的東端啣接，能使井陘的煤，尤其是山西的煤很迅速地送到海口。因此，各帝國主義者一向就很鍾情於這條未成路的建築，譬如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這五年之間，意大利的葛拉錫莫蘇里公司，法國的中法聯合會，英國的裕泰銀公司，日本的華昌公司，都曾爲了該路的路權而與中國當局周旋了一番，不過皆因時機未熟或條件未妥等等關係而未完全實現，以致該路

直到現在還是一條只有路基而無路軌的未成路。最近據報載，冀察政委會已決定開始修築該路，這無疑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時事。不過冀察政委會爲什麼現在要修築滄石路，它到底是爲了自己還是爲着別人，倒不是難以理解的問題。這有下列兩點原因：

第一，冀察政委會這個政權，到現在已經成爲舉世周知的傀儡政權，它的天職就是如何將華北在最順利的條件之下，一塊一塊地割讓給日本。這並不是我們存心要侮辱負責當局，而是客觀的事實逼得我們不得不抱定這種認識。我們且不論冀東和察北有否收復，但問北寧路的路款和路權，是在誰的手中斷送了的？發動救亡運動的北平學生，誰在那兒拘捕殺戮？對於滾滾而來的私貨，有誰出來道過半個不字？爲人作砲灰的防共協定，是經誰的手在那兒簽訂？事實告訴我們，只要冀察政委會有所行動，就沒有一件不是賣國賣民和投降日本的無恥行動！

第二，日本自去年春間提出中日經濟提攜的方案以後，就主張開發華北的富源和鐵道，而它所擬定的華北鐵道計劃之中，最最迫待修築的就是滄石鐵路。對於這條鐵路，滿鐵會社及其代理人興中公司已經不知調查了幾次，計劃了幾次。最近（即本月八日）滿鐵理事石本爲了更具體地磋商滄石路的修築，還在天津滿鐵官舍歡宴華北鐵路販子陳覺生氏，使滄石路

可以趕快修築起來。

只要把上面兩點歸納起來，則冀察政委會爲誰修築滄石路這一問題，原是用不着再加說明了。不過本月二日東京同盟社忽然發出這樣的電訊，說羅斯爵士這次北上與北寧路局長陳覺生氏磋商結果，於前月三十日發表由北寧路局支出經費一千六百萬元，修築滄石路，日本政府認爲有害日本之既得權利，將斷然加以反對（見五月三日上海每日新聞）。這樣，問題好像又複雜起來。第二天（即本月三日）路透社又替英國辯白態度，說英國並未參預滄石路的修築，而以財力人力強迫冀察政委會修築滄石路的倒是日本自己；而且它還解釋說：因北寧路局用以修築該路的經費，必需撥自路債基金，而這筆基金是預備該路營業收入不足時補償英債用的。於是外界就誤認英國投資修築滄石路（見五月四日大陸報）。雙方說得這樣確鑿，好像大有使人無所適從之概。其實，事態還是容易明白的，路透社這一次的聲明是可靠的。因爲一，羅斯這次北上的任務，主要只在慷南京財庫之慨，以與華北日本當局情商減低關稅爲條件，而請其停止“走私”，免使英債基金以及英國在華北海關行政權上的地位感受威脅；二，英國早因歐非多事，放棄在華（至少在華北）與日抗衡的政策，而要求英日老同盟的復活。所以斯羅這次北上絕對不會那樣不識相地如日電所傳，與陳覺生氏磋商滄石路的修築與控制。

那末日本爲什麼要無的放矢呢？這要懂得日本的新聞所玩的把戲。日本的通訊機關以善於造謠聞名於世，不過他每次造謠都有侵略作用。譬如它明明知道中蘇兩國最近並沒有締結什麼協定，但是它定要放出五花八門的謠言，說協定的內容是如何如何排擊日本，好像身歷其境一樣。而它這樣做的目的，是要強迫中國當局更向他“修好”，趕快簽下防共協定，替他去當砲灰，同時使自己的部隊更可大公無私地開到華北各地。所以日本的新聞謠言骨子裏也是侵略的。它這次說英國投資滄石路的作用也是如此，它要使英國更公認它是獨霸東亞的主人，至少也應竭誠擁護它在華北的任何行動，按眼前的例子說，就是要擁護它去獲得滄石路的獨霸權。

冀察政委會爲誰修築滄石路的問題，既已完全明白，那末我們可以進一步地來探討：該路一旦修築完成以後，又將發生怎樣一種作用，這裏至少有下列兩點可以指出：

第一，山西和井陘的煤（爲華北和全國最富的煤區）一旦開掘出來以後，就可迅速地自正太路順着滄石路送到海口（按冀察政委會目下的計劃，該路要築至渤海灣的歧口），這就是說，日本本部隨手可以取得山西的煤炭。日本目下正苦於燃料的缺乏，以致不能大踏步地開拓其重工業和軍事工業，作爲軍事侵略的基礎。現在既能攫得豐富的煤源，那末它未來併吞全中國乃至進攻蘇聯的力量，無疑地可以大大增加。

第二、目下駐紮在平津一帶的日軍，除掉沿着平綏路西進而外，將來更可靠着滄石路而直達太原，對整個西北可取夾攻之勢。這種軍事條件一旦完成以後，日本自然更有把握來兼併華北和西北，並由內蒙而掠取外蒙乃至蘇聯的邊境。在這兒，我們絕對不容忽視日人近來正在趕築赤峯至多倫和熱河至北平的兩條軍用鐵路的活動。

由前面經濟的和軍事的兩種作用看來，滄石路的完成無疑是日本大陸政策完全實現的重要關鍵之一，同時也是它積極進攻蘇聯的必備條件之一。所以正當目下共同防共的聲浪節節高漲之際，滄石路的修築也就很快地具體化起來。不過我們不應忘記：滄石路完成的一天，說不定也就是我們中華民族全部滅亡的一天。所以爲了整個民族的生存，我們有誓死反對冀察政委會修築滄石路的責任和必要。

一九三六，五，十。

東 北

1. 東北勞動大眾的亡國奴生活
2. 東北農民的生活和奮鬥

東北勞動大眾的亡國奴生活

葉 民

我們的“友邦”，自從在一九三一——三三兩年中間，接受了我們的政府在不抵抗政策下慷慨地送給它的東北四省的三千二百萬的中國人口和七萬七千三百方里的中國國土以後，它對於怎樣處理這新佔領的殖民地問題，却很費了一番心計，它第一步的辦法當然是先把這三千二百萬人中間的軍閥官僚買辦土劣們安排好。它在東北四省的地盤上建立了一個嶄新的“滿洲國”，製造了許多特別肥好的美缺（“滿洲國”國務總理的年俸比日本國國首相的年俸還要大兩倍至四倍），讓它的中國走狗日本走狗們都可以盡心着力地幫助他們的主人來鎮壓和掠奪這三千二百萬中國人中最少佔居三千萬的勞動大眾。

從所謂“滿洲國”的中央政府以至於十省的省政府，縣政府，村政府，它統要中國人擔當名義上的首領，可是日本人掌握實際的大權。它尤其注意於與勞動大眾更有直接關係的縣政府和村政府的組織。各縣縣政府都規定着是中國人當縣長，

日本人當參事官和總務科長。所有縣政府的一切來往文件的收發和一切銀錢的出入，都歸總務科長管理；縣長不得過問。全縣所施行的一切事件，都須經由參事官的准許纔能實施；一切上下來往的公文函件必須先經參事官看過准許纔能遞給縣長。

從一九三三年七月起，各縣開始舉辦新村制。每縣分八個行政區；每區分五個村。把舊有的小村改併為大村；小村的住民都迫令搬到大村，以便容易監視。每村設村長一人。村長當初規定是中國人；但從一九三四年七月起，漸漸都改用日本人；或者村長仍是中國人，而聘請日本人當指導官。所有城鄉住戶都編制起來，合十家為一牌，在一村或和村相當的區域以內的牌合成一甲，每一行政區域的甲合成一保。一縣設一警務局，一區設一警務署，一村設一警務隊長。警務局長和警務署長完全都是日本人。每一縣城另設保安警察一大隊，每隊四中隊，隊長中國人，但每隊有日本人指導官一人或二人，實際管理着全隊人員。全縣警察額數，頭等縣七八百人，二等縣五六百人；三等縣四五百人；都有良好的槍械。各縣各村平時就由這些武裝警察駐防着。

遇有人民有什麼反抗的行動，日本軍隊和“滿洲國”軍隊，大砲和飛機，便立刻到來，現在日本全國的三分之一以上的軍隊都駐紮在東北；北滿方面的日軍就有十二萬人以上。“滿洲

國”軍隊也大約有十萬人。東北各地有四十個以上的飛機場：瀋陽，哈爾濱和龍江是三個中心。這三處的飛機場每處都可以容納一百五十架以上的飛機。從一九三一年九月到一九三四年六月，在短短的不到三年中間，我們的“友邦”在東北所建築完成的鐵路有濱北（哈爾濱到北安）齊北（齊齊哈爾到北安）拉濱（拉法到哈爾濱）敦圖（敦化到天圖）朝峰（朝陽川到圖們江岸）拉納（拉哈到納河）七條；同時間所建築完成的汽車路約共四千五百里。這些鐵路和汽車路大多數都是屬於軍用的性質。在遼甯東邊道和熱河境內有所謂“警備路”，更加不准普通人民行走。普通人民走了，捉到立刻就槍斃。

東北四省的人民原來大多都有自衛用的槍枝。但從日軍佔領東北後，就迫令他們把槍枝繳出。據“滿洲政府”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所發表的數目，在遼甯，吉林，黑龍江三省所沒收到的槍枝就已經有二百五十萬之多。尤其在吉林和朝鮮毗連的各縣，所有民間的武器更加搜羅得乾淨，只准每十家人民保留一把刀，為切菜之用；因為日軍認為這些地帶是對外戰爭時的後方，不得不特別注意。

但是我們的“友邦”在東北的主要的目的是在掠奪勞動大眾。雖則它在過去三五年中，在東北大費心計地所施行的一切白色恐怖政策並不會能夠完全把當地的人民鎮壓住，可是它並不會因此而把它的掠奪工作遲緩一些進行。現在東北的一

切的產業部門都已經被它獨佔。中國人民的企業不是被逼着歸併於它的“托拉斯”和“辛的加”，就是迫得以實際價值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代價賤賣給它們了事。中國銀行在哈爾濱的麵粉廠也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以極低廉的價格出賣給它的三井，三菱等財閥。曾在東北住居了十年以上（從一九二四到三四）的格拉時屯察夫（A. T. Grajdanzev）先生說得好：“日本的這種新的獨占精神已經在什麼地方都已滲透到。哈爾濱河裏的冰已經被獨占起來，別的人再不能隨便去取……。一般住家再不能自由僱人去清除自己的園庭，非得找獨占該項事業的日本人不可……。貨車的裝載和卸落已經被一日本公司所獨占。哈爾濱附近的石山也已獨占起來”。凡是東北人民可以投放勞動而我們的“友邦”可以由此剝削東北人民剩餘勞動的地方都已經沒有一個不被它霸占而壟斷起來。所有東北的一切勞動者都不得不在我們的“友邦”底鞭策之下過生活。

東北的工人固然不只是中國人，還有日本人和朝鮮人，但中國人佔絕對的多數。不說在最近三五年內被日本所佔領去的東北地域，就是在已經被它統治了三十年的旅大租借地，中國工人也佔當地全體工人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據日本關東廳一九三一到三二的調查，旅大租借地的工人，主要的是農業工人、交通工人和廠工礦工。農業工人當然差不多全體都是中國人；就是交通工人和廠工礦工中國人也依次各佔百分之九

十五,百分之九十一和百分之九十七。

中國工人在東北全體工人中佔到最大的成份,同時也受到最壞的待遇。中國工人的工資只有日本工人的四分之一上下。

一九三一年東北各主要都會的日中工人日工資的比較:

	中國工人 每日工資 【日元】	日本工人 每日工資 【日元】	前者佔後者 的百分數
大連	0.86	3.19	27.0
瀋陽	0.90	3.03	29.7
安東	0.90	2.87	24.4
長春	0.70	2.96	23.7

並且中國工人差不多全部分都是臨時性質的僱工,一九三三到三四南滿鐵路所僱備的一萬零三百八十六個中國工人中,只有三人是長期僱備的。

從一九三一年日軍佔領東三省以後,中國工人的工資更加迅速地降低。撫順煤礦一九三一年後的中國工人,每產煤一噸平均所能得的工資只有一九二九——三〇的百分之四十到四十四。

一九二八到三三,歷年間撫順煤礦的中國工人每產煤一噸所能得的平

均工資的比較:

年 代	工資(日元)	指數
1928年4月——29年3月	0.25	100
1929年4月——30年3月	0.23	92

1930年4月—31年3月	0.17	68
1931年4月—32年3月	0.10	40
1932年4月—33年3月	0.11	44

“滿洲政府”的地方情形調查團，調查了遼甯省三十四縣吉林省十縣和黑龍江省十二縣的地方情形之後，也說：“僱農之工資，除幾區特殊景況者以外，已減低至百分之五十”。

但是就是這減少了一半或者一半以上的工資，東北的中國工人也很難安心拿到。一九三一以後，我們的“友邦”對於東北的中國工人簡直隨時隨地加以虐殺和驅逐。當然，對於這一類的消息我們的“友邦”都是用盡一切的方法，防止它們向外洩露的；但是因為這類事實的發生實在太普遍太經常了，我們從報章上雜誌上也往往可以知道一二。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撫順煤礦工人三千人被日軍用機關槍屠殺。一九三四年春天又有三千二百多個的築路（從吉林穆稜煤礦到密山縣王家燒燭屯）工人，爲着索取他們應得的工錢，被日軍在密山山裏用機關槍盡數殺死。同年五月有三萬四千多個被驅逐的農業工人因爲沒有路費回家流落在瀋陽討乞。同年十一月有三萬七千三百七十八個被驅逐的山東工人分經大連和安東兩地方由海道回國。一九三五年撫順煤礦工人又因爲反抗日本人的虐待，被礦警大屠殺；礦工被殺的一百十四人；傷的六十六人；被捕的六百人。

可是我們的‘友邦’現在正在東北從事種種的軍事建設，它正急需大批的廉價的中國工人替它工作，所以從一九三三年起就有許多日本浪人和漢奸分頭在北方各省招工和拉夫。拉夫的辦法在冀東各縣在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的保護之下進行。招募的辦法主要地在河北山東各縣行使。單單一九三四年一年中間被招募去的工人就有三十八萬八千人。就中山東人最多，佔百分之五十；河北人次之，佔百分之三十八；河南人又次之，佔百分之三；其餘則為其他各省的人。這班新去的工人，他們在東北沒有任何的社會關係，他們所受到的待遇自然更壞。他們簡直不是工資勞動者，而是純粹的奴隸。當日本浪人和漢奸在各地招工時，他們都竭力地宣傳到東北去做工的好處，除每天可得一元到一元五角的工資外，並且可以有許多優待的條件。一般正被稅捐，租籽，債務，重重壓迫得無法生活的貧農和工人聽着，自然受他們的鼓動，跟着就走。可是一到關外，情形就完全改變。這些新的工人大多數都是分派去建築鐵路和汽車路的。他們上邊有日本浪人當監工，漢奸當翻譯，御用刁刻的中國工人當工頭，另外還有日本軍隊，層層地周密地監督着。他們天一明便工作，一直到黑夜還要點着汽燈趕工，每天工作最少在十二小時以上。不管嚴寒大雪，不管狂風暴雨，不准有一天休息。晚間隨地而臥；日裏連黃煙也不准吸一口。假使誰動作稍微慢些，監工和工頭的木棒和皮鞭就立刻

落到他的身上。至於工資呢，二三個月不發一個大。每天三頓稀粥或者臭高粱米飯，由工頭供給。誰敢做聲一句半句，日本軍隊就把他帶去當共產黨槍決。機靈些的工人當然冒着危險逃跑了；至於一般的工人在那裏既沒有親戚朋友，又層層地被監視着，只能日夜地帶着半飢半飽的肚子工作着，一直工作到死爲止。於是另一批新的工人再從山東、河北、河南等省招募了輸送到來。許多人看到我們的“友邦”禁止華工出關，以爲它不要中國工人出關工作了，實際上它所不要的只是自動出關的中國工人，恐怕他們在關外有熱識的人，不能像浪人漢奸招募去的工人那樣地任意地處理。

我們的“友邦”不但是在招募——其實是拐騙——大批的中國工人到東北去做工，並且正在東北各縣各村強迫着當地土着的農民替它服役。例如一九三四年三月，在遼寧省的錦縣、北鎮、黑山、錦西、興城、綏中各縣的村鎮裏，所有的農戶每二十家必須出壯丁一人運送到熱河去築路。同時，熱河的農戶每家有五個壯丁的必須抽出三個，有三個的抽出兩個或一個，應這個差。一九三四年八月到十一月底，在遼甯、東邊道一帶的義勇軍異常活動，日本和“滿洲國”的軍隊幾次進攻都沒有能打勝。他們竟強迫着當地所有的農民都去築路，完全不准下田耕作。東北四省的農民，都是這樣地隨時隨地被軍隊官廳強迫着拋棄了自己的農作無代價地去替他們建築大部分軍用的

汽車路。這種情形甚至於連“滿洲國”的參事官（大多是日本人）也看了覺得太使農民苦痛了；他們在一九三四年六月曾聯名向關東軍請求把築路的工作暫緩進行，以免激起一般人民的反日思想。這當然只是使關東軍更加加緊對於當地農民的壓迫，其他不會有什麼結果的。

東北的農民，除開築路外，並且必須負擔軍需運輸的責任。一九三四年六月黑龍江省各縣限令在半月內須徵集大車五十輛。同月遼甯省義縣，興城，綏中等縣，也限令在半月內須徵集大車一百五十輛，和“伙子”即脚夫三百名。農民必須趕着自己的牲口拉着自己的車輛去替日軍運輸軍需。這些伙子大多數一去就到死不能回來，所以都是由農民攤出了錢買那些最窮苦的村民去當的。這些車輛牲口也一經徵集了去，就很難發還。“滿洲國”的調查委員會在瀋陽調查後，知道瀋陽第六區被政府所徵集的大車共六十九輛，可是後來歸還農民的只十九輛；第七區被徵集了一百九十九輛，歸還的只三十五輛。

而且農民須負責供給當地駐軍的糧秣。一九三四年六月在察哈爾沽源的第×區，第四區駐紮着有兩大隊日軍。他們向沽源全縣各村徵派糧秣和壯丁。第二區第四區農民的糧食都被他們搜羅去當做馬料。一般農民們只能餓着肚子看着他們的馬吃着搜羅去的糧食。

尤其從一九三二年起，我們的“友邦”在黑龍江省的通肯

河流域，吉林省的松花江下游和牡丹江流域，遼甯省的遼河下游，和鴨綠江流域等土地最肥沃的區域裏，都逐漸進行他們的移民政策，這使當地原來有地的農民都喪失去他們的土地，原來沒有地的農民連租地耕種的機會也喪失去，根本使許多中國的農民失却存在的條件。它第一次的移民是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在吉林松花江下游的佳木斯強家屯。全村有田五萬餘畝，都是最肥沃的田，能夠兼種大米和小麥。日本移民迫令該村的農民把“地照”繳出，一律離開該村，讓他們的佃農雇農朝鮮人居住耕種。這些日本移民都是從日本在鄉軍人中挑選出來的；他們攜帶最全備的武器。當地的農民只得哭喪着臉走路，雖然他們並不知道有什麼地方可走。第二次的移民是在一九三三年七月在佳木斯東南的湖南營。這次和前一次的移民都是日本拓務省所組織的“武裝移民”。有些農民被強奪了土地不甘心，他們向當地政府交涉，結果都以通匪罪被判死刑。一九三四年三月，日本又向佳木斯東依蘭土龍山武裝移民。但當地農民已有準備，他們集合了附近鄉民一萬五千人與日軍對抗，日軍整整一連和它的司令官飯塚大佐，都被他們殺死。他們怕日軍再來，把土龍山四面的交通完全斷絕。因此這日軍全軍覆沒的消息過了一個多月纔被哈爾濱駐軍知道。於是日本當局遂從哈爾濱調遣第十師團的得力部隊一千餘人，攜帶着大砲重機關槍等新式武器，復派轟炸機十餘架幫着，一同都向土龍山進

攻。在一天中間土龍山附近的十七個村莊統統都被轟平。轟死農民五千餘人，其餘未死的農民都投入義勇軍，至今仍從事抗日戰爭。從這次以後，日本移民的武力保護更加周密。一九三四年六月，哈爾濱日本總領事警察署在吉林中東鐵路和牡丹江一帶設立警察分署保護日本人和朝鮮人移民。各地的日本人朝鮮人移民都有極多數日軍警保護。黑龍江的大黑河、海拉爾和濱北鐵路沿綫的克山通化等七縣，遼甯的瀋陽、營口，遼陽和熱河的開魯都是這樣地先後在一九三四年內實行移民。安東的農民，也被迫以時價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把土地賣給日本人，讓朝鮮人耕種。朝鮮本國的耕田據日本當局的統計已經有百分之六十在日本人手裏，所以許多朝鮮人只能逃到東北來求生活；那些能力較差不能逃出來的，只能硬硬地在朝鮮餓死。東北四省的農民不久也就要如此。

并且，我們的“友邦”在東北攫奪土地的進行決不能同在朝鮮那樣地遲慢。因為它在東北的移民，不但是爲了要解決它戰時的食糧保證問題，而且是充實國防上最重要的步驟。所以日本朝日新聞社的鳥居孝一在“日本對滿移民之現狀”裏說：“我國日本基於日滿議定書的規定，與‘滿洲國’負有滿洲的共同防衛的責任；爲着要保衛‘滿洲國’起見，可以無限制地增加兵力。因此一般的自由移民以及拓務省所主辦的具有自衛的戰鬥能力的內地(日本)農民的移殖，都是很切實有效的計劃”。

東北的農民在我們的“友邦”的直接統治之下，都很迅速地在減少着他們的土地和耕畜、車輛、勞力。東北四省的各種主要作物的收穫量和各種主要作物的種植面積也都隨着很迅速地在減少。我們只要根據我們的“友邦”的自己的統計就可以明白：

1930——1934年度東北四省主要農作物底收穫量指數：

[1927年度=100]

年度	大豆	其他豆類	高粱	粟	玉蜀黍	小麥	米	其他雜類	合計
1930	110	85	104	102	93	91	106	180	107
1931	109	72	93	92	97	109	109	183	105
1932	89	64	81	81	90	78	87	153	88
1933	108	75	92	102	109	99	105	181	106
1934	74	64	78	65	94	45	106	128	77

1930——1934年度東北四省主要農作物底面積指數：

(1927年度=100)

年度	大豆	其他豆類	高粱	粟	玉蜀黍	小麥	米	其他雜糧	合計
1930	116	87	114	105	86	121	85	79	103
1931	119	78	112	107	98	139	88	89	115
1932	109	75	100	103	98	123	69	82	120
1933	113	80	100	114	110	121	76	88	104
1934	93	80	102	105	112	73	84	92	96

東北四省各種主要農作物的種植面積的指數從一九三〇年的一〇三減到一九三四年的九六；各種主要農作物的收穫量的指數，更加從一九三〇年的一〇七減到一九三四年的七

七。

東北農民的農產物，不但它的產量在減少，它的產值更加減少。東北的一切農產物的市場，都受我們的“友邦”的完全壟斷。大豆的價格由一九三〇年每噸九十七元哈洋跌到一九三四年四十元滿洋；高粱的價格，由五十五元哈洋跌到十八元滿洋。因此耕地一公頃的收入在一九二九——三〇年可以有一百二十二元哈元，可是到一九三三——三四年却只有五十七元滿洋了。

但是東北農民所被迫着應該繳納的稅捐不但不能減輕，而且反倒加重。以前每“天”（在遼甯每“天”合十畝，每畝合七百二十方步）地最多不過七元五角的正稅和附加稅，現在竟增加到十七八元以至二十元了。東北的勞動大眾在我們的“友邦”這樣的王道政治之下，只有把食糧更加減少，把已經非人生活的生活更加降低下去。據“友邦”的御用報紙大北新聞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的記載說：“一九三三年度，滿人因生活能力所限，減少之糧食消費總數約一百五十萬噸”。這自然使我們“友邦”的食糧問題更加得到保證了。

據南滿洲鐵道會社一九三三年的調查，從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人在滿洲每年可得薪金和工資一萬二千八百萬元，投資所收的股利和債權所得的利益九千四百二十萬元，商業上可得利九千一百九十萬元，還有間接所得的利益四千一百二

十萬元，總計三萬五千五百三十萬元。這三萬五千五百三十萬塊錢那一塊不是三千萬的中國工人和農民日夜工作的結果？中國的工人農民整天整年工作着而不能得一飽；但是我們的“友邦”在東北的投資却能得到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四十的利潤率。

東北農民的生活和奮鬥

徐 雪 寒

大千末劫已來到，
怎麼跑來怎麼逃？
山中有家歸不得，
城裏多產也空勞！
豬鼠年，
鬼神號，
餓牛滾，
火鴉叫，
天翻地覆海花笑！
這般禍，
何時了！
多少樓台成灰燼，
只剩鋤頭和鐮刀！

——東北農民間流行的新歌謠（註一）

東北已在“長期抵抗”之下陷落四五年了；現在亡國的慘禍，又輪到華北八千萬民衆的身上。在這四五年的掠奪，燒殺，和反抗鬥爭的血泊中，東北農民大眾畢竟認識了血戰是他們

唯一的生路！不見這首歌謠麼？

不抵抗主義的將軍，他仍能夠回鎮關內，擁兵專征，成爲剿滅“匪賊”的“社會棟樑”。向東北農民抽收稅捐和田租的官僚地主，他們也能夠歡送了舊主人，諂媚着新主人，依舊保持他們的地位和財產。惟有東北的農民，却成爲掠奪，燒殺，榨取和壓迫的對象。

飢餓燃燒遍了東北的農村。當九一八前後戰爭的年頭，打着太陽旗幟的異國征服者，曾經焚燒了千百的村莊，掠奪盡了農民的糧食，牽走了大車和牲口（註二），大多數的農村，就在這亡國過程中破產了！戰事過去之後，在東北農民的背上，開始建造“王道樂土”。可是，農民顯然感覺到日子更難過了！成堆的大豆堆在場前，等不到買主，或是讓“友邦”的商人用強搶般的法定價格買去了。田地上種出來的生產品，棉花，小麥，以至羊毛等等，都要讓統制公司用規定的價格來收買。春耕貸款祇加重了賦稅負擔。浪人的“質屋”，跟鴉片公賣，都輸入農村裏來。農民在新舊高利貸者的剝削下，失去最後的財產——田地執照。日本紙幣幾萬萬元發行了，在這貨幣的兌換中間，又讓日本商人和收買糧食的商人，獲得了種種額外榨取的機會。軍閥時代所發行的紙票，現在被強迫着用幾元或幾十元去換取一元新紙幣。這一轉換之間，農民很多弄得兩手空空，而且又不知道這新紙幣將來會值得多少？

這些，都像蛇那樣纏繞在農民們的身上：特產的滯售和跌價，商業資本的壟斷和榨取，高利貸資本的跋扈，貨幣制度的剝削。於是，土地耕種面積只好縮小了，農產品也隨着減少。號稱東亞倉庫的東北，現在多半淪為飢荒之域；從各地輸入糧食是必要的了。××的統治者和偽滿政府官吏，都以為這祇是災荒的結果，和‘王道樂土’的創造是沒有關係的。

不能再忍耐下去的赤貧，使質樸的東北農民，漸漸不安靜了！但是，更重要的刺激，是農民賴以生活着的土地大批地被掠奪，或者將被掠奪。這才是亡國人民的遭遇呢！鮮人移民團，武裝移民團，乃至戴着慈悲面具的宗教移民團，帶着武士浪人有組織地來圈掠土地。不管日本的移民運動過去如何一再失敗，不能全般實現野心軍閥們的目的，但是每個東北農民都會明瞭，這種掠奪土地和土地投機，跟着“王道”政策的存在，將會永無止境。飢餓和失去土地，逼使東北農民明白了他們現在的悲慘遭遇，跟亡國是密切地相關聯着的；他們終於知道，現在只有用血戰來拯救自己了。

東北農民用英勇的戰爭，來答覆新的征服者和統治者；用不屈的反抗，來嘲弄不抵抗將軍的喪權辱國。在×偽四十多萬精銳軍隊的統治下，農民所組織的義勇軍，在東北各鄉各村裏燃燒着。直到去年為止，日本國庫，還不得不支出一萬五千萬圓的滿洲事件費，來作為剿滅這些匪“賊”之用。

四五年來東北農民義勇軍的戰爭，在血的迸濺中獲得了許多經驗和認識。在九一八剛剛開始以後，東北農民的戰鬥組織，主要是採取了鬆懈的義勇軍形式。這種組織大多是由地主和新政權下失意的軍閥官僚們所領導，廣大的農民羣衆多曾參加。這種組織，在一九三一到三二年間，確也形成了一大勢力。但是這種初期的義勇軍必然伴隨着的缺點，是領導的錯誤，分子的複雜，組織的散漫，和當地農民間關係的不密切。熱河戰爭是一個巨大的轉換點。在戰役前後，幾千幾萬的義勇軍，都被中國政府的“安內軍隊”爲了“作戰方便”而驅散了。冰天雪地饑凍苦戰的同胞，再也引不起長期抵抗的將軍們的哀憐，隨着××統治力量的加強，隨着關內接濟的因“親善”而中斷，更隨着“領袖們”逐漸明瞭了救國的戰爭決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於是上層領導分子中的軍閥官僚，便多投誠叛變，把義勇軍出賣了；也有借着義勇軍而招搖撞騙的政客，在出賣了義勇軍之後，依舊回到關內來做他們的達官貴宦。

東北的農民大衆，多被這些上層份子所欺騙了；義勇軍的鬥爭，自然也受到影響。但是，整個農民大衆爲生活爲祖國的鬥爭，顯然是不能因欺騙而消滅的。於是，東北農民的抗×復國戰爭便走上了質的改造階段。

純粹的數量論者，他們會從東北義勇軍數量的減少上，來得出悲觀的結論：以爲東北民衆的武力，在敵人高壓之下，已

經粉碎和潰滅了。可是，事實恰恰不是如此。義勇軍數量的減少，是表示着鬥爭的進入更加艱苦的階段，動搖的領袖和動搖的分子，不能戰勝困難而倒下去了；新加入的廣大的貧農和農村工人，成爲義勇軍的中堅。這種質的改造，必然引起量的變化。但這種新的義勇軍的本質，使他更能完成救國的任務。

義勇軍所活躍的根據地帶，是利用有利的自然環境，在貧農佔着村民中的廣大部分，而又鄰近工業中心，勞働工人大批存在的地方。這裏，最主要的是遼寧省的東邊道，吉林省的延吉區，拉賓路沿綫，以及松花江，烏蘇里江和中東路間的三角形地帶。在熱河的北凌路沿綫，黑龍江的洮南索倫，長春洮南，和北安鎮黑河一帶，也是義勇軍經常出沒遊擊，予敵人以重創的地方。

這種新的更鞏固的農民義勇軍，在數量上也日益發展起來。據阿瓦林氏的調查，在去年年初，有嚴密組織的義勇軍人數，大約在九萬人左右。大約，遼吉兩省有六萬人，熱河省有一萬四千人，黑龍江省在一萬四千人以上。(註三)

東北農民義勇軍在成份上是改善了，在數量上也正在擴大。他們在物質條件絕對懸殊的鬪爭之下，已經學得了殖民地民族抗戰的游擊戰術。他們的階級構成，使他們和當地農民們的利益，保持着密切的關聯。他們不僅能和各地方的羣衆團體發生聯系，而且能夠化整爲零地深入各地農村中去。這又使他

們在戰術上有採用靈活的游擊戰的可能。這種義勇軍和前一階段的動搖而散漫的義勇軍完全不同，關東軍公報曾經這樣說：“這些義勇軍是不避討伐，不受宣撫的”！

在亡國的悲慘生活中，在長期的血和鐵的鬪爭中，東北農民義勇軍的革命武力鍛鍊成了。但是，現實的鬥爭，使東北農民更明白了，當他們反對××帝國主義的暴行時候，他們不得不同時反對××統治下的走狗——偽滿的軍閥官僚，地主商人。同時，推翻征服者的宗主國的統治權，也跟建設起自己新的獨立的政權，相密切地關聯着的。鬪爭，使東北農民義勇軍需要一種更嚴密的軍事組織和政治領導。於是，從東北義勇軍中，蛻化出了更堅強的戰鬪組織——人民革命軍，產生了簇新的人民政權——滿洲人民政府。(註四)

人民革命軍的產生和擴大，是指明東北農民的抗×戰鬥，已經進入一個決定勝負的重要階段了。它堅決的執行統一戰線的政策，團集了一切不願為漢奸的分子，團集了各黨各派的義勇軍與××敵人作殊死的戰鬥。它強有力的政治組織，保證着民族抗戰力量的順利發展。人民革命軍的產生，不是分裂了東北農民抗×的戰鬥力；而是把這鬥爭更推進了，他自己站在鬥爭的尖端；他和廣大的東北農民和義勇軍，保持着最密切的關係。人民革命軍有着更嚴密的組織與訓練，在各地義勇軍中間，已有莫大的影響，好多地方的義勇軍，都要求加入，或請他

派人在政治上軍事上去作領導。(同註三) 尤其因為他和農民間的統一關係，使他立在不敗的地位。日本新聞記者大宅壯一曾說：“他們都生活在不可透視的密林裏。樵夫和農民們，在他們的領導下到處都形成生活共同體 (Community)，並且隨着形式的變化，有着隨時都可以移動的準備”。他又說：“義勇軍和農民的分別是很難的，尤其是在人民革命軍，他和農民間兩者是不可分離地連繫着的”。(註五)

人民革命軍已成爲日僞軍所痛心疾首的武力了。他們的主力，分佈在吉林安東，綿延到大連間的三角地帶。根據日本方面的調查，人民革命軍的部隊，分佈在下列各處：

- 第一軍： 在北滿鄰接地帶的滿鐵沿線，統率者不明。
- 第二軍： 在間島一帶，與朝鮮×黨相聯絡，歸朱禎統率。
- 第三軍： 在珠河磐石方面，歸趙尙志統率。
- 第四軍： 在密山虎林方面，歸李延祿統率。
- 第五軍： 在甯安穆稜東甯方面，由周保中統率。
- 第六軍： 在湯原梓川方面，統率者不明。

人民革命軍的著名領袖——楊靖宇趙尙志李紅光等，已經成爲東北農民家曉戶喻的名字，已經成爲×僞敵人痛惡疾首的名字；我們生在關內的中國人民，關於人民革命軍的詳細活動情形，(註五) 很難得知詳細。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申報，曾經登載了一臧君的東北治安狀況一文，說得很是有趣，恐怕留意

的人不多，所以轉錄在下面：

‘此等×軍，大抵在密林中築有兵舍，利用山間曠地，開墾農業，頗有組織。其所採戰鬥法，為純粹的游擊戰法，神出鬼沒，雖精銳之日軍，亦往往入其彀中。數年來日軍在依蘭溝及百草溝一帶，討伐達百數十次，卒難奏功。如民國廿二年四月，日軍曾向間島×××大舉進伐，竟為×軍所敗，犧牲達三分之二。依蘭北方合永坪地方，且樹立×××區域界牌，日人欲經過其界，須受嚴密檢查。直至今日，仍不能越雷池一步。……至於×軍所以能持久之故，實因農民與×軍成爲一體。經濟上農民之共同組織，能使金融不致呆滯，且農事改良的指導訓練，又極純熟，各處村落在戰事期間，互通消息，共同防衛，故日軍卒難進攻’。

東北義勇軍和人民革命軍的鬭爭，一天一天擴大起來，這連關東軍也不能否認。這表示日本在東北的統治，祇得到漢奸們的擁護，却征服不了三千萬和土地相倚爲命的生產的同胞。日本對東北的統治，始終脫離不了征服的階段；因之，這種統治也極不穩固。當一九三四年人民政府成立，發表‘滿洲人民革命政府建立宣言’以後，“東北貧苦農民紛紛加入這種組織，抗×反滿的運動，如火如荼的燃燒起來”（生路創刊號）。日偽聯合大圍剿，幾年來都失敗了。正像大宅壯一所說：“滿洲義勇

軍，是把根基深深地建築在過去和現在的滿洲的政治經濟組織裏面的，並不是拿守備軍討伐隊等等東西，所能掃清的。據今年一月二四日日新聞所發表的‘滿洲國治安工作概況’看來，東北義勇軍依舊蔓延在東北各個主要根據地：三角地帶，東邊道及遼吉省境，東部邊境，濱江地帶，三江地帶（以依蘭為中心），京濱東西地帶（京濱鐵路東西沿線，靠山，雙子等），以及熱河方面等。義勇軍和人民革命軍的神奇戰術，使日本的“皇軍”，也疲於奔命。去年一年，這些“皇軍”戰死傷亡了九百四十六人，平均每日犧牲了三名；但在一九三四年還不足八百名。日軍爲了繼續統治東北，他們便不得不在東北農民大衆前繼續流血。自然，替日本打先鋒和武裝更不如的偽軍，他們的犧牲，更要重大數倍。

東北義勇軍和人民革命軍，繼續破壞着日本備戰的命脈——交通幹線，繼續威脅着各大城市。他向世界勞動大衆宣示：東北三千萬農民勞動大衆，是不願做漢奸和亡國的奴隸。

××屠殺和榨取下的東北農村澈底的破產了，××繼續掠奪華北乃至全中國，必然要使東北農民大衆的抗×怒潮，廣泛地激發起來。農民的戰鬪組織，已經脫出了初建期的領導上組織上的危險，形成了更爲嚴密的義勇軍，和有堅強政治領導的人民革命軍。東北農民四五年來所經過的道路，是每一個將做亡國奴的中國人民必須仔細研究的。東北農民和敵人的血

戰所換來的教訓，是用堅決的抵抗，在鮮血和白骨中：

建立起獨立！自由！平等的中國！

1936, 2, 11日。

(註一)參看生路創刊號。

(註二)參看申報經濟專刊第九一期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八日。

(註三)參看世界智識二卷七期。

(註四)參看申報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廿五日東北治安狀況。

(註五)生活知識第八期。

(註六)關於人民革命軍英勇卓絕的救國鬥爭，請參看田軍八月的鄉村，廬
紅生死場二大傑作。



青年自學叢書

怎樣研究中國經濟

錢俊瑞著 實價三角

本書共分七章：第一二兩章是敘述目前中國一般經濟狀況並批判一些歪曲的觀點；第三章是闡述研究中國經濟的方法論；第四章是說明研究和調查農村經濟的方法；第五章是講搜集和處理材料的方法；第六章是分析中國經濟的性質；最後是闡述目前研究國防經濟之必要。全書用故事體裁寫成，文筆生動有趣，實是年來以輕鬆筆調寫嚴重問題的最成功一本作品。

上海
生活書店
發行

中國經濟年報

中國經濟情報社編

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的一環，本書在說明一年來中國經濟所發生的幾個重要問題，加以精密的分析，使讀者認識牠們的癥結和動向。

第一輯六角半
第二輯六角

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的一環，本書在說明一年來中國經濟所發生的幾個重要問題，加以精密的分析，使讀者認識牠們的癥結和動向。

中國經濟論文集 第一集 七角

中國經濟論文集 第二集 七角

增訂三版 新經濟學大綱 實價二元

沈志遠著 生活書店總經售

中國經濟論文集

第三集

每冊實價柒角

外埠酌加寄費

編輯者 中國經濟情報社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活生

\$0.70